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对海外华文传媒予以特别的关注，研究它的意义在哪里？这是落笔之前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海外华文传媒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华侨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之一。在新闻传播史上，它的地位也不容忽略。

首先，它是世界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支系。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 3000 万，他们分布在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指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华文报纸第一种”、“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后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类似的出版物只能算是杂志，而出现在太平洋彼岸的《金山日新录》才是第一份“完全具备现代报纸的各种特征的”中文报纸）。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

的 1815 年算起，到本世纪初，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 180 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 52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 4000 种。20 世纪 30 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 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90 年代中期，海外华语广播先后开办 60 余家，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出现了卫星电视。20 世纪末，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继留学生的华文电子报刊之后，90 年代中期，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等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对 20 世纪以前海外华文报刊的情况我们可以较少关注的话（在华文报刊的累计总数中，20 世纪以前创办的报纸只占约 1%），那么 20 世纪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华人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带来的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地海外华文传媒大发展的局面，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了。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布广泛的庞大的支系，成为世界新闻传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次，它是世界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支系。

如同一部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当地历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海外华文传媒的移植、融合、发展的历史同样具有“三史”的意义：它既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又是外国新闻史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它们远离母体，与国内传媒有许多不同之处；作为外国新闻史的重要内容，它们又更多地带有中国特色，明显地区别于当地传媒。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世界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支系。

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外华侨普遍持有中国护照，其所在华侨团体与国内侨务机构的关系也是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既然如此，他们所创办的报刊自然也就被视为中国报刊或中国报刊在海外的衍生物而被列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范畴。二战以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获得独立，当地的中国华侨也相应取得了所在国国籍。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政府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自己的国籍。于是便有相当多的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华侨既然脱离母体而成为华人，华侨传媒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中国报刊（电台）演变为外国报刊（电台），从而成为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

外国报刊的创始人是中国人，而中国报刊一时间变成了外国报刊，这种同宗、同源、不同流的现象，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从中国新闻史或外国新闻史的角度对这两个时段、两种属性的传媒进行分别研究是必要的，而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体或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对待，将它们放到世界新闻传播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探明它的前因后果，揭示它与其他事物（母体、所在国以及两国媒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展现出它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第三，它是世界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个民族性很强的支系。

尽管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陆续取得了所在国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他们所创办的报刊也转而变成由华裔公民出面注册的外国报刊，但是，海外华人毕竟有着相同的根，在融入当地社会、逐渐适应异质文化氛围的同时，他们也顽强地保存着、承继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坐落在北美洲、大洋洲以及欧洲大小城市的“唐人街”对此就是最好的佐证。它们就像一座座文化岛屿，将几乎所有形态的中国文化——从衣食住行

到诗书礼乐、从民间习俗到政教体系都囊括其中。它集中体现了海外华人的共性——中华民族性，而这种特性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这种民族性也充分体现在华文传媒中。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文传媒虽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倾向性，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人社会团结进步，增进当地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这种向心力与凝聚力是对中华民族性最生动的诠释。此外，就像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是华夏子孙的表征一样，远隔大洋的华文报刊在文字、内容、版面、编辑手法、表达习惯等方面均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一致性。

目前，新闻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挟其强大的科技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连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渗透，对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面对这种情形，我们除了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之外，还应当从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的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均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海外华文传媒已经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庞大的支系，并在世界新闻传播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它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值得欣慰的是，海内外已经有一批研究者筚路蓝缕，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仅新加坡（中国版图以外华文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人完成的有关新加坡华文报刊的研究成果，截至 1993 年就有专著 52 本、系统论文 11 篇和单篇论文 268 篇。1988 年以后，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出版了 5 本学术专著（方积根、胡文英的《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新加坡华文报业的源与

流》、吴庆棠的《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列有海外华文报刊的专门辞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也辟有关于海外华文报刊的专门章节。在此基础上,一本内容丰富的工具书《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于 1999 年 5 月问世。此卷收集资料 100 多万字,含条目 300 余条,是目前国内这方面的资料最为全面的一部工具书。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堪称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的奠基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它们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或是限于对某一国家华文传媒的介绍,或是由若干研究成果结集而成;即便是带有“通史”性质的,时间也都截止于 80 年代末期或 90 年代初期,而对极富变化的最近十年海外华文传媒的情况缺乏应有的关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 21 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如何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高度,对华文传媒由古至今嬗变过程作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认识和评价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以及它们在新形势下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课题。本书力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探讨,以期得出符合历史真实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第二节 海外华文传媒界说

据学者考证,“侨”字来源于南朝东晋时。由于西晋亡国,当时不少士大夫、地主缙绅逃到江南建立东晋政权,并在当地分治而居,如在西晋旧府地叫某某县,到江南新地盘后仍称某某地。究其初衷,他们显然不欲在江南久居,而是希望有朝一日收

复失地后再打道回府。因此，他们在东晋居留地只算是“侨”，他们暂住的地方叫“侨郡”。当然，这些西晋士大夫最终望穿秋水而复国无望，不得不长久“侨居”下去，直至老死他乡。此乃“晋侨”们的结局。

“华侨”这个名称大约出现在 19 世纪末，它专指远走他乡（异邦）、客居国外的中国人，西方人则将它称为“*The Overseas Chinese*”或“*The Chinese Abroad*”，即“海外华人”。由此可见，“华侨”和“海外华人”这两个概念最初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华侨放弃了中国国籍加入了所在国国籍，这之后，各种文献中的“华侨”就专指侨居海外但仍然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而“华人”则指具有中国血统却加入了外国国籍的人。

与此相应，所谓“华侨报刊”是指由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华人报刊”是指由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华人、华裔或华族）创办的报刊或为他们服务的报刊。

“海外华文传媒”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就媒体形式而言，它不但包括报刊，也包括广播、电视甚至网络媒体；就涉及范围而言，它不但包括所谓“华侨报刊”、“华人报刊”，还应当包括港台、大陆创办的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中文媒体和外国人创办的以当地华人以至全球华人为对象的中文媒体。出于研究任务的需要，本书以时间为序，重点涉及四类媒体，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以外创办的华文报刊、海外华侨报刊、海外华人报刊和新移民创办的华文媒体。

一、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

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中期，东南亚地区和美国先后涌现出一批华文报刊，如 1815 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23 年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8 年纪德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1837 年郭实腊在新加

坡复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在广州创刊，翌年休刊），1854年威廉·霍德华在旧金山创办的《金山日新录》，1855年基督教长老会在旧金山创办的《东涯新录》。这些早期华文报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人在海外的办报活动始于1856年12月）“海外华文传媒”的历史序幕由外国人揭开，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那么，这些华文报刊为什么不是由中国人而是由外国人创办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对后来的海外华文传媒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考证的问题。

二、海外华侨报刊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华文报刊在华侨聚居的美国和东南亚一带相继出现。如广东籍华侨司徒源于1856年12月在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创办的《沙架免度新录》，福建籍侨商薛有礼于1881年12月在新加坡创办的《叻报》、福建籍华侨杨汇溪于1888年在马尼拉创办的《华报》等。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海外华文报刊数量不多（海外各地总共出版过30几种华文报刊），发行量有限，内容也大都以商业信息为主，不介入国内及所在地的政治斗争。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动荡，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到海外创办报刊，宣传政见，以争取华侨的支持，海外华文报刊也因此而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政治色彩。

辛亥革命前，华文报刊日渐增多，并形成两大阵营：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主张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的保皇派报刊；另一方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实现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报刊。两派报刊针锋相对，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政治大论战。这场论战不但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时也带来了海外华文报刊空前繁荣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海外华文报刊分为拥袁和倒袁两派。袁世凯

死后，拥袁者大多转而拥护陈炯明，倒袁者则转而拥戴孙中山。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中，一大批华文报刊同仇敌忾，为打倒军阀、为抗日救国而大声疾呼，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大陆与台湾尚未统一，海外华文媒体又出现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

由此可见，海外华侨报刊是与母体同呼吸、共命运的，国内政局的变化会对它们产生直接的影响，国内不同派系、营垒的斗争，也会在这里得以延续。可以说，同祖国的密切联系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这一时期海外华侨报刊最突出的特色。

三、海外华人报刊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外华侨的大多数陆续选择了所在国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华侨报刊也由中国人在外国办的报刊变成由华人登记注册的当地地道的外国报刊（尽管它们从语言文字到版面风格都没有发生变化）。

华侨报刊转变为华人报刊继而本地化之后，它就要遵循所在国的法律并接受所在国政府的监督与管理。而各个国家对待华人的政策和管理方式不同，有松有紧，有宽有严，各国的华文传媒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综观各国政府对华人及其出版物的政策，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取消型。

顾名思义，取消型就是取消华侨华人社团及其出版物，不允许它们继续存在。这类国家和地区不多，印度尼西亚就是典型的代表。

历史上，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曾经一度辉煌过。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印尼华文报刊就达20余家，它们在抗日战争中，在传播中华文化、团结广大华侨、维系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增进华侨和印尼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但是，印尼政府对华人社会一贯采取同化政策，对华文报刊也竭力采取限制、压制、打击和最终消灭的方针，只是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打压对象不同而已。

苏加诺统治时期，印尼政府将所有亲国民党的华文报刊全部取缔（1958年）。1960年印尼掀起排华浪潮，全部亲北京的华文报刊也遭封闭。此后中国和印尼关系虽一度好转，印尼华文报纸获准复刊，但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中印关系再度恶化，印尼政府最终下令封闭全部华文报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尼仅有一份华文报纸继续出版（据《星洲日报》2000年2月18日报道，被禁止出版30多年的印尼华文报业因新政府实施开放政策而出现转机，多份华文及印、华文双语报刊在雅加达等大城市问世）。

采取“取消型”政策的不止印尼一国。在华侨报业一度相当发达的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华文报刊早已绝迹（柬埔寨90年代以后才恢复出版华文报纸）；在越南，90年代之前，也有一家官办的华文日报在出版。

第二，宽容型。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华侨华人及其传媒历来采取宽容的政策。以美国为例。历史上，美国也曾有过《排华法案》和排华事件，但是华侨社团一直活动，而且十分活跃。美国也曾一度实行“熔炉政策”，即试图以主体民族去“消化”其他民族。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行不通，后来便改为多元文化政策，对华文传媒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美国因此而成为海外华文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首份美国华文报纸问世的1854年到1996年间，美国共出现过华文报刊753种（其中日报69种，周报296种，期刊251种，社团刊物137种），仅次于新加坡；曾经有25个州和海外领地关岛出版过华文报纸；仅1995年存在的报刊数就有130余种，在海外位居第一。140余年来，美国华文

传媒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已经形成品种多样、内容丰富、技术现代化、覆盖全美华人社区的报刊（以及电子传媒）群体。

第三，鼓励型。

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新加坡人口 293.3 万（1994 年）华人占 77.6%，是世界上惟一的华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新加坡独立以前，英殖民当局曾企图将华语从教学媒介语言中清除出去，广大华侨联合抗争，终于保住了华族语言及文化的地位。新加坡独立后，包括华语在内的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受到重视，政府鼓励各族国民除学习英语外，还学习本族母语，并致力于推行统一华人语言的华语运动（当时华族通行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话、海南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0 年代以后，新加坡政府又开始推行汉字简化字，所用简化汉字方案与中国简化汉字方案基本相同。这些都为华文传媒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加坡华文报刊为数众多，是中国版图（海峡两岸及港澳）以外华文报刊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96 年，累计出版过的各类华文报刊在 1000 家以上，居海外各国第一位。70 年代后，报刊开始使用简体汉字（至 80 年代初全面推行）；1977 年变直排为横排，1983 年主要华文报刊合并并改版；1984 年成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集中管理华、英、马来文报纸。90 年代以后，新加坡华文报纸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使华文报刊获得了大发展的局面。如果没有新加坡政府鼓励华语及华文报刊发展的政策，这一切是无法想见的。

四、新移民创办的报刊

1965 年，美国实施了大幅度放宽华人移民政策的法案，其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颁布了类似的法案，使得这些国家华人人人口数量激增。相对于上一代华侨华人而言，这些新增人口被称为新移民。

新移民主要包括这样几类人：

一是港、台亲属移民和已在当地就业、定居的留学人员；

二是港、台投资移民和专业移民；

三是陆续定居和入籍的印支华裔难民；

四是大陆亲属移民和已在当地就业、定居的留学人员。

和老一代华侨相比，新移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早期的华侨大多不想久居海外，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新移民则不同，他们远走他乡的目的就是在此定居、入籍、创业。

第二，早期华侨大多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从事的也都是粗重的体力劳动；新移民大都具有良好的学历背景、知识层次和经济基础，在就业和创业能力方面大大优于他们的前辈。

第三，早期华侨是在祖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离境的，国家地位的低下使他们长期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境况中；新移民是在祖国日渐强大、与其所在国关系平等的条件下离境的，与此相应，他们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使海外华文传媒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新阶段。据统计，在美国 700 余种（累计数）华文报刊中，有三分之二是 1970 年以后创办的，华语广播电视、华文电子媒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80 年代至 90 年代，北美中文传媒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其他国家，如巴拉圭、多米尼加、瑞典、奥地利、阿根廷、哥伦比亚、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也开始出现华文报刊。在 1992 年开播的欧洲东方卫视的基础上，欧洲第二家华文电视台凤凰卫视欧洲台又于 1999 年 8 月开播，此举对于传播华语文化，增进海外华人同母语地区的联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海外华文传媒的服务对象与前相比有

了很大的不同。在美、加、欧、澳、日，由于大批新移民涌入，其人数大大超过老华侨，华文传媒的主要受众已由老华侨转为新移民；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战后几乎没有新的移民补充，华文报刊的读者群已由老华侨为主转为以当地出生的华裔人士为主。

第三节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方法

海外华文传媒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且每年都有新的媒体出现，将它们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不但为笔者力所不能及，而且很可能陷入史学家所批评的“跛行学问”^①的境地。因此，面对如此浩繁的材料，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具体是指客观存在着的、具有多方面属性、特点、关系的事物的统一体。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被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各个方面、属性、关系等。为了获得对事物的科学认识，人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抽象，以揭示事物多方面的属性及其内在联系；然后再将已获得的各种概念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去芜存菁，最终得到对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认识。这种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在思维过程中的体现，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

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将不拘泥于对历史现象的铺陈和考据，而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脉络，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华文媒体及其表现形态进行深入考察，弄清它们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揭示它们在不同时期的本质特征，阐释它们与当时社会发展的互动

^① 刘大年等：《历史理论研究》第 14 页，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版。

关系。在理论抽象的基础上，我们再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视，以获得理性的具体认识，并据此对它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总之，我们的研究将不仅仅停留在具体问题和历史现象的考据和描述上，而是透过现象发掘本质，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二、系统分析的方法

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另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分析的方法要求人们不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而是将研究对象放到更大的环境背景中，分析它的来龙去脉，考察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纵向、横向的联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①

根据系统分析的方法，我们首先要将海外华文传媒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又受到各种条件（比如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国际环境等）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海外华文传媒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或曰“子系统”，它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其他系统（如世界华侨华人体系、世界新闻传播体系等）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因此，我们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具体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导入系统的观念，从它与其他系统的相互联系、交互作用中去把握它的规律和特征，去确定它在世界新闻传播体系中的地位。

三、动态研究的方法

在客观环境和条件的交互作用下，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因此，要想近乎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就必须采用动态研究方法，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观察事物。只有借

^① 《列宁全集》第 23 卷，279 页。

助于动态研究的方法，我们才能看到由环境、条件等因素引起的事物本身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才能据此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运用动态研究的方法，我们应当看到，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存在着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存在着纵向演进中的整合、分化与跌荡起伏。而这些都会对海外华文传媒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祖国的强大与否，直接影响着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而所在国政策的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华文传媒的命运。因此，我们不能静止地看问题，一成不变地作结论，而要时刻关注由社会变化而引起的海外华文传媒相应的变化，在事实的变动与发展中更好地把握它的脉络，认识它的内在规律与特征。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客观真实的、科学的结论。

四、比较研究的方法

所谓比较，就是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

比较的方法是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不可缺少的方法，它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始终。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将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比照分析：

一是不同国家、地区华侨华人生存状态及其办报活动的比较；

二是各国华文传媒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比较；

三是华人人口比例数高的国家和华人人口比例数低的国家华文媒体情况的比较；

四是不同国家华文传媒与母体、与所在国关系的比较。

此外还要进行不同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类型的媒体

之间的比较等等。总之，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有比较才能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意见，有比较才能以科学的眼光展望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种研究方法不是孤立存在、互不相干的；动态研究并不排斥静态分析，系统方法也不否定个别考据。一句话，它们相互融通，共同作用于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中。

第二章

海外华文传媒的产生

任何对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都必须从它的起源开始。

第一节 海外华文传媒的起源

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方曙在《海外中文报业话沧桑》一文中沿用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的说法（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我国现代报纸之第一种”），认为“海外中文报刊的鼻祖，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

而美国华人学者麦礼谦在《十九世纪美国华文报业发展小史》中则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随后在巴达维亚等地出现的类似出版物，“主要任务是宣传基督教义及介绍西方新知识，新闻报道还是处在次要的地位”，“从刊物内容及出版次数来看，充其量，只能说这是杂志而已”。他认为，“完全具备现代报纸的各种特征的刊物，却到 19 世纪中叶才出现”^①。按照他的观

^① 麦礼谦：《十九世纪美国华文报业发展小史》，载《华侨史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点，海外最早的中文报纸是 1854 年 4 月 22 日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金山日新录》。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在涉及海外华文报纸的起源问题时解释道：“1854 年在美国旧金山一度出现的《金山日新录》，是世界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报纸各种特征的华侨报纸”。

平心而论，上述两种观点没有根本的分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重在指明谁为“第一”，而对“报纸”与“杂志”的区别无意深究；后者则以考据学的立场，对二者进行了一番辨析，因此得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第一份华文报纸的结论。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原因在于：

首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产生于中国近代报刊的萌芽期。从世界新闻发展史的角度看，“萌芽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报纸”与“杂志”尚未分离，对这种形态的出版物，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体”。日本新闻学界就将其早期新闻类出版物按出版周期叫作“月刊新闻纸”^①。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在新闻出版物出现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没有试图对它们的种类作严格的区分与界定。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金山日新录》其间只有 39 年的时间，作这种区分与界定的意义也不大。况且报、刊的分离乃至最终定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某一点上一蹴而就。

其次，仅凭出版周期、版式、内容等来判定一个刊物是否报纸，未免有些欠客观。首先，当时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当时尚无华文活字），不可能支撑起一份像样的报纸；其次，当时的办报人都是传教士，其首要任务是传扬宗教，而不是报道新闻。

第三，为了使中国人产生认同感，他们有意模仿古代报刊。

^①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 8 页，〔台〕正中书局 1998 年版。

因此，即使办报人希望自己办成一份报纸并且以为自己办的确实是一份报纸，它的形态也只能如此。但是，没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就没有后来的《金山日新录》，换句话说，正是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内容不断拓宽、信息量不断增加、刊期逐渐缩短的基础上，才有了形式上更接近于现代报纸的《金山日新录》。因此，从中国新闻史发展的角度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后来的出版物，都是近代中文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一体化的。如果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海外华文报刊的起点，那就无异于将海外华文传媒的历史缩短了近 40 年。

第四，认为《金山日新录》是历史上第一份海外华文报纸，或许具有考据学上的意义，但是对于探寻海外华文传媒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根源，意义却不大。因为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报纸和杂志只是大众传播媒体的不同表现形态，如同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而只有“第一”才具有全部的史学价值和意义。因为“第一”即萌芽期，“第一”是转折点，它可以告诉我们海外华文传媒从无到有过程中（亦即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促发因素，包括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等，而这些是“第一”以外的其他报刊所不能解决的。

据此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对 19 世纪初期到中期出现的这些新闻出版物的种类作严格的区分，还是统称“报刊”为好。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第一份海外华文报刊，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并不是一份像样的报纸，尽管它的使命主要不是传播新闻。

那么这份报纸的来龙去脉如何，它又有着怎样的面目呢？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于公元 1815 年 8 月 5 日（于马六甲），它的创办人是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早

在来中国之前，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以拉丁文、中文《合璧字典》为课本，认真誊写，刻苦练习，为来华传教作准备；1807年初，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传教士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然后从纽约坐帆船在太平洋上漂泊七个多月，于同年9月抵达广州。在广州，马礼逊开始实施他筹谋已久的传教计划。由于当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华传教，他不得已受雇于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任汉文翻译，同时着手编辑对后来的传教士影响颇大的《汉语语法》及《华英辞典》又将《圣经》之《新约》译成中文，秘密雇人刻印，但因官府稽查，不得已将所有刻板付之一炬，损失惨重。鉴于马礼逊举步维艰，1813年，伦敦布道会又派另一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来华协助工作。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马礼逊命米怜前往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刊行书籍，创办为中国人讲席英文的华英书院。与此同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应运而生。

从该刊第二期登载的一篇“宣言”中，我们得以窥见刊物创办的初衷和用意：

……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中国线装书版式，木板雕印，自创刊之日起，凡七年，每月一期，每期六至七页，初印500册，不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7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久增至 1000 册，最盛时达到 2000 册。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介绍，该刊内容首为宗教，占绝对篇幅。刚刚由马礼逊译成中文的《新约》以及马礼逊和米怜正在合译的《旧约》，成为其主要的材料来源。其次为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刊有《论仁》、《仁义之心人皆有之》、《古皇恕人》、《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之类的文章。刊物把这些道德原则说成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如能遵守就会得到善报，反之便遭恶报。第三项内容是科学知识，主要是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先后发表了《论行星》、《论侍星》、《论地为行星》、《论地周日每年运转一轮》等文并附有说明地球运转、日食、月食等情况的插图。前五卷未涉及政治时事问题，米怜认为“这一缺陷的造成实因当时条件限制，并非刊物本意”。自第六卷起增辟“全地各国纪略”一栏，介绍欧、亚、美、非洲一些国家的概况，包括中国的概况。同时发表文章评论法国的大革命，对反动的波旁王朝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有的文章还提出发展中英贸易，并涉及颇为敏感的鸦片贸易问题。不过这类内容所占篇幅不大。

作为这份中文刊物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米怜不愧为宣传高手。他不但学会了熟练使用中文语法，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文体，还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以提高自己的宣传效果。后来创办的《中国丛报》的编者称他“是一位善于观察人的能手，能够机敏地抓住各种机会，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①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米怜来马六甲时，带了兩名中国刻印技工梁发（又名亚发）和蔡阿国（又名蔡高）。据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先生的考证，梁发为我国首位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正式服务报

^①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26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界的第一人。他 11 岁起就塾读书，15 岁时因家贫辍学到广州谋生，学习制笔和雕板技术，后成为正式工人。从 1810 年起，他便私下协助潜居广州的马礼逊秘密翻译、刻印《圣经》。1815 年随米怜南渡后，他和同行的蔡高协助米怜开办印刷所，筹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刊物出版后，由于外人不便出面，该刊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全凭梁发一人在海陆间往返奔波，主要方法是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乡试，由他本人携往考场，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其余部分则由编者联络友人，借海船之便销往南洋群岛、泰国、新加坡等华侨聚集地区）。在此其间，梁发受洗入基督教新教，从此毕生服务于伦敦布道会，以刻印中文书报、撰写宗教小册子及传教终其一生。如此说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是近代海外报业史上第一家有中国人参加编辑出版的华文刊物。

1821 年秋，米怜因肺病加重不能继续工作（1822 年去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因主编后继无人而停刊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后不久，伦敦布道会又在南洋地区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一份是《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另一份是《天下新闻》。前者 1823 年创办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麦都思编辑，内容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无二致，以宣传基督教义为主，出刊三年；后者 1827 年在马六甲出版，英华书院院长纪德（Samual Kidd）主编，首次使用活字印刷，并改书本式为单张发行，所载内容为中外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历时仅一年。1833 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qrst Gutzlaff）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以“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利益”为己任，辟有政治言论、新闻专栏及货价行情表等，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该刊历经两次停刊后，于 1837 年在新加坡复刊。

1854 年 4 月 22 日，美国基督教会传教士威廉·霍华德

(William Howard) 在旧金山创办了《金山日新录》，这是在西方国家出版的第一份华文报刊。该报以传扬宗教为主，为了迎合远离故土的华工、华商的需要，也刊登一些当地新闻和有关货物行情、船期等方面的信息。该报只出了几个月便停刊了。1855年1月4日，美国传教士威廉·斯卑尔(William Speer)同样是在旧金山创办了华、英文的《东涯新录》。该报与《金山日新录》性质相同，除宣传教义外，也代替政府向华人解释美国有关法律，并登载一些广告、货物行情、船期消息等。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介绍，这两份报刊都聘请华侨担任华文编辑，其华文编辑是澳门马礼逊学校肄业的华侨李根(译音)。^①

外国传教士创办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至此结束。就在《东涯新录》停刊的同时，1856年12月，由华人知识分子司徒源(即黄泰)创办、由美国人韦伯斯特(Fletcher E. Webster)担任出版人的《沙架免度新录》在萨克拉门托创刊(1858年停刊)。海外华文传媒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自己创办华文报刊的一页。

第二节 海外华文报刊创办的历史背景

以上我们对1856年以前外国人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创办的华文报刊的情况作了一番梳理。那么，第一份(或第一批)海外华文报刊为什么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为什么创办于19世纪，又为什么选择马六甲作为办刊地点呢？有关海外华文传媒起源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21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一、关于时间

我们说，第一份（或第一批）近代华文报刊创办于 19 世纪初期，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海外扩张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

英国是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早在 17 世纪初期，它就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此后不久，又占领了印度，成为“印度斯坦真正的主人”。他们还从非洲捕捉黑人，贩运到美洲去，从中牟取暴利。对于中国，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 1787 年，来华的英国使臣查斯卡特（Charles Chathcart）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请求中国皇帝同意将澳门或是厦门附近的一个地方划给英国人贮存货物，并作为中英商人的贸易地点。因查斯卡特死于航海途中，这一英国使团未能到达中国。1793 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抵达北京，向清政府提出让英国人在舟山群岛的某一岛屿或其他地方居留、贸易的请求。乾隆皇帝没有允准这一请求。这之后，英国人曾两次攻打澳门，试图获得葡萄牙人在那里所享有的“特权”，但均未成功（此后他们才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向中国扩张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如何打破天朝壁垒，抢占中国市场，就成为英国朝野颇费思量的一个问题。“武力征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但那是需要条件和时机，并非随时可付诸行动的；而思想征服则具有经常的久远的意义，而且是易于进行的。当时情况下的良策，就是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展活动”。^①

^①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 197 页，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 年版。

二、关于创办人

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成立于 1795 年。它成立不久, 就为到中国传教而积极进行筹划; 进入 19 世纪后, 又具体讨论了派遣传教士来华的问题。 “1804 年, 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被确认为恰当的人选。马礼逊祖籍苏格兰, 父母双双信教, 自幼受到熏陶, 15 岁时信奉基督教。1803 年入神学院学习, 随即成为伦敦布道会的教徒, 并于 1804 年上书布道会请求派他去 ‘困难最多’ 的中国传教。在这一请求被接受以后, 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与训练。1807 年春, 开始了前往中国的航程”^①

伦敦布道会对马礼逊的活动作了原则性的指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学会中国语文, 然后编纂一本内容丰富释文正确的中文字典, 并将《圣经》译成中文。”^② 这表明, 马礼逊的主要任务不在他个人传教, 而是服务于英国势力进入中国这个远大目标。

马礼逊十分重视出版工作, “对于刊物的力量, 抱着无限的信心。他发现, 中国佛教僧尼, 不在讲坛论道, 只从事翻译及著作, 儒家的伦理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传播, 这种印刷文字比之口传更能普及。……马礼逊传教, 同样注重采用这一方式。”^③ 然而, 事情并非马礼逊想像的那么简单。

1807 年 9 月 4 日他抵达澳门。刚到这里, 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 无奈中, 他只好暂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246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247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程曼丽:《蜜蜂华报 研究》第 197 页, 澳门基金会出版, 1998 年版。

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最初几年，马礼逊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终日蛰居室内怕和外人接触，只好披着夜晚的月光在一两位中国朋友护卫下到田野走走。”^①

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早在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就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其后限制愈加严格。嘉庆年间，清廷又颁布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严申“……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构，希图惑众，……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②）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经过仔细考虑，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三、关于地点

为什么选择马六甲作为传教、出版基地呢？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在多方考察了对华传教的主客观条件之后，向伦敦布道会提出了多项有关传教方针及政策的建议。其中，关于地点选择问题，他们是这样考虑的：“以今日中国的情况而言，要通过出版物或者我们布道会的其他活动来进行传教是十分困难的；实际上，就连个人的居住问题都没有保障。因此，我们希望能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管辖而又距离中国不太远的地方，开设一个在客观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97页，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年版。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8页，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年版。

条件上允许我们较能展开活动且能奏效的根据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作好准备工作，在中国按照上帝的旨意开放其门户时进入该国。^①米怜在其《回忆录》中谈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爪哇和檳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所及之地和华侨聚居之地）都可以发展成为传教据点。他认为，从华侨人口数目考虑，爪哇要比马六甲有利，但是马六甲离中国比较近，加之它位于交趾支那、暹罗与檳城之间，方便同散居于各群岛的华侨接触，况且它与印度、广州的往来也十分方便。因此，米怜认为，马六甲人口虽然比爪哇少，其地理位置却有利于教会向更多的当地民众（特别是中国人）展开传教活动。此外米怜认为，从健康和学习语言的角度考虑，马六甲也较为适宜。这里自然条件好，气候宜人；在此不但可以学习华语，而且还能学习马来语，这对基督教新教扩大对恒河以东广大区域的传教活动是十分有利的。^②基于上述考虑，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六甲。

第三节 早期海外华文报刊的意义及影响

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份宗教刊物，尽管它诞生在外国的土地上，它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取代的。它不但是海外华文报业的源头，也是中国近代报业的源头。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刊，它的意义及影响在于：

首先，它突破了封建限禁，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①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 20 页，〔台〕正中书局，1998 年版。

②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 21 页，〔台〕正中书局，1998 年版。

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会自动退位。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制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监管，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煽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在政治上，清政府实行专制主义的思想控制，打击政治上的异己分子，通过报禁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对内是这样，对外来异质文化同样如此。

由于马礼逊等人一时还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便选择马六甲作为根据地，通过创办刊物、培植中国传教士等方法逐渐扩大影响，以求最终进入中国腹地。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出版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和《天下新闻》的情况也大抵相同），但是，它对封建社会的限禁尤其是报禁毕竟是一个冲击，犹如在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去一个钉子。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有了这一步，才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的创办和更多的近代报刊在内地的出版。而封闭的大门一经开启，就再也无法维持昔日的沉闷了。“资本主义文化一旦进入这个沉沉欲睡的封建王国，就必然成为一种鞭挞数千年的旧传统旧思想的积极力量，启发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上进行新探索新思考”。^①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4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益临近，预示着中国古代报业向近代报业转折的开始。

第二，它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之前，中国报业的主体是封建官报，此外还有一些由提塘报房和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如小报、京报等。清廷对官报所载内容及传发形式的控制历来十分严格，哪些消息应发抄，哪些不应发抄，通过何种渠道发抄，往往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对民办小报、京报的出版发行也作出了种种限制：禁止传报未经批发的章奏，禁止探听写录科抄以外的新闻，禁止不实报道，禁止伪造题奏和御批。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朝廷机密外泄和维护封建治体。在严格的审查和严密的控制之下，各类报纸都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模式，版面上除了宫门抄、谕旨、题奏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不能自己采写新闻，更不能自由发表言论。近现代报纸所具有的基本品质，如信息量、时效性等等，当时的报纸都不具备。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随后出版的华文报刊，是与上述报纸完全不同的新型报刊，它们在形式上虽然有些“仿古”，内容却是全新的。除了传扬宗教之外，它还提供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新理念，对封建社会的传统意识和观念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有了这个点，才会有中国近代报业延绵不断的主线与长河。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个点，没有外力的冲击，任凭封建报业自然演进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还要推迟几十年。因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印刷、出版条件），也不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问世，将中国近代报刊的历史提前了几十年。该报的创办者们是带着特殊的使命来到中国

的，他们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报业由古代向近代转折这个革命性的变革。

第三，它对中国近代报刊及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早期报刊的产生，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这具体体现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

首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报纸的产生带动了国内近代报业的发展。客观地说，近代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 19 世纪初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报刊的出版，就不会有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纸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对后者具有明显的启蒙与示范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自办的近代报纸，差不多全都照搬外报的模式，而对中国古老的封建性的邸报和《京报》，反而很少联系。有的报人（如王韬）原就长期在外报工作，他们将外报的工作经验移用于自己的报纸，这也是很自然的。”^①

正因为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以近代外报为蓝本，并借鉴了他们的办报经验（中国人开始自己办报的时候，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报刊由书本式发展为近代报纸形态，用了大约 40 年的时间；报纸由单纯的宗教刊物发展成为集新闻、言论、广告于一体的现代印刷媒介，更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所以它一开始就能以比较完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报纸的产生带动了海外华文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53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报刊的发展。早期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纸虽然主要面向中国国内读者，但也兼顾华人众多的东南亚国家。据记载，担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刻印工作的梁发、蔡高不但常常潜回广州散发杂志，还分头到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暹罗等地发送。米怜有着强烈的读者观念，对他们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他考虑到刊物的读者以下层劳动者居多，他们工作忙，识字少，所以主张文字宜短，应通俗易懂（“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又根据“人最爱彩色云”的心理，他主张为文要有文采，“方使众位也悦读”。^①他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了一批读者，从而在华侨中播下了华文报刊的种子，为以后华侨办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外国人创办的华文报刊还为华侨自己办报作了人员上的准备。1855年在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出现的华、英文报刊《东涯新录》，其华文版编辑李根就是中国人。据说他曾由美国人威廉·霍华德出版的《金山日新录》做过编辑；美国第一份华侨报纸《沙架免度新录》的创办人司徒源，出身于教会学校，与外国传教士以及外国商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海外华文报业也是在早期外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逐渐具有了稳定的形态，并日益成为华人社会的舆论工具。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2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及辛亥革命时期的 海外华文报刊

自戊戌政变（1898年）到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到海外活动，以寻求华侨社会的支持。先有维新派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到南洋、日本及美国宣传其拥帝反后的政治主张，后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到新、马一带传播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此后，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政治论战的展开，随着广大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个创办华文报纸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华侨报刊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动力，以宣传革命为中心内容，而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第一目标。因此可以说，海外华文报业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推进而发展的。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海外华文报刊

上一章，我们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描述。由此可知，早期华文报刊的创办者是外国传教士而不是华人。这是因为其时移民国外的中国人还很少，且多为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许多人不识字。无论就物质基础还是就精神需求而言，都不存在自己创办报刊的条件。

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由于外国殖民主义者凭借不平等条约突破了清朝政府的种种限制，取得了在中国境内随意办报

的自由，早先创办于东南亚一带、以进入中国为目的的传教士华文报刊（因完成了历史使命）便不复存在了。而在遥远的美国西海岸，由于华人人口的骤然增加，一批新型的华文报刊在这里诞生了。

一、出现在美国西海岸的三种华文报纸

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采金的劳工。由于当地黑人矿工远不能满足大量开采矿藏的需要，矿主们纷纷来到中国，从南方沿海诱拐大批的“契约华工”移居那里充当苦力。这使加利福尼亚华人人口由 1848 年的不到 800 人猛增至 1852 年的 2.5 万人。当时，金矿生活条件极端恶劣，采金技术十分落后，工资报酬又低，不少华工不堪困苦，结伙逃亡甚至自杀。为了使他们安于艰苦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各公司只有求助于教会。

1854 年 4 月 22 日，基督教会在华工比较集中的旧金山出版了一份华文周报《金山日新录》。在谈到创办《金山日新录》的目的时，教会认为“是为了解决华人在宗教上的无知，向华人解释美国法律，是为了解决华人的需要，并使华人的性格柔和、有尊严并得以提高”。^① 而该周报的发行人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在发刊词中指出：

原夫新文（按：应为新闻）纸之设也，所以利商贾，资见闻，达舆情，而通官事者也。今咖喱宽尔一埠（按：即加利福尼亚当时的译音），乃四方云集之区，各国均有新文（按：应为新闻）附刊，而唐人独不行焉。故商贾虽多，操纵无数；见闻不广，取舍乏权。物情则习而不通，任棍徒之狎侮；官事则懵然罔觉，听奸役之欺凌。夫以历数百万里之身，而艰于营谋，屈于掣肘，

^①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第 215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

能不慨然。愚因有感，特设华夷日新录一张，将逐日华夷货物，官衙事件，一一用唐字缮写，每遇礼拜三、六日印发，以便知晓。倘诸君有货物事件，皆可代为附刊。如此则商贾利，见闻资，輿情达，官事通，而于唐人未必无小补云耳。

由发刊词可见，《金山日新录》已不是一份单纯的宗教刊物，它除了向中国人传教布道之外，还以利商贾，资见闻，达輿情为己任（尽管它的创办人从骨子里对中国人是鄙夷、蔑视的），向他们道新闻，提供各种实用的经济信息，表现出明显的为华人社会服务的意向。

《金山日新录》不再是本册状或散页，而是如西方报纸那样呈对折式，其分栏方法也是西化的（各版从上到下分为三栏或四栏），在中文报刊中实为第一家。该报共有四页，第一版为新闻；第二版刊登中西商业广告；第三版为国内外船期；第四版三分之二为新闻，杂以广告，三分之一为货物行情。自同年6月起，第一版左边三分之一用以刊登英文言论，讨论诸如人权、政治、宗教等问题，题目有《在加州的中国人是没有帮助的吗？》、《七月四日与中国种族》等。按版面分配情况推算，英文部分不到十分之一。

该报公开出售，零售价每份 25 美分，订阅每月 75 美分。广告价格，25 个字以下 1 元，50 个字以下 2 元，逾 50 字者按字数计，每字 3 美分。该报还设有邮局，并代办翻译、领牌照等业务。

如上可知，尽管《金山日新录》仍然是由教会创办的，但是它与此前在东南亚一带出现的、同样由教会所办的华文刊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就内容而言，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宗教刊物，而带有了更多的新闻性和商业色彩；就版式而言，它已不再“仿古”，而是更接近于西方报刊；就发行方式而言，它不再免费赠送，而是明码标价，公开发行。据此有人认为它是“完全具备现

代报纸的各种特征”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有一定道理的。

《金山日新录》存在的时间不长，只出了几个月便停刊了。它停刊后不久，《东涯新录》（华、英文报纸）又于 1855 年 1 月 4 日在旧金山面世，创办人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威廉·斯卑尔，1856 年末停刊。这份报纸的内容、形式与《金山日新录》十分接近，初为双日刊，几个月后改为周报。该报华文版编辑李根（Lee Kan 的译音）是美国第一批华侨知识分子，曾经在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和容闳是同学，他被称为“美国第一位华人编辑”。

1856 年 12 月，在《东涯新录》停刊的同时，广东籍华侨司徒源在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曾译为沙架免度）创办了《沙架免度新录》（它的英文名称叫 Chinese Daily News，曾被译为《中国日报》）。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由华侨自己创办的、以刊登与华人社会有关的新闻为主的报纸，初为日报，不久后改为周三刊。这份报纸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不到两年），影响也不算大，但以时间而论，它比 1881 年 12 月在新加坡创办的《叻报》要早 25 年。在海外华文传媒史上，它是最早出现的华文报纸（中国人创办），这就是它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总而言之，19 世纪 50 年代出现在美国西海岸的华文报纸，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华人社会信息需求量的增加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尽管由于当时华侨人数尚少，市场不大，使得这几家报纸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是它们毕竟在远离祖国的大洋彼岸接连出版了 5 年，并逐步实现了由洋人办报到华侨独资办报的过渡，从而实现了海外华文新闻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二、出现在新加坡的《叻报》

1858 年《沙架免度新录》停刊后，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上出现了长达 16 年的空白期。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被迫解除了禁止华工出国的法令

（鸦片战争以前，清廷严禁华民出洋，内地劳工都是秘密招募、非法出口的，人数并不很多），在其分别与英、法、美签订的《北京条约》、《蒲安臣条约》中，外国人招募华工和华工出国得以合法化。华工出洋人数由此激增并形成高潮。除华工之外，远涉重洋的还有一批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日后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侨民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对各种资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就为华侨报刊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海外华文报业处于空白期的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境内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中文报刊，如香港的《中外新报》（1858 - 1918）、《华字日报》（1864 - 1941）、上海《申报》（1872 - 1949），它们为海外华文报刊的创办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样板，并成为其设备、人员和稿件来源的坚实的后方。

1874 年，海外华文报业在旧金山复苏。当年 7 月 14 日，美国人主办的《旧金山唐人新闻纸》创刊；第二年，华侨和美国人合办的《唐番公报》出版。该报先是由华侨黄卓（Chock Wong 的译音）和美国人合办，次年由林赞（Lim Danc 的译音）接办并将华文名称改为《华番汇报》。林赞通过向华人集资，从美国人手中买下了印刷设备并学习印刷技术，使该报成为完全由华人经营的报纸。该报几经改名一直办到 1903 年，是 19 世纪美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华文报纸。

这一时期，在美国本土和檀香山还出现了多份华文报纸，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1876 年在旧金山创办的《华人纪录》、1881 年在檀香山创办的《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1892 年在旧金山出版《文兴报》等；90 年代，旧金山还出现过华文日报，华侨报纸也曾一度扩展到美国中部和东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报纸都未能维持长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洋第一报”《叻报》在新加坡问世。该报创办于 1881 年 12 月 10 日，是新加坡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出现最早、寿命最长的华文日报（一直出版到 1932 年，时间长达 51 年）。该报在海外华文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远远超过此前在美国出现的华文报纸。

《叻报》之所以创办于 19 世纪末期的新加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叻报》创办之前，先有广州迁来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此复刊（1837 - 1838），后有汤姆森·威廉·史密斯（Thompson William Smith）创办的华文周报《日升报》（1858 年）在此出版。前者以中国内地读者为宣传对象兼及东南亚地区华人，后者由于原报遗失，其性质、内容以至创刊日期无从考据。之后便是长达 20 年的空白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华人社会逐渐成长、壮大的时期。19 世纪中期以后，华人人口增长很快，在新加坡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垦殖者）。19 世纪末期，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出现了一批华人富商（《叻报》的创办者薛有礼就是其中之一），从而为报纸的创办与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转口贸易港，中西交往日益频繁。新加坡的华商不但能够经常往来于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将中国的信息及其办报经验传来之于此，同时也需要了解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的知识与信息，以便有效地从事经济、贸易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叻报》应运而生。

“叻”是马来语“Selat”（即海湾的译音）早期华侨称新加坡为“石叻坡”，故名。创办人薛有礼（1851 - 1906）祖籍福建漳州府。其祖父薛佛记原是马六甲富商，后移居新加坡经营地产致富，成为早期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华人社会的领导人之一。其父薛荣樾（薛佛记的次子）常年往返于新加坡和厦门之间，是一位英籍华商，曾从中国购置和运送办报所需的印刷机和铅字。薛有礼出生于新加坡，幼年受的是英文教育，因而较早接触西方文化；他同时又与中国的一些文人学士保持着联系，从而使他有机

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毕业后，薛有礼曾任新加坡汇丰银行买办，后来辞去了薪酬优厚的职位，决定创办华文报纸。

关于薛有礼的办报动机，有学者分析道：他创办《叻报》一方面是出于爱国心，同时也是为了“推进社会文化活动”。“薛有礼受英文教育陶冶，接触西方文化良多，视野开阔。同时又有感于当时当地其他民族办报（尤其是欧籍人士办报）之活跃，而华文报章，则独付阙如。于是决定办报，以开启华人社会风气，推广文化活动；同时表示华人社会不落人后。”^①

《叻报》创刊初期，日出 8 开 6 张（后增至 8 开 11 张），每期印 800 份，报费每月 8 角（后增至 1 元，1 元 5 角，1 元 8 角，2 元）。但是该报的实际订数及零售数并不多。19 世纪末期以前，最高销量为 500 份，最低销量为 160 份。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叻报》的读者是比较少的。这首先是因为新加坡侨民已历经数代，懂中文者不多；其次是经济问题，在一般华侨看来，2 元的报价已经相当高了。

《叻报》初期版式与早期的《申报》大体相似，正文及标题均以 4 号铅字排印（直排），内容包括社论、国内外新闻、政府公报和广告等。标题多为 4 个字，如“谕旨恭录”（即清廷谕旨）“皇畿新语”“英京电音”“京报选录”“开张广告”等。除本地新闻为自行采写外，其他要闻多转译自当地英文《海峡时报》和转载香港、上海报纸的电讯。该报还以较多的篇幅刊登各国洋行的广告，并因此受到外商的重视。

长期担任《叻报》主笔的是从香港《中外新报》礼聘的叶季允（1859 - 1921），他为该报服务 40 年，有“南洋第一报人”之誉。《叻报》之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华文报纸之一，其社论之广有影响，与叶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应聘主持《叻报》笔政

①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后，叶季允写了数百篇社论和评论（笔名为“惺噩生”），其所撰社论文笔流畅，立论新颖，开华侨风气之先，极为侨胞欢迎。在诸如《论教子弟》（1887年9月2日）、《论诚实乃为人之本》（10月12-13日）、《论傲字为处事大病》（10月14日）、《论交友勿事戏谑》（10月19日）、《论报恩》（10月29日）、《论禁赌》（11月11日）、《论匪说》（11月26日）、《戒烟刍言》（12月5日）、《除暴议》（1888年1月21日）等社论中，叶季允一方面向华侨灌输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以树“中国衣冠文物之气”；一方面针砭时弊，呼吁政府严厉对付烟（鸦片）、赌、匪、暴等不法行为，以改变华侨社会的“初启”状态。

《叻报》主持人对清朝政府怀有的挚爱之情使他们在辛亥革命酝酿和发动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持保守态度。武昌起义过后一个星期，即1911年10月17日，《叻报》才开始报道辛亥革命的消息，但把革命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在10月24日以后的4天中，叶季允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承认“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对清朝帝制的覆亡却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直到民国建立已成定局，叶季允才转向拥护民国政府的立场，造起了“弃清兴汉”的舆论。

尽管《叻报》言论保守，落后于形势，但它毕竟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份华文日报，在其刊行的51年时间里，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的面貌，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它的创办人薛有礼和主笔叶季允为办报锲而不舍、鞠躬尽瘁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20世纪之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华侨报刊（除《叻报》之外）还有其他6家：

1. 新加坡《星报》1890年由林衡南创办。该报是一份商业性的华文日报，以林衡南自设的“古友轩印字馆”的名义出版。

内容包括“清廷谕旨”、“谕旨恭录”、中外新闻、社会新闻、经济信息及广告等，日出 8 张，前后共出版了 9 年。1898 年戊戌政变失败，参与变法的福州人黄乃裳（1849 - 1924）被迫远走，于 1899 年到达新加坡后，受聘担任《星报》主编。黄乃裳在任期间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言论激进，与报馆主办人发生矛盾，不久即辞职，转而组织华南移民到沙捞越开发诗巫（新福州），而《星报》也于不久后停刊。

2、《日新报》系由新加坡著名医生及侨商林文庆利用《星报》的印刷设备于 1899 年创办的。该报在内容上有所更新，增加了国际新闻，并以较大篇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日新报》属维新派，主张在中国推动变法改革，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康、梁、拥护光绪、反对慈禧太后的社论及评论。戊戌政变失败后，《日新报》刊登了《吊六君子文》（1899 年 10 月 3 日）《祭支那维新六君子文》（10 月 18 日）《宜恭请皇太后归政议》（10 月 20 日）等文章，光绪帝被废黜后，它又大量转载香港和上海维新派报纸的文章，表现了对变法维新的同情和支持。该报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3、《天南新报》1898 年由著名侨商、文人邱菽园（1874 - 1941）在新加坡创办。邱自任出版人和总主笔，并请陈德逊担任总经理，林文庆为顾问。该报是在康有为、梁启超、欧榭甲、徐勤等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下创办的，是保皇党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份机关报。戊戌政变发生后，该报连续发表反对慈禧太后的社评，认为光绪是圣明之君，清朝家法无太后垂帘之制，抗议慈禧太后通过查禁报馆压制舆论的做法。百日维新失败后，其维新政变及保皇立场更加坚定。后因政局急转直下，保皇言论大失民心，加上邱氏破产，该报失去经济来源，于 1905 年停刊。

4、《华报》系菲律宾最早的一份华文报纸，1888 年由闽籍华侨商人杨维洪（汇溪）独自创办。杨维洪通晓中文、英文及西班牙

牙文，华侨称他为“三支笔都会写”的人。杨自任社长，同时兼编辑及翻译，另聘粤侨陆伯州为社外记者，并撰写社论等。起初由粤侨印务公司承印，后自设印字馆。由于当时华侨中识字者少，能读报者寥寥无几，该报因销售量极少，出版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5、《华报》停刊后，主持人杨维洪和陆伯州东山再起，于1890年创办了《岷报》。该报不但内容、版式与《华报》大致相同，就连运势也相同，出版不及数月，就因销量少，无人登广告而自行停刊。

6、《益友新报》1899年由粤侨潘庶蕃在马尼拉创办。潘是菲侨保皇会的头目，该报因此而成为保皇会的机关报，宣传康、梁维新保皇主张，拥护光绪皇帝。该报无论就印刷设备还是就内容、版面质量而言，都胜于此前的《华报》和《岷报》，但开办一年多也办不下去了，于是改换报名继续出版（更名为《岷益报》）几个月后即宣告停刊。

综上所述，1900年以前东南亚地区华侨创办的报纸，大多问世时间不长即告停刊（一般长则数年，短则几个月就夭折了），只有《叻报》持续出版数十年，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最有历史意义的报纸。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从变法维新转向了保皇复旧。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方兴未艾，其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众共和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在海外华侨舆论界（报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之在20世纪早期围绕革命还是保皇的问题

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使华文报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一、保皇派报刊

康有为、梁启超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康有为说：“有报馆而鼓之，如钟铎之声撞也，其响必应，人之有耻心、好事心，进上心必日增而大长。”^①梁启超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②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先后赴日本、夏威夷、澳洲、新加坡、槟城、印度、缅甸和美洲各地游说，宣传变法维新主张。为了争取民心，扩大影响，他们创办了许多报刊。由于保皇派在利用传播媒介方面棋先一着，收到先声夺人之效，其政治主张在海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连民主革命派也为之侧目，自叹弗如。

保皇派在中国大陆以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维新日报》。该报 1880 年创办于香港，由陆骥纯独资承办。19 世纪末，由于该报宣扬君主立宪思想，在当时闭塞的中国社会中极富“新鲜感”，具有启蒙作用，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但在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学说逐步深入人心以后，该报也就渐为读者摒弃了。继陆骥纯之后主办该报的有陆健康、黄道生等，1908 年刘少云接办，次年改名为《国民日报》1912 年停刊。

保皇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二份报纸是《镜海丛报》。该报 1893 年创办于澳门，是在葡萄牙人费南第的资助下诞生的，分中、葡两种文字版，发行地区广及香港、石岐、佛山、广州、福州、厦门、上海、汉口、新加坡、菲律宾、旧金山等，但中文版仅出至

① 引自《新民丛报》第 5 期，《公民自治篇》。

② 引自《新民丛报》第 17 期，《敬告我同业诸君》。

1894年1月23日便停刊了。^①

此后继起的保皇派报纸有澳门的《知新报》、香港的《岭海报》和《香港商报》。《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初，康广仁、何廷光为经理，徐勤、何树龄等为主笔，初为五日刊，后改为旬刊，杂志型，每期约出15页，内容包括评论、事实、杂文等。

《岭海报》创办于1898年，日出8开8版，内容有“论说”、“邸抄恭录”、“京都新闻”、“各省新闻”、“外洋新闻”等。《香港商报》创刊于1904年2月，由香港商报有限公司印刷发行。担任督印人的先后有黄君任、陈屿、陈奎；主笔徐勤，辅助者为伍宪子和伍权公。辛亥革命后，该报改名《共和报》，由伍权公主持，出版至1921年停刊。

除香港、澳门之外，保皇派在美国、槟榔屿、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缅甸、暹罗（今泰国）等地都出版了自己的报刊。

美国

在旧金山，原有一家商办报纸《文兴报》（1892年创办，后更名《世界日报》），1899年中国维新会（保皇会）旧金山分会成立后，由徐勤等主持将该报改造成为保皇会在美国的机关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该报更成为美洲地区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的主要阵地。与《文兴报》同时创办的还有《金港日报》，主持人亦为康门弟子，但影响没有《文兴报》大。1902年，美洲华侨最大的会堂组织致公堂主办的《大同日报》在旧金山创刊，总编辑为欧榘甲。该报大力宣传康梁的君主立宪思想，成为保皇会的喉舌。1903年，康有为派汤铭山在纽约创办了《维新报》，作为保皇会在美国东部的机关报。1900年4月，梁启超在檀香

^① 方曙：《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报》，载香港《地平线》杂志第13期，1980年10月。

山创办了《新中国报》，作为檀岛保皇会的机关报，自任主笔。该报面世后，就摆出左右开弓的架式，一面抨击清廷的腐败无能，一面批评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以示独树一帜。该报还提出过“保皇即革命”等欺骗性的口号，1903年曾受到革命派《檀山新报》的批驳。在此期间，纽约还出版了一份《纽约日报》（中英文版），也是保皇派控制的报纸。

槟榔屿

林华谦于1896年在槟榔屿创办的《槟城新报》也是一份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报纸。辛亥革命后，该报逐渐放弃保皇党的立场，1936年并入《光华日报》。

新加坡

除1898年创办的《天南新报》（保皇派在东南亚地区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外，1906年，保皇派与民主革命派曾合资出版过一份《总汇日报》，后因两派观点相左拆股，保皇党人朱子佩等人便“接办”了该报，报名改为《南洋总汇新报》，徐勤、欧榘甲、伍宪子均曾出主笔政，使该报言论颇具《天南新报》的风范。中华民国成立后，此报仍继续出版。

日本

1898年冬，康梁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保皇派在海外的舆论重镇《清议报》（旬刊）出版至1901年底，适值100期，因报社被清廷雇用的日本人纵火焚毁而停刊。该报名义上的印刷人是日人铃木鹤太郎，编辑兼发行人是冯镜如，实际主编是梁启超。内容以论说、时事评论、外论译述、中外新闻、文艺创作为主。在刊物存在的3年中，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撰写了300多篇论著和刊于《文苑》、《饮冰室自由书》等专栏中的诗词和散文。梁启超离日本时，由麦孟华主持报务。此外，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秦力山、郑贯公等人，也曾一度担任过该报的编辑工作，章太炎曾为

该刊撰稿。《清议报》停刊不到两个月，梁启超重振旗鼓，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该刊自 1902 年 2 月 8 日正式出刊到 1907 年 11 月 20 日停刊，前后历时近 6 年（1904 年后，经常不能按期出版，故实际只出足 4 年）《新民丛报》每期篇幅 120 页，封面常用套色，卷首时有插图，内容与《清议报》大体相同。发刊后迅即风行海内外，销量之大远远超过《清议报》。最初销行 2000 份，不到一年即增至 9000 份^①，以后经常行销 1 万份左右。国内外寄售点 90 多处，以至云、贵、陕、甘等偏僻地区均有出售。1902 年 11 月，梁启超在横滨又创办了一份以刊登新体小说为主、兼及戏曲、诗歌、文艺理论等内容的文艺刊物《新小说》。初为月刊第 4 期后经常脱期，前后延续 3 年多，出至 1906 年 1 月第 24 期停刊。名义上编辑兼发行人是赵毓林，实际主编是梁启超。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上述刊物先后停刊以后，保皇派又于 1907 年在东京创办了《中国新报》。该报仍为杂志型，每月一期，每期 80 页左右，由杨度主编，撰稿人有熊范兴、胡茂如、陈籽美、薛大可等。内容仍着重于论说、时评、译论。该报仅出版 9 期，1908 年 1 月停刊。^②

澳大利亚

1902 年，康有为派唐才质在悉尼创办了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报》。唐才质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唐才常的三弟，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华东报》成为保皇会在澳洲重要的舆论机关。1906 年康有为曾把它与《新民丛报》、《文兴报》、《新中国报》等并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651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方曙：《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报》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13 期，1980 年 10 月。

列为改良派在海外的重要报纸。

缅甸

1903年在仰光创办的《仰光新报》，是康有为自印度到缅甸后出版的。创办人是当时被推为保皇会仰光分会会长的闽商庄银安。由于该报股东的思想新旧不一，有的人连保皇维新的主张也接受不了，因此该报言论较为保守，只是稍稍倾向于康梁观点而已。1905年，该报因股东政见冲突而停刊。1908年，保皇派东山再起，趁民主革命派的《光华日报》被迫停刊之机，购下该报全部财产，另出《商务报》，由张石朋、李牙聪编辑，大肆鼓吹君主立宪制。

暹罗

1907年，保皇会在曼谷出版了《启南日报》。该报是在徐勤前去活动，引致原有的《湄南日报》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以后创办的，《启南日报》仅存在一年左右即因受读者唾弃而垮掉。

《中华民报》是另一家在曼谷出版的保皇派机关报。该报创刊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创办人为刘茂新。刘始终迷恋康梁的君主立宪说，继续与孙中山对抗，其顽固可见一斑。该报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

此外，保皇会还曾经在加拿大出版了《日新报》和《华英日报》（后期改变立场）在爪哇出版《鸟岛日报》在墨西哥出版《墨西哥朝报》等等。

保皇派在海外创办的众多报刊中，最具权威性的当属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关于《清议报》创办的历史背景，梁启超曾经指出：“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之志事，忽大挫折，举国失望，群情鼎沸。自兹以往，中国遂闭于沉

沉妖雾之中，其反动力量一起再起而未有已。’^①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清议报》之所以能够在梁启超到达日本后一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刊发，除了得益于横滨大多数华侨商家的支持，亦可窥见康梁当年的号召力是相当大的。

关于《清议报》的宗旨，梁启超在第一期卷首《叙例》中，将它归纳为“维持支那之清议”[”]；“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等四项。第11期《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又将上面四项概括为：“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这里所说的“主持清议”，就是指猛烈抨击“逆后贼臣”慈禧、荣禄等人把持下的朝政；鼓吹“尊皇”，力主归政光绪皇帝。这里所说的“开发民智”，就是要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道德思想。总之，“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这八个字，集中体现了《清议报》的宣传要旨。

《新民丛报》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以后出版的。该报创刊号《本告白》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依循这三条办报宗旨，《新民丛报》力图摆脱党报色彩，注重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新观念——即所谓“新民”（但是就其本

^① 引自《清议报》100期：《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质而言，它与《清议报》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新民”思想在《新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梁启超所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可见，他正是希望借助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

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的《过渡时代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尊皇论》、《少年中国说》、《立宪法议》、《新民说》、《论立法权》、《论正统》、《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都曾经是蜚声一时之力作。“他的一些针砭中国时弊的文章，有不少论说是切中要害的。而《清议报》发表的有关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梁启超在《新小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纪》中描绘的理想国，名号‘大中华民国’，尤有独到之见，小说中所言，有些竟与后事暗合了”。^②

由于《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揭露了清廷的一些问题反映了一点困极思变的民情，宣扬了立宪维新的政见，其本意虽然始终是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但昏庸虚弱的清政府还是下发谕令，悬赏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严行查禁”他们创办的刊物，甚至出售或购阅其报章的人，也要“一体严拿惩办”。由此可见，这两份报纸当年不仅在海外风行一时；而且在中国大陆也是广为流传的，据说翻印者遍及各省。梁启超曾自豪地宣称，其所办报刊“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胫而走。”然而随着民主革命

^① 引自《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② 方曙：《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报》，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13 期，1980 年 10 月。

浪潮的日渐汹涌，保皇派越来越成为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其软弱性、妥协性也越来越明显。尽管梁启超等人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变本加厉地在其报刊上发表长篇大论，主张保皇维新，反对民主革命，但毕竟大势已去，难以挽回。1908年以后，南洋和美洲各地的保皇派报刊都成了强弩之末。“辛亥革命后，海外的保皇维新派报纸，虽然还有三数家继续勉力支撑，但都已经不成气候。其中，在檀香山出版的《新中国日报》，一直维持至1978年初始停刊，为康梁改良派所办的报刊中最长寿的了。不过，该报在停刊前早已不是梁启超当年创刊时那种性质的报纸了”。^①

二、革命派报刊

1894年11月，孙中山自上海赴檀香山，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此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在檀期间，他首先将当地华侨报纸——1881年创办的《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的经理、编辑人员全部吸收进兴中会，从而使报馆的言论从言商转为言政，进行了一些爱国救亡宣传。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向重视宣传活动。早在读书（在香港）和毕业后行医（在澳门、广州）期间，他就与报界有所接触。在著名报刊政论家何启的直接影响下，他曾向港、粤、沪的一些报刊投稿，阐述改革中国的见解。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后，他更是将“设报馆以开风气”明文载入章程之中。但由于当时他们急于发动军事起义（广州起义），而起义又遭失败，“设报馆”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不过，在筹备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等人曾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他们秘密

^① 方曙：《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报》香港《地平线》杂志第13期，1980年10月。

印刷和散发兴中会宣言，起草讨虏檄文，并吸收何启等著名报刊政论家参与宣传工作。1895年3月至5月，香港《德臣西报》曾陆续发表社论及何启的文章，为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制造舆论。孙中山本人也在中外文报刊上发表文章，有策略地进行宣传鼓动。对此，《德臣西报》曾有这样的记载：“孙氏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之文字，发行于香港，而传播于中国内省，其于良政府与恶政府描写极为尽致，两两相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词至为留意，虽以彼狼若狼虎，善于吹求之中国官吏，亦复无从指摘之”。^①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遭清政府通缉、追捕，被迫流亡海外。他们刚到日本，就将随身携带的反清文献和《上李鸿章书》等翻印成小册子，在华侨中广为散发。之后，在游走东亚、北非、西欧的日子里，孙中山以演讲、游说、向报刊投稿、编印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等形式继续进行反清宣传，播撒革命火种。在此基础上，从1899年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正式出版自己的报刊。

据记载，辛亥革命前由孙中山亲自创办、改造，或由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创办的报刊主要有：

- 1899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
- 1901年在日本创办的《国民报》；
- 1903年在檀香山改组的《檀山新报》；
- 1905年在日本创办的《民报》；
- 1907年在加拿大创办的《大汉公报》；
- 1907年在暹罗创办的《华暹新报》；
- 1907年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兴日报》；

^① 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6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08 年在缅甸创办的《光华日报》；
1910 年在美国创办的《少年中国晨报》；
1910 年在加拿大创办的《新民国报》；
1910 年在马来亚创办的《光华日报》；
1911 年在菲律宾创办的《公理报》。^①

《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最早和影响最广泛的报纸，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12 月 11 日注册，翌年 1 月 25 日于香港正式出版，印刷设备是孙中山在日本横滨购置的，初期经费也是由他支付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为兴中会的主要成员陈少白（1869—1934），1906 年 7 月由冯自由继任，1910 年由谢英伯继任。由于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因而被誉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还是在 1899 年夏秋，孙中山、陈少白等人筹划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开始了办报的准备工作。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作为办报地点，是因为香港是兴中会早期活动的基地，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又是革命党人进入华南开展活动的门户，在此可以将办报同革命活动很好地结合起来。由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孙中山遂派陈少白前往香港主持编务，自己则负责报纸的物资及人员供给。他还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为报纸定名为《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每日出版“大小二张”，大张以“道路之传言，朝野之琐事”为主，设“论说”“国内新闻”“外国新闻”“广东新闻”“香港新闻”“来稿”“来件”等栏目；小张主要刊登货价船期表。该报十分重视政论，“论说”栏每天都有编者自撰

^① 参见方曙：《孙中山创办的海外报刊》，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8 期，1979 年 12 月。

的言论，“乃所以抒该本报主笔之意见，亦所以令阅者比较各报意见之异同”。^①此外，报纸创办初期还“日撰英文论说一篇，附录报纸，俾供洋人快睹”。^②该报大张正文版借鉴了日本报纸的编排形式，将版面均分为6个横栏，每栏长15字，缩短了字行，便于阅读，后渐为他报仿行。

除了出版日报之外，报馆还同时出版一份旬刊，即《中国旬刊》，以兼收日报、期刊之长。

《中国旬报》10日1期，每期1册，阴历逢五出刊，主要刊登“中外之要信，名人之议论，政治、格致、农圃、工艺、商务、方技之学”等。^③先后设有“论说”、“中外时事”、“中外电报”和汇编会党方面消息的“党局”、专载谐文小品的“杂俎”等栏目。从第11期起，“杂俎”改名“鼓吹录”，专登粤讴、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文献戏剧作品。1901年2月，《中国旬报》出至第37期停刊，“鼓吹录”转入《中国日报》，成为了它的文学副刊。

从1900年正式创办到1913年停刊，《中国日报》连续出版了13年，是辛亥革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它的出版，一举改变了革命党人没有机关报的局面，使兴中会的宣传活动从依靠口头演讲、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的初级阶段进入利用新闻媒介进行大规模宣传的较为成熟的阶段）。它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向中国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冲击，为建立新的中国摇旗呐喊。它刊载的《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等文章，曾被人誉为“最惊人的文字”；它讽刺时弊的歌谣与杂俎，也尖锐泼辣，为中

^① 《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中国日报》。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16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② 《中国报序》刊于1900年1月25日《中国旬报》第1期。

^③ 《中国报序》刊于1900年1月25日《中国旬报》第1期。

国报业开创了副刊文字的新风，极受读者欢迎。陈少白后来忆述该报时曾说道：

《中国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自乙未广州事败，同志星散，团体几解。

《中国报》出，以悬一线未断之革命工作，唤醒多少国民昏睡未醒之迷梦，鼓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之主义，战败康氏保皇之妖说，号召中外，蔚为大革命之风气也。^①

《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期间，经历了艰难困苦。它曾数度因经济拮据而险些停刊；也曾三易社址：创刊时的社址是中环士丹利街 24 号，1906 年迁至上环德辅道 301 号，1908 年冬再迁至荷理活道 231 号。在该报危难之时，香港热心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伸出援手，使报纸一一度过险境。辛亥革命后，该报迁往广州继续出版，至 1913 年 8 月遭地方军阀龙济光封禁。

《中国日报》虽然只存在了 13 年，但是它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冯自由对此评价甚高：“以十三年期间之大声疾呼，卒能领导海内外舆论以倾覆清廷，重光汉业，殊非当日参与诸干所及料也”。

民主革命派的另一份重要刊物是被称为“宣传革命之急先锋”的《民报》。

《民报》

1905 年，孙中山到达东京。在他的斡旋和推动下，兴中会与以章炳麟（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合并，组成新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经黄兴提议，同盟会决定将在东京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组为自己的机关报。

《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办于 1905 年 6 月 24 日）是留日学生

^① 引自方曙：《孙中山创办的海外报刊》，《地平线》杂志第 8 期，1979 年 12 月。

创办的一份革命刊物。主持人为宋教仁、程家桢。该刊的宗旨为：“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杂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① 8月27日，《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警吏查禁原因是该刊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的文章。此文揭露了日本对我辽东半岛领土的野心，从而引起日本官方的恼怒。面对这种情形，同盟会认为不宜再用《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报的名称，遂将其更名为《民报》。11月26日，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民报》在东京正式出版。

《民报》是一份杂志型的刊物，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每期150页，6-8万字。1907年出临时增刊一期（名为《天讨》）1908年10月出至第24期，因发表汤增璧《革命之心理》一文，被日本官方查禁。停刊一年零两个月以后，1910年1月由汪精卫秘密复刊，只出了两期，同年2月又被日本当局封禁而终刊，共出刊26期。

创刊号上发表了孙中山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他指出：“民报所为作也”，乃宣传三民主义。他要求“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并使“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报》集中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精英力量。先后挂名为该刊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璧等。此外，陈去病、吕复、苏曼殊、冯君武、周作人、陶成章、田桐、柳亚子、冯自由、叶夏声等也曾为该刊撰稿、译稿或作

^① 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8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画。《民报》和《中国日报》成了当时同盟会最具权威的舆论代表，成为宣传三民主义的主要论坛，同时也是与康梁维新派论战的旗手。“建立中华民国”的口号，就是《民报》在 1907 年正式提出来的。

《民报》以同盟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宣传方针，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它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以中英文刊登其宗旨：（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土地国有；（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建设共和政府；（五）主张中日国民之联合；（六）要求各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民报》上发表的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除了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留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之外，还有《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陈天华所著《狮子吼》（小说）尤其脍炙人口。且摘录两段以见其恢宏气势及绚烂文采：

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什么代越庖俎，还他个一矢双穿。人生一世几华年！男儿六尺谁轻贱！精金百炼，磨砺时贤，将军三箭，恢复利权。便封豕长蛇，也不过再起群龙战！

从今后，外交策，誓完我独立权！休教碧眼胡儿，污了庐山面，任他花县游蜂恋，还他铁血神龙变。我定要到一声霹雳走春霆，他虚掷了十年肝脑如秋扇。

由于《民报》充满革命激情和具大的感召力，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各期不得不一版再版。据报纸第 11 期所刊广告称：创刊号已印第 7 版，2、3 期印 5 版，4、5 期印 4 版，6 期印 3 版，7、8 期再版，9、10 期印 4 版，发行量最高的一期达 17000 余份。在《民报》的宣传鼓动下，成立不到一年的同盟会会员人数过万，革命火种遍播全国和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区。

《国民报》

在《民报》创刊之前，兴中会曾于 1901 年 5 月 10 日在东京创办过一份《国民报》。该报为月刊，同年 8 月 10 日终刊，共出过 4 期。秦力山任主编，沈翔云、戢元丞为主要支持者，冯镜如任发行人。该刊由孙中山资助并领导，刊名取“冀明我国民当任之责，振我同胞爱国之心”之意。《国民报》以“唤起国民精神”为宗旨，大力宣传革命排满思想，揭露清政府的专制卖国政策，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中国“二千里山河已为白种殖民地，四万万黄种已为欧人注籍之奴”（《中国灭亡论》）；“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名也”（《亡国篇》）；它倡言“倒旧政府而建新中国”（《中国灭亡论》）；强调民权，认为“民权之集，是为国权；民而无权，国权何有？”（《二十世纪之中国》）还预示了中国革命危机之必然到来：“壅之愈甚者，溃之愈猛；压之愈暴者，激之愈烈。今日我国受数重奴隶之压抑，亦云至矣。物极必反，惟理之常”（《二十世纪之中国》）。由此可见，该刊在宣扬民族意识、灌输民主思想方面是相当出色的。该刊每期印刷逾 2000 份，发行于东京，并经上海销往国内。后因冯镜如背离兴中会而与梁启超合流，《国民报》只出版 4 期便夭折了。

《檀山新报》

1903 年，孙中山第四次来到檀香山。在此期间，他改组了《檀山新报》，将它作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檀山新报》创办于 1881 年，为广东香山县人程蔚南所办，原属私营商业性周报。1894 年秋，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即被选为总办（会长），程蔚南、许直臣被选为正副文案。因《檀山新报》笔政由许直臣主持，该报实际上已成为兴中会的喉舌。1898 年，该报由初期的石印改为活版铅印，并由周报改为每周出版两期，但由于助笔者寡，报纸未能发挥较大的宣传效力。20 世纪初期改版

后，《檀山新报》实力大增，何宽、林鉴泉等加入笔阵，使该报渐有生气，孙中山也亲自撰文，更增加了报纸的影响力。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孙中山派《中国日报》记者卢信返檀香山主持革命工作，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檀山新报》则因程蔚南自觉年迈体衰无意续办，乃于 1906 年由同盟会会员曾长福集资将该报印刷设备购下，改名《民生日报》继续出版，卢信任主笔。然而《民生日报》仅出版一年左右，卢信因言论屡受股东干涉而愤然辞职；后在曾长福的支持下，另起炉灶，自创《自由新报》，亲任社长，大力鼓吹革命。《自由新报》不但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也成了该会檀香山分会的总部。1910 年，孙中山第五次赴檀香山开展工作，就下榻该报楼上，并在那里召开会议，指导革命活动。^①

《大汉公报》

孙中山对侨办报纸进行改造，除《檀山新报》外，还有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大汉公报》为洪门致公堂的喉舌，创刊于 1907 年，其前身是与洪门关系密切的《华美日报》（1906 年 12 月初创办于温哥华）。在当时的美洲，洪门会党对华侨下层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美洲华侨十之七八都参加了该组织。1896 年孙中山到北美活动时，遇到的不少困难都与他未能取得洪门致公堂的支持有关。他曾慨叹：“致公堂一反对筹饷，则虽热心革命者亦不敢前”。^②他吸取了这个教训，于 1906 年冬加入致公堂，并要求同盟会会员也都加入致公堂，将两支反对清廷的力量结合了起来。加入致公堂后，他立即着手协助该堂改革，向

^① 参见方曙：《孙中山创办的海外报刊》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8 期，1979 年 12 月。

^② 参见方曙：《孙中山创办的海外报刊》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8 期，1979 年 12 月。

堂友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孙中山的感召下，加拿大温哥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书记黄璧峰等人发起创办了《大汉公报》，为革命呼号。该报创刊之初，先后聘请张泽黎（《檀山新报》记者）、黄希纯为主笔。1910年，冯自由应聘由香港赴加主持该报，并负责同盟会的工作。《大汉公报》实际上已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派的喉舌。

《华暹新报》

《华暹新报》的前身是《美南日报》，1906年由陈景华、萧佛成、沈苻思创办于曼谷。《美南日报》是一份普通的侨报，革命倾向不明显。后因经费拮据，遂在华侨中集资，改组为《湄南日报》。时值保皇党人徐勤来泰活动，部分董事受其煽惑，引起股东分裂。保皇党人在《湄南日报》旧址创办《启南日报》，鼓吹君主立宪；革命党人则另觅新址，于1907年创办了《华暹新报》。该报由萧佛成任社长，陈景华任主笔，用华、泰两种文字出版。1908年同盟会暹罗分会成立，萧佛成被推举为会长，《华暹新报》遂成为该会的机关报。是年孙中山在暹罗逗留期间，就是用该报的社址与外地联络、指导工作的，陈景华则为孙中山传递书信。

《中兴日报》

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兴日报》，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该报诞生前一年，孙中山偕胡汉民来新加坡时，就已开始筹谋建立宣传机构。后来他不但为该报筹措开办经费和扩充股本操劳，还为该报调兵遣将，安排人事。曾经在《中兴日报》主持笔政的有胡汉民、田桐、居正、陶成章等人，汪兆铭、杨秋帆、吕志伊等也挥毫助阵，遂使《中兴日报》成为革命派在南洋一带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孙中山对该报寄予厚望，曾于1908年4月6日致邓泽如函中说道：“中兴报于大局甚为有关，不能不竭力维持”。可是，该报却屡为经济问题所困扰，终因亏

损严重，经费无着，勉强维持到 1910 年春停刊。

《光华日报》

1908 年 4 月，孙中山派汪精卫赴缅甸组织同盟会仰光分会。为掩人耳目，该会以“觉民书报社”为会名。与此同时，居正、杨秋帆、吕志伊也被派往筹办一份报纸，鼓吹革命。因当地《仰光新报》主持人庄银安加入同盟会并被选为分会会长，乃由他就地向侨商招募股本，于 1908 年 8 月 1 日创办《光华日报》作为同盟会仰光分会的机关报。庄银安兼任该报经理，居正、杨秋帆主持编务，胡汉民、汪兆铭也助以一臂之力。后来胡、汪、杨他往，由居正、吕志伊主持笔政。当时居、吕各以“觉生”、“天民”为笔名撰文，讽刺清廷驻仰光领事萧永熙，宣传反满思想。此举引起萧永熙的不满，他行文以抄没股东原籍财产相威胁，迫使股东们拍卖报馆全部资产，《光华日报》不得已停刊。报纸停刊后，革命党人再接再厉，重新筹集资本，于同年 11 月 24 日复办《光华日报》（又称“第二光华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但出版至 1910 年夏，又遭萧永熙迫害（被诬鼓吹“无政府主义”），结果报纸再度被封，主笔居正、经理陈汉平被驱逐出境，庄银安也被迫逃亡槟榔屿。

1910 年 12 月 20 日在槟榔屿创办的《光华日报》（又称“第三光华报”），就是庄银安逃亡槟榔屿期间，与当地同盟会的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人联合创办的。吴世荣是槟城同盟会（该会是 1905 年奉孙中山之命建立的）会长，黄金庆、陈新政均为该会骨干。1909 年，同盟会南洋支部因环境关系由新加坡迁往槟榔屿，槟榔屿遂成为同盟会在马来半岛的活动中心。尤其是在 1910 年春夏，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及仰光的《光华日报》相继停刊后，槟榔屿同盟会的地位就更重要了。与此相应，《光华日报》的出版也就更具有继往开来、维系人心的特殊意义。该报创刊前后，适值孙中山再度由美国东返，居于槟榔屿。黄兴、

胡汉民、邓泽如同盟会领导人也络绎来此聚会，策划黄花岗起义的军事会议即在此召开。可见，《光华日报》实际上已成为指挥中国民主革命的临时行营。辛亥革命后，该报继续出版。

《少年中国晨报》

《少年中国晨报》的前身是旧金山少年学社主办的油印周刊《美洲少年》，创办人是美国土生华侨李是男。1910年2月，孙中山再度亲临美国筹募军饷，并组织成立了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少年学社全体成员加盟，推举李是男为会长。是年8月，《美洲少年》被改组为日刊，定名《少年中国晨报》，作为同盟会旧金山分会的机关报铅印出版。这是美国本土上出现的第一家同盟会机关报。该报的主持人即为李是男，孙中山居留美国期间，亦曾亲自主持该报笔政。该报大力抨击君主立宪论调，为中国民主革命张声势，在美洲华侨中有较大的影响。

《新民国报》

《新民国报》1911年3月创办于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初为不定期油印刊物，后改为铅印周报，1912年改为日报。该报是在孙中山到维多利亚筹备军饷时，联合同盟会会员共同创办的，是同盟会加拿大分会的机关报。同盟会曾派夏重民、谢英伯、冯自由、陈树人等先后主持笔政。辛亥革命后成为国民党加拿大支部的机关报。

《公理报》

菲律宾的《公理报》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创办的最后一家报纸。1911年春，同盟会派李其自香港前往菲律宾，与孙中山早年的同学郑汉琪商议在马尼拉成立同盟会分会的事。《公理报》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1911年10月）。创刊之初，郑汉琪任总经理，吴宗明任总编辑。该报名义上由普智书报社主办，实际上是同盟会菲律宾分会的机关报。一年后扩大招股，添置设备，增加版面，发行网遍及菲律宾各岛和香港、广州、上海、厦门、北

京等地。民国以后，该报作为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 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停刊。

除了上述报刊之外，郑贯公主编的香港《广东日报》（创办于 1903 年）和《有所谓报》（创办于 1905 年），由周之贞等人主持的新加坡《星洲晨报》（创办于 1909 年），由吕志伊主持的仰光《进化报》（创办于 1909 年）等，实质上也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 – 同盟会的喉舌。只不过这些报纸是由兴中会 – 同盟会的会员自发创办的罢了。

辛亥革命前在海外创办或改造的革命派报刊，大力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抨击保皇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在当地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它们“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因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

三、两派报刊的大论战

曾几何时，维新变法还是最进步的言论，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民主革命的呼声又大倡于天下。这就使革命派与保皇派报刊之间形成了相互对垒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那场大论战。

早在 1900 年，革命与保皇之争就已初露端倪。1901 年 8 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首先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向保皇派放出了第一枪。1902 年广州《岭海报》攻击革命派策划广州起义，香港《中国日报》严词痛斥，“双方笔战逾月”。这是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交锋。1903 年 6 月，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黄世仲在《中国日报》上发表《驳康有为政见书》，对康散布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等观点加以驳斥。1903 年 12 月和 1904 年 1 月，孙中山亲自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篇文章，对保皇派《新中国报》散布的“保皇即革命”的谬论予以痛

斥。这之后，两派报刊之间的笔战益发激烈，至 1905 年《民报》创刊，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政治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所罕见。当时双方投入这场论争的国内外报刊有数十种之多，而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争最为激烈，可以说是这次大论战的主战场。

《民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向保皇派和《新民丛报》发起了攻击。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无异于战斗动员令，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等文，也如同投向保皇派的匕首和投枪。1906 年 4 月，《民报》第 3 期以号外的形式刊登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一文，把双方的对立观点归结为 12 条，并宣告从第 4 期起逐一加以驳斥，展开了全面的舆论攻势。此后，指名同《新民丛报》驳难的文章有：《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汪精卫，刊于 1906 年 5 月第 4 期），《斥〈新民丛报〉之谬妄》（胡汉民，刊于 1906 年 6 月第 5 期），《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汪精卫，刊于 1906 年 7 月第 6 期），《答新民难》（汪旭初，刊于 1906 年 11 月第 9 期），《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十三号社会主义论》（民意，刊于 1907 年 3 月第 12 期）等三四十篇。《民报》论战的主将，前期主要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从第 6 期起，章太炎主编《民报》（第 1 期至第 5 期的主编为张继），他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和战斗檄文，逐渐成为后期论战的骁将。此外，朱执信、廖仲恺、汪旭初等也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场论战中，《新民丛报》先后发表了 20 多篇文章。重要的有：《开明专制论》（刊于第 75 期、第 77 期），《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刊于第 76 期），《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刊于第 79 期），《暴动与外国干涉》（刊于第 82 期），《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刊于第 89 期）等。这些文章均由梁启超执笔，发表时署名“饮冰”。梁启超是这次论战中保皇派一方的主

帅。此外，康有为、徐佛苏等也写了不少文章。

归纳起来，双方主要是围绕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展开论争的：

1. 革命还是保皇；2. 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3. 是否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革命派强调必须实行革命、推翻满清，反对保皇改良，驳斥革命必招瓜分的谬论；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反对君主立宪，驳斥开明专制和中国文明程度不足以行共和的谬论；主张实行“平均地权”，要求矫正贫富不均的状况，驳斥实行这种经济改革会破坏社会秩序的谬论。总之，革命派高屋建瓴，大张挞伐，把一场舆论斗争进行得有声有色，酣畅淋漓，写下了海外华文报刊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页。

在这场大论战中，《新民丛报》节节败退，很快便难以招架了。1906年，该报第83期刊登了一篇《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试图平息论战，革命派则因他们没有停战的诚意断然拒绝了。至1907年冬，论战终以革命派取得胜利、保皇派惨遭失败而告一段落；《新民丛报》也于1907年11月宣布停刊。梁启超曾沾沾自喜地说过的“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胫而走”的黄金时代，很快便成为过眼云烟。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几乎把海外所有的华文报刊都卷了进来。它们同样分为革命与保皇两大派，彼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首先是日本。同盟会成立后的两三年间，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数目不下三四十种。在这些报刊中，与《民报》站在一起的有《醒狮》（1905年9月创办）、《复报》（1906年5月铅印出版）、《云南》（1906年10月创办）、《鹃声》（1906年出版）等，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1907年1月创办，月刊）和梁启超虽然并非一派，但它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言论却与《新民丛报》沆瀣一气。

在新加坡，彼此对阵的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的《中兴日报》。时间在 1907 年至 1908 年间。《南洋总汇报》方面参与论战的有徐勤、欧榘甲、伍宪子、梁伯鸣等人，《中兴日报》方面参与论战的有胡汉民、田桐、居正、黄兴、汪精卫、陶成章等人。参战双方都是宣传战线上的一时之选，因此这场论战备受瞩目。针对《南洋总汇报》主张立宪、反对革命的论调，《中兴日报》连续发表 50 多篇文章予以反击。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孙中山也亲自参加了这场笔战。他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抨击对手保皇立宪的主张。

在仰光，彼此对阵的是保皇会的《商务报》和同盟会的《光华日报》。《商务报》由张石朋(笔名顽石)李牙聪(笔名聋子)主笔，《光华日报》由居正(笔名生公)吕志伊(笔名天民)主笔。双方笔战数月，张石朋豁然觉悟，宣布脱离《商务报》。李牙聪孤掌难鸣，败下阵来。时人戏撰一联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天民示威，聋子投地。”^①保皇会不甘心失败，后勾结清廷驻仰光领事唆使缅甸当局将居正等二人押解出境。

在檀香山，彼此对垒的是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和革命派的《自由新报》。《自由新报》创刊于 1908 年 8 月，由当地同盟会成员集资创办。作为同盟会檀香山分会的机关报，该报常与当地保皇派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并多次因严词激烈而涉讼法庭。正如冯自由所描述的那样：“由丁未之辛亥之四五年间，几无日不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笔战。且于笔政而外，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与保皇党人涉讼法庭。……故报业中于人于办报经常费外，尚须为讼费之预备，实较在美国本土办报为困难也。”^②

^①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85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4 集），第 134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在旧金山，彼此对垒的主要是保皇派的《世界日报》和革命派的《大同日报》与《少年中国晨报》。《世界日报》的前身是《文兴报》，1906年改组并更名，成为保皇会的喉舌。《大同日报》为洪门致公堂所办，1904年发生华文报刊史上有名的易帜事件，遂成为倾向孙中山的革命报刊。《少年中国晨报》是旧金山同盟会的机关报，其口号是“倾覆现在强权专制恶劣贪淫之大清政府”“恢复我中华祖国”“回复我民族独立之性”。两派报刊针锋相对，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温哥华，彼此对垒的主要是保皇派的《日新报》（创办于1903年，是维新会在加拿大的机关报）和革命派的《大汉公报》时间是在1909年至1910年。当时，《日新报》的主笔是保皇派的舆论干将梁文卿，《大汉公报》的主笔是革命派的骨干分子冯自由，双方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彼此驳论多至200余篇，是海外革命派与保皇派最持久的论战。后《日新报》终因所持论点违背时代潮流而败下阵来。冯自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自豪地说：“……加拿大原为康有为创始保皇会之发源地，经余口诛笔伐，侨胞之陷溺君宪邪说者，遂多豁然觉悟，而改趋革命一途”。^①

此外，在泰国保皇派的《启南日报》与革命派《华暹日报》之间，在荷属东印度保皇派的《苏岛日报》与革命派《泗滨日报》之间，在澳大利亚保皇派的《东华报》与革命派《警东日报》之间，也都进行了有关君主立宪还是民主革命问题的论战。

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南洋和美洲各地的保皇势力及其报刊都成了强弩之末，而革命力量则方兴未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10年前后，“凡华侨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3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员之足迹”。^①虽然在这场论战中，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它们所遇到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日本横滨的《国民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等皆因经济拮据而辍版，香港的《中国日报》也几乎因财政困难而停刊，檀香山的《民生日报》、曼谷的《渭南日报》等因发生内讧而拆伙，仰光的《光华日报》因被清廷官吏迫害而无法生存，东京《民报》则被日本政府以“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罪名横加封禁，孙中山也因此而被勒令离境。至于同情和支持民主革命派的其他华侨报刊和留学生刊物，遭厄运者更不在少数。

然而，民主革命派及其追随者在海外出版的报刊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孙中山在 1923 年 2 月的一次演说中强调的那样：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②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 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及意义

从戊戌政变开始（1898 年）到武昌起义爆发（1911 年）即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海外华文报刊有如下特点：

一、主导性报刊为政治报刊

戊戌政变前后，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商业性华文报刊已经兴起，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881 年闽侨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的《叻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时期（19 世纪末）商业

^①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86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引自孙中山《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

性的华文报刊还有新加坡的《星报》，檳榔嶼的《檳城新报》，菲律賓的《华报》、《岷报》和《益友新报》美国的《檀山新报》、《文兴报》等。这些报刊均为私人所有，由华商出资或依靠广告费维持；内容主要是地方新闻、中国新闻、国际新闻、货物行情等，目的是“利商贾，资见闻，达輿情，通官事”，即重在向侨民传播各种信息，以促进华侨社会的发展，未见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斗争的逐步展开，一些报纸逐渐具有了政治色彩，新创报刊更成为两派政争的輿论工具。先是保皇派势力及其报刊占上风，之后是革命派改造并创办报刊，大造革命輿论，从而打破了保皇派在海外宣传战线上的垄断局面。此后，凡是有保皇派报刊的地方，革命派都办起报刊与之对垒，并且在数量上很快超过了它们。与商业报刊不同，这类报刊（政治性报刊）是适应保皇派与革命派斗争的需要而创办的，它重在说理驳论，而不在传递信息，政论是它的主要手段。

先期使用政论这种文体的，是王韬、梁启超等人。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熏陶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出于传播先进思想、倡导社会变革、启迪民众心智的需要，王、梁等人秉承中国古老的论说传统，又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融入其中，从而创立了政论这种新型的报章文体。这种文体重在强调“明理达意”，并不过多着意于文字之雅俗和写作技巧之工拙，与之前的时文八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保皇派的《清议报》就开辟了“国闻短论”专栏，所发评论与当时重大新闻事件相配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设有“论说”栏，每天刊登编者自撰的言论，“乃所以抒该本报主笔之意见，亦所以令阅者比较

各报意见之异同’^①；孙中山 1905 年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堪称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政论佳作；章太炎 1906 年任《民报》主编后，先后在该报发表文章 58 篇，其中政论文章 42 篇，它们说古论今，针砭时弊，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主要是政论性报刊，其内容也主要是政治宣传与鼓动，但也有一些纯商业性质或是持中立立场的报刊存在，如 1904 年在荷属东印度创办的《译报》，1908 年在马尼拉创办的《警铎新闻》，1909 年在爪哇创办的《爪哇公报》等，即便是政论性的报刊，在论战之外，也对华侨社会的一些问题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二、读者多为知识阶层

本章开始我们提到，早期海外华文报刊的创办者是外国传教士而不是中国人。原因在于其时清廷严禁华民出洋，出口劳工都是秘密招募、非法贩运的。他们多为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许多人不识字，无论就物质基础还是就精神需求而言，都不存在自己创办报刊的条件。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解除了禁止华工出国的法令，出国人数一时间迅猛增长，他们中除了贫苦劳工外，还有一些商人和知识分子，这就为中国人自己创办报刊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华侨中知识阶层的比重仍然很低，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早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不但数量少，发行量也十分有限。例如新加坡的《叻报》创刊时日销仅 50 份，两年后增加到 350 份，1894 年才上升至 450 份；美国的《华洋新报》（原《唐番公报》）的销数多一些也仅为 750 份。^②

维新变法失败后，国人痛感洋务运动的路线行不通，于是出

^① 《谨以各报馆公共章程》，《中国日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689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据《美国报纸名录》1890 年的估计数。

现了研究日本的高潮，并得出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变法自强的结论，“留日热”由此兴起。据统计，自 20 世纪初期开始，留日学生人数 1901 年为 280 人，1903 年增加到 1000 至 1300 人，1906 年则骤增至 8000 至 12000 人。^①加之变法维新失败后，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致使康梁等一大批维新党人及其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主要是日本）。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开展宣传活动，播撒革命的火种。在此基础上，一个具有政治见解的知识阶层在海外逐渐形成。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日本，在世界各地创办报刊，扩大影响，从而带动了华文报刊的发展。以日本华文报刊为例，辛亥革命前后，仅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就有六七十种之多，其中既包括《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等最早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也包括《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等具有地方色彩的爱国刊物，而女学生创办的几份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刊物，也曾备受瞩目；加之政界人士创办的刊物和其他刊物，日本出版的华文报刊多达百十种，日本遂成为当时拥有华文报刊最多的国家。20 世纪初期，美国也出现了各派政治力量竞相办报的热潮。当时洪门致公堂（秘密会党）在华侨中影响颇大，美国华侨中的大多数都加入了该组织。从致公堂订立的新章程来看，其会员中的一部分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因此而成为保皇派和革命派宣传和争取的对象。如致公堂创办的《大同日报》先是被康梁控制，后经孙中山改组，成为了革命派的讲坛。

陈辛仁主编：《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第 29 页，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方雄普等编著：《海外侨团寻踪》第 37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年版。

由此可见，没有海外华侨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其中知识阶层比重的增长，就不会有办报的需求和读报的需要。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阶层在海外的形成，才出现了华文报刊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报刊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

早期华侨报刊多为商业报刊，它们由华商出资创办，并依靠广告费维持发行。如新加坡的《叻报》由三代经商、家道殷实的福建侨商薛有礼创办，该报除了刊登新闻外，还以较多篇幅登载各国洋行的广告。《叻报》之所以能够连续出版半个世纪之久，与这方面的经营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政治报刊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它们中虽然有一部分是由商业报刊转化而来的，如檀香山的《檀山新报》等，但大部分是由保皇派或革命党人筹资创办的。例如，保皇派在海外的第一个机关报《清议报》的经费来源，就是旅日华侨冯镜如、冯紫珊等募集的款项，梁启超流亡时李端芬所赠的“赤金二百两”和黄遵宪等人的捐款。《新民丛报》创办时，由于资金不足，向保皇会译书局借来几千元；而该报的停刊，也是因“出报既屡衍期，则阅者生厌，销数亦窒，而经济不能支”^①。革命派的报刊也大抵如此，“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中国日报》创办之前，孙中山曾在日本筹措经费、采购印刷设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前，孙中山也曾“由日本横滨乘船赴越南筹款”。他在旅越华侨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救国救民”，“即席认捐的人很踊跃，当晚认捐总数约 1 万 2 千元”。^②孙中山还亲自为中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刊物《开智录》捐款 200 元，为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宣传反清的刊物《国民报》捐款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8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李凡：《孙中山全传》第 135 页，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1000元，作为印刷费。

由于改良派或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以政治论战为主，很少或基本上不刊登广告，因而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报纸创刊时是不定期出版的油印报纸，后来才改为铅印报纸；有些报纸则经常脱期和中途停刊。例如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对该报寄予厚望，而该报却因“资本不足，屡次临渴挖井”艰难支撑了两年多的时间。辛亥革命后，海外的保皇派报纸只有三数家勉强维持，但已不成气候；革命派报刊的大多数也都相继停刊了。“现在仍旧以原来的报名继续出版的，只剩下了四家，即美国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今称《少年中国》）马来西亚檳榔屿的《光华日报》、加拿大温哥华的《大汉公报》和《新民国报》”。^①

四、报刊倒戈、易帜较为普遍

由于保皇派在利用传播媒介方面棋先一着，收到先声夺人之效，其政治主张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期，保皇会在美洲各地先后建立了78个分支机构，仅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占该地华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1903年梁启超到美洲各地访问时，所到之处，保皇党人都“以军乐欢迎”，“光崇备至”^②；那里出版的华文报纸，几乎清一色都是保皇派的报纸。

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学说，是在同康梁君主立宪主张的论战中发展、并逐步取得优势的。由于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的主张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根本愿望和最高利益，因而最

^① 方曙：《孙中山创办的海外报刊》，香港《地平线》杂志第8期，1979年12月。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7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终得到广大侨民的拥护与支持，不少华侨还踊跃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保皇派的报刊，则由于其所提出的改良主张既不符合中国实际，又有悖于历史潮流，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就连保皇党的追随者也相继倒戈，投向民主革命派的阵营。《大同日报》的易帜就是一例。该报原为洪门致公堂的报纸，受保皇派控制，总编辑欧榘甲曾撰文诬蔑孙中山为“伪革命党”，孙中山与洪门合作（通过加入洪门的方式）后，与致公堂总堂大佬黄三德和英文书记唐琼昌等结为至交，黄、唐力劝欧榘甲与孙中山合作，欧榘甲不从，黄三德等最终向欧榘甲下了逐客令，解除了他的总编辑职务，并请孙中山推荐人来主持《大同日报》。该报于是由保皇党的喉舌一跃而变为革命派的舆论阵地。经革命派改造后易帜的报刊还有美国的《檀山新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泰国的《华暹日报》、缅甸的《仰光新报》等。“大论战”以后，美洲、南洋一带的保皇会会员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入同盟会，使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其控制的报刊也由最初时屈指可数的几家扩充到 30 多家，数目上远远超过了保皇派报刊。

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无论是就社会进步而言，还是就报业发展而言，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首先，它使海外华侨更加关心祖国命运。

政治性报刊出现之前，海外华文商业报刊因“尚没有受到各方政治介入”而“专注于为华侨服务，在促进华侨经济发展和内部团结方面发挥其舆论的作用”。^①例如新加坡的《叻报》虽然把自己置于中国报纸之列，却较少关注中国时局。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中外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亲政，宦官弄权，洋务运动兴起旋又失败等等，这些均未在《叻

^①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 9 页，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报》上得到反映。这一时期，《叻报》正在连篇累牍地发表说教文章，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以“树中国衣冠文物之气”^①，《檀山新报》创刊时，其内容也以报道当地各业行情为主；兼报道祖国、家乡信息和广告”。^②由此可见，早期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是较为松散的。

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国内局势更加危急，从而引起了海外华侨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此同时，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在世界各地创办报刊，揭露清廷的腐败，宣传拥帝反后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后来居上，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大造推翻清朝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革命舆论，并与保皇派展开政治大论战，最终使海外华侨中的绝大部分变追随康梁为拥护革命。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治宣传和论战，唤醒了广大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使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在革命党人的带动下，海外华侨不但踊跃捐款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起义和1908年的钦廉起义，都是以华侨志士为主组织起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的72烈士中，就有23人是华侨，几乎占三分之一。这与海外华文报刊的革命宣传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从这时起，海外华侨与祖国形成了愈益紧密的联系。他们与中华民族荣辱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其次，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的海外舆论中心。

冯自由在《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的《自序》中说：“中华民国之肇造，以海外华侨协助之力为最巨。……近人有警句云，

^① 柯木林等：《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第129页。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5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无华侨即无革命（按：指辛亥革命），诚确论也。”台湾海外出版社出版的《华侨志总志》第七章第一节也提到：“因革命策动多在海外”故此“莫不以华侨分子为中心”。

资产阶级革命及其舆论中心之所以在海外形成，主要是因为当时清廷统辖下的中国国内不存在自由办报的条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报刊出版方面实行“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①的政策，中国人办报毫无保障，只要当地官员不满意，就可以随意封闭。广州的《广报》只因刊登了某大员被参一事，触怒了两广总督，便被下令查封。上海的《汇报》也只因新闻中涉及官府，受到很大的压力，被迫改名整顿。维新变法失败后，革命报刊迅速发展起来。清政府更是不惜采用各种手段，竭力打压、封杀。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制造了“苏报案”，还以及其凶残的手段杀害了新闻记者沈荃（沈是中国新闻记者中惨死于封建统治之下的第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顺利进行革命宣传，只有避开封建统治者的魔掌，到国外办报，走一条由国外到国内的道路。

从这一时期海外华文报刊分布的情况看，这些报刊大都创办于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如日、美）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如南洋一带）。相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前一类国家的民主气氛更浓一些，享有较为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在后一类国家，只要言论不危及殖民当局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过多干预的。这就为报刊的创办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可以在此大胆放言，自由论争，从而形成引导革命的舆论中心。而这一切在国内是不可想见的。

第三，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传播到国内。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5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由于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是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创办的，因而其内容比国内的报刊要开放得多。以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为例，该报对西方国家及其文化思想的介绍，上迄古代希腊、罗马，近到英、美、法、意等国家，上下几千年，涉及的人物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培根、笛卡儿，不下百十人；评介的学科知识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以至自然科学等，无所不包。这些新的思想观念传到国内，自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知识阶层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邹韬奋在谈到初读《新民丛报》的情形时说：“我就一时看入了迷，这也是鼓励我要做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① 1936年毛泽东谈到青年时代（按：指1909年）学习的情况时说：“当时我正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② 留日学生报刊对国内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据周世钊在《我的师表》中回忆，当《浙江潮》被送到湖南长沙周南女校以后，经徐特立、朱剑凡等教师一宣传，“革命思想的浪潮立刻就泛滥起来，冲动了整个学校”。这种影响在江浙两省和上海地区就更为明显了。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大都如此。”^③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的政治宣传不但唤醒了海外侨胞，也唤醒了国内民众，甚而影响了一

① 邹韬奋：《经历》第19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②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6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7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代人以至几代人。没有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

第四，促进了海外华文新闻业的发展。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前，华侨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如果从 1854 年创办的华文周刊《金山日新录》算起，到 1898 年的 40 多年间，只出现过十几家华侨报刊，而 1899 年康梁到海外从事宣传活动后，仅 5 年的时间就出版了 11 种报纸，革命派报刊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他们的对手。辛亥革命前海外各地出版的革命派报刊计有 34 种，保皇派报刊也有 30 多种，加上一些纯商业性的报刊，海外华文报刊的总数在 70 种以上。其分布地域也从原有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拓展到日本、古巴、暹罗、缅甸、墨西哥、越南、加拿大、法国、秘鲁和北婆罗洲等地，初步形成了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遍布世界的基本格局。

报刊业务也有很大的改进。早期华文报刊设备比较简陋，形式也比较古板，大多使用文言文，或华、洋文字合刊，多为石印周刊。这一时期的报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报刊采用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不但改石印为铅印，还印制彩色封面、插图、照片插页，给读者留下清新美好的印象。有些报刊（如留日学生报刊）还一改线装书的传统形式，以洋装书的形式出版，引得国内出版界纷纷仿效，以至洋装书最终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杂志的标准形式。这一时期的报刊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谕旨恭录”、“京报选录”之类的栏目已经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关于世界各国情况的报道和新知识、新学说的介绍以及关乎祖国前途命运的讨论、论战性文章。尽管这一时期报纸与杂志仍没有完全区分开，所谓“报”、“丛报”等多为杂志，但是其内容由贫乏到丰富，形式由单调到多样化的演进过程，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章

辛亥革命后的海外华文新闻业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后，原在海外各地华文报刊中主持笔政的同盟会会员（包括留日学生）纷纷回国，这对华文报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海外华文报刊开始由政治性报刊逐渐向文化性、商业性报刊过渡，并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性色彩。随着华侨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随着知识分子、商界人士办报热情的提高及理念的改变，随着广大侨民文化水平的日渐提高，海外华文报业在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迅速发展，30 年代进入鼎盛期。尽管这一时期的华文报刊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报刊，然而由于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宣传的影响，海外华侨对国内政局的变化仍极为关注，并在自己的报纸上不断给予详细的报道。而对这一时期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外华文报刊更是热切关注，大力声援，充分体现了爱国华侨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意识。

第一节 二战前的海外华文新闻业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新加坡开始成为南洋华文出版业的中心，檳城、曼谷、仰光、巴达维亚、西贡等

地的华文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海外各国都有一批商业性华文报刊出版，华文报刊已遍布世界五大洲。以下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介绍之。

一、新、马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新、马地区创办的华文报纸先后有 60 余家。^① 在新加坡，除了《总汇新报》是辛亥革命之前创办的老报外，其他都是新创办的，其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创办于 1923 年 9 月 6 日，由福建籍实业家陈嘉庚创办。顾名思义，《南洋商报》是以报道商业动态为中心内容的报纸，它的特色就在于“商”字。该报首任经理为林青山，编辑主任（总经理）为方怀南，创刊号印 3000 份，以后每日销量约 2200 份。出版至第 50 天，1923 年 10 月 28 日，因刊登有关曹锟的评论文章，被英殖民政府以触犯禁令为由停刊，林青山和方怀南也因此而离职，直到第二年 2 月 1 日才被允许复刊。从创办到 1930 年，该报由陈嘉庚独资经营，但屡屡亏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其亏损更加严重，以致陈嘉庚无力继续负担报馆费用。在此情况下，成立了由李光前任董事会主席的“南洋商报社有限公司”，接管该报。直到 1942 年 2 月 15 日日寇占领新加坡前夕才再次停刊。从 1923 年到 1942 年的 19 年间，《南洋商报》变动频繁，先后有 5 任经理（林青山之后是叶青沙、侯西反、柯朝阳、傅无闷）编辑部主任 11 人（方怀南之后是杨治襄、林独步、沈职民、张相时等）。他们都是当地颇有名望和影响的侨商、文化人以及新闻工作者，为《南洋商报》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如历任 11 位编辑部主任在主持笔政时，不但亲自撰写社

^① 林远辉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 529 页，广东高教出版社 1991 年版。

论、评论，还不断更新报纸版面及内容，开辟了“时评”、“评论”、“论坛”等专栏，增设《商余》、《爱同》（半月刊）、《学生文艺周刊》等副刊；1927年设文艺副刊《洪荒》；1929年设《经济周刊》、《教育周刊》、《妇女周刊》、《商业周刊》、《学生特刊》、《星期天》、《国画增刊》；1930年设《言论》、《周末论评》、《周末述评》；1932年将各版新闻改为“紧要新闻”，并推出“今日各版新闻提要”；1937年设“编辑室漫谈”、“读者之声”及“来论”。傅无闷任经理期间，创办了《南洋商报晚报》、《南洋商报画刊》，出版了综合性杂志《南洋周刊》。1939年1月初，他主持出版了反映东南亚人文史地、华人社会纪实及学术论著的《南洋年鉴》。全书100余章，250多万字，是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特别是研究南洋华侨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副刊方面又增辟了《电影半月刊》、《戏剧周刊》、《歌咏周刊》、《南洋妇女》、《琼潮》、《人潮》、《救潮》、《狮声》等等。

《南洋商报》创刊时为4大张16版，后来增加到6大张24版，其中广告占一半左右。报费由每月2元，零售每份1角减少到每月1元5角，零售每份6分（1937年6月以后）。

《南洋商报》是战前新加坡及马来亚地区最重要的华文报纸之一，它在提高华侨爱国爱乡的民族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沟通当地与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华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国内抗日战争期间，更是极大地声援、支持了这一正义的事业。

《星洲日报》创办于1929年1月15日，由与陈嘉庚齐名的另一福建籍华侨企业家、号称“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创办。胡氏为推销自己的产品“虎标”万金油等，感到“如其花钱登广告为什么自己不办报”，遂办此报。历任经理为邓荔生、林蔼民和胡昌耀（兼社长）。该报与《南洋商报》并驾齐驱，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有雄厚的资本支持，《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能

较早使用平面印刷机、卷筒印机、新式印机以及铸字机等先进设备，而且竞相招聘高级编辑人才，傅无闷、关楚璞、俞颂华等均担任过《星洲日报》的主编。该报还出版过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文艺》副刊，颇受读者欢迎。1940年，该报聘请张礼千、许云樵等编纂了百余万字的《星洲十年》。该书和《南洋年鉴》一样，为日后研究南洋问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星洲日报》初创时日出4大张16版，1932年扩版，分早报及晚报两次出版，全日共出8大张32版。30年代中期以后，胡文虎又办起了新加坡的第一份午报《星中日报》，还在槟城创办了《星槟日报》（此外还在中国国内创办了厦门《星光日报》和汕头《星华日报》，初步形成报业集团，并于1941年在新加坡成立星系报业有限公司）。

《星中日报》创办于1935年，最初由《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兼任总经理，后改由胡文虎次子胡山任经理，1939年1月又改由长子胡蛟担任。同年9月胡蛟调《总汇报》任社长，经理复由胡昌耀兼任，主编为胡守愚（继任者为钟介民、胡迈）。该报原为午报，后改为早报，之后又加出晚报。创刊时日出两大张，后曾一度增至5大张，1939年改为4小张，侧重图片及副刊。晚报出一小张。

《星槟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办于槟榔屿。经理最初为胡山（胡文虎次子），主编由《星洲日报》编辑胡迈担任，1939年4月，胡迈与《星中日报》主编钟介民对调。该报每日出版两大张，内容有社论、中外电讯、国内要闻、南洋要闻、本岛新闻及副刊等，星期日出版星期刊两大张。

《总汇新报》是创办于辛亥革命前的老报纸，由《南洋总汇新报》改组而成。该报1906年由保皇党人朱子佩等接办，成为保皇派的喉舌。民国成立后，保皇派退出历史舞台，该报继续出版。1929年转到广东帮侨商手中，改称《总汇新报》，由何德如

为名誉总经理，梁显凡任经理。1931年梁显凡辞职，何德如自任经理，黄景棠任副经理，1932年又改由张玉琪任经理。由于竞争激烈，该报勉强支撑了几年，到1938年底因无法维持而收盘；1939年2月由胡文虎接办。他购置新的印刷设备，由长子胡蛟任社长，严瑞堂任经理，并将报名改为《总汇报》。该报每日出四大张，晚报一大张，侧重为广东籍读者服务，派有内地通讯员，报道两广消息。

在槟榔屿，辛亥革命前创办、继续出版的有《槟城新报》和《光华日报》。《槟城新报》由林华谦于1896年创办，是一份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报纸。辛亥革命后，该报逐渐放弃保皇党的立场，1936年并入《光华日报》社，仍用原名继续出版。

《光华日报》创办于1910年（由孙中山倡办），是全马历史最久的华文报，也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文报。1920年创办的《南洋时报》，1930年因出版济南惨案特刊，被英殖民当局勒令停刊（理由是日本领事提出要求），不久总编辑潘允中被迫离境。1920年还有《华侨日报》诞生，1930年、1931年先后有《中南晨报》、《电讯新闻》和半月刊《南洋导报》创刊但不到两年就都停刊了。

1936年，华侨新闻工作者骆世生、林珊珊等人集资创办了“现代报社”出版了《现代日报》。《现代日报》是北马地区唯一的小型报纸，首任董事经理为庄明理，最初由曾圣提任总编辑，后由方君北、洪丝丝继任。该报同时办有晚刊，每天早、晚各出一小张，内容侧重于国内及当地新闻，摘要刊登南洋及国外电讯。当时，抗日战争已逐步进入高潮，该报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大量报道国内抗日军民的消息，并从中透露出新四军英勇抗敌的战绩。该报在当地华侨中广受欢迎，并远销泰国南部及苏门达腊岛西岸各埠，日销上万份。1936年8月及1937年1月，殖民当局以该报发表了过激言论为借口，

两次对其处以罚款并令其停版反省。1939年4月，“现代报社”又出版了《现代周刊》，由林珊珊任经理，洪丝丝任主编，每期3万字，以新闻综述和时评为主。这几份报纸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办。

二、荷属东印度（印尼）

辛亥革命以前，印尼出版的华文报刊均为周报，直到20世纪20年代，华文日报才纷纷创刊。20世纪初，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即所谓“新客”）人数激增，到1930年，“新客”已占印尼华侨总数的36.5%。^①“新客”不懂马来文，而作为新移民，他们又特别关心祖国的情况，并渴望对侨居地有更多的了解，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对华文报刊的需求。20年代以后，印尼华文日报陆续创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家：一是《新报》，一是《天声日报》。

《新报》马来文版（周刊）创办于1910年10月1日，1912年4月1日改为日报，但直到1921年2月21日才出版华文版。《新报》华文版和印尼文版虽分别编排，却是在新报社有限公司统一领导下展开业务工作的，因此其办报方针基本上是相同的。华文版初创时，内容大多是从印尼文版翻译过来的消息和文章，后来有所改进，主要刊登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新闻动态，并在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聘请特约记者，发表颇具特色的“特约通讯”。该报同时大量报道华侨社团、学校、商业等各方面的活动，反对荷兰殖民政府对华侨的歧视与迫害。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报积极宣传抗战，揭露日寇暴行，代收华侨救亡捐款。《新报》言论比较稳重，报道面广，发行量大，是“荷属东印度消息灵通、

^① 温广益、蔡仁龙：《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190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记载翔实、评论公正之最大日报”。^① 这份报纸宣传爱国主义，却能被荷印当局所容忍，主要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国共斗争持中立态度。《新报》华文版由爱国侨领洪渊源任社长，直到 1959 年报纸停刊为止。华文版最初的负责人不详，20 年代谢佐禹即在《新报》工作，1929 年谢佐舜应聘到该报华文版任总编辑，1932 年宋中铨应聘为该报编辑，1940 年林琼光亦到《新报》任编辑。他们是《新报》华文版的主要负责人和功臣。^②

《天声日报》创办于 1921 年 3 月 1 日，是印尼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孙中山曾为该报题写报名并赠祝词。全文如下：

大汉天声，轰腾寰宇，文化既敷，被之南暨。

我党主义，揭橥三民，曰维民族，胞与含宏；

发展民权，人群自治；畅遂民生，群生乐利。

惟笔与墨，时用宣传，斯民觉牖，勛哉维贤。^③

《天声日报》的宗旨是宣扬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在坚守中华民族立场和宣传抗日救国方面，该报与《新报》是一致的，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它们的立场不尽相同。例如在国共冲突中，《新报》保持中立，而《天声日报》则坚决支持国民党。从创刊到 1937 年，该报因进行“政党宣传”触犯荷印法律而被判出境的有社长 2 人、编辑 10 人，被罚停刊 1 次。该报最终于 1942 年 3 月日军占领印尼后停刊。

除上述两家报纸外，当时的华文报纸还有：《工商日报》（吧城，1922）、《日丽晨报》（棉兰，1922）、《苏岛日报》（棉兰，1922）、《三宝垄日报》（三宝垄，1923）、《苏门答腊民报》（1914

① 《南洋研究》第 3 卷第 1 号，1930。

②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第 920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天声日报十周年特刊》A9 页，1931。

年创刊于棉兰，1924年后改称《民报》）、《锡江日报》（望加锡，1925）、《全民日报》（吧城，1926）、《中南日报》（三宝垄，1926）、《大公报》（泗水，1908年创办时称《大公日报》，1922年与《商报》合并后改称《大公报》）、《荷属民国日报》（巴达维亚，1926）、《民声报》（望加锡，1927）、《爪哇每日电报》（泗水，1928）、《泗滨新报》（泗水，1928）、《新中华报》（前身为1922年在棉兰创办的《南洋日报》，1929年改称《新中华报》）、《侨声日报》（坤甸，1929）等。

三、菲律宾

20世纪初期，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经济的发展，以商业为主体的菲华社会逐步形成，创办华文报刊之风渐盛。20至30年代，除了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同盟会菲律宾分会的机关报《公理报》（该报转化为国民党驻菲支部的机关报）尚继续出版外，还出现了17种其他类型的报刊。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①这些报纸存在的时间都不长，短则几个月，长则三五年，同时存在的仅五六种。

《中华日报》1914年由共和党人创办于马尼拉，王子敬为经理，主编施建庵。1915年改组后，更名为《新福建报》继续刊行，由白萍洲主编，但也未及一年即停刊。同年，国民党驻菲第二支部又创办了《民号报》，由前《公理报》编辑李思轸任主编，1932年改组为《新中国报》，出版至战争爆发时停刊。

《平民日报》1919年在马尼拉创刊。它是当地中华工党的喉舌。中华工党是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菲律宾的华侨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组建而成的。初期的总经理是王雨亭（一说陈夏莲）社长兼主编是傅无闷。《平民日报》创刊不久适逢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报纸立即发表评论响应祖国的学生爱国运动，

^① 巫乐华：《华侨史概要》第202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反对北洋军阀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同时大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世界各国劳工运动的情况，在当时的华侨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该报与《公理报》立场观点不同，时常与之进行笔战，就一些原则问题展开论争。《平民日报》以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接近中下层民众而颇受欢迎，成为菲律宾销路最广的侨报。后来由于工党组织渐趋松散并出现经济困难，于 1923 年春停刊。

《华侨商报》(月刊是在《中华日报》和《新福建报》停刊后，由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会长、知名侨领李清泉和商会秘书于以同于 1919 年 10 月发起创办的，1922 年 2 月改为日报。鉴于当时的主要报纸《公理报》和《民号报》都为国民党支部所办，中华商会的董事们希望由华商自办一份报纸，主要报道经济及商业方面的信息，并作为中华商会及商家们的代言机关，而《华侨商报》就是这样的报纸。该报“秉承不偏不倚，立论公正的宗旨，坚持报道客观的作风”，促进华侨和菲律宾人社团之间的感情，为菲华社会利益服务。《华侨商报》从一开始就抨击国民政府的贪污和违法行为，并对国民党自称“对菲律宾华侨拥有管辖权”表示非议。主编于以同因此得罪了在中国和菲律宾的敌人，一再受到当局的威胁和迫害。1942 年日军侵占菲律宾，因《华侨商报》发表多篇抗日文章，于以同被日军司令部处决，《华侨商报》也遭关闭，直到战争结束才复刊。

《新闻日报》创办于 1925 年 2 月，由菲华闽商“南洋闽侨救乡会”负责人李清泉等创办。初期由陈三多任义务总经理，陈克如、陈佑孙为编辑，黄以堤任翻译，宗旨是揭露和抨击福建省官僚军阀腐败势力和恶劣风气，建设新福建。该报后由菲律宾中华总商会理事、老报人吴重生(社长)主持并自行经营管理。吴氏在编辑高承烈的协助下，积极报道抗日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报纸推动华侨捐款抗日，抵制日货，并

与西班牙一公司合作，用华语在广播电台播放抗日活动消息。这份报纸的人员及经费都比较充足，读者对象主要是菲华社会中祖籍闽南的商人、店员和学生。该报也刊登国际要闻及南洋经济新闻，还辟有适合不同读者对象的副刊。当时发行到全菲各个华埠，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马尼拉前夕才告停刊。

此外，这一时期各类小报、期刊也不断涌现，名目繁多。多日刊的报纸有《午报》、《格骨报》、《消愁报》等 16 家；期刊有《华铎》、《求是周刊》、《华潮》、《破晓半月刊》、《校阅月报》、《回声》、《菲律宾画报》、《良友画报》等不下 40 家。马尼拉以外各埠出版的报刊有《时报》、《晶报》、《革命先锋》、《工商周报》等 8 家。以上报刊寿命都不长，多数出版几期或几个月即告停刊。^① 尽管这一时期华文报刊变故较多，但总体上是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是菲华报纸最活跃的黄金时期。1942 年 1 月日军占领菲岛后，菲律宾的华文报纸全部被迫停刊，由占领当局出版《华文马尼拉新闻》。

四、泰国

中华民国成立后，泰国华侨和东南亚各地华侨一样，先后创办了许多报纸和刊物，从而使华侨报刊在 20 世纪 10 至 30 年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天汉公报》1912 年创办于曼谷，由国民党人蔡俊卿创办，不久即停刊。另有刘茂新创办的《中华民报》（1912 年），代表保皇会残余势力，与革命党人 1907 年创办的《华暹新报》（后来成为国民党党报）相对立，成为民国建立后在曼谷坚持康梁立场、宣传君主立宪的一家保守派报纸。该报至 1939 年被封闭。

《侠报》创办于 1918 年，由广东人区灵侠、陈愚侠、冯精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 63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侠、李少侠四人联合创办。该报鼓吹革命，提倡新文化，并大量刊登社会新闻。1922年因亏损而停刊。同一年（1922年），潮州籍侨商林铭三创办《暹京日报》，出版约一年即停刊。1926年，潮州人许超然、荷兰籍华人谭振三分别创办《联侨报》和《侨声报》（后改名为《励青报》），这两家报纸都因言论激进，主张抗日而被封闭。

1927年中国国内大革命时期，海外侨报也发生了新的对立。由吴碧岩、许超然投资创办的《国民日报》（1927年）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路线，不久因悬挂五色旗并攻击中华总商会，遭到商界人士抵制，报份大跌（1936年停刊）。《励青报》因反对蒋介石的政策纲领，常与国民党办的报纸展开论战，被视为共产党的报纸。该报因受中国国民党清党的影响而销量降至24份（一说该报言论极为左倾，不合时宜，而致报份大跌），1927年被当局封闭，总编辑郑省一也被驱逐出境。

《华侨日报》1928年由广东客籍侨商熊幼霖（文阶）等集资创办于曼谷。社长熊文阶（兼），总编辑吴楚声，主笔蔡惠康（怀斌，笔名非非）。创办不久，经费遇到困难，后由中国商会主席、中国驻泰商务专员沈李明接办。沈对报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进，增加版面，降低售价，使用优质纸张，并一度和保守的《中华民报》进行论战，威望不断提高。30年代时，该报日销量曾达8000份，由于办得出色，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评选为中国12大报之一。《华侨日报》掀开了泰国华文报业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象征着泰华报业开始走向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泰国政府采取强迫华侨同化的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法令。1922年，当局颁布了出版法，对华文报刊的经营、出版和发行予以限制。1927年，当局又颁布了一个更加严厉的出版法，规定“对那些原先不是泰国固定居民的人，不发给经营报纸的执照。并且可以危害公共安全或登载有意损害暹罗与各缔

约国政府间关系的文章为理由，随时吊销其执照。”^①这就为泰国政府限制及镇压华文报刊奠定了法律基础。

1931年以后，一些华文报社因坚持抗日立场而被泰国政府吊销执照。对此，各报采取了应变的办法，即一家报纸以两家或三家不同的报名进行注册，报纸被封后，随即以另一报名继续出版。以两个以上的名字注册，便形成了“姊妹报”的格局。如《晨钟日报》（1930年创办于曼谷，由国民党员陈暑木、许金钟等创办，正式登记为国民党党报）——《中南晨报》；《国民日报》——《曼谷日报》；《中华民报》——《中民日报》；《华侨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日报》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救国的呼声中，泰国华侨社会创办了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暹京日报》和《新时报》。继之，以潮州会馆派蚁光炎、余子亮、郑子彬等为主干的抗日爱国侨领办起了《中国报》和《中原报》（李其雄主持报务），目的是号召泰华社会同心协力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9年8月奎披汶政府推行亲日排华政策²，借口华文报纸刊登抗日文字，抵触泰国亲善外交政策，下令封闭全部华文报馆；但为了方便向华侨传达政府法令，特准许《中原报》继续出版。1941年日军占领泰国后，《中原报》被日军强行接管（这一时期的《中原报》被称为“伪《中原报》”），至此华文报刊无一幸免。

五、缅甸

从1912年到1942年的30年间，缅甸华侨先后创办的华文日报主要有7家。

《觉民日报》是辛亥革命后缅甸华侨创办的第一家华文日报，

^①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第9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13年9月1日由《缅甸公报》（1910年创办）改组而成，主编梁冰弦，饶潜川、陈钟灵先后任经理。该报是中国国民党驻仰光总支部的机关报，创刊初期全力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紧跟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拥护护法斗争，反对张勋复辟，同时支持“五·四”运动，抨击北洋军阀，成为北伐战争前颇受爱国侨胞欢迎和支持的报纸，发行量居当地华文报纸之冠。北伐战争后，郑沛霖、方之栋等先后任主编，该报从此为右派势力所掌握，成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喉舌。1942年3月日本占领仰光后停刊。

《仰光日报》1921年11月11日创办于仰光。创办人为陈守金、陈允洛、许魔力，陈守金任注册总经理兼总编辑，傅无闷负责实务编辑。该报初以无党派、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鼓吹无政府主义，不时与《觉民日报》展开笔战。北伐战争开始后，改由陈兰生主持，聘请王思科等进步人士参加编辑部工作。《仰光日报》一改同《觉民日报》笔战的性质，开始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政策。报纸同时开始刊登汤道耕（艾芜）等进步青年的作品和文章，使缅华社会的文化气息大为增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由此成为南洋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后因陈兰生、许魔力另办《中国新报》和《仰光日报》，改由郭史翼任主编，后来更名为《新仰光报》，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前夕停刊。

《缅甸晨报》1923年11月5日由胡文虎创办于仰光。第一任主编为鲍慧僧，副主编刘韵仙（为当地首次任命的女主编）。开办一年后，因业务不景气，将股权转让给侨商杨子贞，由杨接办，报纸易名为《缅甸新报》，于1924年12月1日改为晚间出版，由陈震、张正藩担任编辑，也无大起色。后因经济困难，于1928年交由中华工党（后称华侨总工会）接办，由吴怀世、王思科（键安）、汤道耕（艾芜）等任编辑，仍不景气，于1930年停刊。

《兴商日报》由“缅甸华侨兴商总会”（1911年成立）购下《缅甸新报》的全部机器设备，于1930年3月1日创办。该报是“总会”的机关报，首任经理为陈伯诚，主编黄莪生。出版不到两年，即因销路不大，资金亏损而不得已将股权转让给《仰光日报》印刷机构明明印务公司，该公司将报纸改为晨报继续出版，但也只坚持了两年便因经济拮据而停刊。

《中国新报》创办于1938年8月16日，创办人许魔力、陈允洛，编辑陈兰生、胡伯然（百年）。该报除了版面新颖，消息灵通外，内容上没有明显的特色，因而影响不大，日军侵缅后停刊。

《侨商报》（原名《缅甸日报》）创办于1941年12月16日，是日军侵缅前缅甸华侨创办的最后一份报纸。经理为张良丞，编辑为刘惠之（一溪）、毕朔望（杨林）及任孝逵等。初出版时为三日刊，不久改为日报。1942年日军侵缅后停刊，前后只出版了三个多月。

这一时期，缅甸华侨还出版了一批小报、周报或半月刊等。辛亥革命后最早出现的小报是由陈允洛等人主办的《正报》，仅出数期。1923年，先后出版的刊物有《仁声日刊》（9月1日，出版月余即停刊）《中缅周刊》（9月8日，短期即夭折）《微光》半月刊（8月17日，不久停刊）。以后相继出版的有《国民周刊》（1929年）《如是周报》（1929年）《新芽小日报》（1930年）《民生新闻》（1935年）《国民日报》（创刊年月不详，作为国民党海外部的机关报出版）、《土瓦导报》半月刊（1939年）《嗨鸣周刊》（1939年）《曼德里周报》（1940年）《新知周刊》（1941年）。^①

^①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第9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六、越南

越南于 1884 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因此，越南最早的华文报纸是由法国人创办的。1918 年，越南第一份华文日报《南圻日报》在西贡创刊，1920 年，《华侨日报》（初创时名为《华侨报》）问世。两份报纸均由法国天主教牧师安德烈所办，目的是向华侨宣传天主教教义和法殖民政府的对华政策。《华侨日报》几经转让，最后由岑琦波、余奋公、陈肇祺等人接办。直到 1925 年，由华侨自己主办的中文报纸《群报》才在华侨最集中的西贡出现。该报由退出《华侨日报》的余奋公（后改名余群超）创办，余氏自任社长，陈漫浪任总编辑。到 1936 年，西贡先后出版过 10 家华文报纸。其中，1930 年创办的《中国日报》（1963 年停刊）是越南华文报纸中历史最长的一家。

《中国日报》1930 年 1 月 1 日由广东籍侨商梁康荣创办，前身是 1929 年春梁氏创办的《民国日报》。该报是商业性的报纸，言论中庸，社会经济信息较为丰富。初时销路不广，只有 1000 份左右，后来报社聘请广州老报人朱学潮主理笔政，加强了编辑力量，使销量有所增加。1936 年增出《中国晚报》，每日出 4 开 1 张 4 版。朱学潮返国后，报社先后聘区丽庵、冯白苹等任总编辑。“七·七”事变后，报纸每天刊登香港特约通讯员发回的电讯，销量进一步增加。1940 年又聘广州报界陆文英、欧阳伯川主理笔政，版面内容大有改进，销量增至 5000 多份，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华文报纸。1941 年欧阳返国，改聘黄子远来越。1941 年至 1945 年日军占领西贡期间，该报因为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得以继续出版，其他原有各报加上新创报刊全部停刊。

进入 30 年代，越南华侨社会办报之风日盛。1931 年仅西贡一地就出版了《民报》、《全民报》、《侨众报》，1933 年又创办了《公论报》，1936 年至 1938 年抗日烽火燃起后，西贡又先后创办了《建国报》、《真报》、《中华日报》、《时报》、《华南报》。由于

仓促上阵，缺乏应有的出版条件，许多报刊维持数月甚至数日便停刊了。1938年至1940年间，越南新增华文报刊计有10家，加上原有的，共计15家，其中13家在西贡（约有华侨25万），2家在河内和海防。这些报纸同仇敌忾，奋起疾呼，促进了全越南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西贡的《越南日报》、《全民日报》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越南日报》1938年12月31日创办于西贡，是当时越南首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华文报纸，力主国共合作抗日，反对投降妥协。首任社长王逸鹤，副社长陈其彬，总编辑先后为张壮飞、李佑宸。《全民日报》1939年2月创刊于西贡，报名题字选自孙中山墨迹。与《越南日报》相同，该报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妥协。社长张长，副社长陈炳权，总编辑吴敬业。

七、美国

20世纪前半期，美国华文报刊在旧金山、纽约、檀香山、芝加哥等地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在各地华埠成立中共支部，通过进步的留学生组织华侨工会，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1926年，在旧金山、纽约、檀香山先后出版过《平等》、《侨光》、《互助》等报纸型的月刊、周刊和《国民日报》。国共分裂后左翼分子组织的“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和“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出版了《先锋报》（1928—1938），这是美国第一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群众性报纸，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20年代新创办的华文报纸有1920年在檀香山出版的《汉民报》和1928年由国民党员集资创办出版的双日刊《中华公报》。1941年，《中华公报》易名为《中华新报》，改为日刊继续出版。由《新中国报》（1900年创刊）改组而成的《新中国日报》也在继续刊行，并有“夏威夷华文报纸第一”之美誉。此外，20年

代在纽约还出版过《中山日报》、《纽约商报》、《五洲公报》、《纽约日报》、《民气日报》。

“七·七”事变后，《救国时报》由巴黎移至纽约出版。《救国时报》原名《救国报》，1935年5月15日由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由张仲皋、雷子声以中国留法学生名义在巴黎注册）。其宗旨是：“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首任主编兼发行人为吴玉章（1878-1966），吴翌年离法去莫斯科后，由吴克坚（1900-1986）接替。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先后担任主编的还有廖焕星、李立三（1899-1967）、陈潭秋（1896-1943）；担任副主编的有张报（莫国史，1903-1996）、周翼、王揖（赵毅敏）；从事编辑工作的有李克、王德、欧阳新、龙毅、何天智、于辛超、邱静山等。报纸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制版，然后航寄巴黎印刷、发行。在巴黎负责报纸工作的，先后有吴克坚、饶漱石。由于该报反日立场鲜明，因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在国民党政府通过其驻法使馆的要求下，法国政府于1935年11月强令《救国报》停刊。两年后，报纸改名《救国时报》重新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社人员陆续回国参加抗战。担任该报主编的李立三在苏联的肃反中被投入监狱，工作人员廖焕星、张报、周翼、邱静山等十余人也因受到牵连而被关押。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将该报迁往美国出版。1938年2月10日，《救国时报》在第152期上发表《本报暂时停刊宣言》，同年8月迁至美国纽约继续出版。

上述报刊均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有些本身就是政治性报纸）。它们以中国国内问题为主要的关注焦点，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评说。当然，它们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华侨社会，报道华侨、华人问题，其中的一些报纸成为当地侨社的主要读物。

八、法国

法国虽然不是欧洲国家中最早出现华文报刊的地方，但是它后来居上，在 20 世纪前期盛极一时，巴黎也一度成为欧洲早期华文报业的中心。

法国最早华文报刊是 1907 年 6 月 22 日创办的《新世纪》周刊，它是由清政府首批派往法国的留学生李石曾与张人杰、吴稚晖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五·四”运动前在海外出版的一份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为目的、较有影响的刊物，在将近三年的时间中，共出版 121 期，部分期次流传到国内。

从 1915 年开始，法国的华文报刊逐渐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这期间的华文报刊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华工和一般留学人员为对象，以介绍文化、科学知识为主，无强烈的政治倾向。以华工为对象的有《华工杂志》、《华工旬刊》、《工余》等以留学人员为对象的有《旅欧杂志》、《旅欧周刊》等，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等是这几份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另一类是以当时国内三个主要政党为依托，由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中国青年党欧洲支部相继创办的机关刊物。这些刊物的基本特征是：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以宣扬各党政治信仰，阐述各党对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政治主张，争取当地侨界和留学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为目的。^①

以周恩来（1898 - 1976）为领导的中共法国支部先后创办的《少年》和《赤光》是这类刊物中最有影响者。《少年》（月刊，手刻油印）1922 年 8 月创办于巴黎，其宗旨是向“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传播共产主义学理，阐述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以抵挡当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 50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时在中国留法学子中广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编辑部由赵世炎（1901 - 1927）和陈延年（1899 - 1927）负责，邓小平（1904 - 1997）参加了刻印工作。初为月刊，16开本，每期30 - 50页不等；第7期起改为24开本，第8期以后改为双月刊。作为理论性刊物，《少年》经常选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名论断，介绍他们的生平与学说，刊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文件、通告，报道各国革命运动、劳工运动等。由于该刊旗帜鲜明，富有朝气，颇受旅欧青年学子和华工的欢迎，是当地拥有读者最多的华文刊物，并远销中国和美洲等地。因受当地警察当局的干扰，于1923年12月10日出版第13期后宣布停刊。与此同时，周恩来等筹组了赤光社，并决定出版《赤光》半月刊以代替《少年》杂志。《赤光》1924年2月1日在巴黎创办，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通过“评论中国时事”，指出中国“乱源所在”，和“解脱之方”；通过“评论国际情势”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管”是中国国难的“万恶之源”，唯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国的方法”。循此方针，报纸大量报道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帮助读者理解事件的起因、背景、沿革和趋向。《赤光》是16开本半月刊，每期12页左右，从第23期起增加到16页。该刊第33期为“五卅惨案”专辑，称“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特刊”。周恩来亲自主编了该刊前10期（主编后为李富春、成仿吾），并发表了40篇论理精辟、笔锋犀利的时评。邓小平也参加了该刊的编务和刻印工作，并撰写了重要文章。1927年，随着赴法勤工俭学最后一批学子返回中国，这类报刊就不复存在了。

由中国青年党人曾琦、胡国伟、李潢等人创办的《先声》周报（1922年12月）则以《少年》、《赤光》为政治对手攻击中国共产党，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由此两党通过各自的刊物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当时的法国侨社。也使中国

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华文报刊主要有《三民导报》。该报由巴黎大学中有国民党身份的留学人员发起组织的“国民党旅欧执行委员会总会”于 1933 年创办（巴黎），后改由“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发行。其宗旨是：对旅法和旅欧的中国侨民进行教育，帮助他们了解国内时局动向并使欧洲人了解中国，其言论重点为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战爆发后，该报侧重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要闻，也报道国民党党务消息和旅欧侨社新闻。该报为大 16 开本，手刻油印，每日页数视内容而定。该报从创刊到停刊，断断续续维持了 33 年。国民党方面的报刊除了《三民导报》之外，还出版有《国民》半月刊和《三民周报》但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也是海外华语广播事业的创始时期。华人社会最早的华语广播机构 1933 年春创立于檀香山，最初名为“华人播音局”，由《自由新报》主办，该报职员蔡融勋、佐治·林金、刘惠略负责筹划、经营。创办者鉴于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而决定创办此台。他们租用英文早报播音台的广播时段，从 1933 年 4 月 30 日起播出粤语节目。同年 10 月 20 日，因《自由新报》无力兼顾而由黄关有接办，并改名为“华语播音社”。1933 年 5 月 1 日，华人彭爱贤在檀香山又设立了另一家华语广播机构——檀华播音社。该社租用当地英语电台“骑芝天播音台”（KGU），每逢周一、三、五下午播音。数月后改组，由黄子南任社长，彭爱贤任司理，程棉任播音员，改租当地另一家英语电台“骑芝奄沃播音台”（KGMB）每日播音（周一至周六为半小时，周日为一小时），1935 年因环境关系而停播。这是海外华文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华语广播机构（严格地说，它们还不是正式的广播电台），也可以说，它们的出现意味着海外华语广播事业

的肇始。这两个华语广播机构之所以出现在美国旧金山，是因为这里的言论自由度大一些，当地政府的限制比较少。而在其他国家，广播、电视均被置于当地政府的严密管制之下，外侨是很难涉足的，惟有报刊，各国尚能允许华侨创办，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华侨报业始终是华侨新闻业的主体。

第二节 抗日战争中的海外华文新闻业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进踞东三省；翌年，又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起大举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在国难当头之际，海外华侨报刊不论政治背景和原有立场如何，都不约而同地站到同一个立场上，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此时，积年累月的相互骂战，顿时烟消云散，相率投入鼓吹抗日救亡的浩荡洪流”。^①与此同时，为声援抗战而办的报刊也纷纷面世，海外华侨报刊由此出现了蓬勃发展和空前团结的局面。据统计，到1941年12月，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总数已达151家。^②

东南亚华侨报刊是抗日宣传的主力（在上述151家报纸中，南洋约有120多家），而新加坡和马来亚又是这一带抗日宣传最为活跃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新加坡华文侨报界对此立即作出了反

^① 方曙：《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1980。

^② 任贵祥：《抗战时期的东南亚华侨文化救亡运动》，载《南洋问题》，1986。

应。当地几家主要华文报纸每天辟出专版刊登有关消息，除了详细报道事变经过外，还刊登社论，对日本军国主义予以猛烈的抨击。针对日本关东军本庄繁狂妄蛮横的话：“头可断，兵不可撤”，《星洲日报》发表题为《头可断兵不可撤！我四万万同胞听者！》的社论（10月5日），义正辞严地指出：“东三省我领土也”，神圣不可侵犯，而“日本军队以何理由，以何权利，在我领土之内，恣意横行，无所顾忌？”大声疾呼：“苟形存心死，甘为奴隶，则亦已耳。否则宜人人下一决心，以一语自誓曰：头可断，日本兵不可不撤”。此间，《南洋商报》和《叻报》还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自动停刊一天，“以志哀痛”。与此同时，各报社论一再动员侨胞开展抵制日货、多用中国货的运动。《星洲日报》在其社论（9月26日）中鼓动侨胞：“今后应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在可能范围内，终此一身，购用国货、经营国货……为家长者，勉训其弟子；为教师者，指导其学生；有朋友亲戚者，各向其亲戚朋友，进恳切之忠告。此国货运动最简单之办法，而救国之根本要义也。”针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的外交政策，《星洲日报》（1932年1月26日）评论道：日军的武力侵略，“已越出人类理性之外”，无法“与言礼让，言公理”；“除以武力抵抗外无办法也”。至于媚外的政策，“未必能博强邻之欢心，抑且促其贱视，长其野心，而增加我之祸难”。1936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为满足读者关心时局的需要，新加坡各报均改出早、晚两版（只有《星中日报》中午出报），以扩大信息量。1937年“七·七”事变后，《星洲日报》增出“星期特刊”，大力报道祖国军民英勇抗敌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了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推动海外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星洲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新加坡、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筹赈消息。1939年12月，该报每日的“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各版中，捐输的消息都占

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有时甚至占据了全版，这些筹赈动态随着每日早晚两报的派发，就像滚滚江水，推动着东南亚侨胞努力捐输救国。

新加坡《南洋商报》在抗日救国宣传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南洋商报》是陈嘉庚于 1923 年创办的。抗战时，全部股权归大实业家李光前（陈嘉庚之女婿）和其弟李玉荣等所有，由李玉荣任董事长，傅无闷任董事经理。这是一份销量好、影响大的报纸，但是一直未设总经理，由傅无闷、副刊编辑张楚琨等轮流主持笔政。1939 年秋，张楚琨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国采访抗战新闻，并受傅无闷的委托，在国内物色一位有名望的新闻界人士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经周恩来的推荐，选定了胡愈之。胡愈之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编《东方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后又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之前，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1940 年 12 月，胡愈之到任。从 1941 年元旦起，他每天写一篇社论，并为星期刊写较长的专论，有时也要给晚报写简短的时评。他与范长江在香港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保持密切联系，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抗日战争的最新消息，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及时在报纸上披露。1941 年 1 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南洋商报》迅即作出强烈的反应，该报 1 月 14 日发表评论指出：“在日本强盗压境的日子，‘团结则生，分裂则亡’，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不当汉奸汪派，都应该团结起来，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如果怀着‘排除异己’的念头，互相歧视，鼓吹分裂，陷中国于灭亡的境域，便是民族的罪人，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将不能宽恕他。”此后，该报还发起了反分裂、反妥协、反专制的“七·七签名运动”，响应之声遍及南洋各地，参加签名的有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历时仅 3 个星期，

就有 20 多万人参加，签名用纸长达 3·2 公里，装裱成册高逾 1.22 米。^①《南洋商报》还根据华侨群众最关心的事件和华侨救亡运动中的问题，具体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强调“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不分智愚，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②在胡愈之与《南洋商报》全体同人的努力下，该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南洋侨报之首”，成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南洋商报》的成功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华文报纸也竞相仿效，纷纷到国内聘请编辑，改造报纸。《总汇新报》聘请乔冠华和郑森禹，但因乔冠华用“乔木”笔名，英殖民政府认为他就是延安的中共政论家胡乔木，故意刁难，使他们未能登岸。胡愈之的老友俞颂华入主《星洲日报》，使该报一改与《南洋商报》对立的竞争态势，出现团结融洽的气氛。

在马来亚，除了原有报刊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为报道祖国的抗战信息而创办的报纸。如檳城的《电讯新闻》，古晋的《古晋新闻日刊》、《沙捞越日报》和诗巫的《诗巫新闻日刊》等。暹罗也是如此，抗战爆发后，曼谷华侨创办了《曼谷日报》、《国民日报》、《新时报》、《中国报》、《华星日报》、《华声日报》、《民国日报》等报刊，进行抗日宣传。中文旅菲华侨创办了《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民族斗争》等刊物，为抗战呐喊助威。菲律宾首府马尼拉有 4 家华文报馆，每家每天至少要出两次号外，侨胞还嫌不够。许多华侨青年每晚坚持收听国内广播电台的消息，连夜誊写并油印，第二天作为号外散发。“他们将号外准备好去散发时，许多侨胞

^① 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第 411 页，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 77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已等候在门外，大有‘一日不可无新闻’之势”。^①抗战时期缅甸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当时先后出版的华文报刊，成为新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宣传抗日主张、发表民主政见的阵地，如《新芽小日报》、《中缅周刊》、《如是周报》、《晦鸣周刊》、《新知周刊》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同形式坚持出版，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新芽小日报》由于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批评《觉民日报》的消极抗日论调（当时缅甸华文报刊均力主抗日，只有《觉民日报》一家例外），在缅华社会引起较大的反响。《新知周刊》最后一期还刊登了黄丙秋写的华北战场抗日斗争的报道。这些刊物虽然刊期不长，但起到了鼓舞华侨抗日斗争意志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荷印华侨报刊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七·七”事变后，《天声日报》在新任社长吴慎机的领导下，大力宣传抗日主张。1940年3月，该报因反日宣传被荷印殖民当局下令停刊8天。停刊期间，该报同人发动“伤兵之友运动”，数日内募集2万余元汇寄重庆。《新报》也积极宣传抗战，揭露日寇暴行，批评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并代收华侨救亡捐款。抗战时期，也是越南华文报业的发展时期。各报无不以笔代枪，支援抗战。为了加强抗日舆论，越南仅在1938年至1940年间，就创办了10家报纸，加上原有的，共有15家。其中，西贡的《全民日报》表现最为突出，该报创办于1938年底，是越南华侨救国总会的喉舌。它的言论主张是：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由于这些主张符合广大爱国侨胞的要求，加上该报每天的电讯消息多转载国内报刊的抗战文章，因而受到当地侨胞的欢迎。报纸除了在南圻各省销售外，还销售到北圻的河内，中圻的芽庄、藩切和柬埔寨的金边等地。

在欧洲，法国巴黎是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常设机构所在地，

^① 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7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也是抗日宣传最为活跃的地方，《救国时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专门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的机关报，该报易名（原名为《救国报》）后正式出版的当天，就赶上“一二·九”运动爆发，报纸便立即投入到声援国内学生的大潮中去了。它致函北平学生会转全国同学，称：“诸君奋起救国，闻讯感奋，望坚持到底，促进全国工农商学大团结，一致救亡，海外同胞誓为后盾”。接着，又发表《欢迎第二五卅运动》的社论，赞誉“一二·九”运动是“继续五·四的光荣事业”，是“全民一致抗日救国的先声”，“希望全体人民一致的行动来造成第二个光荣的五卅。”^①在《本报致国内各界同胞书》中，它还吁请全国人民“督促政府即日出兵声讨华北叛逆，停止一切内战，枪头一致对外，以打出一条民族独立生存之血路”。^②全面抗战爆发后，《救国时报》连续发表题为《全国奋起抵御日寇之新进攻》、《要求全国一致坚持抗战》、《展开全国一致的总抗战》、《以最后胜利的信心来坚持抗战》、《侨胞一致起来，援助抗战、参加抗战》等社论，并刊载抗战的专论和文章，号召各国华侨“真正团结和统一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诸方面，“来长期地进行援助和参加抗战的各方面工作，来坚持我国抗战到最后的胜利。”^③同时，该报每期都以整版的版面宣传和报道海外各地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这对于鼓舞各地华侨的爱国热情，激发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该报发行范围遍及欧、美、亚、澳等 40 多个国家，在中国国内也广为流传。在欧洲力主抗日的中文报刊，还有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联合战线》和《祖国抗战情报》在英国出版的《解放》、《民主阵线》在比利时出

① 《救国时报》1935年12月28日。

② 《救国时报》1936年2月29日。

③ 《救国时报》1937年9月5日。

版的《抗战消息》；在荷兰出版的《抗战要讯》；在苏联出版的《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抗战报》、《动员》、《救亡》、《蹶起》、《铁血》、《呼声》等。1938年，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以日刊的形式及时地向侨胞报道抗战消息，每天销行1000多份。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出版的《抗战情报》，从1937年7月28日起改出小型日报。该报及时通报祖国抗战的消息，号召侨胞团结抗日，受到广大爱国华侨的欢迎。同年9、10月，德国抗联和柏林中国学生会在团结抗日的原则下，共同编辑出版了《救国周报》，德国抗联参加编辑工作的是乔冠华、温朋友、刘文华等。《民主阵线》是抗日战争后期面世的小型刊物，由杨宪益等人在伦敦自编自印，发刊于1944年。与上述报刊同时存在的法国华文期刊《三民导报》，则在其他为抗日战争而生的报刊鸣金收兵之后，继续坚持出版，成为欧洲寿命最长的中文报。该报的影响虽然不及《救国时报》之大之广，但也为抗日宣传尽了自己的职责。

在美国纽约的《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美洲华侨日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芝加哥的《三民晨报》等华侨报纸，在抗战时期都是较有影响的。其中又以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和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影响最大。《美洲华侨日报》诞生于抗日战争高潮期的1940年7月8日，是由梅参天、冀贡泉、徐永英、唐明照等人和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一些会员创办的。首任社长冀贡泉，总编辑唐明照。该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着力报道祖国正面战场和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具体情况，使海外华侨了解祖国和抗日战争的真相，从而赢得广大侨胞的欢迎与支持。该报不但及时报道国内抗战的消息，还发动华侨捐款，购买医药器材及救护车等赠送八路军，以实际行动支援祖

国抗战。抗战后期，冯玉祥在美国考察期间，该报还刊登冯氏揭发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演说及其所组织的“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开展的活动，使报纸始终受到进步侨胞的支持。40年代美国华侨的人数不多，但该报的销数却一度达到5000份。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是一份老报，其前身是《文兴报》（1892年创办），1906年改组并更名。该报在宣传抗日主张，报道反侵略战争情况，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推动筹赈活动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此外，由在美中国学生编辑的《抗日周刊》、《留美学生月刊》、《学生周刊》等其“要求抗战的文字”；热情喷溢极为动人”。^①在加拿大等美洲各国以及澳洲各国的侨报，也都大力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

欧战爆发后，德军于1940年占领法国，欧洲的华文报刊首先受到摧残；同年9月和次年7月，日军先后侵占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那里的华文报刊又成为覆巢之卵；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华文报刊又遭厄运。当时，除泰国曼谷有一家《泰华商报》利用特殊的关系和巧妙的手段得以在日军的肆虐下公开出版直至完成历史使命外，其他报刊均被封闭，报刊负责人及其编辑人员也在劫难逃——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被害致死。如爪哇《天声日报》、《新中华报》、《大公报》的社长、职工被关进集中营；菲律宾《华侨商报》的社长于以同以身殉国；曾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中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苏门达腊被日本宪兵暗杀。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南亚，日本占领者为了宣传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论调，也曾利用被封后的报社和设备，出版了一些傀儡报，如越南的《新东亚报》，新加坡的《昭南日报》，爪哇的《共荣报》，缅甸的《正谊报》，等等。而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许多国家，华侨正义的舆

^① 《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10月5日。

论（报刊）并没有偃旗息鼓，只不过由公开转入地下，由合法变为“不合法”罢了。据统计，当时在暹罗出版的 8 开小型中文地下报就有 8 种^① 包括《真话报》、《中国人报》、《同声报》、《重庆报》、《自由人报》、《青年报》等 它们在日寇占领期间 做了大量的工作。以《真话报》为例，该报创刊于 1942 年 7 月，它先是由蜡纸刻印，同年 10 月改用铅字排版。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该报以小报形式发行，携带传阅方便，报纸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易懂，抗日道理讲得深刻、透彻。其中有社论、国际国内时事、时事问答、地方新闻等，时事新闻还细分为国际战场和中国战场。由于《真话报》在“万马齐喑”的舆论环境下敢讲真话，很受读者欢迎，有些商人甚至将报纸传递到邻近国家，如越南、缅甸、马来亚等。这些地下报刊的一部分战后在曼谷公开发行 菲律宾的地下报纸《华侨导报》、《侨商公报》、《南侨呼声》及《大中华报》也于 1944 年美军逐出日军后公开注册出版。在日军占领下的其他地区，在民间流传的抗日地下报，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华文报业惨遭厄运的时候，位于西半球的美国却因言论宣传比较自由，报业发展较为平稳。不但原有的报纸如常出版，《光华日报》（后改名为《华美日报》）、《美洲华侨日报》、《联合日报》、《美洲日报》、《纽约新报》等新的报刊相继问世，使侨报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① 方曙：《海外中文报业话沧桑》，原载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1980。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 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及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有如下特点：

一、报刊依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主要是政治报刊，内容以党派政争为主，双方争论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中国政治这一主题展开的，属于国内政治的范畴；抗战时期的报刊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这里的“政治”已不再是党派政治，而是关系到民族兴亡的“大政治”或曰“国际政治”（尤其是战争后期）。

这一时期，海外虽然出现了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为代表的日臻成熟的商业性报纸，并逐渐走上了企业化经营和跨国经营的道路，但是当国难降临的时候，这些报纸凭借其良好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成为抗日宣传的主力（如《南洋商报》曾派特派员分赴港、粤、沪、京、津等地采访，以便尽快获得国内的消息）；而那些为抗战创办的报刊，其民族性和政治色彩就更加鲜明了，尽管命运多舛，困难重重，它们依然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抗敌斗志。如 1938 年至 1939 年间，有些国家的报纸因宣传抗日而连遭厄运，有的不能正常出版，时断时续，有的被封禁。然而幸免于难的绝大部分报纸和报人没有知难而退，而是继续坚守岗位，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宣传。华文报刊的抗战宣传分三个阶段进行：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重点是揭露日本侵华，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呼吁国际友邦主持正义、制裁日本侵略暴行。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华侨报刊开展抗日宣传的高潮时期。重点是继续揭露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鼓励侨胞捐款献物、回国参战；声讨汪精卫卖国投

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分裂，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开展援华及反法西斯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这期间，南洋、欧洲侨居地大部分沦陷，由于宣传工作难以开展，其重点放在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等方面。总之，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围绕抗日救亡这个“最大的政治”做文章，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形成了空前一致的舆论

戈公振在对民国建立前后二三十年间海外华文报刊言论的特征进行分析时指出：“华侨报纸之言论，大率在前清分为维新与革命二派。光复后，维新、革命，均失其标帜，色彩渐淡。未几洪宪事起，乃又分为拥袁与倒袁二派。袁死，拥袁者转而拥陈炯明，倒袁者转而拥孙中山，互相攻击，今犹未已。其他则模棱两可，无一定之宗旨也。”^① 戈氏的分析与当时海外中文报刊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国民政府，致使国共分裂……这一系列事件均对海外华文报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国内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党，这三个党在一些国家的海外支部也创办了报刊；1927年国民党在美组织分裂为左右两派以后，两派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如在旧金山，国民党左派拥有《美洲国民日报》，右派拥有《少年中国晨报》）。这些报刊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以宣传各自的政治信仰、阐述各自对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主张为中心，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争。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

^① 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一战线建立后（1935年），不同政见的报刊才捐弃前嫌，联合御敌，形成了空前一致的抗日舆论。例如，1935年，北平学生发起大规模的“一二·九”运动，各地华侨报刊如美国的《商报》、《先锋报》、《抗日救国周刊》、《留美学生月刊》法国的《救国时报》、古巴致公堂的《开明公报》，荷印爪哇的《巴城新报》，菲律宾的《前驱日报》、《救亡月刊》，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等，都以相当的篇幅予以报道，并加以评论。“所有报纸从左到右，都只有赞叹绝无批评。”^① 1941年发生抗日的新四军被袭击的皖南事变，北美洲洪门的《五洲公报》、左派的《美洲华侨日报》等十家华文报纸共同发表了“十报宣言”，亚、美各国华文报刊就此事发表的言论文字，由马尼拉建国出版社汇集成《关于新四军事件华侨舆论一斑》一书，共达290页之多。^②

三、多数报刊具有临时性

与辛亥革命时期相似的是，抗战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大都存在时间不长，这是由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除了那些历史较长、经营较好的商业性报纸之外，很大一部分刊物是为抗战而生的，它们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抗战消息》、《抗战要讯》、《抗战情报》、《人民抗日报》、《抗日先锋报》等而有些国家的华文报业就起始于抗战报刊（如欧洲的一些国家）。由于这类刊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又是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仓促上马的，缺乏应有的印刷、出版条件，因此，它们大多以内容为重，形式上较为简陋，有些就是手抄油印出版，如抗战期间德国先后印行的油印刊物就达10余种。它们以抗日宣传为使命，战争结束，它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其次，除了那些经营有方的商业性报纸之外，大部分抗战报纸都是筹资创办的，缺乏稳定的经济来

^①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第353页。

^②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1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源，因此，大都维持时间不长。如暹罗的《晨钟日报》、檳城的《中南晨报》、缅甸的《知新周报》、越南的《真报》、《时报》等许多刊物，最终都是因经济拮据而停刊的；日军南侵以后在暹罗出版的一批地下中文报刊，也迫于环境艰辛，只能不定期出版。第三，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侨报的处境相当窘促。如在当时的暹罗，华文报纸只要发表抗日言论，当地政府动辄令其停刊检查（当时暹罗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因而极力想与日本维持邦交）。

《国民日报》副刊因刊登《铁血》一文，被当局勒令停刊 3 日；《曼谷日报》因发表《敌侵潮汕我们当前应有的认识与任务》一文，被吊销出版执照；《中华民报》和《中民日报》因刊登商号的“道歉启事”（因买卖日货被抗日团体警告而登报自咎）被封。在 1939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初的半个月內，暹罗华文报刊连续被封 9 家之多，这就使华文报刊陷入不能持续发展的境地。二战后期，在日军占领的国家，除了其御用报纸外，所有的华侨报刊均遭封闭，从而使海外华文报刊史上出现了一段“萧条期”。

四、资力雄厚的大报稳健发展

尽管抗战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尤其是为抗战而办的报刊）大多存活时间短，刊期不稳定，编印质量差强人意，但仍有一些资力雄厚的大报与时俱进，在宣传抗战的同时不断增资以更新设备，延聘人材，扩充实力，从而成为蜚声海外的中文大报，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早在 20 年代末期，《南洋商报》就购进轮转印刷机，添置收发报设备，以提高效率；30 年代初期，报纸又增加了由报社派员直接采编的新闻，并且率先打破星期日不出报的惯例，增出星期刊，1931 年报纸日销量超过 7000 份。1933 年初华北局势紧张，为了尽快反映中国国内的情况，该报特派记者分赴港、澳、沪、平、津等地采访，并在沪设立了办事处。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报社又派出战地记者，他们和通讯员一道发回

大量的专电、时评和社论，在华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一时期，《南洋商报》还增辟了各种知识性、文艺性、综合性的副刊、专刊，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信息量和知识含量。到 1938 年底，报纸日发行量已突破 3 万份。《星洲日报》也是如此，该报创办不久，胡文虎便出资添购德国新式印刷机，增置铸字机，以适应报业发展的需要。1932 年，中国时局紧张，为了及时报道时事新闻，报纸改一日一报为每日早晚两次出版。胡文虎还出资叻币 15 万元购置了一幢 3 层大楼作为新馆址，并增购大型平面印刷机，以增加报纸印数。1936 年，为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报社又购进一台英国制新式大卷筒印报机以及其他附属机件。新印报机功能先进，能自动套色印刷、割裂折叠，每小时可印 8 大张报纸 2 万余份，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两份报纸还竞相从国内聘请人材，充实力量。《南洋商报》聘得胡愈之出任总编辑后，报务的改进颇为显著；《星洲日报》也得到林蕙民及傅无闷的操持，后来郁达夫又加入主编副刊，更是如沐春风。从此两报并驾齐驱，共同引领着海外现代华文报业的潮流。

抗日战争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在宣传抗日、声援祖国、动员侨胞支援抗战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意义在于：

首先，使海外侨胞及时了解抗战讯息。

海外华侨遥居异域，远离祖国，却与母体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辛亥革命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关注程度大为提高，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更是中原北望，忧心如焚，迫切希望了解有关祖国的一切信息，而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传媒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此任。1931 的“九·一八”事变；1932 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1933 年日军侵入热河，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5 年制造“冀东自治政府”翌年又成立伪“蒙古自治政府”；1937 年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及至 1941 年日军偷

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荷、澳等 20 多个国家对日宣战。所有这一切，都在海外华文报刊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为了及时报道国内抗日消息，除了《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这样的大报派记者回国采访、扩版、增刊之外，其他报纸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在旧金山报社工作的华侨，每隔 1 小时就把中国抗战的新闻张贴在报馆门前，以便广大侨胞及时了解祖国的战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 4 家华文报馆，每家每天至少要出两次号外；“一·二八”淞沪抗战，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给侵华日军以迎头痛击，一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妥协退让带来的耻辱，越南堤岸华侨报纸《群报》得到消息后迅即发出号外，用《蔡廷锴大胜日军》的特大号标题报道淞沪抗战消息，使广大华侨“遥听捷音，欣慰莫名”^①。许多报纸还冲破各种阻力，报道抗战消息。如 1931 年 11 月初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进行江桥抗战，重创日军，美国纽约华侨所办的《中国杂志》和《商报》等报刊首先突破国民党官方的新闻封锁，详细报道了马占山抗日的消息，由于读者猛增，供不应求，《商报》不得不扩大发行数量，由平时的每日 4000 份增至 6000 份。在日军占领下的曼谷，一家独存的《泰华商报》巧妙地利用海通社的电讯，从新闻的字里行间中点点滴滴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德、意、日的军事失利消息透露给广大读者，使日本人的欺骗宣传大打折扣。总之，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努力，整个抗战期间，爱国华侨与祖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促使华侨出资出力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抗

^① 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第 86 页，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这当然与各方面的努力有关，而华文报刊的宣传也功不可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报刊纷纷载文，“提倡全国一致，对日宣战”，表示“誓为后盾”。曼谷《滨江日报》报道了曼谷中华总商会商讨抵制日货和筹募捐款事宜的消息，并刊登了国民党驻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黑龙江省主席的电讯誓言：“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①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了反映侨胞的爱国热情及捐输的踊跃，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各报都在主要版面上以大量篇幅报道新、马和南洋各地的筹赈消息，如 1939 年 12 月份的《星洲日报》（早报）其《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各版中，每天关于捐输的消息都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有时甚至充斥全版。在报纸的推动下，各界华侨的捐赠源源不断，极大地支持了国内的抗战事业。仅经《星洲日报》代汇回国的捐款数额，即达 100 余万元。据南侨总汇统计，从 1938 年 10 月到 1941 年 12 月，该会筹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就达 4 亿元国币。^②美洲华侨的义捐同样十分踊跃，在 8 年抗战期间，美国大陆华人捐款共计 2500 万美元，平均每位华侨捐款 300 美元。^③此外，非洲、澳洲和欧洲等地的华侨也尽其所能，捐献了巨额款项。与辛亥革命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华侨捐款持续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富侨捐献成千上万的固不乏人，但数量更多的还是那些收入微薄的劳苦大众。他们的义捐对于祖国的抗日战争，无疑起到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除了捐款，华侨直接回国服

^① 《滨江日报》1931 年 11 月 27 日，转引自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第 74 页，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南侨总汇编纂：《大战与南侨》第 47 页。

^③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 300 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务、请缨杀敌者络绎不绝。他们中许多人在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功，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① 国民党方面评价说：“海外侨胞为抗战建国力量泉源之一……抗战期间，其重要性尤倍于往日。”他们“踊跃回国，投效军旅，及服务交通运输机关者，为数至多；其仍在海外者，则慷慨解囊，尽量捐输助饷，或汇款回国增加外汇。……此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② 总之，在爱国侨报的推动下，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史还是华侨爱国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一页。

第三，在海外华侨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传统的华侨社会向来具有浓重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帮派林立；加之国共阅墙经年，政争频仍，矛盾重重。自“九·一八”事变前后始，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海外侨胞逐渐摒除宗族、地域及行业观念的藩篱，不断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并在“一二·九”运动后走向初步的联合。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抗日团体发展更为迅猛，组织益加巩固、集中。而在此过程中，海外华文报刊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以《救国时报》的宣传为例，1935年8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

^① 转引自巫乐华：《华侨史概要》第30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转引自巫乐华：《华侨史概要》第30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的《八一宣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国力，共同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救国时报》自出版之日起 1935 年 12 月 9 日易名后正式出版)便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团结了一大批海外同胞。出版当天，报纸即发表一位英国侨胞读罢宣言的感受，他说：“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宣言和主张，而是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心声”。他写道：虽然“几年以来各方面爱国人士，都提出了许多救亡图存的方案”，但还“不曾有一种主张比这宣言中提出的更实际而具体的，更足以代表目前全国人民最广大而深刻的要求的；全民族的真诚觉悟以及救亡图存的方针，也没有像这宣言中表现得如此沉痛而正确”，“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救亡时报》还发表侨胞就如何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在华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5 年 12 月 14 日，报纸刊登一位侨胞的来信，信中谈及“抗日反蒋”的口号，认为“一面讨蒋，一面抗日，尤非任何军力所能做到”。由此他提出“讨蒋，不如联蒋”。《救国时报》在刊登这封来信的同时还公开回函，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是以抗日不抗日为准”，“反日者便是我们的朋友，亲日者便是我们的敌人。对任何人是如是，对蒋介石也是如是”。“联蒋抗日”主张的提出，引起广大华侨的热切关注，他们纷纷来信来稿参加讨论，掀起了一个高潮。而华侨社会中关于“联蒋抗日”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实际的促进作用。总之，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在广大爱国侨胞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海外华文新闻业

1945年，德意日法西斯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侵略者铁蹄下解脱出来的各国人民无不欢呼雀跃，摆脱了日军蹂躏的东南亚华侨和当地人民更是倍加振奋，而海外华文报刊也再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新闻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与此相应，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窃取胜利果实，一时间内战阴云密布；建国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而国内政治又对海外华侨和华文报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它们自然而然地分为亲大陆与亲蒋两派（有些报纸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性），并围绕如何看待中国前途、如何对待新中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随着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侨陆续加入所在国国籍），海外华文报刊的绝大部分由华侨出版物衍变为当地华裔公民主办的新闻媒体，即由中国人在国外办的报刊变为纯粹的外国报刊。这使海外华文报刊在内容和总体布局上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 海外华文新闻业

二战结束后，战争期间被迫停刊的报纸纷纷复刊，并有大量新的报纸出现。据统计，战后截至建国后的 1959 年，北自缅甸、泰国，南迄印度尼西亚，东起印度，西至菲律宾的 12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香港、澳门不计），曾经在市面上发行的华文日报就有 159 种，期刊 177 种，连同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东北亚等 28 个国家和地区，当时出版的华文日报共有 200 种左右，期刊 223 种以上，总计 423 种。^①

一、东南亚的华文报刊

东南亚地区华侨最多，华文报刊一向也最为发达。但是战后情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②、新加坡、菲律宾与泰国，华文报刊继续存在，其他国家如缅甸、印尼与越南，由于相继建立特殊的政治制度，国情发生改变，侨社难以存在，华文报刊也受禁不能继续出版。

（一）新、马华文报刊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民族民主运动如火如荼，遭受摧残的华侨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作为舆论工具的华文报刊也纷纷复办或创办，华文报刊一时间欣欣向荣。然而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局势变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新办

^① 参见方曙：《海外中文报业话沧桑》，原载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1980。

^② 马来西亚即马来亚的新称。1957 年 8 月 31 日联合邦宣告独立。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1965 年新加坡退出。

报刊大都旋办旋停，寿命长的几年，寿命短的只有几个月或几天“，令人有如看走马灯之感”。^①

战后在新加坡复刊的有《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由于纸张缺乏，《南洋商报》最初以 4 开小型版发行，后扩大到对开 1 大张 4 版，1950 年 3 月增至 2 大张 8 版。1-2 版为电讯、国际要闻、社论，3 版为中外新闻、各地派驻记者专稿和时评，4 版为经济版，着重报道土产贸易和金融行情，5-6 版为本埠新闻，7 版为南洋消息，8 版为副刊。1955 年自购小型飞机运报，成为一大创举。50 年代后，关于中国政局的社论逐渐减少，而日益转向当地政局。该报复刊后由李玉荣任社长，王仲广任编辑主任，曾心影任主笔。报纸还在中国国内及欧、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设有特派记者。《星洲日报》复刊后，先与《总汇报》（1939 年收于麾下）出联合版，称《星洲日报 / 总汇报联合版》，1946 年 6 月 1 日恢复单独出版。由胡文虎之子胡蛟、胡好（Aw Hoe）相继任社长，胡伟夫、胡浪漫、江锦帆、黄思先后担任总编辑，其中黄思任该职达 27 年之久。黄氏在任期间，为增加报纸容量，将新五号字代替旧五号字。1953 年增出 16 开本的综合杂志《星洲周刊》，1953 年出版了包括《摄影入门》、《东南亚风情画》、《马华小说选集》等在内的“星洲日报丛书”，1954 年在原有栏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妇女”、“学生”、“儿童园地”等 10 多种专栏、副刊，并于星期日增出光纸印刷的《星光画报》。同年胡文虎逝世，星系报业及该报董事长由胡文虎之侄、即胡文豹之子胡清才（Aw Cheng Chye）继任，胡蛟复任社长。随着出版条件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规模越来越大，两报均在吉隆坡发行马来亚版，另有北马、南

^① 陈烈甫：《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第 499 页，台北中正书局 1979 年版。

马分版。由于各版的设立，使得当地原有的报纸受到冲击，维持不易。

除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之外，战后新加坡新创办的报刊有《华侨日报》、《新民主报》、《公报》、《中南日报》、《中兴日报》、《南侨日报》、《南侨晚报》、《星洲晚报》、《南方晚报》、《益世报》、《星马日报》、《新生日报》、《南洋晚报》等。其他小型报刊有《娱乐报》、《夜灯报》、《新力报》、《欢乐报》、《热带报》、《新报》、《海报》、《香槟报》、《创造报》、《东方报》、《新生日报》、《正风报》、《快活报》、《内幕新闻》、《人人新闻》、《大公报》、《生活报》、《风下》《铁报》、《大众报》、《海星报》、《大声报》、《新时代日报》、《社会新闻》、《民主周刊》、《观察报》、《新妇女》《七彩》、《艺风》、《工商报》、《狮报》、《钢报》、《新镜报》、《峰报》、《工艺》、《新生活报》、《工商导报》等。其中，《华侨日报》、《新民主报》、《公报》、《中南日报》、《中兴日报》、《南侨日报》、《南侨晚报》、《星洲晚报》以及一些小报很快便停刊了。

在上述报纸中，《中南日报》是反共的，而《南侨日报》是拥护共产党的。《中南日报》由老报人傅无闷于 1946 年创办，初曾标榜“纯为服务文化事业而起”，持“不党不派之立场”，但办了三个月终因经费问题而转售给国民党党部，1947 年 5 月改名为《中兴日报》，正式成为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部的机关报。《南侨日报》创办于 1946 年 11 月 21 日，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当时，新加坡的两家大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均不同程度受到国民党控制，整个新加坡没有一家进步的大报。基于这种考虑，陈嘉庚联合张楚琨、高云览、陈岳书、王兴源以及其他爱国华侨，创办了这份报纸。《南侨日报》在创刊号的《告读者》中明确提出：“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民主堡垒。”并阐述其办报目的在于“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

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该报董事会主席由陈嘉庚担任，王兴源在后期担任副主席，创办初期社长是胡愈之，主笔是夏衍，张楚琨任经理，洪丝丝后来亦担任过经理，胡伟夫任编辑主任。《南侨日报》创办后，即致力于团结广大华侨，坚持民主，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及其反人民的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全中国的事业。报纸同时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的民主斗争，努力维护广大华侨的利益。由于该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且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社论、时评、专稿均有很高的水平，在华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该报却被英国殖民政府视为眼中钉。1950年9月20日，英殖民政府援引“紧急法令”封闭了《南侨日报》，总经理洪丝丝、编辑主任胡伟夫被逮捕。其他进步的报刊还有创办于1945年的《新民主报》（1946年被封）、胡愈之主编的《风下》、沈兹九主编的《新妇女》和民主同盟出版的《民主周刊》。

在马来西亚，战争结束当年即复刊的有槟城的《星报》、《光华日报》和《现代日报》，古晋的《沙捞越日报》，诗巫的《华侨日报》；马来亚共产党的《战友报》和《民声报》也于战后转为公开出版。新创办的华文报，更犹如雨后春笋，1945年新创办的华文报刊，除了10月1日在古晋创办的《中华日报》外，还有同年在古晋和槟城创办的《中华公报》，在西马出版的《联邦日报》以及12月由绿社编辑的《南方文艺》。1946年2月，吉隆坡出版了《中国报》、《桂桥旬刊》同年9月、10月、12月，槟城先后出版了《新生报》、《学报》（前身为《学生周报》）、《钟灵中学季刊》。1948年1月15日，《大同日报》在诗巫创刊，由陈兰训创办，至1962年2月16日停刊。1948年5月，《民主前锋》在吉隆坡创刊，在此前后还出版过由山口洋激流社编辑的《激流》。就连战前从未刊行过华文报刊的一些城市，也纷纷创办

了华文报，如马六甲的《大众报》，太平的《北马导报》，芙蓉的《森州民报》，麻坡的《麻坡新报》，新山的《新民报》、怡保的《时代日报》等。50年代创办的报纸有吉隆坡的《马来亚通报》，古晋的《前锋日报》、《华侨晚报》、《新闻报》、《沙撈越时报》，诗巫的《诗华日报》，美里的《美里日报》，山打根的《山打根日报》等。这些报刊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其中的进步报刊有槟榔屿的《现代日报》该报1945年10月复刊后，始终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1950年9月12日，英国殖民当局以该报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为借口，吊销其执照，该报被迫停刊；吉隆坡的《民声报》该报1945年9月出版，它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的企图予以谴责，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取消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6月被英殖民政府查封。除此之外，进步报刊还有在古晋出版的《中华公报》、在诗巫出版的《侨声报》、《新民报》，在怡保出版的《时代日报》和在太平出版的《北马导报》等。上述报纸中的很大一部分刊行时间都不长，长则几年，短则几个月就停刊了。原因是有些报纸仓促上马，办报条件不成熟；有些报刊则因竞争激烈，经费无着，难以继；还有一些报纸是因为战后英殖民政府宣布于1948年6月实施“紧急条例”，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加紧对进步力量的镇压。

（二）泰国华文报刊

日本投降后，泰国的华文报纸开始复兴。从1945年8月到1947年间，就出版了14家日报。至1948年春，因经济问题等各种原因，一度仅存6家。

首先是战时出版的小型地下刊物纷纷转为公开发行（其中的大部分因未被允许登记注册不久便停刊），而只有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侨务科长兰东海主持创办的《中国人报》在政府重新登记出版物时，被批准于1945年9月27日正式注册出版。《中国人报》

主持人为兰东海，社长是陈春发，总编辑是泰籍华人李锡麟。刚出版时发行量高达万份（泰国华文报刊前期发行量一般只有几千份，超过万份的就可称为大报了），但因质量问题，很快滑坡，未及一年就停刊了。

1945年10月1日，《中原报》回到原主人的手中。该报复刊后，仍属潮州会馆派所有，仍由李其雄主持报务，社长为陈恒奎，总编辑为许克明，日出4开纸1张4版。该报资力雄厚，又拥有一批资深报人和记者组成的编辑班子，从而使该报很快成为当时泰华报界规模最大的报纸。1948年该报增办《中原晚报》，总编辑为泰国问题专家陈毓泰（又名乃盐）。报纸复办后，报道国内及华侨社会新闻比较多，50年代后，大量刊登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消息和侨乡动态，广受读者欢迎，销数大增。正当该报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以沙立·他纳叻（Sarit Thanarat, 1908 - 1963）为首的军人集团于1957年8月上台执政，推行亲美反共排华政策，翌年10月20日查封《中原报》，逮捕了其主要负责人。

1945年10月10日，由侨商林国华等出资，由李子英、李哲民、李止戈主办的《光华报》在曼谷创刊。该报获得一批中药业界人士的支持，为商办报纸。李子英任社长兼总编辑，李哲民任主编，其他主持编辑工作的人均为具有办报经验和写作才能的高手。该报政治上倾向进步势力，在内容、编排上都较有新意，颇受读者欢迎。《光华报》不久创办了《光华早报》作为其姐妹报，1958年10月被沙立·他纳叻政府连同其晚报一起查封。

也是1945年10月10日，《全民报》在曼谷创办。主办人兼社长刘泽民，总编辑蔡志宏，总经理兼督印人郭天任。该报是以原来的抗日地下刊物《真话报》为基础创办起来的，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后由进步团体在各界爱国华侨中筹资100万铢，成立大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46年5月28日由该公司接办《全民报》。注册人是许亦曾，社长陈兵人兼经理（1947年1月），

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华侨抗日义勇队和曼谷侨界进步社团的骨干。这使报纸逐渐走向正轨，并步入泰华大报的行列。该报在创刊号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其办报宗旨是：“实行民主，惩办汉奸，中暹亲善”；随着形势的发展，又进一步提出“争取祖国独立、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反对内战”；同时努力“推动华侨团结，促进中暹两国人民的长久友好关系”。至 1948 年底，由于銮披汶政权对左派采取高压政策，《全民报》处境也愈加艰难。尽管如此，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报仍扩版增幅，大量刊登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稿件，受到急于了解祖国和家乡情况的广大华侨的欢迎，日销量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 1.2 万 - 1.3 万份。报纸因此而经常受到新闻检查，报社的主办人、总编辑和督印人也时常受到“约见”或“传讯”，并被勒令“不要宣传共产主义”、“禁止评论国际政治”。由于泰国当局的刁难，《全民报》最终不得不于 1952 年停刊。

以上三份报纸，即《中原报》、《光华报》和《全民报》是当时泰国主要的华文报纸。

1946 年元旦前，由百乐公司出面主办，由蔡学余、刘栋臣主持的《中华报》出版；1946 年元旦，曼谷三民主义青年团总部罗鸿恩等创办了《民声日报》，社长蔡学余，总编辑谢维藩；同一天出版的还有商会出资、实由国民党海外部驻暹罗办事处主持的《正言日报》。这三份在同一地点出版的华文报纸因读者有限，销路受到影响，前者于 1952 年初停刊，后两份报纸维持到 1948 年，相继停办。

1946 年 5 月，中国民主同盟暹罗支部负责人黄声、卢静子等在曼谷创办了《民主新闻》，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1953 年停刊。1947 年 4 月 1 日，在这份刊物的基础上，又创办了《曼谷商报》。该报社长许元雄，经理马荫荪，实际编务由出任总经理的杨繁负责。《曼谷商报》以经济新闻及时事评论为主，在泰

华侨社中颇有影响，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界也颇予重视。报纸出版至 1948 年 7 月，因环境不利而停刊。1947 年出版的还有前《华侨日报》编辑李慕逸集资复办的《华侨日报》，该报标榜中立，颇获读者支持，故能与《中原报》、《光华报》和《全民报》同侪为曼谷华文大报。同年又有《新中国报》出版，该报由侨领张兰臣出资，莫树立任社长，黄病佛为主笔。该报资力虽厚，却少有起色，亏蚀累累，年余就停办了。1948 年，由黄民魂等人筹办的《曼谷周报》在曼谷出版。该报使用刚停刊的《正言日报》的旧址和设备，虽非属正式国民党报，但与《正言日报》立场无异。之后又有黄楷之创办的《自由报》、黄病佛创办的《社会日报》、谢维藩创办的《知行导报》相继创刊。这些报纸大都办了晚报，以扩大影响，内容偏重世界要闻及当地消息，在报道国内新闻时，政治上多倾向国民党政府，但最多不过一两年便停刊了。

1950 年元旦，星系报业集团在曼谷创办了《星暹日报》（创刊同时即出版《星泰晚报》晚报 1973 年停刊），由胡文虎长子胡蛟担任社长。由于资力雄厚，该报一开始就以“大报”的姿态出现，在后来的几次华文报刊被封事件中稳住了阵脚，一直在泰华报坛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星暹日报》创办后，不但与《中原报》争短长，也给《华侨日报》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使之终因无力抗衡而于 1952 年自动停刊。1951 年 11 月，泰国侨青会人士创办了一份小报《南晨报》，1952 年由小报扩充为日报（晚报）。该报是一份内容活泼的进步报纸，适合青年人的口味，但因被视为左倾，不到一年而遭搜捕封闭。

这一时期的泰华报业同样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且壁垒分明进步的华文报纸有《全民报》、《真话报》、《曼谷商报》、《民主新闻》及《南晨报》；国民党办的报纸有《中国人报》、《民声日报》、《正言日报》、《曼谷公报》、《民主日报》有进步倾向的

商办报纸有《中原报》、《光华报》、《华侨日报》等。

50年代以后，泰国政府采取了排斥和歧视华侨的政策，特别是銮披汶执政时期，下令封闭了所有的华文中学，华文报刊也受到严格的检查和监视，一些报纸（主要是进步报纸）被查封。由于华文学校停办，华文报纸新一代的读者越来越少，致使华文报业的处境愈加艰难。可以说，这一时期以1950年为界，之前是恢复和发展，之后便一步步走上坎坷之路。1955年至1960年，先后又有几份华文报纸出版即《世界日报》、《中国日报》、《京华日报》、《中华日报》等。《世界日报》由一个与台湾有贸易关系的企业家集团创办，它虽不是国民党报，却在政治上支持台湾，坚持不与中国大陆发生任何关系。因为它的立场与过去的历届泰国政府不相抵触，所以能历经50年代以后华文报业动荡变化的阶段而一直生存下来。

（三）菲律宾的华文报刊

战争结束后，随着菲华社会的迅速复元，战前三家华文报纸《公理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很快复刊。

作为国民党驻菲支部的机关报，《公理报》于1945年复刊后，仍一如既往地追随蒋介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报继续支持台湾政府。1954年4月报社进行改革，延聘新闻人才和名作家，增辟专栏，扩大内容含量。1956年社长王泉笙病故后，由庄铭渊任代理社长，庄金朝任总经理。1957年5月，该报与《大中华日报》合并，隶属国际印刷公司，由《大中华日报》出早报，《公理报》改出午报，主持人不变，1969年日发行量5000份。1972年菲律宾实行军管，该报与其他华文报纸同时被勒令停刊。1973年该报奉台湾当局之命，与《大中华日报》合并为《联合日报》。

1945年《华侨商报》复刊后，该报创办人于以同之子于长城和于长庚继承父志，分任社长和总编辑。该报坚持进步立场，

秉公直言，同《公理报》、《大中华日报》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因而被中国国民党势力视为眼中钉，多方陷害。1962年，国民党驻菲律宾总支部与菲当局合谋，以“传播反菲亲共思想”的罪名将于氏兄弟逮捕。于长庚两天后获释，但是于长城未经任何审讯被监禁8个月后方被释放。1968年，于氏兄弟再次以同样罪名受到控告审讯，但查无实据，对他们的控告被撤消。1970年3月23日，于氏兄弟又一次以“反菲亲共”的罪名被捕，并认定其为“中共在菲律宾的高级代理”，指控他们资助学生示威行动，灌输毛泽东思想，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后虽保释出狱，但传闻要被遣返台湾。为防患未然，1970年4月下旬，于氏兄弟公开声明放弃“中华民国”国籍，成为无国籍人士，并通过菲外交部向英国大使馆申请，要求移居香港、新加坡或英国。同年5月4日晚，于氏兄弟在马尼拉海外记者俱乐部突遭菲军警逮捕，并于翌日清晨用菲律宾空军军机押送台北受审。这就是菲华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于氏兄弟事件”（或“《华侨商报》案件”）。此案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抗议，人们纷纷谴责台湾当局无权审判从未到过台湾的无国籍于氏兄弟，迫使台湾当局不敢按原计划宣判两兄弟死刑，而于8月14日宣判处于长城2年、于长庚3年感化教育。期满获释后，于氏兄弟分别移居美国和加拿大。1986年科拉松·阿基诺出任菲律宾总统后，于氏兄弟返回菲律宾，并于同年6月12日重新出版华文报纸《商报》（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去掉“华侨”二字）和《商报复版纪念刊》。科拉松为该纪念刊写了贺词。

《新闻日报》1945年复刊后，仍由吴重生主持，高承烈担任总编辑。不久高被人暗杀，吴重生自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报除了继续报道当地经济新闻以及南洋、港、台等地的经济信息之外，还经常刊登广大华侨所关心的新中国和福建省建设的消息，大多采用中国新闻社播发的电讯稿。《新闻

日报》与菲中华总商会有一定的渊源，经费充足、人员齐备、技术手段先进。为了与菲华第一大报《华侨商报》争夺读者，该报每周出版一期画报。1960年11月，早先在马尼拉创办的《晨报》改名为《礼拜天晨报》（周刊），并成为《新闻日报》的星期刊。该报另出版有《新闻晚报》（约在30年代），1963年2月1日在香港发行《新闻日报 香港版》。每年年底编印英文版的《新闻日报年鉴》，由名作家林仙德主编。每周还发行英文版《经济晨报》，主要对象为商界外籍人士。经过种种努力，报纸的影响不断扩大，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欢迎，60年代末期日销量达到3万份。吴重生也因该报的成功获得了菲律宾国家新闻奖。1972年马科斯政府实行军管后，该报被查封，后曾多次申请复刊，未获批准，只能每年刊售英文年鉴。

除了复刊的三家“老报”之外，战后新办的报刊也纷纷出现，仅在1945年就有6家，它们是：《华侨导报》、《前锋日报》、《大华日报》、《中正日报》、《侨商公报》和《重庆日报》。之后又相继出现《民声日报》、《大中华日报》、《民族日报》。加上前述三家，几年间日报恢复到12家，这是菲律宾历史上华文报最多的时期。这些报纸同样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当时拥护共产党的有《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有《公理报》、《前锋日报》、《大华日报》、《中正日报》以及《重庆日报》；《华侨商报》和《新闻日报》则持中间立场，不过前者稍微左倾，后者比较偏右。这些报纸对国内政局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在当地侨社的肃奸问题上分歧更为明显。双方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几乎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期刊方面有《新中国周报》、《粤声周刊》、《良友画报》等及多日刊报纸《照妖镜》、《X光小报》、《公道话》、《铁扫帚》、《警报》等数家。

正当国内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当地形势却越来越不利于进步报纸的生存，《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的工作人员纷

纷回国，两家报馆也悄悄地关上了门。与此同时，菲经济开始不景气，对报业影响很大，几家报纸先后停刊，《大华日报》和《中正日报》合并为《大中华日报》，《前锋日报》和《重庆日报》则相继停刊。总之，从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到 1972 年菲律宾实施戒严法，20 多年间没有新的华文报刊出现，继续出版的只有《公理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和《大中华日报》4 家报纸。1972 年 9 月 21 日，马科斯总统宣布实行军事戒严，下令新闻部和国防部接管和控制全国传播媒介，这 4 家报纸也都被迫停刊，繁荣一时的华文报业进入了低潮期。

（四）缅甸的华文报刊

1945 年 3 月 27 日，昂山（Aung San, 1915 - 1947）将军领导的缅甸抗日武装在盟军配合下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英国借此机会重新占领缅甸，并对其实行军事管制，使缅甸无法立即宣布独立（1948 年 1 月 4 日方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尽管如此，战时饱受日本占领者的文化禁锢和新闻封锁的缅甸华侨，仍然渴望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适应这种需要，华文报刊陆续复刊或创刊。

1945 年 7 月 6 日，战后出现的首家华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仰光创刊，其首任董事长为曹缙卿，副董事长为柯梓能，主编李哲仁。该报表面上对国内政治斗争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倾向国民党一方，发行量仅 1000 余份。后因财政困难，以 13 万缅元转售给缅华侨徐四民和陈占海，政治态度遂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 年停刊。

1945 年 8 月 5 日，在热心缅华文化事业的侨商们的支持和赞助下，《新仰光报》创刊。该报董事长陈守金是著名侨商，也是早期同盟会仰光分会机关报——《新仰光报》的创建者和赞助人，副董事长为曾顺续，经理徐四民，主编杨水源。该报创刊时即提出“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替侨胞说话”的宗旨，初时曾对

蒋介石抱有幻想，希望战后的中国能在他的领导下走向和平民主的目标；在事实的教育下，逐渐变拥蒋为反蒋，开始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化行为，传播革命理论，推动民主运动，并因此而受到亲国民党的《中国日报》、《先声日报》和《国民日报》的围攻，双方展开了一场论战。在广大旅缅华侨的支持下，《新仰光报》同上述三家报纸的论战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海外部一度筹谋的收买该报股权、改变其办报方针的计划也告失败。1946年8月，《新仰光报》在举行周年庆典时，缅甸临时政府首脑昂山将军亲自莅会祝贺，还亲笔题词赞颂中缅两国的传统友谊。该报后期坚持“以广大华侨为服务对象，为发展中缅友好，团结广大侨胞，缓和国际形势，促进世界和平，激发侨胞爱国精神，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办报方针，致力于爱国主义和中缅友好方面的宣传。该报最高发行量3000份，于1966年1月1日停刊。

1945年10月16日，在仰光又有《先声日报》创刊，创办人为原国民党远征军退伍军人许百富等。与此同时，二战时由国民党海外部经营的《国民日报》也复刊了。这两家报纸的观点与《中国日报》相同，于是三家报纸沆瀣一气，就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与《新仰光报》展开笔战，结果是前者一一败北，先是《先声日报》停刊，继而《国民日报》被迫关闭，剩下的《中国日报》则与交战对方握手言和，转向拥护新中国的立场。

1946年，一家较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人民报》创刊。该报前身为《人民旬报》，1947年改为日报，始称《人民日报》，后改为《人民报》。该报创办初期便积极报道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进展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方报道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况。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和文教界人士，50年代初日销4000多份。

1949年1月1日，又有《中华商报》创刊。该报由华商共同集资创办，因而资金雄厚，发展也比较顺利。首任董事长曹凤

美，社长曹缙卿，总经理李启我，主编朱仲玉。该报初期自诩中立，但前期言论对台蒋往往是“小骂大帮忙”，而对新中国却常常恶意中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仲玉态度发生转变，言论开始倾向新中国。朱不久被解职，并于 1951 年被缅甸政府驱逐出境。50 年代中期，报纸经营遇到困难，遂转让给进步报人主持。由于改组后的报纸能够客观地报道新中国和侨乡的消息，日销数从 4000 份左右增至近万份，发行量一度居缅甸华文报纸的首位。该报除在缅属地区发行外，还远销至印度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德里等地，1966 年 1 月 1 日缅甸政府迫令其停刊。

50 年代在缅甸先后出版的华文报刊有：1950 年 2 月 17 日由民主人士苏礼用、苏佐雄、胡肯堂、黄铁耕等创办、每星期出版 1 小张的《生活周报》；同年 5 月 8 日由卑谬华侨青年创办的《华青周报》，社长苏福和，发行人周博意，正副主编吕剑辉、李光美等；1951 年 12 月创办、每星期一出版 1 张的《自由日报》，该报为国民党在缅机关报，董事长兼总经理为李紫荣，总编辑林炳坤，发行人李义常；1951 年 12 月创刊（1953 年曾一度停刊，同年 9 月复刊）每周出 4 开 1 张的《中国论坛报》负责人为国民党驻缅总支部书记王辉等；1952 年 4 月由缅华联合总会创办的半月刊《民众呼声报》；1953 年 8 月创办的《亚洲日报》，初为周刊，1955 年改为三日刊，1956 年 9 月改为日刊，日出 3 大张，社长马次伯，总编辑卢伟林。该报日常稿件由美使馆新闻处供给，此外还编用中央社、美联社、合众社的电讯稿。读者对象是华侨青年，每日发行不过 2000 份，仅维持两年就停刊了。

上述报刊的政治立场也是各不相同的，《生活周报》、《自由日报》、《中国论坛报》、《亚洲日报》、《民众呼声报》属亲台报刊而《人民报》、《新仰光报》、《中国日报》、《中华商报》等在后期均倾向新中国。

60 年代创办的华文报刊有 1960 年 1 月许斯仁创办的《时代

报》，1961年2月高伯坤创办的《东南日报》。此外还有《青霸报》、《观察报》、《南国周报》、《旋风报》等，但发行不久即停刊。战后，缅甸华侨在仰光和其他地方还出版过少量中文杂志，《南国画报》（1954年）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全缅惟一的一份华文画报，着重刊载缅甸的图片，每期销售约2000份。

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政权转移到军人集团手中。1965年8月，军政府首先吊销了《自由日报》的执照，1966年1月1日又发下一纸命令，将包括华文报刊在内的全部外侨报纸一律关闭。在这些被取缔的外侨报刊中，华文报刊无论是种类，还是发行数量，都是最多的。从那时起直到90年代末期，华文报刊在缅甸绝迹。

（五）印尼的华文报刊

日本投降后至50年代末，是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的“全盛时期”。除原有的《新报》、《天声日报》等先后复刊外，又有雅加达的《生活报》、《自由报》等许多新报刊相继出现。在雅加达、棉兰、泗水、坤甸、锡江、苏拉威亚、井里汶等地出版的华文日报达20家左右。^①

战后，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印尼华侨社会中出现了拥共和拥蒋两股政治力量，与此相应，印尼的华文报纸也自然而然地分为亲中共（北京）和亲国民党（台湾）两大派。拥护共产党的报纸以《新报》和《生活报》为代表，拥护国民党的报纸以《天声日报》和《自由报》为代表。这四份影响较大的报纸，均在首都雅加达出版。

《新报》是战后复刊最早的报纸。该报仍由爱国侨领、中华总会副主席洪渊源任社长（兼总经理），总编辑由印尼侨团总会

^①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第106页，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秘书长宋中铨兼任。报纸共有 4 个版，第 1 版以国际要闻、大陆新闻为主，并有就重大事件发表的社论和评论，新闻多采用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的电讯。第 2 版以当地新闻为主，重要新闻除自派记者采访外，多采用印尼官方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的电讯稿。第 3 版为副刊，多转载中国新闻社和中国通讯社提供的通讯和专访稿。第 4 版为娱乐版，1955 年 7 月 3 日起还发行以文体消息为主的星期增刊。

《生活报》是由爱国华侨民主人士于 1945 年 10 月 24 日发起创办的一份进步报纸。开始为临时性半周刊，每期发行 7000 份，1947 年 2 月 1 日才改为日报正式注册出版（临时性半周刊改为《生活周报》），黄周规任董事长兼社长，王纪元任副社长兼主笔，张又君任总编辑，陈纪煌任经理。该报版面设置与《新报》大体相同，但编排手法比较新颖，读者对象为青年教师、学生和进步侨商。就内容而言，《生活报》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新中国成立前后，该报详细介绍政协会议的有关文件，出版专号、特辑，赞颂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报道国内国际新闻事件时，始终采用新华社电讯和中国新闻社电讯稿，较少采用外电。该报同情、支持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图谋。在印尼从荷兰人手中接管政权后，又积极参与“中印（尼）建交促进委员会”的活动，宣传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在当地华侨社会中颇有影响。到 1960 年，日报发行量达到 55000 多份，周报达到 30000 多份，成为印尼爱国华侨最大的侨报。同一年，印尼政府颁布紧急法令，禁止华文报刊继续出版，《生活报》于 10 月 17 日被迫停刊。

除了这两份报纸之外，拥护共产党的报纸还有棉兰的《民主日报》、《苏门达腊民报》、《华侨日报》泗水的《大公报》坤甸的《黎明报》；望加锡的《匡卢日报》及《每日电讯》等。

倾向国民党的华文报刊主要有：

《天声日报》该报 20 年代初创办时，孙中山曾为其题写报名。日本投降后，报纸在吴慎机主持下于 1945 年 10 月 22 日复刊。1949 年 10 月后，该报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3 年 2 月 5 日，报社毁于大火。在国民党人士的支持下，发起“预付一年报费运动”及“一人 1000 盾以上借款运动”，支援报社重建。1954 年 10 月 31 日，在原址重建五层大楼。报纸共有 4 版，第 1 版为国际新闻，第 2 版是中国新闻，第 3 版是南洋新闻，第 4 版为副刊，附有“娱乐”、“体育”等栏目及《学生》、《儿童》等期刊，发行量达 15000 份。其最后的负责人为：董事长黄根源，社长邓广希，副社长钟干材，总主笔及总编辑丘正欧（汉兴）、徐竞先等。该报于 1958 年 5 月 5 日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取缔。

《自由报》1951 年 2 月 1 日创刊于雅加达。董事长章勋义，副董事长梁锡佑、李裕崇，社长徐琚清，副社长林云谷、谢佐禹，主笔郑学稼，总编辑王季高。该报为对开张报纸，发行量 13000 份。1954 年章勋义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后，梁锡佑继任董事长，1958 年 10 月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取缔。

这一时期倾向于国民党的报刊还有雅加达的《中华商报》，1953 年 8 月 24 日由亲台的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按照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创办，社长马树礼；泗水的《青光日报》，1946 年 1 月由当地侨领叶立庚主持创办；棉兰的《新中华报》，1945 年 9 月 5 日复刊，由苏源昌主持；《兴中日报》，1957 年 1 月出版，社长刘天一；坤甸的《诚报》，1947 年 3 月由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华侨集资创办，首任社长孙季刚，末任社长邓新贤；望加锡的《侨声报》，1951 年 10 月 1 日创办于苏拉威西望加锡，董事长卢建招，社长徐卓云。

当时的华文杂志也分为两大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有雅加达

的《生活周刊》、《星期正论报》、《觉醒周刊》、《中学生》、《印华经济》、《南洋画报》等反共的有雅加达的《艺友》、《动力》、《青年》、《南风周刊》、《青春》半月刊、《星期日报》（逢星期日出版），以及泗水的《黑白周刊》、井里汶的《自由青年》等。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当时中国和整个华侨社会的缩影。

1958年4月，印尼陆军当局以翻译人手不够，不便“审查”华文报纸，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为借口，下令将所有的华文报纸（约计20种）一并查封。后经我驻雅加达使馆据理力争，左派报纸《新报》和《生活报》获准合并复刊。同年5月5日，印尼军事当局以危害国家利益、妨害治安为由，逮捕了雅加达3家亲台报纸的负责人，即《自由报》副董事长梁锡佑、社长徐琚清；《天声日报》董事长黄根源、社长邓广希、总主笔丘正欧；《中华商报》社长马树礼、主笔方希亮等人，后来，梁锡佑、邓广希、方希亮获释，其他人则被驱逐出境。1960年印尼掀起排华浪潮，刚刚复刊了两年的《新报》、《生活报》又遭停刊的厄运。

排华浪潮平息后，中印关系好转，印尼华文报纸又出现了。60年代新出版的华文报刊有：《忠诚报》（雅加达，1960年12月，实为《新报》的资本）、《政治宣言日报》（棉兰，1961年，只出版5个月即被取缔，后迁移雅加达，以同名继续出版，1963年8月又被取缔）、《红白报》（泗水，1961-1962年）、《首都日报》（雅加达，1963年）以及《友谊报》（泗水）、《火炬报》、《革命火炬报》等。60年代的华文报刊全部由印尼籍人士所办，多数与印尼政党或民间组织有关，而且往往聘请印尼原住民担任法人代表、社长或总编辑，在新闻报道方面也以印尼为主，其他国家的消息次之。1965年“九·三〇”事件（印尼发生的政局变动事件，事件发生后，总统苏加诺的权力削弱，军人集团逐步掌握政权）前夕，印尼政府又批准8家华文报纸出版，情况与上述报纸相同。“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关系恶化，印尼政府

下令封闭了所有的华文报刊。

1966年9月12日，为了与不懂或不太懂印尼语的华侨、华人沟通，印尼政府决定出版官办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这是一份双语报纸，华文与印尼文各占一半，其主持人与印尼武装部队报纸《战争报》有关系。该报在雅加达出版，不久棉兰版也问世。1974年棉兰版被禁，就只剩下了雅加达版。当局的最后目标是把《印度尼西亚日报》改成纯粹的印尼文报纸，^①这实际上等于为印尼华文报业敲响了丧钟。

（六）越南的华文报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盟军决定原被日军占领的越南，16纬度以北由国民党军队接收，以南由英印军接收。由于国民党和英印军勾结法帝，使法国侵略者得以卷土重来，占领了北越和南越的大小城市。越南人民于是奋起进行抗法斗争，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力争建立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则实行独裁，阻挠联合政府的成立，进而发动全国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46-1950年间在越南出版的华文报纸，以立场而论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报刊，读者多为工人、店员以及知识界人士；第二类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共、反人民的报刊，读者多为国民党员、国民党机构的人员和富商；第三类是以商业面貌出现的、对国共问题采取中立立场的报刊，读者为一般市民、商人。这三类报纸的发行总数约为20000份，其中第一类

^① 廖建裕：《印尼华人报业简史》，载《华侨史学会通讯》1983年第2期

3000 份，占 15%；第二类 3000 份，占 15%；第三类 14000 份，占 70%。

第一类报刊有二战结束后即复刊的《越南日报》、《中华日报》以及战后创刊的《时代报》（三日刊）和《南亚日报》4 家，均为 4 开 1 张。这些报刊往往一家被封后，另一家才出版，一个时期只有一家存在，寿命最长的只有 14 个月。

《越南日报》于 1946 年初复刊。该报坚持原有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报纸以刊登新华社电讯为主，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为“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军”“伪国民政府”“伪总统”，同时反对当地国民党机构的活动，批驳当地国民党报纸的言论，为华侨进步社会撑腰。发行量约 2500—3000 份，复刊后仅两三个月就被封闭了。

《中华日报》1936 年创办于西贡，属当地广西籍华侨报纸。首任社长余群超（开明的国民党老党员），总编辑陈漫浪。该报主张抗日，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持批判态度。1949 年 9 月日军占领越南北部后停刊。日本投降后，于 1946 年初复刊，发行约 1000 份。1947 年因经济拮据，将版权转让给进步人士。同年 8 月，改名《中华报》继续出版，改版后的《中华报》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致力于侨区的进步事业。新闻以刊登新华社电讯为主，兼有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发行量增至 3000 份，在越南南方华侨中有较大的影响。改版后的总编辑为陈东明，社长王法铎，1948 年 3 月被法国殖民政府封闭。

《时代报》（三日刊）1948 年 4 月 10 日在西贡创刊。社长兼总编辑为郑明（郑衡），编辑有房瘦竹、张英（张俞）、陈莹。该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刊登新华社电讯为主。每期有徐盘石（徐安如）撰写的时事述评以及旅越中国漫画家刘建安和越侨漫画家柯文扬揭露国民党独裁腐败的时事讽刺漫画。地方版新闻

言论大胆，勇于维护侨胞利益。这使该报在越南华侨中颇受欢迎，发行量 3000 份，1948 年 10 月被法国殖民当局封闭。

《南亚日报》1949 年 1 月在西贡创刊。主办者为《时代报》原班人马，社长郑明，总编辑徐盘石，编辑有房瘦竹、张英、陈莹。该报立场与《时代报》一样，发行量也相差无几。同年 6 月 21 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南英的越南通讯《越南华侨申述希望》，报道华侨仇法心态，法殖民当局认定作者南英为《南亚日报》编辑张英，遂于 7 月 7 日将该报查封，随后又搜捕该报有关人员。1950 年 6 月张英被监禁，而徐盘石则早在同年 4 月被驱逐出境。

此后，南越法占区就再也没有公开发行的华侨进步报纸了。

第二类报刊，即倾向国民党的报刊先后有 7 家：《华南日报》、《自然报》、《扫荡报》、《正道报》、《中正日报》、《侨联》、《朝报》。有的是 4 开 1 张，有的是对开 1 张。这些报纸的新闻以中央社电讯为主，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为“共匪”、“共匪军”，其领导人都是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头目。这些报纸均因发行量不大，经济困难，先后自行停刊。寿命最长的也不过两年，所以每年只有两三家同时存在。

《华南日报》1938 年初在西贡创刊，由中国国民党驻西贡机构主办。首任社长邝鲁久，总编辑崔潇然，1940 年停刊。1947 年复刊，日出 4 开纸 1 张 2 版。发行约 1000 份，因经济困难于 1949 年初停刊。《自然报》1947 年在西贡创刊，两日刊，由中国国民党西贡直属总支部主办，总编辑文衍光，1949 年因财政困难停刊。《中正日报》与《华南日报》相同，也是由国民党驻西贡组织主办，1949 年初停刊。此外，《侨联》的主持人是杨海天，《正道报》是郑光昭，《朝报》是李峤峙。后三份报纸是属国民党三青团的，这些报纸均因发行量不大，经济困难，先后自行停刊。寿命最长的也不过两年，所以每年只有两三家同时存在。

至《朝报》最后终刊后，就再也没有新报出现了。

第三类报刊，即以商业面孔出现的报刊有《远东日报》、《妇女日报》和《中国日报》三家。这三份报纸以工商业资本为后盾，经营状况较好，发行量也较前两种报纸为多。政治上采取中立的态度，但视国民政府为正统，对其偶尔也有批评性言论。

《远东日报》1940年3月29日在西贡创刊。1941年因日军占领西贡而停刊，1945年9月11日复刊。复刊后，由于该报资金雄厚，编辑人才集中，多采用中央社、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并以商业面目出现，发行量很快达到7000余份，成为全越最大的一份华文报纸。社长是在香港的国民党员蔡贞人，实际社长是朱闻义。1955年3月因越南当局认为该报亲共，遂予封闭；后经有关方面争取，于同年10月6日复刊，麦思源为总编辑，黄文鼎为副总编辑。复刊后，发行量高达13000余份，销路遍及印支三国。

《妇女日报》创办于1946年4月25日，原名《妇女周刊》，10月10日改名。创办人为张瑞芳（自任社长并主持编务），其夫为法国殖民政府西贡堤岸新闻处华文检查官李秉恕。该报最初为纯文艺性刊物，因内容新颖，受到读者欢迎。改名《妇女日报》后，由李达之任总编辑，变文艺性周刊为综合性商业刊物。李秉恕利用其华文检察官的职权，采取各种手段，使报纸发行量达到4000份，坐上第二大报的交椅。1952年3月1日改名为《世界日报》。

《中国日报》可谓“三朝元老”经历过法殖民地时期、日军占领时期和法军再度侵略时期，连续出版33年，是越南及印度支那历史最长的华文报纸。该报从不发表社论，直到1949年5月底从停刊的《朝报》聘请了一位编辑，才开始偶有社论。1956年，报纸由独资改为报业股份公司，创办人梁康荣引退，由黄永洲主持业务，周志刚出任总编辑。改组后，该报多采用英美通讯

社及中央社的电讯，拓宽了报道面，同时开始报道新中国的消息，销量得以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南华文报纸的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认同新中国的报纸，当地政府不容许出版；国民党党报，读者寥寥，经济上亦无法维持。因此，侨区就出现了既无亲大陆的报纸，也无国民党党报的特殊局面。全部华文报纸都以商业性面貌出现，对大陆、台湾问题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以争取读者，谋求生存。

1954年7月抗法战争结束后，越南北方和南方暂时分治。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得到美国的承认和援助，并同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则早已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南方，亲中反美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又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南方的华文报刊不敢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只能保持中立。此时绝大多数华侨已被迫转入越南国籍，华文报刊对海峡两岸的政治纷争也持较为客观的态度。^①

（七）日本的华文报刊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在日华文报刊（一般为非政治性刊物）数量减少；新创报刊也为数不多，基本上是由日本人办的或是汉奸刊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战胜国的地位为日本华文报刊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据台湾方面的统计，从1952年到1967年，日本先后出版的华文报刊计有41种（包括已经停刊的）。^②其中日报1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491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转引自罗晃潮：《日本华侨史》第397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家，报纸性质的期刊 3 家，通讯 4 家，杂志 33 家，多数为华文与日文或英文合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华侨报刊也变得日益复杂。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亲美亲台的报刊，一部分是亲大陆的报刊，还有一部分是台独分子所办的报刊。

亲美亲台、反对新中国的报刊，是由台湾官方或国民党人士、亲台侨商创办的。战后一段时间内，此类报刊在华文报刊中占多数。这类报刊有《中华周报》、《自由新闻》（原名《自由中国新闻》）等。《中华周报》创办于 1952 年 11 月 29 日，由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发行，为华、日文合刊周刊。该刊经常引用美联社、中央社的电讯，较多介绍“复兴基地”台湾的情况，时有攻击新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创办于 1954 年 11 月 1 日（东京）是以日文为主的报纸型刊物，初为旬刊，每期出 4 开纸 1 张 2 版。该刊系台湾国民党人宓汝卓所办，由日本人石井思郎协助。后因财力不足，由汪少庭等多人集资接办，改为三日刊，经费由台湾当局通过“亚东协”拨付，每期印 3000 份，免费赠阅。该报除在日本发行外，还发行到南朝鲜。

这类报刊还有创办于 50 年代的《东亚通讯》，邓友德主办，丁经章任编辑，专门发布各种新闻；《天地画报》，张天翼所办，后改名为《春秋》；《新东方》臧广恩主办。此外还有《大同》、《今日之世界》等。这些报刊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早已先后停刊。60 年代有《东方文摘》月刊（1960 年 1 月创刊于东京，发行人为黄裕德）《自由中华》（1961 年 1 月 23 日创刊，国民党大阪直属支部发行）、《华侨之声》双周刊（1962 年 5 月 10 日创办于东京）、《台湾经济》月刊（黄远竹发行于东京）、《华侨生活》（1962 年 6 月李献璋创办）《扬华侨报》（1963 年 2 月 15 日由薛来宏主办）、《太平洋经济》月刊（1963 年创办，李国卿任社

长)、《今日之中国》(日文月刊,60年代中期发行)等。其中,《扬华侨报》主办人薛来宏为横滨华侨富商。该报是小型华文旬报,较受华侨青年的欢迎。《太平洋经济》虽属台湾,却认为自己是“纯粹的经济杂志,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其口号是“倡导、鼓吹、促进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之实现”。根据《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鉴》1981年的介绍,该刊内容“大体以理论经济占15%,待开发国家经济启蒙占25%,国际关系占10%,日本各种产业及新制品之介绍占10%,其余则穿插以轻松、幽默的历史小说、稗官野史、世界珍闻、各国风俗习惯、世界著名企业及人物介绍等”。《今日之中国》则以报道台湾农工商情况为主,发行量不大。

倾向新中国的华侨报刊主要有日、华文《华侨报》、《大地报》、日文《国际新闻》和中国通讯社等。《华侨报》1948年创刊,由东京华侨总会出版。该报初为华、日双语刊,每期出对开纸1张4版,其中有一版是中文,后来则全部改为日文。报纸以正面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主,读者主要是华侨总会会员,每年报费连同会费一起交,发行量初为7000份,后降至5000份。该报由东京华侨总会理事殷秋雄负责,设专职工作人员3名,华侨总会理事梁启成、江洋龙参加采访、撰稿、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大地报》创办于1954年3月1日,由东京华侨总会编辑,总编辑韩庆愈,周一出版。1964年11月起,由《大地报》社出版发行,每期4开2版。《国际新闻》1945年10月创办于大阪,初由康启楷、潘铎元任正副社长,后林清木、黄万居、林炳松先后任社长。1947年起,林炳耀任总编辑。著名报人韩飞凤(1916-1994)曾任该报记者、主笔、总编辑,直至1955年回国。该报是战后最早发行的华文报刊,影响较大。其从业人员一度多达300人,发行量20万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该报就大量采用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的电讯稿,在使广大侨胞和日本人

民及时了解新中国的信息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中国通信社是由日本华侨创办的、以报道中国情况为主的日文通讯社。1947年在东京都开业。创办人为杨春松等，首任社长曾永安（曾子平）。50年代改组为亚西亚通信，社长李铁夫。后又改回原名中国通信社，历任社长有陈辉川、于恩洋、张铭忠。该社主要业务是抄收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的电讯，连同其他来源的资料，选择后译为日文，提供给日本各大报馆（后来则包括广播电视机构）。

这一时期由“台独”分子廖文毅及其同伙主办的报刊则有《台湾民报》（旬刊）《台湾公平报》（旬刊）《台湾青年》（月刊）《台湾自由新报》（月刊）《台湾新闻》及《台湾独立通讯》等。此类报刊名义上虽为旬刊、月刊，但实际上都是不定期发行，有些出版一两期便停刊，读者很少，影响不大。

此外，五六十年代创办的华侨报刊还有《华侨自由导报》（日文旬刊）《新亚洲》（中文月刊 王力鹏主办）《华侨新闻》（中、日文旬刊）《东洋新闻》、《华侨通讯》、《世界华侨》（月刊）以及《东亚工商新报》等。

（八）美国华文报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迁移到美国纽约出版（1938年8月11日），同一时期在纽约出版的报纸还有此后改名为《华美日报》的《光华日报》、《联合日报》、《自由世界》（月刊）以及不定期刊《大公报》、《华侨文阵》和《学建通讯》。这些报刊及时译载美联社、合众社有关战局的报道，也发表一些对时局的评论，为抗日救亡造舆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在华侨“衣馆联合会”的资助下，由梅参天、唐明照等人于1940年7月7日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1940-1989）。该报创刊初始即宣称“乃欲尽其分子之义务，负兹时代的使命”；并明确指出“美国华侨之中，不少享有美国籍民权者。其爱护祖国，是属天职；而矢忠美国，亦有义务在焉”。战争期间，这份

报纸不但向华侨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及时报道国内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而且还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抗战后期，冯玉祥赴美考察期间，揭露了蒋介石专制独裁的行为。该报对此大力支持，并报道了他所组织的“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开展的活动。报纸因此而受到进步侨胞的支持。

战后初期，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曾先后出版了一批期刊，如《新苗》月刊、《光明》和《文荟》季刊，周刊有《新光大报》、《大华周刊》、《中美周报》、《美华新报》、《东西报》和不定期出版的《美洲中华书法学会特刊》和《团结报》等。这些报刊几乎全部置于台湾当局的控制之下。从内容上看，它们多采用美联社、合众社以及台湾中央社的新闻，大量刊登诋毁新中国建设成就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的文章，政治倾向十分鲜明。除此之外，这些报纸还热衷于刊登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和黄色新闻，报格不高，加之编排、印刷粗陋，发行量很低，最多不过千份。

五六十年代，由于美国政府采取对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实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政策，使华文报刊的发展极为缓慢。新创刊的日报只有纽约的《联合日报》（1952-）、短期存在的《民治日报》（1960-1966）、《中国时报》（1962-1979），以及在旧金山短期存在的《自由中国日报》（1955-1957）。

《联合日报》1952年7月8日创办于纽约。创办人吴敬敷（Chin-fu Woo）1938年至1941年任国民党《民气报》总编辑，被迫辞职后于1942年创办《中美周报》，并以其积累的资金创办了《联合日报》（《中美周报》继续刊行至1970年）。该报自称“商办”、“无党派”，是一份“侨营独立报纸”，实际上视国民党为“正统”，表示要“巩固民主阵营，扫荡反动势力，保障天赋人权，争取世界和平”，“为中国人民自救运动效其至忠”。该报初以中华民国纪年，较多采用中央社电讯，刊登港台消息比较

多，版面上不乏反共文章。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该报逐步转向中间立场，读者以工人和新移民为主，采用公元纪年。内容主要有国际要闻、美国新闻、华人社会新闻、港台新闻以及中国大陆研究、大众文坛等专栏。70年代初曾进行改革，主要是增添印刷设备，增加版面至4张16版。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采用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电讯，转载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稿件，广告有时占总篇幅的一半以上。

《民治日报》前身为1913年（一说为1911年）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创办的《民国公报》。该报自创办以来几度停刊，又几度易名重新出版。1960年9月，刘兴、黄植滋等人再度向洪门人士集资复刊，易名《民治日报》，由梁冷明任总编辑，1966年因维持困难停刊。《中国时报》1962创办于纽约，因经济困难，遂于次年售予中国国民党人陈兆琼（Siu King Chan）。陈氏和旧金山的国民党人黄仁俊（Doon Wong）等扩大该报组织与规模，设总社于纽约，分设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三个版，主要内容在纽约编印，地方新闻由各版自行编辑。1964年10月10日正式出版，陈兆琼任董事长，毛树清、王桂生先后出任总编辑。由于规模大，开销多，不久经费出现问题，旧金山版不得已于第二年取消，芝加哥版维持时间也不长，该报后又艰难支撑十几年，终于1979年停刊。《自由中国日报》1955年3月1日由美国自由亚洲协会和侨界资助，创办于旧金山，吴思琦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报以中国留学生为主要对象，并与左派报纸有论争，由于经营不善，发刊仅两年便停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党报以反共为基调控制侨社舆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受到迫害，《美洲华侨日报》一度只出周二刊。总之，这一时期的美国华文报刊业处于低潮中。

（九）欧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欧洲是一个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达的地区，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侨民和华裔居民计有 32 万多人^①。欧洲华文报刊至今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然而其发展却时断时续，命运多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华文报业劫后重生。

在法国，由中国国民党法国总支部在巴黎创办的《三民导报》继续出版。该报是战后惟一恢复出版的华文报纸，也是欧洲华文报刊中寿命最长的一份，一直印行至 1966 年被法国政府封闭，期间一度辍刊，1949 年 4 月因经费困难停刊 4 个月，1964 年中法建交后复刊。复刊后因其“反共甚力”（经常刊登反共漫画，公开呼吁反攻大陆），而法国政府不意“破坏法国与北京的关系”遂于 1966 年 3 月 11 日将其封闭，封刊前的负责人是中国国民党党员陈楚本。

除了《三民导报》继续出版外，还有一份新创办的《华侨时报》。《华侨时报》由方镛（Fong Yong，20 年代中国首批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一）1944 年 11 月在巴黎创办，总编辑刘国平（Liu Guo - Ping）。该报为周刊，16 开本，竖行手刻油印。最初的宗旨是：呼吁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恢复中国国家主权独立。当时主要刊登时局消息、国内外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有关消息和评论；对国内政局，以抗日为焦点，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二战结束后，该报公开批评蒋介石为了反共不惜挑起内战的做法。1948 年 6 月，报社进行改组，内容侧重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49 年 3 月曾一度停刊。1950 年以后，转为报道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进步，每期发行 600 份左右。

^① 方曙：《欧洲中文报业柳暗花明》，载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15 期，1981 年 2 月。

战后不久华工总会还出版过一份带有左翼色彩的《侨讯》半月刊，读者对象为旅法华侨工人。该刊一般每月出版两至三期（视经济情况而定），销数不逾千。此外还有 1947 年出版的《和平呼声》只出版 9 期；1953 年至 1957 年刊行的《侨众》月刊；1973 年至 1974 年出版的《欧洲评论》等，由于发行量小，又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一般都难以长久生存。

德国是欧洲最早出现华文报刊的地方。据学者考证，早在 19 世纪末期，柏林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德国学者在华人的协助下，就出版过一份介绍德国情况的中文刊物《日国》（即日尔曼之意）

1945 年 5 月，德国法西斯在同盟国军队的打击下彻底失败，随后苏、美、英、法对其进行了 4 年的军事管制。1949 年 9 月 20 日，美、英、法管制下的西部地区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 10 月 7 日，苏联管制下的东部地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此后的 40 年里，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直到 1990 年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整个德国才重归统一。战后，联邦德国先后有《和平报》、《出谷月报》和《西德侨讯》等华文刊物发行。《和平报》出版了 27 期，《出谷月报》和《西德侨讯》只出版了 4 期便夭折了。此后，直到 1959 年才由亲台华侨编辑出版了《自由亚洲》但不久也告停刊。

在英国，1946 年 1 月利物浦中华建国协进社编辑出版了《建国周刊》。此后的十几年，一直未见新刊出版。直到 1958 年 2 月，才出现了一份通讯性质的油印刊物《自由中国新闻》，每周出一期。与它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份《中国新闻》，也是油印通讯性期刊。前者着重刊登台湾官方发布的宣传稿，后者单纯报道中国大陆的新闻，泾渭分明。

欧洲国家战后一二十年内出版的这些华文报刊，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到 70 年代之前已先后停刊，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的华

文报刊。

这一时期的海外华语广播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继 1933 年 4 月 30 日檀香山“华人播音局”播出粤语节目以及 1933 年 5 月 1 日华人彭爱贤设立的檀华播音社（1935 年停办）开播之后，1939 年 4 月 22 日，祖籍广东恩平华人唐宪才，在美国旧金山创办了金星广播电台，每天播出 1 小时广东话节目，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唐宪才于 1977 年退休后，该台才随之停办。可以说，它是美国华人社会历史最悠久的无线电台。美国加州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洛杉矶，50 年代中期开始兴办华语广播。1955 年 2 月，华人余进源在洛杉矶创办了广州话广播机构华钟广播电台，但由于缺乏广告收入，于当年 11 月停办。其后，1963 年至 1967 年，余进源又与香港人文毓明合作，再办钟声广播电台，但每次都是经营一两年便停办。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也是五六十年代才开始兴办华语广播的，1951 年，华人雷庭坚与西方人士莱尔·斯图尔特（Lyle Stuart）合作，在纽约创办华、英语广播，不久停办。1964 年，华人江涤氛在纽约创办了华语广播机构中华广播公司。^①

在东南亚，创办华语广播电台较早的国家是马来亚。还是在 1935 年，它就开始试办华语电台，1937 年正式开播。40 年代后期，英国海外传播公司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创办了“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新加坡的“丽的呼声”电台华语节目于 1949 年启播，随后在马来亚其他城市也相继建台。马来亚早期设有金、银两家电台，使用广东话和福建方言，每天播出 18 小时。新、马独立后该台股权分别转为当地公司所有。马来亚“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私人有限公司”的 1 台节目以汉语普通话、广东话为主，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 220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2 台以英语、马来语、汉语方言（厦门话、潮州话、广州话）为主。泰国的“丽的呼声”广播电台使用潮州话播音。该台后来转归政府民联厅管理。

第二节从华侨报刊到华人报刊的历史性转变

二战结束后，从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中期，华侨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首先，东南亚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开始着手解决外侨问题。这些国家往往采取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外侨（主要是华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祖居国和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次是“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909 年清政府颁布的《国籍法》（草案）以及 1914 年、1929 年由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先后修订的《国籍》，均取“父系血统主义”的原则，认为只要父亲是中国人，其子女无论居住何地，均为中国人。而印尼等国的《国籍法》则取“出生地主义”原则，认为出生在哪里，即为哪个国家的公民。这就是“双重国籍”问题产生的根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着手解决此问题。1955 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凡属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人，都可根据本人的志愿，在两国国籍中选择一种；而如果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就自然丧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尔后，中国政府按此政策解决了周边一些国家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由于棘手的“双重国籍”问题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华侨审时度势，从长远利益出发，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该国公民（称华人）。虽然这一时期还有中国人出国定居，老华侨中也有许多人保留中国国籍，因

此还不能断言华侨“消亡”，但传统的华侨社会正在向华人社会过渡，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随着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海外华文新闻业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性质的变化。

战后初期，由于海外华侨均持有中国护照或具有双重国籍，因此华文报刊中虽有如同美国《金山时报》那样的华裔公民创办的报刊，但总体上仍以华侨报刊为主。经过 50 年代中后期以及后来的嬗变，大多数海外华文报刊逐渐由中国人在外国办的报刊变为纯粹的外国报刊。当然，不同地区变化程度有所不同。

在东南亚仍有华文报刊出版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由于其法律规定不许外国人办报，全部华文报刊的所有权已转归各该国公民或官民合营的公司，华侨报刊不复存在。例如在马来亚，华侨获得公民权的可能性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宣布独立）成为现实，这之后，历史悠久的华侨报纸《光华日报》率先改换面目，宣示“新姿”，其他原与台湾当局有联系的华侨报纸也纷纷对台声明，改为马来亚报纸。新加坡数十万华人通过登记成为当地公民（1958 年）并参加第一次大选（1959 年），被《星洲日报》视为“侨报地位随之蜕变”^①的标志。新加坡学者进而指出，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历史从 1959 年成立自治邦起，开始由“侨民报刊时期”进入“国民报刊时期”。^② 菲律宾于 1946 年 7 月宣布独立后，由于政策多变，华人入籍进程缓慢。直到 1975 年马科斯总统放宽和简化华侨入籍手续后，华人中的绝大部分（90% 以上）才转而成为菲国公民，华文报刊作为

^①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 40 页，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第 271 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5。

华人喉舌而存在的现实也才变得明朗起来。70年代以后马尼拉新创办的华文报纸如《联合日报》、《东方日报》、《世界日报》、《菲华周报》等，就都以菲籍公民为注册人了。

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华文报刊性质的变化还与这些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陆续颁布了一批旨在限制华文报刊出版的法规、命令。例如新加坡从1972年起多次修订“报章和印刷馆法令”，规定报业公司的所有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公司接受外国资金必须经过政府批准。马来西亚于1975年修订的印刷业法令，规定非大马公民不准拥有、把持或控制印务局或报章的全部或部分资本、股票、资产或其他权益。在菲律宾也有“报纸持牌人必须是菲籍公民”的规定。泰国当局则于1970年颁布“管制外侨业务条例”，规定外侨不准经营印刷业和报业。^①这些文件的颁布，意味着华侨报刊历史的终结。

而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这些国家对外文报刊的管制相对比较少，不存在由华侨报刊向华人报刊转变的强制性的过程。即使其华文报刊的多数已变成由当地华人出面注册的出版物，但是由留学生或持“绿卡”者主办的华侨报刊也并没有绝迹。其次，这些国家由华侨报刊向华人报刊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随着传统报刊的消亡和新创报刊的出现逐渐完成的。以美国为例，据统计，从1946年到1970年，美国停刊的日报有9家，改组的有3家。^②也就是说，在各种因素的统合作用下，原有的报刊（华侨报刊）已

^① 转引自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41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20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376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

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大幅度放宽华人移民限制法案（1965年）的实施，申请人籍者数量大增，至1970年，全美华侨、华人人口已增加到431583人（1960年计有237292人）^①与早期华侨不同，新移民多以“落地生根”为目标，与此相应，他们所办的报刊在方针、内容上一开始就具有华人报刊的特点，并且随着主办人的入籍、定居，其报刊在法律上也成为由华裔公民登记注册的华人出版物。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相继采取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华人人口大幅度增长，其报刊的发展也呈现出与美国类似的情形。

第二，职能的变化。

历史遗留的“双重国籍”问题解决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便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早在1956年，廖承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即指出：“加入侨居国国籍的人”，“名称上已不能叫华侨了”，他们“自然应当忠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和人民，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服务，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建设，使他们国家繁荣富强，并促进和中国的友好”。随着华人“使命”的转变，华文报刊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华侨报刊大都以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传播中华文化、传递家乡信息、促进侨社团结、维护侨胞利益为宗旨，这与老华侨们“落叶归根”的心态是一致的。华人报刊则侧重于向华人灌输其所在国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介绍所在国的各种法律规定、政策措施，以帮助华人“落地生根”，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与这一重大转变相伴的是双语版报刊的兴起。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战后很少有新移民的补充，华文报刊的读者群已经由以

^① 转引自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第22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老华侨为主转变为以当地出生的华裔为主。而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子弟中懂中文的越来越少，对华文信息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在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形出现。例如在美国，土生华人在华侨、华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19世纪中期约为1%，1900年为10%，1910年为21%，1920年为30%，1930年为41%，1940年为52%，1960年达61%，^①其速度大约为每年增长10%。而土生华人的汉语能力也不容乐观。针对这种情况，华人报刊纷纷推出双语版。仅60年代初期出现的双语版报刊就有：印尼的《社会报》有中、印文报；菲律宾的《晨报》（马尼拉）有英文版；美国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有中、英文版，《少年中国晨报》有英文版；墨西哥的《侨声月报》有西班牙语版；苏利南的《南风日报》有荷文版；韩国的《韩华时报》有韩文版。上述双语版报刊分两种类型，一类以《韩华日报》为代表，即在华文版的基础上增加当地语文版，其内容大体相同，有如华文版的译文版；另一类以《少年中国晨报》为代表，即另出周刊或期刊，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刊物，其内容是对华文版的延伸或拓展（由于《少年中国晨报》是反共的，因而对大陆有许多攻击性的言论）。在华文报刊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双语版报刊的推出具有重要意义。它首先有助于敦亲睦邻，加速华人社会本地化的过程；其次有助于增进所在国朝野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此外它对不懂中文，却又希望了解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华裔子弟，可以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第三，内容的变化。

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海外侨胞与祖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讨袁、北

^①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1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对华侨社会以至华文报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抗战期间，几乎所有的侨团和侨报都卷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捐资筹款、抵制日货、回国参军参战等成为当时的主要议题。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影响到海外，使得海外华文报刊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二战以后，从全球的角度看，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并相继进入了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实现了本地化。与此相应，华文报刊也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政治色彩日渐淡化，这与华人角色定位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华人已不能像从前一样过多地投入中国的政治纷争而漠视所在国社会的发展，他们必须立足本国，融入当地国民经济的主流中去。适应这种要求，华文报刊也转而“在商言商”，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当然，在多极的世界格局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超凡脱俗的报刊是没有的，作为华人的舆论机构，它们或多或少总会有各自的信仰、宗旨和政治倾向性，但与前相比，其政治性的内容已经大为减少了。二是关注焦点由中国转向本国。新加坡学者王慷鼎将华文报刊特有的常用词分为“国字头”的（如祖国、国庆、国货等）、“侨字头”的（如华侨、侨胞、侨团等）和“华字头”的（如华人、华教、华校等）三种。按照他对《星洲日报》从1945年到1959年社论标题中上述词汇变化的统计分析可见，“国字头”词汇从1953年以后就不再出现，而“侨字头”词汇的减少和“华字头”词汇的增多并从1954年起完全取代“侨字头”，则反映了“华文报章侨民意识与当地国民意识此落彼长，交相嬗变

的轨迹”。^①事实正是如此，传统的华侨报刊一直把中国新闻作为关注焦点，报道量很大，除要闻版以中国新闻为主外，往往还设有国内通讯、闽粤新闻以至潮梅新闻等专版，其总量大约占到新闻版面的一半以上；社论也以中国问题为中心阐幽发微，数量占绝对优势。华侨报刊转变为华人报刊后，由于中国问题已不再是“国内问题”，报道和评论的篇幅和数量都大为减少。以新加坡《南洋商报》为例，据统计，该报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 1946 年占社论总数的 69.7%，1950 年下降到 22.5%，1953 年降至 2.4%。相反，有关新、马的社论则逐渐增加。1946 年只占 19%，1959 年则多达 84%。^②这一时期，除少数报纸仍有中国版外，大部分报纸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报纸很少有在要闻版之外设中国新闻版的。许多报纸把中国问题放在“国际新闻”、“东亚新闻”版中，或分别放置在“综合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等版面上。

正因为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海外华文报刊发生了以上几方面的变化，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已不再属于中国新闻事业的范畴，而成为所在国新闻事业的一部分。当然，华人报刊是从华侨报刊演变而来的，它与华侨报刊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价值判断标准，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因此可以说，尽管这些报刊在法律上已成为所在国的报刊，成为地地道道的外国出版物，但是它们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却没有被切断，为当地华侨、华人服务，绵延中华文化仍然是它们的使命。就像外籍华人是中国人的亲戚一样，华文报刊也是中国报刊最亲近的族

^① 转引自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 40 页，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第 243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

系。

这一时期还存在着一批华侨报刊和留学生报刊。如果以主办人的国籍而论，它们可以被划入中国报刊一类，但是如果从出版物的管辖权、出版运作的外部环境等方面看，它们就不能被视为中国报刊了。因为它们同华人报刊甚至同纯粹的外国报刊一样，其出版活动不能越出所在国政治法治的轨道。否则，对它们的惩处随时有可能发生，而中国政府却无能为力。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及意义

战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乃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期，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诡谲多变之时。这些变化不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海外华侨及其报刊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一时期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在于：

首先，政治分野鲜明。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文传媒一度从党派政争中挣脱出来，形成了空前一致的民族舆论。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国内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遂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盘据台湾，海峡两岸形成持续经年的对峙状态。中国政局的变动直接影响着海外华侨、华人及其报刊，使之同样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营垒。拥蒋亲台报刊一般由国民党海外部、国民党驻各国支部以及台独分子（也有一些亲台侨商）创办，它们多采用美联社、中央社的电讯稿，大量刊登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在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问题上持反共立场。拥护共产党的报刊一般由民主人士、进步侨商创办，它们多引用新华社和中新社的

电讯稿，较多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决策，并与前述报刊展开论战。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前一类报刊在海外华文报刊中占多数。例如 50 年代美国新创办的华文报刊均以反共为基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则受到迫害。在加拿大，原有的报刊多为国民党控制，新办报刊的大部分也受控于台湾当局。日本等国华文报刊的情形也是如此。直到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亲大陆的华文报纸才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才能与亲台报刊抗衡并逐步占据优势。华侨报刊衍变为华人报刊后，尽管其政治色彩日渐淡化，对中国的报道也在减少，但是政治倾向性却没有消除，有些时候反而更加明显。例如亲台的《少年中国晨报》在阐述其增出英文版的意义时，除了强调它具有沟通中西文化、帮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作用之外，还指出：“我人以反攻复国为当前最大之任务”，“本刊……增发英文周刊，展开国际宣传工作，以争取国际尤其是美国支持与协助，进军大陆，群策群力，齐一步骤，向前迈进”。该报的这种反共立场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直到 80 年代末期，“北京和台北才从‘骂战’时代走上开明客观的路线”。^①

第二，华人报刊成为主体。

这一时期，由于东南亚各国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推行民族化的政策，致使这些国家华文报刊的主持人大多转而加入当地国籍，华侨报刊也因此失去“侨”的性质，成为当地华裔公民主办的传播媒介。由华侨报刊向华人报刊的转变，是海外华文报刊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从中国的角度看，它们已不再是中国人在国外出版的报刊，而成为各所在国拥有的报刊；从所在国的角度

^① 美国《华语快报》记者语。转引自山林：《海外华文报刊纵横谈》，《对外报道业务》，1987 年 1 期。

看，它们也已不再是外国报刊，而成为由本国公民出版的汉民族语言的报刊。作为所在国的公民，华人享有与当地民众同样的公民权利，其言论出版自由受到所在国法律的保护，对他们的各种控制和限禁相应减少，以前因对华政策的变化侨报动辄被封闭情形也基本上不存在了（印尼等国例外）。这就使华人报刊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的空间，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报业的稳定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首先，报纸的寿命延长。侨报时期的一个特点是，报纸大都具有临时性，旋办旋停，寿命较长的寥寥无几。华人报纸则不同。由于有了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寿命长达 10 年、20 年的报刊已不少见，有些报刊甚至从那时起延续至今。如 50 年代在泰国创办的《星暹日报》、《世界日报》，40 年代在美国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联合日报》等历时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在出版。其次，报业规模有所扩大。随着出版环境的改善，50 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华文报纸，如 1950 年星系报业在泰国创办的《星暹日报》、《星泰晚报》，60 年代星系报业在吉隆坡出版的《星洲日报》马来西亚版以及 70 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等，它们在资金、人才、设备、发行量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再次，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过去的侨报许多靠资助或捐赠维持，由政党，特别是国民党津贴的也不在少数。国民党当局改变在海外办党报的政策后，尤其是华文报纸本地化以后，报刊的生存问题就变得愈加突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报纸淡化政治色彩，更多关注当地社情，增加内容的可读性，以吸引读者，扩大报份，争取广告。有些报纸还通过内部改组、设备更新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第三，华文报刊的分布范围发生了变化。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动及其反华、排华浪潮的兴起，一大批华文报刊被封闭。例如 60 年代中期，在华侨报业一度相当兴盛的缅甸，军政府下令将包括

华文报刊在内的所有外侨报刊全部关闭；柬埔寨、老挝的华文报刊也于 70 年代中期和后期销声匿迹；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后，印尼政府下令关闭了所有的华文报刊，只留下一家官办报纸继续出版；越南亦是如此，70 年代以后只有政府创办的一家越文报纸的中文版一息尚存。而在北美等地，由于政府采取放宽移民限制的政策，华人人口数目大为增加。如美国华人人数 20 多年来以年平均 3.3 万人的速度增长：1960 年为 237292 人，1970 年为 431583 人，1985 年达 1079000 人。他们中多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也有来自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此外还有几十万印度支那华裔难民。与战前华侨（称旧侨，十之八九为粤籍）不同，战后新入境的华人各籍各省都有，不再是粤侨居多，以教育水平而论，新侨也略胜旧侨。这就为华文报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由于出现了上述变化，50 年代以后华文报刊的分布情况比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已经由东南亚地区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有数字为证。据统计，从 1945 年 8 月至 1959 年底，海外发行的华文报刊共计 423 种（报纸 200 种，期刊 223 种），而东南亚国家就有 340 种（报纸 159 种，期刊 181 种），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 80.38%。1970 年到 1979 年，海外华文报刊总数为 419 种（报纸 121 种，期刊 298 种）东南亚国家有 232 种（报纸 75 种，期刊 157 种），占总数的 55% 美国和加拿大有 142 种（报纸 28 种，期刊 114 种），占总数的 34%。^① 除北美之外，澳洲和欧洲的报刊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比例数有所上升。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在华文报刊总数中仍占有较高的比例，主要是因为占华人人口总数半数以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四国的华文报刊经历蜕变后获

^① 方曙：《海外中文报业话沧桑》，载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1980。

得了稳定的发展。

第四，新的传播手段出现。

这一时期，一些华文报刊在有关国际事件和国内新闻的报道上，已开始采用世界性通讯社和国内新闻通讯社的新闻稿，这就大大缓解了因办报人才短缺、采编力量薄弱而造成的新闻来源不足、报纸内容单调的状况，为报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专门为海外华文报刊提供信息服务的通讯社也于此时建立。中国新闻社就是一个。中新社成立于 1952 年（由海外归来的著名报人金仲华、胡愈之发起建立，金仲华任第一任社长，胡愈之一直担任理事），它的宗旨是“为海外华侨服务，向他们介绍新中国，向海外和港澳华文报纸、华侨社团广播纪录新闻”。^①到了 70 年代，中新社的服务对象已从海外华侨发展到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外籍华人等 4 种人了。据 1982 年中新社成立 30 周年时的统计，全世界有 180 多家海外华文报刊采用该社的电讯、专稿和图片稿。它们分布在亚洲、北美、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港澳地区。这一时期，尽管还有一些油印或石印的华文报刊出版（如帝汶的《侨声》、墨西哥的《侨声月报》、法国的《三民导报》等），但现代化的电子传播媒体也开始进入应用阶段，出现了一些由华人独立经营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纽约的华语广播电台，温哥华的华侨之声广播电台，菲律宾“大东广播社”等。这说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因为电子传播媒体与印刷媒体不同，它通过电子信号传递信息，为此需要采取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装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是不可想见的。如创办温哥华的华侨之声广播电台的香港移民刘恒信就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除了办广播，还经营旅游业，举办华文教学班、幼儿教育班和

^① 山林：《海外华文报刊纵横谈》，《对外报道业务》，1987 年 1 期。

代理房产出租、维修、管理等业务，而这一切都需要较大的投入。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华语广播电台的出现，还与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融入当地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各国的广播、电视均被置于当地政府的控制之下，外侨很难涉足，即便是新闻性的电影事业，也较多受到限制，外侨不易经营。只有实现了由华侨到华人的转变，他们才具有了在所在国创办广播电视事业的权利，他们的新闻活动才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文报纸最突出的特征是由华侨报纸向华人报纸的转变，而它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因为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果可以对此前华文报刊的历史做一个总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华民族新闻事业的一部分，海外华侨报刊与祖国同属一体，紧密联系，利害相关，休戚与共。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报纸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华侨报纸强烈的回应。华文报刊也便在这种联系中获得发展。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海外华文报刊的大论战，掀起了华文报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当时先后卷入论战的华文报刊数逾 80 家之众，地区广及四大洲（非洲除外）；抗日战争促进了华文报刊的大发展，使它形成了第二次高潮，老的报刊大有所为，新的报刊应运而生，形成了蓬勃之势；二战结束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文报刊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海峡两岸都在努力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以扩大影响，增强力量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华侨报刊转变为华人报刊后，其性质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职能的一部分却没有改变，即促进中外文化传播交流与中外民族团结合作——无论是亲大陆还是亲台的华文报刊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由于这些报刊已作为当地报刊而“深入腹地”，因此可以说，它们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方面的作用更为重大，意义更加深远。尤其是

各类华人外文报刊和华文报刊外文版的创办和设立。正如丘正欧 1965 年 2 月在由台北出版的《华侨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华侨新闻事业主要任务之一，为促进中外文化传播交流与中外民族亲善合作。惟欲达成此项任务，并非经由中文报业可以办到，必须创办适于外人阅读之外文报刊，始有希望。因此，华侨外文报刊之创办，亦属必要”。事实正是如此，华文报刊当地语文版的开设，为当地官民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开辟了一扇扇窗口，同时使他们认识到华人对当地经济繁荣所作的贡献。而这样的效果是我们自己的报纸难以达到的。

第六章

改革开放至 80 年代末期的 海外华文新闻业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会议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此之后，党中央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及其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引起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加之 1978 年以后，中国全面恢复外派留学生的的工作，使得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留学人员的接踵而至，使华文报刊的读者群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的加盟，也使亲大陆报刊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大陆推行开放政策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在积极推展它的海外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对亲台的华文报刊进行游资灌注。据统计，80 年代以来，台侨委会每年用于海外宣传事业的经费高达 3000 万美元。^① 尽管如此，亲台报纸普遍存在经营

^① 万小穗：《浅谈海外华文报业》，载《侨务工作研究》，1987 年 3 期。

不善，报份较低，读者日趋减少的问题。在亲大陆报纸和亲台报纸之间，还出现了一大批持中间立场的报纸（约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它们或独资、集资兴办，或得益于当地某个财团的支持，故有一定的生存能力，经营状况较好。总之，战后亲台华报长期占压倒优势局面此时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亲大陆报纸的崛起，海外华文报刊左、中、右“三分天下”格局已初步形成。

第一节改革开放后的亚洲华文传媒

这一节主要介绍华文报刊尚存的东南亚四国独立以后（新、马独立后，泰、菲则是七八十年代局势稳定后）华文新闻业发展的情况以及改革开放至 80 年代末期日本华文新闻业的情况。

一、东南亚四国

这一时期，占海外华人人口总数半数以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四国仍旧是海外华文报业的重镇，其华文报刊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有数据显示，从 1945 年到 1949 年，这四个国家华文报刊的总数为 214 种，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 50.59%；到 1980 年上半年，其报刊总数为 123 种，所占份额反而上升为 58.29%，可见稳中有升。

（一）新加坡

1959 年 6 月，新加坡成立自治邦，1963 年 9 月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1965 年 8 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新加坡独立初期华文日报仍维持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大报为主的格局。1967 年，由梁润之、查良镛合办的《新明日报》创刊，该报以丰富多彩的新闻和灵活的编排方式，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短短 5 年的时间内在新马的销量突破 15 万份。

从而使新加坡华文报业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为了使新闻媒体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从 70 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新闻业的管理。1972 年，政府将原殖民政府制定的有关报章法令修订后公布，1974 年再次予以修订，称新加坡报章法令（1977 年、1986 年、1988 年和 1990 年先后四次修改）。该法令规定，报业公司所有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这就排除了非新加坡公民办报的可能性。法令还规定，报业公司必须公开挂牌出售股份，任何个人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 3%，这又排除了个人或家族独立办报的可能性。依照这一法令，《南洋商报》于 1975 年 2 月改称南洋报社（新加坡）有限公司，并于 1977 年 9 月公开发售股票，正式挂牌交易。《星洲日报》也于 1975 年 4 月改名为星洲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并于 1977 年 10 月公开发售股票，正式挂牌交易。这样一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家大报就由家族企业变为公共公司。

从 1982 年起，新加坡报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动。1982 年 4 月 20 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文告，宣布对全国报业进行重大调整，要点是：将《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一家控股公司；《海峡时报》集团停办《新国家报》，另外出版一份华文午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所控制的英文《新加坡箴言报》借用 New Nation 的报名出版，为期一年。

根据上述决定，《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家报社于 1982 年 5 月合并，定名为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翌年 3 月，两家报纸合刊为《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南洋商报》原先出版的《快报》先是改为周末版，不久即并入《联合晚报》。1982 年 7 月，新加坡箴言报有限公司按规定出版《新国家报》，至 11 月又改名为《新报》（1985 年 7 月因亏损过多停刊）。以上三家报纸《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报》又合办了一份以

学生为对象的小报《新一代》，随三报附送，以培养学生阅读华文的习惯。1986年1月，该报也并入《联合晚报》。

1984年7月，新加坡报业结构又出现新的变动。在政府的推动下，当时并存的三家出版公司——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海峡时报有限公司以及时报出版有限公司联合组成报业集团，名为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td. SPH）。三家公司发表的联合公告宣布合并的理由是：1、避免各自庞大的常年开支和额外资本开支；2、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出版机构，集中人力和财力资源，争取资讯领域的新的发展机会；3、为不同语文的报章建立共同的理想，继续提高报纸的内容水平。^①8月4日该公司正式成立，建立了10人董事会，推举了高层领导人，委任了各家子公司的负责人。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版机构，政府拥有全部股份的60%，公司股票进入市场，市民均可购买，但每人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3%。1990年3月19日，控股公司进行结构改组，全公司分成四个集团，即英文及马来文报章集团、华文报集团、报章服务集团、广告市场集团，它们在总公司协调下分别开展活动。

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所属华文报集团情况如下：

华文报集团出版《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星期5周报》四种报纸。共有从业人员400多人，其中55%拥有大专以上学历，40岁以下的超过半数。以上四家报纸除了遵循集团所制定的一般编务方针和原则外，其编辑部的业务都是独立的，各报既协作又相互竞争。

《联合早报》（Lianhe Zaobao）：全称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83年3月16日开始出版。初期由莫理光（Mok Lee

^① 转引自张允若：《新加坡报业十五年》，《国际新闻界》1997年2期。

Kwang, 1925 -)、黎德源 (Loy Teck Juan 1940 - 1995) 分别担任第一和第二总编辑, 聘请老报人钟文苓 (Chung Wen Ling, 1920 -) 担任编务顾问, 郑民威 (Tay Bin Wee) 为编务协调。1986 年 2 月, 莫氏调任培训与评估部顾问后, 黎德源升任总编辑。1993 年 12 月黎氏卸任后, 由林任君 (Lim Jim Koon) 继任总编辑。

该报是新加坡惟一一份上午出版的华文日报。每天分两次印刷。第一次在夜间 10 时左右出报上市, 第二次在清晨印刷, 刊出最新的要闻。日出对开 16 张 64 版, 最多时出版 18 张 72 版。广告约占 20 版。正文采用简体字横排, 字体用新 5 号宋体。版面内容包括重要新闻、国际新闻、新加坡新闻、马来西亚新闻、东亚新闻、亚细安新闻等, 同时设有财经新闻、天下事、大马财经、亚太经济、体育、影视、现代生活、马经快讯、服务、交流 (读者来函分析)、天窗亮话 (市民反映) 等专版, 以及风土志、四面八方、茶馆、艺苑、青草地 (少年习作)、文艺城、小说精品、联合学生、饮食天地、现代生活等 20 多种副刊。该报的特点是: 一方面提供全面的综合性新闻, 一方面加强本地社区、华人社会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的报道, 这是其他语种报纸所不及的。在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港的消息时, 该报采取客观温和的立场, 尽量指陈事实, 不作偏激性的结论; 有关通讯、评述、资料以及电讯多采用西方通讯社的新闻稿或由自己派驻国外的特派员撰写的稿件。从 1987 年 11 月 1 日起, 该报每星期天出版《早报周刊》, 颇受读者欢迎。为了扩大新闻和特稿来源, 报纸同境外新闻机构, 特别是中国大陆、港、台、马来西亚的新闻机构建立了各种业务关系, 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驻有特派员, 在中国大陆、港、日、美、德、法等地聘有特约专栏作者。该报与其他华文报纸一起为推广华语华文、发扬华族文化做了不少工作, 例如举办两年一度的华文书籍“金狮奖”颁奖活动和国际华文文艺营、一年一度的世界华文书展、每年迎新春的大型春节活动以及

“华族文化节”活动等。该报至 80 年代初期逐步采用电脑排版，至 90 年代初采、编、印刷全过程已实现电脑化，是全世界最早“告别纸与笔”的华文报纸。

《联合晚报》（Lianhe Wanbao）：全称为《南洋·星洲联合晚报》，1983 年 3 月 16 日开始出版，总编辑为陈正（Chen Cheng, 1937-）。该报创刊号上的《告读者书》表明其使命是“传播现代知识，发扬传统文化”，并要“用轻松活泼的文字处理精彩的副刊”，“用浅白生动的文字报道国内外新闻”。日出对开纸 5 张 20 版。广告占 5 版以上。版面用 5 号仿宋简体字横排。该报除刊登发生于当天的本国政治、经济要闻以及中国、世界要闻外，偏重于文化娱乐及体育新闻，如歌坛舞榭盛事、艺人名伶轶闻，并配以彩色照片；辟有国内新闻、行情（当地经济版）、国际新闻、赛马、新一代、大特写、龙门阵、星辰（影视娱乐新闻）、体育、大马新闻、工商之家、文艺、青春、社团天地、美食家、健康生活、小说连载、娱乐消闲等专版。还曾附送学生副刊——《新一代》。该报新闻简洁，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流畅，版面设计醒目多变，形成了晚报的独特风格，与早报相辅相成。在技术方面，自 80 年代初期逐步采用电脑编排，至 90 年代初采、编、印刷全过程均实现电脑化。

《新明日报》（Shin Min Daily News）：1967 年 3 月 18 日创刊，报名中的“新明”二字取自梁润之所办《新生日报》之“新”和查良镛在香港所办《明报》之“明”。该报初期由梁氏任董事主席，查氏任副董事主席兼社长，潘洁夫任督印兼总编辑，潘粤生为执行总编辑。1968 年潘氏离任后，聘请曾担任香港《益世报》编辑部主任和《明报》总编辑的钟文苓任总编辑。该报初期日出对开纸 5-6 张，广告约占一半篇幅。报纸采取新闻与副刊并重的方针。新闻包括本国新闻、国际新闻、大马新闻、财经新闻等，但以本国新闻为主，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新闻、文化体

育新闻和娱乐消息；国际新闻版以刊登中国大陆消息为多，港台新闻多编发自西方通讯社电讯。副刊以富有趣味性的史地艺林掌故见长，而且每日连载引人入胜的武侠言情小说（其中不少佳作出自金庸之手），吸引了不少读者。该报初创时发行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各为 2000 多份，以后逐年提高，第三年便赢利。1987 年并入海峡时报集团。

《星期 5 周报》（Friday Weekly）：1991 年 2 月 22 日创刊。首任主编杜艳嫦（Toh Yim Seong）。该报是新加坡惟一的华文学生报，每期出 4 开纸 6 张 24 版，全部彩色印刷。其宗旨是“欲使华文成为新加坡华人生活中的一股推动力，使新加坡华族子弟尽早养成阅读华文报章的习惯”。内容包括校园新闻，人物专访，娱乐报道，文化、体育消息，科幻小品，编辑与读者对话，嘉华舞会及漫画等。为了适应华文地位日益提高、学习华文者人数不断增加的需要，该报于 1995 年 3 月 31 日开始推出改革版。内容增加了具体实用的语文练习题和学生们感兴趣的电脑游戏。在编排方面，封面、目录均改用较大字体，采用开放式设计，使版面更加鲜明美观。新增栏目有“语文进补”、“电脑科技专栏”、“邮差按铃”、“你来我往”等。主编后由林春兰接任。

据 1996 年的统计数据，新加坡华文报纸的销量，《联合早报》日平均为 20.6 万份，《联合晚报》为 12.8 万份，《新明日报》为 11.1 万份，3 份日报的平均总销量为 45 万份。此外《星期 5 周报》发行 5.4 万份。华文报的读者超过 110 万人。

英文马来文报章集团拥有的报纸有《海峡时报》（英文）、《商业时报》（英文）、《新报》（英文）、《每日新闻》（马来文），此外还有一些英文杂志。英文是新加坡的官方用语，广泛使用于政界和商界。上层社会大都订阅英文报纸，一般民众除了阅读一份本民族语文报纸外，往往也要读英文报纸作为补充。而且这种趋势正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而发展。

新加坡报纸十分重视广告经营，广告收入相当可观。华文报集团的广告额，1983年为6400万新元，1993年为1.25亿新元，10年增长了95%。国家规定广告版面不得超过报纸总版面的二分之一，实际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广告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有商品广告，还有出租求购、招聘求职、贺词挽词等，形式也多种多样。

新加坡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和控制是相当严格的。它明确规定报刊不得从事危及政权和政局稳定的宣传，不准宣传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政府鼓励报纸在恪守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对政府官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但大选前一个时期不得发表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意见。对于涉外关系的敏感问题和政府已作出的决议，则不允许擅自发表议论。新加坡政府有一套管理传播媒介的比较完备的体制，除了多次修订的《新加坡报章法令》之外，与新闻有关的法律还有新加坡基本法、国内安全法、不良出版物管理法、煽动法等。

在仍有中文报出版的东南亚4国中，按人口比例计算，新加坡的华文报业、出版事业最为发达。在这个素有“东南亚汉学中心”之称的国度里，华文被规定为第二语文。政府提倡学习和使用华语，华文社团和华文报业也经常举办诸如华人书展、中国书画展、集邮展、文艺公演等全面性的推广活动，这使华文报纸、杂志在新加坡的新闻传播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马来西亚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与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成立后，大多数华人在法律规定下成为本国公民。许多报纸，如历史悠久的《光华日报》等先后宣布自己“由马来亚华侨的报纸，变成为马来亚华人的报纸”。马来西亚政府也于

1975 年修订印刷业法令，规定非大马公民不许拥有、把持或控制印务局乃至报章的全部或部分资本、股票、资产或其他权益。此后马来西亚便再无华侨报纸。

这一时期的华文报刊呈现出以下特点：1、各报均以宣传本国（马来西亚）政府的方针政策、维护华族利益、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为宗旨，在行文遣词上也表现出与前不同的特点。如《南洋商报》（马）称其宗旨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使华裔同胞了解国家的政策和政府的方针，使华族能及时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光华日报》的编辑方针是“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政府桥梁，沟通民意，致力促进全民团结，亲善和谐”。各报所称之“我国”、“我政府”都是指马来西亚。2、在新闻的处理上，突出当地新闻。本国新闻约占全部新闻的 80%，国际新闻占 20%，中国新闻只是作为国际新闻的一部分而存在，且篇幅很少。3、除华族人士外，有些政党和非华人也创办华文报刊。如《沙巴时报》是当地“巫统”首领、马来人唐纳·史蒂芬所办；古晋的《团结报》是沙捞越人民联合党的机关报。

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60 年代后半期）到 70 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新创办的华文报刊为数不少，计约三四十种。其中有 1966 年陈英庚在马六甲创办的《华商报》（半月刊）；1967 年 3 月 20 日原新加坡《新明日报》马来版在吉隆坡的出版；1968 年黄文彬创办的《国际时报》、丘扬洲创办的《自由日报》及《马来西亚日报》等。60 年代还创办了两份期刊，即由少年乐园社出版的《少年乐园》和由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在槟城出版的《经济季刊》等。70 年代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刊因经济困难呈现出大起大落之势。这一时期先后创办的报刊有：在吉隆坡出版的月刊《妇女》、《斗士》、《先生》、《风采》、《商海》、《一友》、《热门》周二刊《新生活报》半月刊《新潮》、《小读者》、《好学生》，季刊《跑道》、《写作人》等；在古晋出版的《沙捞越晚

报)、《沙捞越周报》、《人民论坛报》(1978年8月1日改名为《民报》)、《人民之声》、《世界特刊》(1976年11月10日改名《世界早报》)、《学生月刊》在诗巫出版的《大众报》以及在沙巴出版的《亚洲时报》等。

整个8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当局推行马来语优先政策,造成华裔子弟识汉字的日益减少。据1987年3月11日沙巴《华侨日报》披露:“华文报的读者由1981年的154.6万人增至1986年的167.3万人”,而马来文报读者“则由1981年的157.7万人增至1986年的234万人”,^①可见马来西亚华文报读者增长率远远落后于马来文报。除了受政府政策的影响,马来西亚华文报刊还要面对经济不景气带来的财政困难,因此其发展屡屡受挫。如《中国报》(1946年2月1日创刊)于1985年11月停刊半年多(后又复刊)历史悠久的《星报》(1939年1月1日创办于檳城)和《建国日报》(1940年创办于怡保,1975年改为全马报纸,迁往吉隆坡,由中央印务公司接办)于1986年先后倒闭。后两份报纸都是较为著名的全国性华文报纸。据统计,1987年,全马有华文日报22家,到1996年,只有16家。其中西马5家,东马11家。

西马的5家华文报纸是:

《南洋商报》:是全马销量最大、广告最多的华文报纸,也是当地华文报纸中盈利最多的一家。该报原为新加坡《南洋商报》(1923年创办)马来亚版,在新加坡印刷,运马来亚销售,产权归李氏家族(李有成、李茂成兄弟,其伯父李光前系陈嘉庚之婿)所有。至1962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5周年纪念日,《南洋

^① 转引自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第38页,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商报》吉隆坡办事处发展成为一家完全的报社，于是就在当地出版报纸，产权仍归李氏家族所有。1965年新、马“分家”后，在马来西亚实行的“马化”政策下，该报也于1969年与新加坡《南洋商报》完全分家，成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根据马来西亚印刷业法令，该报于1975年3月将30%的股权卖给马来西亚政府设立的“国家企业公司”（Pemas），另30%股权散售给马来西亚社会人士。1989年，该报被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为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中惟一的股票挂牌公司。以后股权几经变动，到1991年底，随着华资丰隆集团收购控制性股权，该报遂成为这个庞大集团中的一员。

该报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日报后，1972年首先采用简体字，并启用高斯柯式彩印机。1978年实现电脑植字，1979年把华文传统直排改为横排，1985年又添置新式电脑照排系统以及其他现代生产设备。为了加强在全马各地的采访和发行等业务，该报在全马各地开设了10个办事处。90年代初，该报每日出对开纸8张32版，必要时增至10张40版，星期日附送4开纸6张24版的《南洋周刊》。平日版内容包括要闻、马来西亚新闻、言论、国际新闻、新加坡新闻、东亚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娱乐、赛马。另有《南洋学生》、《新妇女》、《综合》、《风华》以及《南洋副刊》、《南洋文艺》、《小说天地》、《考试辅导》、《科技世界》、《医药保健》、《画页》、《服务》等每日出版或每周出一二次的专版。必要时，还会增加《特刊》和《特辑》版。1992年还出版了南洋教育和南洋女性双周刊，随报附送。此外还出版《淑女》杂志和《青苗》周刊。该报既是全马读者人数最多的华文报，也是所有非马来文报章中读者人数最多的报纸。1990年8月销售量为日均16.66万份。该报对中国的报道比较客观。

《星洲日报》原为新加坡《星洲日报》马来西亚版，1966年7月7日在吉隆坡设厂印刷出版，向全马发行。以后又逐步在

采访、编排等方面与新加坡分家，成为一份独立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改由“星”系报业（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经营。1975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布经修订的印刷业法令，由于该法令不允许外来资本投资当地新闻出版业，拥有《星洲日报》股权的胡氏家族便将该报放盘求售。1981年9月，槟城建筑商林庆金（Lim Kheng Kim, 1923 - ）买下该报和胡氏家族拥有的另一份报纸槟城《星槟日报》。此后的《星洲日报》经历了几番起伏跌宕，1987年因涉及报道某一敏感问题，被马来西亚政府勒令停刊。后经多方努力，由沙捞越木材业巨子张晓卿（Tiong Hiew King）出资购下该报，并于1988年4月8日复刊（张自任社长）。该报复刊后的宗旨是：“扮演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角色”，为读者“提供互通信息”和“表达心声便利”；推广教育、发扬文化和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在党派政治中“严守中立”。该报复刊时每天出对开纸6张至7张半，后增至10张40版，并从周一到周日附送增刊，周日还附送《儿童天地》。《星洲日报》内容包括要闻、国际新闻、新加坡新闻、综合要闻、国内新闻、东亚新闻、体育新闻等，栏目有“言路”、电视精华、工商财经、赛马、画页、娱乐等副刊有《小说》、《妇女》、《菜式食品》、《医药与健康》、《青春》、《星云》、《文艺》、《佛学》、《天下事》和《特稿专题》等。广告占全部篇幅的40%以上。自80年代末期起，该报增设电脑设备和彩色图页，印刷质量有了明显的改进，读者激增，销量增加，1991年达20多万份。

《中国报》是吉隆坡华文报纸中历史较悠久的，由马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长、著名华人李孝式（Lee Hau Shik, 1900 - 1988）于1946年2月1日创办，李担任该报历届董事主席直至逝世。1982年在庆祝该报创刊36周年时，李孝式重申报纸的宗旨是：“支持（马来西亚）政府政策，塑造一个统一、独立的马来西亚，促进各民族文化，加强各民族间的亲善关系，以便维持一个强盛

的国家。”1984年，该报负责人强调“新闻报道采取公平独立、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于“马华党争，本报在报道上采取中立”。该报初创时为对开2张半10版，至70年代增至每日出版对开4张至5张（16版到20版），星期日除增张外，还随报附送《中国报星期刊》（The China Press Sunday Edition）。以后版面逐步增加，90年代初期为日出对开7张28版。该报主要内容有社会和政坛要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工商新闻等，此外还有《南马电视》、《体育》、《封底头条》、《猛片开映》、《赛马》、《系列》、《连环画》、《娱乐全盒》、《无忌之谈》、《常春》、《消闲》、《醒目》、《画页》等副刊。80年代中期，年事已高的李孝式将报社董事主席一职交由次子李裕隆代行，不久李裕隆尊父命将该报股权出售，报纸遂转由闽籍出版商（也是该报主要股东）周瑞标接办。由于经济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周宣布该报于1985年11月23日停刊整顿，1986年5月1日先行出版《新晚报》，同年7月25日《中国报》复刊。复刊后周瑞标任社长，其长子周宝华任总经理，次子周宝振、三子周宝源加入董事会，总编辑为林通光。该报初期销量3万份，后来逐步增加到5万份、7万份、8万份……发行量仅次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居全马第三位。该报于1992年由南洋报社（马）有限公司收购，成为该报业集团两家日报之一。

《光华日报》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也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文报（1910年创办于檳城，由孙中山倡办）。该报于马来西亚独立之日起宣示由华侨报纸改为华人报纸，并将“超然的立场，公平的态度，无党无派，不偏不倚，惟知有益于人类，亦求无愧于良心”^①作为自己的办报宗旨。1975年董事会改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8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组，卢良山任董事主席，温之开任董事经理。70年代末期，每日出版对开纸5大张，周日出版7-8张，由过去主要行销北马扩展到行销整个马来西亚，日销接近3万份。1987年，销量达到8万份，1988年下半年，报纸宣布日销数突破10万份。1981年卢良山逝世，董事会推举槟城五金界殷商、金石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及多家公司董事王富金为主席，董事经理仍为温之开。90年代初每日出版对开纸8大张32版，内容主要有要闻、地方新闻、言论、经济、国际新闻、体育、娱乐、电视、综合新闻、赛马、读者之页等版面和《新风》、《茶与咖啡》、《星座》、《小说》等专刊、副刊。该报在国际新闻版刊登有关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的报道，有关中国的体育消息则经常刊登在体育版上。副刊也刊登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方面的稿件。

《光明日报》该报是以1986年9月29日停刊的《星报》的大部分员工为班底，于1987年12月18日在槟城创办的。它是马来西亚第一份由报社员工和商人合办的华文报。报社员工拥有30%的股权，其余股权则属于支持该报的华社殷商。1990年10月，金马扬油棕有限公司收购了该报的大部分股权（68%），报社领导机构亦重新改组。“金马扬”收购该报后，其宗旨一如从前即“作为一份民营报纸”，“绝不偏向任何政党”，“依全体读者及大众的利益为依归”。^①改组后每日出版对开纸8张32版，内容有要闻、本国新闻（占版面最多，通常10版）、国际新闻、经济新闻、经济广场、综合新闻、体育新闻、赛马等，此外还有6个版的专刊、副刊，包括《国语》、《大马风光》、《中国历史掌故》、《风物》、《茶馆》、《地下情》、《光明小说》、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88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读者来函》、《教育》等。广告 10-15 版不等。对中国大陆新闻的报道，多采用西方通讯社的电讯稿，或用“综合电报道”、“北京电”、“香港电”等电头。也刊登中国旅游景点的彩色图片专辑。1992 年 12 月，沙捞越木材业巨子张晓卿麾下的“朝日报业集团”收购了该报，使它成为《星洲日报》的姐妹报。该报社长张晓卿，总编辑王金河，执行总编辑李兴前。

东马的 11 家华文报纸是：

《诗华日报》 1952 年 4 月 1 日创刊于沙捞越的诗巫，是东马华文报中规模最大、读者最多的一家。初创时每日出版对开纸两大张，1985 年增加到 6 大张。从 1989 年起，篇幅增至 7-8 大张 32 版。内容包括地方新闻、马来西亚新闻、新加坡新闻、文莱新闻、体育新闻等 此外还有《综合》、《娱乐》、《小说天地》、《漫画》等版面。关于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的报道，新闻类内容不多，特稿、述评及风光文物之类的稿件稍多一些。董事经理刘会湘，总经理刘利宏（刘会湘长子），总编辑黄乔松。

《国际时报》 1968 年 10 月 1 日创刊于沙捞越的古晋。创办时为对开纸 2 张 8 版，后扩大为 4 张纸 16 版。1982 年发行量位居古晋第一，总销数在 1 万份上下，1987 年后达到 1.6 万份。90 年代初每日出 5 张 20 版。内容包括马来西亚新闻、古晋新闻、新加坡新闻、国际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娱乐等，还有《画页》、《大特写》、《小说》、《旅游》、《医药》、《儿童世界》等副刊。有关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内容，以娱乐性、内幕性、客观性为出发点，刊在国际新闻版内。董事主席兼社长黄文彬，董事经理黄国忠，董事兼总编辑李福安，执行总编辑杨金生。

《中华日报》前身是 1937 年创刊的《古晋新闻日报》，1941 年 12 月因日军入侵而停刊，1945 年 10 月 1 日复刊时改为现名。初为 4 开纸 1 张或 2 张，1958 年改为对开纸，80 年代扩展为对开纸 2 张 8 版，90 年代初增加到对开纸 3 大张 12 版。内容有

古晋、沙捞越和马来西亚各地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影视新闻、中国（包括港、台）消息、西方政要秘闻、新加坡新闻等。该报以市民阶层为对象，发行量不大，80年代只有两三千份。1994年归属于婆联报业集团。董事经理兼社长黄克芳，董事长许长国，总经理兼编委会主席罗启光，总编辑杨金生。

《马来西亚日报》1968年12月17日创刊于沙捞越的诗巫。80年代，报纸由最初时出对开纸2张8版，增加到日出对开纸6张24版，以后又增加到对开纸8张32版。内容包括地方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新马新闻、体育新闻、妇女、旅游、医药保健、经济、股票等。较少报道有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新闻，只是国际新闻版偶尔有一两条电讯稿；而在综合版和增版上，则较多刊登有关稿件。1996年该报主要负责人有：董事长戴承聚，副董事长陈锡监，总编辑黄生光。

《美里日报》1957年6月8日创办于沙捞越的美里，是美里现有的惟一的一份华文日报。初创时每日仅出1张，至90年代初已增至7大张28版，销数由500份增加到2万多份，发行网遍及沙捞越及文莱各地。主要版面有地方新闻、要闻（主要是美里新闻）、区域新闻等，此外还有国内新闻、新加坡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副刊等版面。1993年，该报收购了《中华日报》，两家报纸成为连锁报，同属婆联报业集团。1996年时社长兼董事经理黄克芳，董事长郑灼新。

《华侨日报》1936年3月1日创办于亚庇，为英属北婆罗洲（今沙巴）首家华文日报。日军侵占沙巴时停刊，1945年复刊。1947年，叶保滋接办，改为铅字印刷，变4开纸为对开纸，日出6版。1950年增至8版，1973年增至3张12版。90年代初，日出对开纸6张24版，发行量逾万份。主要版面有要闻、沙巴要闻、马来西亚新闻、国际新闻等。该报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比较多，每天刊于要闻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反映大陆、台湾的政

报。社长由黄文彬担任，董事长兼董事经理为黄国忠，总编辑为黄优才。

《新华晚报》马来西亚诗华报业集团所属华文报纸，社址在沙捞越州的诗巫。该报前身是《诗华日报》的星期刊《诗华周刊》。1974年6月30日《新华报》创刊，取代了这一星期刊。

《新华报》是一份星期日休闲性的娱乐报，除刊载少量由记者采写的新闻外，大部分内容为转载的娱乐性稿件。1988年7月2日改为下午出报，并改报名为《新华晚报》，成为《诗华日报》的姐妹报。该报日出对开纸4张16版，销量1万份以上。报社董事经理为刘会湘，总经理刘利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报纸的规模不但越来越大，技术装备也日趋现代化。从80年代开始，它们已逐步实现了激光照排、彩色印刷，以后更是一步步实现了电脑化。有些报纸还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报业集团。由《南洋商报》发展而成的“南洋报社集团”拥有《南洋商报》、《中国报》、生活出版有限公司及其属下的《新生活报》和多份杂志。《星洲日报》自1988年为木材业巨子张晓卿收购后，张氏又收购了檳城的《光明日报》。这两份报纸都是“朝日报业集团”属下的成员。“诗华报业集团”是东马的一个规模宏大的报业集团，属下有东马最大的华文报《诗华日报》和最大的英文报《婆罗洲邮报》，还有《新华晚报》及马来文报《婆罗洲前锋报》。沙捞越的《美里日报》和《中华日报》也已组成婆联报业集团；《国际时报》和《沙捞越晚报》则已处于同一个拥有者的管理之下。这几家大的报业集团占据了全马主要华文报市场。

与马来西亚华文日报越来越少相反，华文多日刊报纸，特别是期刊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全马有华文多日刊报纸8家，杂志63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日报或每周出版一期以上的报刊必须先向内政部申请出版

执照，限期为一年，期满须再申请，不符合政府有关出版规定的报纸，得不到续照。旬刊、半月刊或月刊等则不受此法规限制，因此办期刊要容易得多。当然，同日报相比，期刊的规模和影响就小多了。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从 70 年代起就开始使用简化汉字和横排，是继新加坡之后海外华文报刊采用简化字和横排的第二个国家。

（三）泰国

50 年代到 70 年代，泰国局势动荡不宁，军事政变频繁，军人独裁统治加强，华侨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华文报业处于萧条停滞状态，时间长达 20 年。70 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泰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随之改变，这就为华文报刊的再度繁荣打下了基础。1970 年至 1976 年，新的报刊纷纷涌现，旧有的报刊也相继复刊。1976 年 10 月泰国发生政变，他宁政府下令全国所有报刊一律停刊，重新进行登记注册。华文报除了《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京华日报》获准复刊外，其余报纸均被禁止出版。1977 年，他宁下台，江萨执政，一批华文报如《新中原报》（原《中原报》）、《中华日报》、《联合日报》（70 年代创办）、《曼谷日报》（后改为《泰商日报》）、《泰中日报》、《光华报》等相继复刊。80 年代以后又出版了《中原日报》、《工商日报》、《中商日报》。1984 年 7 月，《中原日报》并入《京华日报》，形成《京华中原联合日报》，延续至今。90 年代，又出版了《中华日报》的姐妹报《经济日报》，《亚洲日报》也于此时创刊。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报界竞争激烈，一些华文报纸或经改组后合并，或因遇到经济困难而停刊。到 1996 年仍在继续出版的报纸有 6 家即《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新中原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和《亚洲日报》。

《星暹日报》创办于 50 年代初期，是星系报业集团所属报

纸之一，靠华商侨领郭实秋的资金（集资 200 万铢）得以创办。胡文虎从香港选派范基平、朱淑和、宋郁文、苏济川、杨丽生 6 人主持编务，苏济川任总经理，杨丽生任总编辑，后由杨健行（又名杨捷）接任，督印人伍启芳。不久，胡氏家族收购郭实秋等人的股权，独资经营，该报遂成为星系报业有限公司的实业。董事长胡文虎从新加坡调其长子胡蛟任该报社长。1954 年胡文虎去世后，该报由胡蛟负责，不久改称星系报业（泰国）有限公司。六七十年代，该报领导人频繁更迭，80 年代末期（1989 年）马耀辉接任总编辑兼督印人，一职延续至今。该报声称“以宣扬文物、沟通文化、辅导教育、增进文明、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加强中泰亲善关系，鼓吹泰国及华侨工商事业发展，拥护政府政策等工作方针”，并声称言论“力持公正”。该报言论较为客观，在报道国际政事及中国新闻时，多引用外电报道（如法新社、美联社、新华社、中新社及香港中国通讯社等电讯），不加评述。近年来，随着中泰关系日渐亲善，该报较多报道中国大陆新闻和宣传泰中友好。日出对开纸 8 大张至 9 大张，星期日出对开纸 2 大张。主要版面有国际要闻、泰国新闻、泰国社会新闻、侨社新闻、各府要闻、经济新闻、内地新闻、副刊、娱乐版、广告（占四分之一）。其中，经济新闻版最具特色。从 1982 年 12 月起，该报对经济新闻报道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更新，版面由原先的 1 版增至 4 版，后来又增加到 8 版，包括工商经济、工商动态、今日商情、市场中心等，以便更好地为工商界人士及普通民众服务。星期日版面包括国际新闻、泰国新闻、泰国社会新闻、体育、星期文史、星期娱乐、副刊、武侠小说、医疗与健康等。其新出版的《星泰日报》（周报），每周出版一次，周期不固定，随当日报纸附送。每次出对开纸 1 大张内容取代《星暹日报》的侨社新闻、泰国社会新闻和各府要闻（《星暹日报》版面数维持不变）实为该报的增张版。

该报日销 2 万份左右，为各家华文报纸之首；从人员配备及经济实力看，亦属泰国华文报界实力较强的集团。该报与香港及新、马等地的“星”系报纸关系日渐疏远，已成为一家独立经营的泰国的华文日报。1985 年，该报创建阿里·思斯登有限公司，经营电子分色制版业务，李坤扬任董事经理。该公司以 4000 多万铢的投资，购置泰国首座全套电子菲林分色业务，以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

《世界日报》1955 年 7 月 26 日创办于曼谷，以“世界报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注册发行，同时出版《世界晚报》（1973 年 7 月停刊）和《世界周报》。该报自创刊之日起即以亲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面目出现，长期坚持反共反华立场。中泰建交后，立场仍然不变。1978 年 7 月 1 日，江萨政府以其妨碍泰中关系为由，吊销了它的出版执照。直到泰华老报人林文稳接任该报总编辑兼督印人之后，才获准继续出版。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世界日报》以“委托经营的方式”交台北联合报系全权经营管理。此后该报虽以“独立、民营的现代化企业”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却继续充当台湾在泰国的喉舌。稍有不同的是，其宣传方针和手法有所调整。如对外称该报以“致力促进侨社和谐、团结、繁荣、进步为目标，为华商企业现代化尽心力，为华裔中文教与学作贡献”；在侨社新闻版和侨社服务版方面加强了力量；1988 年增辟大陆新闻版，对大陆政经新闻、社会和民间活动的报道明显增多，态度也较为客观。90 年代日出对开纸 9-14 大张，版面包括国内外要闻、泰京新闻、东南亚、港澳、国际新闻、国际经济、台湾新闻、台湾经济、大陆新闻、大陆经济、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国际综合、泰国经济、股市、侨社新闻、侨社服务、内地新闻、工商服务、经济生活、五金机械 / 产业房地产、娱乐影视及《湄南河副刊》等，广告约占 11 版。《世界周报》最初逢周日出版，随正刊附送，后来星期日由《世界周报》代替《世界日

报》，每期出对开纸 2 张 8 版。台湾联合报系负责经营后，将《世界周报》停刊，恢复在周日出版《世界日报》。发行量长期徘徊在 3000-4000 份左右，近年来有较大增长，并向东南亚地区扩大发行。1995 年该报董事长为泰华企业家林来荣（1909-曾任泰国中华会馆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副董事长为王必立（原为台北《联合报》副总经理），社长为台湾资深报人、前台北《联合报》总编辑赵玉明，总编辑为黄根和（泰国中华会馆理事长），总经理为袁守盈。

《中华日报》前身为 1958 年停刊的《新日报》，1960 年 3 月 16 日改现名复刊于曼谷。1970 年以前，该报曾被国民党当局控制和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该报逐渐改变态度，转而支持中国政府。泰中建交后，该报常采用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的电讯，较多报道中国大陆和泰中友好的消息。80 年代初期，该报曾经是所有华文报刊中报道中国消息最多最快的一份报纸；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报道也力求公正客观。该报宣称其一贯宗旨是“沟通中、泰两国文化，促进两族人民亲善”，言论上“不偏不倚，自由客观，言人所不敢言”，并表示要“注意中国的信息，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加强泰、中两族文化交流，增进感情，共同为建立地区与国际和平、安定做出贡献”。该报平日出对开纸 8 张以上，星期刊出对开纸 2 张。主要采用美联社、法新社、中新社、新华社、香港中通社电讯。版面包括要闻、台海两岸新闻、国际新闻、泰国新闻、社会新闻、社团新闻、内地新闻、经济版（中华经济、经济动态、商场传真图片）、商情版（股市、行情表等）、专题报道、港澳经纬、综合版、体育版、小说版以及各类副刊。广告占四分之一。据该报称，“1984 年，读者人数占有所有华文读者的 43%”，90 年代后“已提

升到 49% 几乎达一半”。^① 1994 年发行量约 5 万份。

《新中原报》前身为 1958 年遭封闭的曼谷《中原报》，1974 年 6 月 18 日以现名复刊，由原《中原报》社长、督印人李其雄以新中原报有限公司的名义注册。此后该报负责人几经更换，到 1995 年，多位泰华知名企业家受聘加入董事局，扩充了实力。顾问主席为盘古银行常务董事长陈有汉（1934 - ），顾问为华尔街金融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隆（1935 - ）及华泰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卓豪。董事长为柳进雄，常务董事长为柯楚君，副董事长为方思若，董事、总经理兼执行总编辑为林宏（原《工商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董事、总编辑兼督印人为何韵。该报复刊时重申其宗旨为“始终坚持促进泰中友好、维护正义、繁荣泰华文化的方针，在新闻报道中做到翔实、公正，不偏不倚”。该报对中国态度友好，报道中国的消息比较客观。日出对开纸 7 大张 28 版以上，星期日出对开纸 2 大张 8 版。广告约占四分之一。发行量约 7.2 万份。该报的新闻报道多采用法新社、美联社、新华社、中新社、香港中国通讯社、台北中央社电讯。版面内容包括要闻、国际新闻、海峡新闻、国际经济、经济新闻、今日市场、商情、股市、泰国证券交易行情、泰国新闻、社会新闻、社团新闻、内地新闻、体育、娱乐、小说、副刊《新半岛》、《大众文艺》，以及春秋、文声、新艺林、大千世界、新视野、趣知廊、地球村特讯等专栏。星期日版面有国际要闻、国内新闻、社会新闻以及《趣知廊》、《玲珑》、《新视野》、《中华风采·风流人物》、《周日漫话》、《娱乐》、综合版等。

《京华中原联合日报》由《京华日报》与《中原日报》合并而成，1984 年 7 月 16 日创刊于曼谷，京华报业有限公司发行。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 523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据两报称其合并原因是“藉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强化人事和先进设备，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丰富多彩、内容充实的精神食粮”。从内容上看，合并后的联合日报实际上与《京华日报》一脉相承。该报创刊词称要“以尊重泰国政府政策宣扬尊崇皇室、宗教、维护国家安全，并以报道翔实迅速，内容力求充实，服务读者为宗旨”。1988年新年献词中重申：“立论公正，报道翔实；发扬中华文化，促进侨社团结，增进泰中亲善，沟通文化交流；推动社会慈善福利事业”。该报以泰国佛历纪年，日出对开纸8大张至9大张，星期日出2大张。国际新闻采用美联社、法新社、中新社、香港中国通讯社、台北中央社的电讯。版面内容要有要闻、国际新闻、泰国新闻、泰国社会新闻、内地新闻、侨团版、两岸消息、中国人、经济、市场春秋、商场风云、泰国证券交易行情表、专题报道、娱乐、京华电视、体育、小说天地、武侠天地，以及副刊《妇女》、《科学与健康》等。广告占三分之一。1992年该报董事局多为泰国军政要员及泰华金融、企业界要人。董事长兼社长为陈松亮（新松泰机械集团机构总裁），副董事长兼财政为林兴强（金融界名人），副社长兼督印人为原《中原日报》总经理吴金城，董事总经理为原《京华日报》总经理林妙英（吴金城之妻），执行总编辑为萧泽铭。在强大的董事局阵容的支撑下，报纸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很快成为华文中“数一数二的一份报纸”。1992年的销量约4万份。

《亚洲日报》 1993年8月28日创刊于曼谷，由泰华金融工商企业界人士支持创办。担任该报董事局主席的李光隆是华尔街金融证券（大众）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金融、饲料、地产、纺织等多种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为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顾问郭振；董事局副局长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陈荣泉、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永远主席庄锡鸿；董事总经理为黄腾凯；执行总编辑为林兴。该报有编辑记者100多人，广告人员30多人。1995年

迁入新址，业务在发展中。日出对开纸 9 大张至 10 大张，星期日对开纸 3 大张。报道持“不偏不倚”立场，言论较为客观。版面内容有国际要闻、国际经济、国内要闻、社会要闻、侨团新闻、各府通讯、港澳动态、台湾讯息、乡情、风云、经济、股市、体育、小说、武侠及副刊《天窗》、《世界风情》、《旅游》、《医药健康》等。

泰国的华文期刊产生于 20 年代初期，然而直到二战前，它们大多以日报增出周刊、随报附送的形式为主，独立出版的刊物尚不多见。战后华文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盛极一时。至 60 年代中期，出版的各种刊物多达 110 种。其内容各有侧重，有时政性的，学术性的，娱乐性的，文化教育类的以及迎合部分读者需要的色情类刊物。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刊物大多难以维持长久（寿命长者也只是一二年）。70 年代至 80 年代，由于报业竞争激烈和政局动荡，期刊的种类和发行数量大大减少，只有《香檳夜报》（1971）、《泰华报》（1976）、《京华导报》（月刊）《华声周报》等尚在出版。90 年代以来，华文期刊的数量仍然不多，1996 年有近 10 种，内容涉及时政评论、经济报道、旅游休闲及生活健康等。其中，商办的《时代论坛》（1994，双月刊）及其姐妹刊《时代周刊》（1996）、《现代泰国导报》（华人经济刊物）等，其内容和质量与以往相比有新的突破，备受出版界和读者瞩目。

多年来，泰华新闻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忧虑，就是随着华文教育的断层、薄弱以及华文报高素质人才难求、从业人员老化，泰华报业的前景将会越来越暗淡。早在 30 年代末期銮披汶政府大举关闭华校时，人们的忧虑即已产生，不过经历了数十年，华文报刊仍然存在，这使人们多少得到一些安慰。五六十年代以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泰国政府将华人与泰国社会融合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华人后代接受华文教育的已数凤毛麟角，

华文报读者渐少已成为必然趋势。据当地有关机构调查，目前华文报读者多年龄偏高，46-65岁占62%，66岁以上占13.4%，加起来达75%强，31-45岁占17%，30岁以下占7%。按照这个数字，华文报的前景的确不容乐观。但是也有人认为，泰国华文报业虽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新问题，但整体前景乐观，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迅速发展，在世界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联系，这些都为华文报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从泰国六家华文报的现状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顽强奋斗精神，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①

（四）菲律宾

1972年9月21日马科斯总统宣布实行军事戒严后，在华文报刊无一幸存的情况下，当时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理事长、马科斯的密友高祖儒（Ralph Nubla Sr.）征得马科斯的准许，将原有的《公理报》与《大中华日报》合并，组成《联合日报》，于1973年2月出版，成为当时全菲唯一的一份华文报纸，发行量最高时近2万份，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974年9月《东方日报》（后改组为《世界日报》）创办后才降下来。从1973年到1986年的13年间，每隔几年就有新的报纸出现，显示出菲律宾华文报业稳定发展的趋向。这个态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至1996年仍在出版的华文报纸有《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菲华时报》、《环球日报》5家。

《商报》 1986年2月25日马科斯政府倒台后，因宣传“反菲亲共思想”之罪名被逮捕、后又分别移居美国、加拿大的于氏兄弟（于长城、于长庚）重返菲律宾，并选定同年6月12日（菲律宾独立日）复办《华侨商报》，但改称《商报》，同时出版

^① 《泰国与港澳报业同行畅谈华文报业前景》，载1997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

《商报复版纪年刊》。于氏兄弟仍分任社长和总编辑。为顺应时代潮流，二人修订其编辑方针为：鼓励华人身心融化于菲律宾大社会；推动华人积极参政；促进华人积极参加菲国经济重建；联络和团结菲华各社团、各界人士；传达工商消息，普及财经学识；融洽劳资关系；提高华文教育水平；翔实客观地报道中国情况。1988年，该报人事作了调整，董事长由于长城的女婿吴抵抗（又名吴雅利）担任，于长庚任社长兼总编辑。1995年再次改组后董事长为蔡黎明，副董事长为蔡文春，常务董事兼经理为庄金耀，于长庚仍出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报1986年复刊时，日出3大张12版，1988年调整版面，日出4大张16版，并增印《儿童周刊》每周随报附送。1989年又将版面扩增至6大张24版。主要版面有要闻、菲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摘要、“商报生意场”、经济、华社新闻、侨乡新闻、中国新闻通讯、“社会、政治、生活”（翻译英文报评论、专栏）“电影与娱乐”“港台言论选粹”“长短镜”“博览”副刊版包括《新潮》、《小商报》、《小说》、《儿童周刊》、《象棋报道》、《连环画及漫画》、《医药卫生》等。该报较多采用中新社、新华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电讯稿，以及转载香港中文报纸有关稿件。该报还附送由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编的《华文教育》1小张4版，内容主要是菲律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文教育动态，并辟有“特稿”专栏，刊载有关华文教育方面的专论。《商报》是历史悠久的华文大报，以客观真实、公正直言而闻名于菲律宾华人社会，对促进菲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较大的影响。该报目前发行量为5000-6000份。

《世界日报》1981年6月1日创刊于马尼拉，前身是由菲华联谊会创办的《菲华联谊周刊》（简称《联谊》）《世界日报》之脱胎于《联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72年亲华的《华侨商报》被封后，当地华裔王芳盾于1974年9月通过马科斯的助理胡安·杜维拉（Juan Tuvera）取得该报执照，以菲律宾东方

传播公司的名义创办了《东方日报》。该报最初能够对中国新闻及菲中关系作较为详细的报道，后在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诱使下态度有所转变，较多刊载台湾新闻。1975年中菲建交后，该报大肆刊载反共、反华言论，引起当地华侨的不满。1981年6月1日，爱国华侨及前《华侨商报》的部分工作人员联合《东方时报》以及《联谊》的记者编辑，通过侨商陈永裁的关系，向杜维拉收买《东方日报》的出版执照，重整旗鼓，在《东方日报》的基础上出版了延续至今的《世界日报》。《联谊》周刊则在《世界日报》创刊后不久，宣布停刊，以支援《世界日报》。新出版的《世界日报》承继《联谊》的宗旨，即巩固、发展、推进菲华友谊，促进菲华社会的安定、繁荣和菲中人民的团结友谊。该报常采用菲新社、中新社、新华社、香港中国通讯社、台湾中央社及西方各通讯社的电讯，对国内外各方面信息和菲华社会动态的报道采取客观的态度，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兼收并蓄。由于该报编辑、记者多为兼职，缺少专业记者，消息来源主要靠抄收上述通讯社的消息，有时甚至整版转载香港中文报纸上的新闻。但总的来说，该报的编辑质量还是较高的。日出对开纸10张40版至15张60版不等，广告占很大的篇幅。版面主要有本岛新闻、国际新闻、华社新闻、中国和台湾消息、文摘、特稿、世界经济、每周新闻摘要、西报评论摘要等。副刊名目繁多，有《融合》、《小说》、《体育》、《文娱》、《新地》、《众艺》、《海潮》、《集邮世界》、《学群龙诗刊》、《世界漫画》、《医药卫生》、《妇女》等。90年代中期，该报发行量约2万份，成为当地5家华文报纸中发行量较多的一家，而且靠刊登大量广告而获得盈利。

《联合日报》 1973年2月由《公理报》和《大中华日报》（两份均为台湾国民党党报）合并而成，成员亦为两报老班底，继续受台湾当局的控制。中菲建交后，该报立场有所改变，自诩走“中立路线”。创办初期每日出对开纸5-6张20-24版，80

年代末期增加版面，日出 6-8 张，广告平均占 14 版。主要版面有要闻、国际国内新闻、经济、体育、影视歌、《有声有色》、《国际副刊》、《旅游》、《万象》、《世界趣闻》、小说等。还有每周一至二次的《生命园地》、《掌故》、《缤纷》、《风景线》、《医药》、《中学生》、《圣莲月刊》、《文化公园》、《五线谱》、《人物志》、《海外》、《青年人》等 10 多个副刊。从 1983 年 7 月 20 日起，该报增辟了半版“新闻窗”，（每周三刊出）专门报道中国大陆的有关情况。“新闻窗”每期刊登消息 4-6 条，简讯 4-6 条，每条消息二三百字到八九百字不等，内容多数是谈改革开放后的人民生活或社会问题，如《大陆第一批时装模特儿》、《婚姻介绍所在大陆盛行》等；而对大陆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及不正之风，则大加抨击。政治性较强的文章或特稿也时有刊登，并有一些对大陆贬损性的言辞，但总的来说还是以正面介绍为主。对台湾当局明显有所偏袒。除“新闻窗”之外，该报其他版面也曾少量刊登过介绍中国大陆情况的文章或特稿。该报还经常转载香港《争鸣》、《广角镜》、《镜报》等杂志的文章并采用中新社和新华社的专稿，报道大陆经济改革、四化建设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新的变化。90 年代中期，该报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主要负责人是：董事长高祖儒（长期任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1995 年起任永远名誉理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社长庄铭渊（曾在《大中华日报》社工作，后任《公理报》社长。到《联合日报》后先任代社长，1986 年升任社长），总编辑施颖洲（曾任《大中华日报》总编辑，菲律宾报界联合会常务理事）。该报发行量可达 2 万份，广告收入也相当可观。

《菲华时报》前身是 1982 年 2 月 1 日创办的华、英双语综合性期刊《菲华周刊》。该刊主要介绍菲华社会动态、华人对菲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国际时讯。发行量约五六千份。1983 年 3 月 24 日，曾负责马科斯夫人宣传与新闻发布事务的该刊主编、

菲籍华人叶双珠在周刊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份日报，称《菲华时报》。总编辑由叶担任，副总编辑为庄文成及庄惠泉。该报沿袭周刊的宗旨，表示“以入籍了的华人或作为菲国新公民的华人的利益为依归，不偏不倚，据实报道和公正立论”。其创刊词还强调，要为“推动和加速菲华融合、华人团结和菲国繁荣作出贡献”。正因为如此，该报的创办受到菲律宾各界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当时的总统夫人、新闻部长等许多头面人物都出席了该报的创刊庆典活动，并在祝词中一致赞扬旅菲华侨和菲籍华人对菲国建设作出的贡献。该报创办时日出对开纸 4 张 16 版，辟有中国新闻、世界新闻、台湾新闻、社团新闻、时报经济、评论摘译等专版，在中国新闻中，偏重福建新闻的报道。据统计，1984 年 9 月份前的 24 天，该报登载中新社福州（或厦门）电头的稿件 28 篇，其中《福州侨务要更开放些》、《福州居民住房条件大改善》、《福建正大力开展与各省经济合作》等，都以醒目的标题在显要位置刊登。^① 其他版面有体育版、小说版、《人与事》、《生活》、《妇女》、《影视》、《旅游》等。原《菲华周刊》则以星期刊的形式随报附送。1986 年 2 月，叶双珠全家移居美国，该报由其义父，菲华银行家、企业家李南文及华商余明培收购并续办。后李南文、余明培相继被枪杀，该报被菲律宾亚洲世界国际集团和马仁那地产公司（郑周敏 Tan Yu 集团）收购。至此，该报产权从报业集团转由郑周敏企业集团控制。由于该报先后两度易主，报份及广告量大受影响，发行量降至 4000 份（发行量一度曾达 9000 份）。1995 年以后，情况逐渐好转。

《环球日报》 1986 年 7 月 2 日创办于马尼拉，由菲华商联总会新闻委员会主任李永年等人受台湾当局旨意筹办。首届董事

^①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第 96 页，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会成员及报社主要负责人大多是亲台的“商总”要员。董事长李永年，社长陈瑞时（曾任台湾“反共抗俄总会”秘书），总编辑黎少熙，副总编辑王鸿基。该报创刊时，自称其办报宗旨和报道方针为“中立”、“客观”、“绝对忠实报道”。报庆周年重申其立场是“支持民主自由制度”，“恪守菲律宾反共和国国策”；报道方针是“力求翔实公正”，“鼓吹菲华两民族的合作与和谐”。初期日出对开纸 2 张 8 版，销量 5000 份（包括赠阅）。刊登中国大陆新闻不多，新闻多采用路透社和中央社电讯稿，言论明显倾向台湾当局。创刊不久，报份即迅速下跌，1986 年年底下跌至 2000 份左右。为扭转颓势，该报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增加了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并相应扩大了篇幅。1987 年日出 3 大张 12 版，开始少量采用中新社、新华社以及香港中国通讯社的稿件。1987 年李永年当选为“商总”理事长后，辞去该报董事长一职，该报遂由菲华文经总会（实为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和部分亲台人士接办。期间两度进行董事会改选，但该报亲台立场始终未变。90 年代中期，该报每天设有大陆与台湾新闻两个固定版位，还有一些中国新闻散见于要闻版和国际新闻版。该报采用中新社稿件的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也常转载香港报刊（如《文汇报》、《大公报》等）有关中国的报道，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报道；该报对台湾当局纵容“台独”分子四处活动的行为同样表示不满并作报道和评述。主要版面有要闻、国际新闻、华社新闻、工商版、环球体育、娱乐、电影与戏剧、小说等。1996 年 9 月，由于台湾当局不再给予津贴，该报难以为继，遂由拥有《菲华时报》的企业集团巨贾郑周敏接办。易主后的《环球日报》与《菲华日报》一样，走中间路线。1996 年 10 月 7 日起改为下午出版，同时更名《环球晚报》。董事会也相应进行了调整，由西黑人省众议员米格尔·迈克·罗梅罗（Miguel Mike L. Romero）任董事长，菲律宾国家银行总裁彼德·法维拉（Peter

Favila) 任副董事长，社长特聘庄纯端 (Mr. Carmen Chung Dy) 女士担任，总经理为律师阿斐洛·罗梅戈 (Atty. Rome Alfredo)，董事长特别助理为曾任《联合日报》副总编辑的菲华资深报人吴友裕。

菲律宾华侨出版的期刊，发创者当推马尼拉华侨中西学校办的《教育丛刊》和《教育月刊》。两刊都创办于 1917 年，均以提倡华侨教育为旨归。以此为起点，各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不定期刊等纷纷刊行。刊物的种类既有教育类的，也有综合、学术、艺术、戏剧、小说、工商类的。办刊的地点，也由马尼拉发展到宿务、怡朗、三宝颜、达沃等城市，数量总计近 50 种。但这些刊物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的一两年，多数不数月或不数期，即办即停。可见办刊比办报要困难得多。究其原因，一是没有招登广告，经济不能自主，出版若干时间后资金用完，刊物也随之结束；二是多数侨胞忙于业务，没有时间阅读大块文章，故订户稀少；三是编辑和办刊人多是兼职，无法专心办刊、锐意经营。

与马、泰两国的情形相仿，菲律宾华文报刊亦前途堪忧。70 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菲政府实行华文学校菲化政策，致使四年制中文中学毕业生连最简单的中文篇章也读不懂，更不用说写了。在他们中，阅读中文报者百中无一。这就使中文报读者逐年减少。若不是近年来自台湾、大陆及香港的华人有所增加，华文报将更加缺少读者了。有人估计，老一辈华文报读者多为四五十年前陆续移民至此，多数在六七十岁以上；再过 10 年，这些老读者将会大量减少，这对华文报不啻一个沉重的打击。菲政府若不放宽对华文教育的诸多限制，中文教育及中文报刊可能会在菲国渐渐消失，这是令华人社会感到担忧的。

二、日本

1972 年中日建交后，中国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改

革开放以后，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于 1979 年放宽了出境旅行的限制，台湾省人到日本观光、旅游、探亲（毕业后留在日本就业的台湾留学生不在少数）的人数也逐年增加。据日本政府 1979 年的统计，当时旅日华侨总数达 5 万，其中半数来自台湾（1979 年，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宽了出境旅行限制）。随着留学人员的与日俱增，日本华文报刊也在稳定中日渐得到发展，并为敦睦乡谊，沟通乡情，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而发挥着作用。

70 年代以来创刊并持续出版的日本华文报刊有：

《社团法人神户中华总商会报》创办于 1971 年 12 月 10 日，由社团法人神户中华总商会文化委员会主编，是该会的机关刊物。该报《发刊词》称，其创办目的是“记录及预告本会的行事；发表会员的意见和会员的消息；记录每月间的世界大事新闻要略；记载侨界消息；写点华侨小史”^①等。该报内容翔实新颖，注重对华侨情况和华侨资料的介绍和搜集，对华侨问题时有研究和评述，如陈德仁的《脱了国籍也洗不了中国人的血》（载该报总第 11 号）林同春的《要培育接班人》（载该报总第 14 号）等文便很有见地。该报初为月刊，16 开 8 版，后为不定期刊。以中、日文并用刊行。

《横滨华侨通讯》 1973 年 2 月创办，月刊，为横滨华侨总会的机关刊物。早期主要编辑为该会常务理事吴桂显（1922 - ），后为马广秀（1925 - ）。该刊每月 1 日出版，内容以会务通讯、会员信息、华侨动态为主，也刊登中国新闻，以中、日文并用刊行。每期出版 4 开 1 张 4 版，其中一、四版为中文，刊登祖国消息，二、三版为日文，发表会务及会员消息。发行量约 3000 份。

^①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第 399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关西华侨报》日文月刊，1976年4月由关西地区京都、大阪、神户三市的华侨总会联合创办。过去三地各自办有一份华文报纸，现合为一家，每逢25日发行。早期主要负责人是神户华侨总会常任理事曾森茂和常任理事文化部长王鄂；后有蔡宗杰、杨隆资等。主要读者为关西地区的华侨。其办刊目的是为了加强关西地区华人之间的联系，介绍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及促进中日交流。该刊每期出4开纸2张8版，第一、二版为与中日两国及华侨有关的重要新闻；第三版以海峡两岸关系为主；第四、五版为中、日及华侨文化和经济信息；第六版至第八版分别是神户、大阪、京都三地的侨情信息，内容相当丰富。此外还有《窗》、《东南西北》等评论性栏目，所论颇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发行量3000多份。

《社团法人广东同乡会会刊》杂志型中文季刊，1980年12月25日创刊，由广东同乡会文化部主编，每期16版。据该刊称，《会刊》不仅报道“日常会务活动，会员近况，其他如有关家乡建设的消息，祖国传统文化的发扬，日本先进、传统文化之介绍，文艺作品的发表，都普遍地登载，还专设‘意见栏’……通过《会报》的媒介，以期提高大家对会方的关心与理解，加强双方紧密的联系”。^①由此可知，该刊旨在报道同乡会的动态，乡讯侨情，也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1985年，该刊还在同乡会成为法人团体20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特刊》，内容有该会的简史、章程，以及会员的回忆、感想等。

《台湾大众》华文月刊，1982年2月28日由日本“独立台湾会”代表史明创办。“独立台湾会”曾于多年前发行过一份名为《独立台湾》的月刊，于1974年停办，故《台湾大众》也可

^①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第400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以说是《独立台湾》的复刊。该刊在《创刊词》中说，要“继续为实现台湾社会革命及阐释正确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要“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来研究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及其方法论”。创刊号中刊有史明的《革命》及《为如何促使“革命的主体条件”成熟？》、苏平的《近十年来海外台湾人政治运动的回顾》、林阅的《读“四百年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章。停刊日期不详。

《华侨新报》中、日文双语月刊，1985年6月23日创办于东京，由在日台湾人士所办，华侨新报社发行。每期出3张12版，发行量1.5万份。该报以台湾在日华侨为主要对象，提供有关台湾和当地华社的最新信息。每年还发行4-6次彩色特集，以庆祝“双十节”、春节等重要节日（1996年时为全日文报纸，每月1期，每期出对开纸2张。负责人杨文魁）。

《台湾省民报》日文月刊，1973年7月创办于东京，由台湾省民会出版。最初10年的编务和发行工作均由该会常务理事、事务局局长吴修竹负责。每期出16开8至10页不等，发行1500份。读者对象为该会会员。该刊经常刊登报道台湾社会阴暗面的消息或评论，同时多方面介绍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图文并茂。1981年以后担任主编的有刘启盛（后任台湾省民会名誉会长）、谢国权（曾任台湾省民会副会长）和蔡庆播（后任台湾省民会会长）。他们都写过多篇评论和随笔。该刊已停办。

《复兴新闻》1971年10月10日创刊于横滨，发行人为来自台湾的许至诚。1980年内先后更名为《亚东新闻》、《东京商报》。后在此基础上又于1989年4月14日创办了《亚洲新闻》，由亚洲新闻社发行，发行人兼社长仍为许至诚。该报自言其创刊目的是“担任侨民与侨民、侨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

这一时期的华文报刊还有《中兴报》（社长为刘兴尧）、《亚东新报周刊》、《台湾公论报摘要》、《台生报》、《台湾青年》、《春

雷》、《民心》、《盟员通讯》、《台声报》和《关怀》等。

除上述报刊外，都市中的侨校和各省籍的同乡会大都有自己不定期出版的通讯、会刊，如《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通讯》、《神户江苏同乡会会刊》以及兵库县广东同乡会编的《年间行事录》（1987年5月—1988年4月）等。除了由华侨、华人创办的中、日文报刊之外，还有几种由日本官方和日本商社主办、内部发行的中文刊物，其中有日中工业技术文化中心出版的《日本工业技术》月刊，日中经济协会主办的《日本经济》季刊，日本外务省通过其外围组织霞山会出版的《中日画报》等。

这一时期日本华文报刊的一大特征是，出现了一批用日文刊行或中、日文并用的刊物，而且越到后来，以日文出版的就越多。这种用侨居国文字编行的报刊的出现，与日本华人的境况有直接的关系。在日本，华文学校的中文课程只教授到初中，升高中以后就大量增加日文课的比重，以适应学生高考升学的需要。因此，旅日华侨，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懂日文的比懂中文的多；而懂中文的读者中，同时懂日文的又占大多数，为了面向多数读者，争取好的销路，华侨报刊多以日文或日文版刊行。其次，在日本，中文的排印费用比日文昂贵，为了节省开支，也不得不如此。

在亚洲（也包括世界各国在内），华语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首推新加坡。

新加坡的广播事业始于1935年，1963年开办电视。广播电视开办之初，均有华语节目。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后成立的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adio Television Singapore）以中波和短波播出4种官方语言和6种华语方言节目。1969年，调频立体声开始在华语广播网使用。1980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根据国会通过的法案，更名为新加坡广播电视局（SBC），第一任主席由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Ong Teng Cheong, 1936—）兼任。

1982年，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分离，重新组建为5个广播网（即5套节目），在5套节目中，有4套各使用一种正式语言（国家规定的正式语言有4种：英语、华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还有1套是立体声调频广播（从1980年8月1日起，立体声调频广播由每天8小时延长到18小时）。各种语言的广播同时播出，使用中波和调频波段，同时还使用短波对海外听众广播。5套节目周累计播出时间是638小时45分钟。其中第3个广播网为华语台，每天早晨6时开始播音，午夜2时结束（1991年第三广播网被命名为958城市频道）。为了推广华语普通话，电台减少了华语方言的广播时间，增加了普通话节目，并开办了“大家都来讲华语（普通话）”节目。新加坡广播局与教育出版和联邦出版社还合作出版发行了“汉语拼音”、“华语讲座”节目的盒式带和小册子。

新加坡电视开办之初，只有1个频道。1963年11月23日开办了第2频道。1974年开始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76年底两套节目的播出全部彩色化。电视台的两套节目交叉使用英、华、马来和泰米尔4种语言播出，两套节目每周共播出113小时。若按语种计算，英语节目占62.35%，华语占24.82%，马来语占6.09%，泰米尔语占6.74%。进口的节目53%为英语节目。就内容而言，电视节目主要分为5大类：新闻、综艺、戏剧、儿童教育、体育和文化。新闻节目每天播出约90分钟，使用四种语言在不同的时间播出（内容相同），每种语言的新闻约为20分钟。在两套电视节目中，自办的节目占26%，购买的节目占74%。在节目总量中，新闻和教育节目占20.3%，戏剧占51.1%，音乐和综艺占16.5%，儿童节目占7.2%，体育节目占4.9%。80年代以后，电视台自办节目数量有所增加，节目形式也有所改变，还开办了一些新栏目。如1981年3月开办了两周一次的时事杂志性节目。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目的，是要为观众提供重

要新闻事件的背景材料，对新加坡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评述。这个节目一开播，就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1981年5月，新加坡电视频道首次播出华语综艺节目，1983年开始制作华语电视连续剧。

1994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全面私营化，全国10家广播电台全部归属于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SIM,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控股公司的子公司——新加坡广播机构（RCS）。从1996年5月起，隶属于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的新加坡广播机构和电视机构，每天用4种官方语言和6种华语方言（广州、闽南、客家、潮州、福州、海南）分别播出各类节目。

除新加坡之外，在华人约占全国人口35%的马来西亚，华语广播电视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马来西亚有三个电视频道，在每日下午6至7时的时段专门播放华语节目，主要是由香港提供的广东话节目。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菲律宾、泰国的电视台经常将港、澳、台的电视节目转译成当地语言播放，吸引着一大批华人观众。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世界上很多国家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为了向国内观众介绍中国，他们常常将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转译成当地语言播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日本，华语广播电视节目也受到重视。90年代初期，半官方的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每周除播出两个汉语学习讲座节目外，其所属的广播电台也每周4次播出两个汉语学习讲座节目。该电视台导演郁野上说：“日本人对汉学抱有特别的亲切感。现在华语电视讲座已成为仅次于英语而居第二语言的节目，收视率超过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而且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①。

^① 文陆：《世界各地的华语电视节目》，香港“四海通讯社”稿第2296期，1993。

第二节改革开放后的北美洲华文传媒

一、美国

从 1971 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长达 20 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僵局被打破，两国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与此相应，长期处于低潮状态的美国华文报业也重获生机。

1972 年，美国依据新的移民法案，将华人入籍配额增加到每年 4 万人。这使美国华人人数迅猛增长。据统计，1990 年，美国华人人口总数已达 1,645,472 人，约为 1970 年的 4 倍。加之 20 年来，华人工商业者及知识界的经济实力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这就为华文报刊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之出现了空前大发展的局面。据统计，在美国华文报刊累计的 700 余种中，三分之二是 1970 年以后创办的；而 80 年代末期以后，每年都有 100 余种华文报刊同时存在。

从地域上看，纽约和旧金山两地出版的华文报刊最多，影响较大的 19 家大型华文报纸都在这两大城市出版。此外，在华盛顿特区、芝加哥、波士顿、依阿华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夏威夷等地，也都有华文报刊出版。

（一）纽约

纽约华文报刊的历史虽然没有旧金山长，却是后来居上。70—80 年代，持续出版及新创办的、影响较大的报纸有 8 家（由于各方面原因，其中的一些已于 80 年代末期或 90 年代停刊）

《美洲华侨日报》该报从 1940 年 7 月 8 日创刊到 1989 年终刊，历时 49 年，是美国少数几家历经半个世纪的华文报刊之一。由于该报创刊以来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故受到美国当局和台湾

在美势力的迫害，长期处于困难境地。1972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该报的处境也逐步好转。60年代，该报曾一度改为每周出版两次，每期只发行几百份。为了使它恢复为日报，一些侨团于1972年成立筹委会，扩大招股，由此吸纳了一批新的入股者（多为知识分子和侨团人士）。在此基础上，该报于1977年1月1日恢复为日报。初为每周5期，第二年恢复为每周6期，并在旧金山华人谢侨远（Kew Yren Ja）、黄运基（Maurice H. Chuck）的支持下出版西岸版和派驻记者。这一时期报纸的总编辑为陈天璇（Hanson Chan），不久后由关文亮（Andrew Kwan）接任；总经理为黄立庄（Lewis Wong），不久后由毛仁浩（J. H. Mao）接任。

该报恢复日报时重申的编辑方针是：“以在美华人的观点，拥护国际上的正义进步事业；忠实地报道中国消息，使广大读者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支持华侨争取正当权益，为侨胞大众服务，同阻挠、破坏侨社争取正当权益的恶势力作斗争；努力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支持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斗争”。1979年2月5日，邓小平访美期间曾为该报题词：“愿你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努力。愿你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更多的贡献。”该报恢复每日出版后即实行柯式印刷，版面逐步增加到3张12版，1984年增加到4张16版，1986年则增至8张32版。内容包括国际要闻、中国新闻、当地新闻、香港新闻、时事新闻、花边新闻等，其余则为专刊和副刊。稿件除来自当地作者外，该报还广为采用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这四大通讯社的稿件，同时也大量采用新华社和中新社的新闻稿。该报对中国大陆的报道较为详细，增加了专稿和评论等有特色的稿件，成为华侨华人获取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中，该报“跟着国内学

潮而起舞，从新闻报道以至社论，刻意制造歪曲的舆论，为学潮推波助澜”，导致“三分之一来自大陆的商品广告撤销”，“面临经济困境”^①，于 7 月 29 日停刊。停刊前，发行量达 1 万多份。一位曾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过的报人在谈到该报的终刊原因时不无遗憾地说：“最后由于一位中年的社长，……年少气盛，走错了路，在 1989 年停止出报。历史悠久的《美洲华侨日报》，就在这样的中年人手中断送了。但是，它数十年艰苦奋斗为侨众服务的历程令人难忘”^②。

《联合日报》从 1952 年 7 月 8 日创刊到 1998 年终刊，历时 47 年，为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刊之一。该报创办初期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步转向中间立场。80 年代初，该报一度辉煌，发行量达万份以上，成为当时华埠销量第一的中文报纸。但由于报纸长期以老华侨为读者对象，仅在老华埠发行，80 年代中期以后无法与有着港台资金背景的新型大报抗衡，销量日渐下降。为了扭转颓势，从 80 年代后期起，该报逐渐增加了面向新移民的内容。如 1985 年 6 月 22 日增辟《新侨必读专刊》，1987 年 3 月 16 日又开辟了以土生华裔为对象的《国学入门》专刊，1989 年 2 月、5 月先后再设《侨生园地》专版和《协助申请绿卡入籍应试专版》，还定期刊登英文学习材料等，但仍无明显起色。90 年代该报的主要内容有要闻、社论、美加新闻、侨社新闻、大陆新闻汇编、台湾新闻汇编、香港新闻汇编以及奇趣集锦、论著摘录、小说精选、茶余酒后等专版、专栏和轮流刊出的副刊。该报董事长兼主笔一直是吴敬敷（1990 年已届 80 岁时仍在撰写社论和专稿，但不负责具体

① 见 1989 年 12 月 18 日纽约《东方新闻报》。

② 司徒律：《回忆在美洲华侨日报的日子》，中新社《业务通讯》，1990。

编务)，总编辑黄玉珍。

1998年12月，《联合日报》宣布停刊。该报创办人吴敬敷在停刊声明中说：“四十七年来，纽约华文日报先后停刊者不下十六家，本报尚能支撑迄今，宗旨不稍变，亦未受任何方面分文津贴。无奈岁月催人，创办人已年老退休，欲再支撑有所未能，只好宣布停刊”。在谈到该报停刊原因时，有人认为：“美国修改移民政策以后，纽约侨社近20年来大量新移民涌入，改变了过去单一台山人和其他广东移民的局面。社区急剧变化，而《联合日报》仍坚守五六十年代的办报方向，因而与华人社区脱节，读者层面也受到很大的局限，停刊是在所难免的”^①。

《华美日报》该报也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创办于1943年4月9日，由中国国民党员余仁山、李莘之等创办，取名《纽约新报》。初期执行国民党宣传政策，战后因支持冯玉祥（1882-1948）的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等言论受到压力，余仁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报纸亦于1950年8月18日停刊。余缙棠等购下该报后，改名为《光华日报》继续出版。1951年4月11日，又由曾为国民党要员的陈立夫（1900-）、潘公展（1895-1995）、徐堪（1888-1969）等人买下，以中美文化公司的名义出版，名称改为《华美日报》。徐、陈先后任董事长，潘任主笔多年。参与者还有陶百川、赖琏、项定荣、陈裕清等人。1975年，台湾印刷机制造业商人朱伯舜（Chu Po Shen）来美，购下该报，以华美日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接办，自任董事长，陈立夫改任名誉董事长。新股东还有旅居阿尔及利亚的侨商朱乐涛等。社长兼总经理、总主笔先为项定荣，后由朱鸿华任董事总经理。总编辑先后为袁良、江枫、陆铁山、陆映山。该报与台湾当局渊

^① 《纽约历史最长的中文 联合日报 停刊》，《地平线》月刊，1999年2期。

源甚深，在台北设有办事处和出版“国际航空版”，宣称其宗旨是“发扬中华文化，服务侨界”。日出对开纸 2 张 8 版，使用“民国”纪年。在美国发行甚少，每期印数只有数百份，市场上很少见到。

《纽约日报》 1972 年 11 月 22 日由梁桢（纽约金都戏院老板）、楼明发、谭勇为、王桂生、郑士镕、林缙光等合资创办。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为福建客籍报人王桂生。不久王退股，由梁桢任社长，郑士镕接任总编辑（至报纸停刊），谭勇为任总经理。该报创刊不久，适逢香港影星李小龙暴卒，报纸因同电影界关系密切而获得独家新闻，遂使报份迅速上升至 1 万多份。1974 年 4 月 10 日，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说，郑士镕作为惟一的华人记者参加采访，并于第二天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对此作了报道。这是美、中尚未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的条件下，美国第一份以一手材料报道邓小平演说内容的华文报纸，因而受到广泛关注。这一时期，该报每周出版 6 天，日出对开纸 3 张 12 版，有国际新闻和中国大陆重要新闻 2 版，香港新闻 2 版，台湾新闻、侨社新闻、美国地方新闻各 1 版，其余为副刊和广告。该报以侨社问题为主要关注点，华人员工的福利待遇问题，华人参政问题，侨团新鲜血液的补充问题以及华人青少年因失学失业导致的犯罪问题等。报纸反对“台独”以及一切破坏中国统一的言论和行为，强调实现中国统一是当代中华民族子孙共同的责任。1978 年，该报在其 6 周年社论中对其立场作了如下陈述：“1972 年创刊迄今，六年如一日，纽约日报所朝夕馨香祈望的，是世界和平，祖国统一，侨社进步”，“除为侨社竭诚服务以外，别无其他更值得努力以赴的事功”。

进入 80 年代，随着纽约华文报业竞争的日趋激烈，《纽约日报》每况愈下，1984 年为原股东之一、华人画家林缙光购得，林自任社长，副社长兼总编辑为陈天璇。1985 年 11 月 19 日起，

实行华、英文合刊，并向唐人街以外的主流社会发行。这是第一家尝试进入英语报刊零售市场的华人所办的双语日报。该报董事长林缉光说，这份报纸用中英双语出版，目的是使华人报纸能够进入美国社会，增进美籍华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美籍华人不懂中文的青年一代和美国人民真正了解中国。由于该报最终未能走出困境，终于 1986 年 2 月 5 日停刊。因债务方面的法律问题，该报当年曾一度改出短期的《经济时报》（中、英文合刊的周报）和《中原周报》，至同年 8 月终刊。

《世界日报》 1976 年 2 月 12 日创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惕吾（1913 - 1996）投巨资创办。王惕吾称该报的主旨是“传播中华文化”，“迅速报道”台湾“实施民主宪政、民生福利建设的实况”，“加强对侨胞与侨社的服务，结合海外中国人的自由力量”，并促进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友谊”。该报以政治为着眼点，不惜亏损地大批赠阅，压价争取广告，并利用多种手段大力推广，一跃而成为全美发行数量最大的华文报纸，被称为美国华文报业的“巨无霸”。该报初创时有纽约版、旧金山版，1980 年又增加了洛杉矶版，报社还在台北、香港、多伦多、温哥华、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和檀香山设有办事处。纽约版初期每日出对开纸 3 张 12 版（星期天休刊），现每期出对开纸 14 - 24 张，每周出版 7 次，是美国目前惟一星期天不休刊的华文报。主要版面有要闻、国际新闻、华埠新闻、台湾新闻、香港新闻、当地新闻、东南亚新闻、体育、经贸、影视、青年、妇女、旅游、小说、副刊等。该报一贯采用“民国”纪年，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政策，至 1989 年仍称北京为北平。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该报态度有所改变，在新闻报道上稍有松动，增加了关于中国大陆情况的报道，但根本方针依旧。如王惕吾 1994 年还明确表示该报的言论是“亲台湾，反台独”。该报董事长初由王惕吾本人担任，副董事长为其子王必成、王必立。

1996 年时董事长为王必成，副董事长王必立，总社长李厚维（王惕吾的次女婿）总编辑郭俊良。

《北美日报》 1978 年 7 月 22 日创刊。该报是在《星岛日报》美东版被香港总部收回自办后，由原经营者苏国坤（Eddie So）于原址创办的，苏自任社长。初期由严昭（Daniel Yen）任总编辑，后陈婉莹（Yuen Ying Chan）曾任总编辑。1979 年 11 月在多伦多发行加拿大版。1980 年 1 月由旧金山中文报业联营公司经销，向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夏威夷发行。该报自称实行“力求独立公正编辑方针”“力求忠实报道、公正立场的编辑政策”，并声称将“作为一份为北美洲华人服务的报纸，作为一份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报纸”。1981 年 7 月 27 日起实行横排，版面由 3 张 12 版扩大为 4 张 16 版。1982 年由吴隆达接办，任董事长。1984 年起由俞国基任社长兼总编辑。1984 年 4 月 17 日恢复直排，内容有所增加，扩大了为社区服务的工作，版面也扩大到 5 张 20 版。增版后该报再次阐述其方针为：“站在正义的一边，为人类和少数民族的不平而战”“确立以社区为取向 尽力使本报成为代表华人社区的报纸”。该报主要版面有要闻、世界新闻、中国新闻、台湾新闻、香港新闻、纽约新闻、华埠新闻、论坛、娱乐、北美生活、文艺广场、小说、社会服务等，广告约占一半。1987 年再次由严昭任社长兼总编辑。由于当时纽约华文日报过多，竞争激烈，该报经营遇到困难，于 1987 年 11 月 5 日停刊。

《华语快报》 1980 年 6 月 16 日由纽约华语广播公司创办，The Greater Chinatown Publishing, Inc. 出版。发行人为电视工作者刘恕（Arthur Liu），社长为曾在多家传媒工作过的华人记者郑心元（Hsiu-yuan Cheng），总主笔为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报头下的口号为：“扎根自由土地，参与民主政治，维护华人人权”。该报为对开日报，日出纸由 2 张 8 版、3 张 12 版逐步

增加到 4 张 16 版。原由英文印刷厂承印，1982 年自置印刷机。主要内容有要闻、社论、国际新闻、美国新闻、中国大陆新闻、台湾新闻、香港新闻、娱乐圈新闻、体育、画页、服务、“自由谈”专栏、医疗保健、连载小说、副刊《上下古今》等。1984 年增辟由陆铿主编、多位华人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的《新独立论坛》版，发表华人知识分子各种不同的观点。当时纽约华文日报过度集中，竞争激烈，该报开支需由华语广播公司和亚洲印刷厂补贴。为了摆脱困境，报纸一方面减少篇幅为 2 张 8 版，同时加强深度报道，除 1 版刊登社论和新闻外，内页全部为文章、通讯、副刊类稿件；另一方面，于 1986 年夏在皇后区出版了《华语快报》的姐妹报《皇后日报》（Sino Daily Express Queens Edition），以争取新移民读者。但未能打开销路。由于经济困难，1986 年 12 月 1 日宣布两报停刊，并于同年 12 月 8 日起出《华语快报·皇后日报联合版》，每周发刊一次。1987 年 7 月 20 日，又宣布联合版暂时停刊 3 个月，公开征求合作者集资办报，未果而终。

《中报》 1982 年 2 月 27 日创办，创办人傅朝枢（Chao - chu Fu, 1924 - ）原为《台湾日报》老板，因其发表的“党外新闻”不容于中国国民党当局，被迫收盘并离开台湾，以出卖该报所获资金于 1980 年 2 月 27 日在香港创办《中报》，声称“面对海峡两岸，均怀善良愿望”。1981 年 4 月因著文抨击蒋经国（1910 - 1988）在有关两岸探亲问题上的僵硬立场，遭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并冻结财产。第二年即到美国出版美洲《中报》，宣告“我们的立场乃为中国人的立场”；“不偏不倚 不党不私”，并支持中国统一。总部设在纽约，1984 年出洛杉矶版，后陆续增出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多伦多、休斯敦等版，形成报业集团。各版相互以卫星传送部分版面，在各地加上当地新闻和广告印刷、发行。至 80 年代中期，该报已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

几家全国性华文报纸之一。当时日出对开纸 10 张 40 版左右，内容有社论、国际新闻、综合新闻、香港快讯、体育、舆论广场、台湾新闻、经济、神州大地、大千世界（画刊）、纽约大都会新闻、各地华人社区新闻和各种副刊。1987 年起日渐收缩，除纽约、洛杉矶之外，北美地区其他的地方版相继停刊。美洲《中报》集团董事长、发行人和纽约《中报》总编辑初由傅朝枢担任，1989 年 7 月 5 日傅引退，交由其子女经营，由傅雅堂任纽约、加州中报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献堂任美洲中报发行人。同年 9 月 18 日，该报宣布停刊。由于对傅朝枢的通缉令和冻结财产的决定已于 1988 年撤销，傅于 1991 年返回台湾，并于 1994 年在台创办《台湾民报》，表示要支持李登辉。据认为，《中报》的停刊与傅朝枢“政治上和名声上的赌博”是分不开的。

除了上述 8 家报纸外，还有 9 家香港日报的美洲版也曾在纽约等地出版和发行。最早出美洲版的是《星岛日报》，后来陆续出版的 8 家是：《成报》、《明报》、《新报》、《电视报》、《大公报》、《信报》、《文汇报》和《商报》。另有两份仅办了 2 年多的日报，即由原香港《华侨日报》美洲版改办的、于 1978 年创刊的《华声日报》和 1982 年 9 月 1 日创刊的《中国时报》。它们已先后于 1980 年 10 月初和 1984 年 11 月停刊。

70 年代后期在纽约出版过或仍在出版的期刊不下二三十种。其中有每周出版两次的《台湾公论报》周刊《工人观点》、《节目一周》、《星报》、《美加周报》、《时报周刊》和《时代周报》；双周刊《华埠青年人》、《娱乐双周》；8 开版报纸型半月刊《全美学联通讯》月刊《自由人》（实为不定期刊）《新土》、《运河月刊》、《社声》、《香港学生联谊会月报》、《华协月报》、《大众月刊》、《大都会月报》、《堂区通讯》（纯宗教刊物）季刊《文荟》；半年刊《秋火》和不定期刊《美洲中华书法学会特刊》、《平等报》、《衣食住行》由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丘农达与《星岛

日报》纽约版负责人梅建南等创办的《独立论坛》月刊，则从 1987 年 5 月 4 日起，作为纽约《星岛日报》专版刊出。^①

（二）旧金山

由于华人在旧金山聚居的历史长久，这里土生华人的比例比其他地区要大。虽然土生华人懂中文的不多，但他们大多关心华人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希望中美友好，因而对华社活动参与的程度比较高。这一时期由当地华人创办的华文报纸仅有两家，即《少年中国》和《金山时报》华、英文报纸一家。

《少年中国》原名《少年中国晨报》。孙中山于 20 世纪初期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长期以来一直为台湾当局把持。负责人虽多次变动，但始终执行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政策。70 年代曾宣称要“号召团结海外华胄力量，汇成反共洪流”，80 年代又说“凡一切共产暴政，必口诛笔伐，不稍容情”。由于其明显的反共立场和编辑方面的保守落后，从 60 年代起已渐趋衰落，靠产业入息始得维持。又因 1962 年编印英文周刊造成巨大亏损，使得债台高筑。国民党当局在陆续关闭其他一些海外党报的情况下，却几次向该报注资，力图挽救。1970 年，台湾《中央日报》和在美国国民党员集资 15 万美元承购该报，但起色不大。1986 年，台湾当局又一次注资和派人前往改组。此后即将篇幅由对开 3 张 12 版增加到 6 张 24 版，扩大了新闻版面，同时改进编排，并于 1986 年 4 月 1 日增出洛杉矶版（英文名 China Daily News）。但终于未能挽回颓势，两地版同时于 1991 年 4 月 1 日停刊。停刊前董事长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海外党务委员会主任的陈裕清，社长徐绍铭，总编辑王绍志。该报从创办到停刊历经 82 年，是美国存续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

^①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第 193 页，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金山时报》美国现存历史最长的报纸之一。1921年先办月刊，后为了抗议美国移民苛例，阐述华人的立场、观点，由美籍华人组织——美洲同源总会会员集股，每股3美元，成立股份公司，将月刊改为日报，取名《金山时报》，于1924年7月15日在旧金山面世。发起人有林华耀（Walter U. Lum）、洪耀宗、林康惠、李时镜等。林华耀为同源总会创始人之一，曾带头争取废除排华法案，他负责该报工作35年，现旧金山华埠仍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1977年，因拥有该报股票额半数以上的老股东已死亡，其股票由加州司法当局拍卖，引起台湾、香港多方面的兴趣，该报遂向法院起诉。经法院判决，这部分股票由该报购得，从而使该报继续由同源总会控制。70年代末期，报纸销量达到1万份以上。进入80年代，由于香港报纸传真版大批涌入，竞争日趋激烈，而该报从内容、编排到印刷都显得保守，在竞争中失利，报份大幅下跌。虽经数次革新，报份略有回升，但仍处于困难境地。1988年，旧金山一华人财团收购了该报。此后由谭树本（Stanley Horn）任总裁，原香港《明报》副总编辑李文锜（Leonard M. K. Lee）任总编辑。该报公元和民国纪年并用，报头下显示的宗旨未变，即“专以发展华侨公益为职志；言论公正，新闻翔实，电讯灵通”。1996年日出对开纸4张16版，内容有要闻、国内外新闻、两岸新闻、香港新闻、南加州新闻、旧金山湾区新闻、侨社新闻和3个版的副刊。总裁仍为谭树本，总编辑为李创基，经理黎敬熙。

《时代报》美国时代有限公司出版的华、英文报纸，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同一星期创刊。创办人黄运基著文阐述其办报宗旨时说，“《时代报》创刊于美中两国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之际，肩负着迎新、革新、立新的重担，每周把中国的新人新事、新旧世界的较量、美国华人社区和动态传达给读者”；其时代使命是“当美籍华人的喉舌，为美籍华人的权益竭尽职

责”。政治上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该报初为周报，华文、英文合刊，一年后停用英文，1976年又改出单独的英文版。两种语言版均为4开纸，华文版每期4张16版，英文版每期3张12版。英文版维持出版了4年后只出华文版。1982年2月24日该报创刊10周年时改为对开大报，8月11日扩充篇幅为每期3大张12版，同年10月2日改为周三刊，1983年5月改为日报，有时出14-16版。主要内容有要闻、美国新闻、中国新闻、本埠新闻、社区新闻、图片、娱乐与体育以及自由谈、万花筒、历史与人物、新园地、小说、新书刊等专栏、副刊。该报曾是美国西部唯一一份大量报道中国大陆新闻的华文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时和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黄运基均作为该报记者参加采访，成为一大特色。该报还重视华人问题，曾连续4年连载美国华人学者麦礼谦（Him Mark Lai, 1925-）长达20万字的《美国华侨简史》一书，颇受读者瞩目。1986年11月15日，该报因“面临两个根本问题：钱和人”^①而告停刊。

除了上述报纸之外，旧金山还有不少家外来的华文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是最早在旧金山印行的外来日报；香港的《明报》、《新报》、《成报》、《快报》、《大公报》等也先后在此印行美洲版。1980年，台湾在旧金山创办了一份《远东时报》，但由于各种原因只存在了两年。创办于纽约的《世界日报》也在此设立了美西总社，印行美西版。

除日报外，旧金山还出版了十多家期刊。其中有1945年创办的《太平洋周报》、1967年创办的《东西报》（从1983年8月起两份周刊合并出版）半月刊《正言报》、《新星报》、《新报

^① 《讣告——旧金山时代报停刊》载《论坛报》1986年11月25日。

双日刊》周刊《人报》、《光华报》、《中山报》、《商报》、《天声报》、《星岛周报》、《炮报》(后改为月刊)《中南报》季刊《华文进步会会刊(通讯)》和《中华语文月刊》等。

此外,旧金山还有一家华文通讯社,名为“金山新闻社”,社长黄源超。

(三) 洛杉矶(包括加州蒙特利市等地)

70年代以前,洛杉矶的华文报刊寥若晨星。70年代中期,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华文报刊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其中大部分为台湾移民或由台湾当局控制的势力所办。80年代以后,又有一批新的报刊创办,其中的一些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有的延续至今)主要的有:

《国际日报》 1981年11月2日由曾经涉足台湾政界和在台经商、办学的陈韬、李亚频夫妇移民美国后创办(创办于大洛杉矶地区的蒙特雷公园市),是北美洲最早实行彩色印刷的大型华文日报。董事主席为陈韬,发行人李亚频,董事副主席(社长)兼总经理为陈韬之子陈英,总编辑为曾任《台湾日报》副社长的荆溪人。该报宣称“以团结中华儿女为目标,以增进华侨公益为蓝本”,“既不亲中国大陆,也不亲台湾”,编辑政策是“新闻报道,务求迅速、确实”;“言论意见,务求客观、公正”;“为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服务”。创刊时日出对开纸4张16版,1982年扩版为对开纸6张24版。至1983年已在美国、加拿大设立6个分社,并有独立的4开周报《国际周报》出版(1989年改为随报附送的《星期增刊》一大张)1987年又增设巴拿马、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分社,创办英文《新闻文摘》。至1995年,每日出对开纸8-10张,以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纽约、亚特兰大5个版同时发行。版面内容有国际焦点、言论舆情、国际社会、国际经济、台湾新闻、台湾影视、香港影视、国际影视、大陆新闻、香港新闻、闲情逸趣、医药保健、音乐天地、消费广场、人物春

秋、甜蜜家庭、小说总汇、国际体育、美东新闻、金山华人、洛城华人等。由于具有台湾背景的日报在美竞争激烈，发展受阻，1995年10月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熊氏集团（S. S. Group）收购，集团总裁熊德龙任董事长，集团副总裁熊斐文任社长，朱焕武任总编辑，版面增加到每日11-13大张44-52版。

《新光大报》 1951年9月1日创刊于洛杉矶，初名《光大报》，由华侨各界集资创办，董事长李秀华，主持人雷法均。1961年宣告破产。后由李振胜等出资购得，改现名于当年10月15日复刊，以中国文化公司名义承办，由朱箕活、周大为主持，总编辑为陈威立（楚湘）。该报采用“中华民国”纪年，由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并宣称要报道国民党当局的“国策”。台湾《中央日报》曾向其供应全套4号新铅字以改进版面效果。原每期出4开纸4张16版，1983年改为每期出对开纸3张12版。广告约占二分之一。该报以当地华人社区新闻、台湾新闻为主，也有美国新闻、中国大陆新闻、国际新闻和少量副刊性文字。1996年董事长为陈威立（兼总编辑），社长马允臧（兼总经理）。

《立报》 1976年1月1日创办于洛杉矶。先为周二报，后改为周报。“中华民国”和公元纪年并用。每期出4开纸24版，刊有洛杉矶华人社区和美国各地新闻、香港行情、“台湾与大陆”版，其余为副刊及广告。社长为中华会馆监事黄金泉，发行人黄伯英。1987年停刊。

《华兴时报》原名《南华时报》，1980年1月30日创办于大洛杉矶地区的蒙特雷公园市，1983年夏迁至圣加夫列尔（San Gabriel）。1989年初该报与相关企业华兴学院及圣迭戈人文大学合并成中美文化教育公司，并将报纸于1989年10月改现名，再迁于罗斯米德市（Rosemead）。改名后的第一版刊有台湾驻洛杉

矶“协调处长”的贺词。该报主要内容有当地华人新闻、中国短讯、华人节令风俗、历史文物、文化艺术、中医药、《锦囊妙计》、《健康生活》专页和大量广告。1991年每期出对开纸1张半6版，发行人兼社长为中美文化教育公司董事长郭原勋。1995年前停刊。

《联合时报》 1980年9月3日创刊于加州阿尔汉布拉。每期出4开纸9张36版到11张44版不等，内容以华人社区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主，有时事一周、新闻眼、工商一周、地方新闻、社区服务以及各种消闲性专栏，还有关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报道。副刊中有不少关于西方社会生活和各国文物、风光、人物掌故方面的文章。广告约占总篇幅的四分之三。负责人原为宋秀兰，1991年时为魏宏俊。后停刊转为电子版。

《龙报》 1980年9月17日创办于加州蒙特雷公园市。脱胎于蒙特雷公园市英文报纸《进步报》——该报于1980年春开辟的华文专栏，专门报道本地区有关华人的新闻和活动。非卖品。总编辑杨海伦（本名秀滨）。创刊号共6版，刊有台湾奉祀官孔德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张其昀等题写的贺词。不久后停刊。

《越华报》 1980年12月26日创办于洛杉矶，是越棉寮（越南、老挝、柬埔寨）华裔难民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该报由台湾当局支持下的美国越南华裔联合会主办，名誉董事长为台北《自由侨声》董事长、台北越南归侨协会理事长阮乐化神父，首任社长为美国越南华裔联合会会长李少光（Vincent Siu - cong, 1929 - ）。该报宣称其宗旨为“正确报道‘铁幕’内的动向，宣扬中华民族文化，支持全球各地越棉寮社团的成长”，并表示“五洲反共一条心”。每期出对开纸4张16版至4张半18版，广告占四分之三。主要内容有越棉寮地区情况、当地越棉寮华人移民情况，亦有转载的台湾要闻和其他国际新闻。1996年时社长为叶世材，总编辑陈星云。

《论坛报》前身是《加州日报》，1982年4月创办于大洛杉矶地区，由一批台湾移民中的技术人员集资创办。宣称以“财务独立”、“言论自由”、“论政不从政”和“园地公开”为办报原则。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倾向，致力于促进中美和睦友好，鼓励华人参政。该报每期出对开纸2张半10版，主要内容为时事政治文章。1983年7月24日起连载后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暗杀的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1932-1984）所写《蒋经国传》并汇集成书于1984年9月出版，遂使该报名噪一时。但因同仁办报，经费有限，曾数次短期休刊进行筹款和改组。1989年5月18日因“财务困难……达到同仁们分担吃力的程度”而停刊。停刊前董事长为华人社会活动家李惠英，发行人为电力工程学家梁佩璐，社长为范培林。

《越棉寮报》1982年6月11日创办于洛杉矶，由越棉寮华裔移民创办。董事长黄兴忠，社长庄清和，总编辑何健行。每期出对开纸5张20版，头版和末版为彩色。重要栏目有要闻、社论、一周纵横谈、袖珍新闻、每周话题、世界一周、华埠新闻等，广告超过三分之二。1986年报纸改组，庄、何相继离去，改由杨海（Hay Yang）接办，任董事长，社长为刘振辉（Henry Liu）。该报在改版社论中申明：“以维护越棉寮华人应有权益”作为自己“应负起的道义责任”，“同时，愿与其他华人团体做出坦诚的合作团结”，“维护整体华人权益”。该报每期出4张16版，主要内容有当地华人社区，特别是越棉寮华人移民动态和评论，有关中南半岛和台海两岸局势的报道分析以及各种知识性的文章。1996年时总编辑徐伟光，总经理张涌南。

《新亚洲报》1987年2月创刊于洛杉矶，由印支华裔报人联合会主办。每期出对开纸2张8版，第1版和第8版为彩色印刷。内容有美国新闻、社论、越棉寮新闻、侨社新闻、一周纵横谈、行者专栏等。其宗旨是：“使亚裔能团结一致，致力于社区

的繁荣，并取得所在地之公平政治地位与权力，进而促成母国政治修明，实现自由民主，国土统一，冀可唤起亚洲人种的觉醒，使我亚裔得以光耀于世，再无海外孤儿及政治难民之噩梦复现”。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均为同一母国国土，不可分割。发行人何健行。已停刊。

除上述报纸之外，70年代以来，在加州的奥克兰出版过《团结报》加州的伯灵甘出版过《四海报》（双周刊）阿罕布拉市出版过《联合时报》。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外来华文报刊印行，如纽约的《世界日报》于1980年6月16日创办了洛杉矶版；旧金山的《金山时报》以及香港的《星岛日报》、《新报》、《明报》、《成报》等均在此开设了办事处。

除了报刊之外，洛杉矶还有一家“荣华新闻社”，主要报道当地华人社团的活动，供应照片等。该新闻社董事长、发行人兼总经理为陈威立，社长兼总编辑为马允臧。

（四）华盛顿及其他各州

位于美国东部的美国首府华盛顿，华人居住的历史较短，故长期没有华文报刊出版，直到70年代才开始出现一些期刊和不定期刊物。曾经出版过或仍在出版的报刊有《华府春秋》、《乡亲》、《台湾季刊》、《华府新闻报》、《西华报》和《华府邮报》等。

《华府春秋》 1972年4月创办，缮写影印出版，是参加保卫钓鱼岛运动的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地区出版的惟一的华文刊物（月刊）。随着“保钓运动”日益发展为要求祖国统一、促进美中建交的运动，该刊主要讨论台海两岸关系和中国统一问题，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保钓运动”结束后延续出版多年，在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于1978年8月号出版后停刊。

《乡亲》 1973年创办于旧金山，由旧金山台湾同乡福利会

主办。初由一位台湾籍人士做执行编辑。第 3 期以后，该编辑辞去编务，改由台湾同乡福利会的庄怀义及“革新保台”分子张显钟实际负责。后成为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由该会事务局在华盛顿出版、发行。

《台湾季刊》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秘书处主办。20 世纪 70 年代在马里兰州出版，为该会每年召开年会的专辑。如第 1 号记述该会在维也纳成立的情况；第 2 号记述在纽约举行的年会；第 3 号记述在洛杉矶举行的年会；第 4 号在日本印刷，记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 (Kingston) 举行的年会。

《华府新闻报》1979 年 8 月由韦振之 (James C. Wei) 创办于马里兰州，面向大华盛顿地区发行，是当地最早的和当时惟一的华文报纸 (双周报)。其宗旨是促进华人社会团结，为华人向美国政府争取福利，褒扬事业有成的年轻一代，鼓励华人参政。主要内容有华人社区新闻、美国新闻、国际要闻、中国大陆新闻、台湾新闻，其余为副刊、广告。中途曾两度停刊。1986 年 11 月复刊后改为电脑打字胶印，篇幅由 2 张 8 版增加到 2 张半 10 版，发行约 3000 份。1989 年夏停刊。停刊前发行人兼社长为韦振之，他曾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随行记者访问中国。

《华府邮报》1983 年 4 月 14 日创办于华盛顿。每期出对开纸 4 张 16 版，内容侧重于大华府地区华裔生活或工作情况的报道。该报在试刊号上表示：“一个中国人不论其美国化程度如何，都有权利和责任继承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而先得充实本身的中华文化基础知识”。该报经常刊登时事分析专文和文艺作品。首任董事长许冀云，社长王定南。1995 年时董事长为王显耀，社长夏绪安。

除上述报刊外，纽约、旧金山等地出版的华文日报，包括香港部分报纸的美洲版，大部分均由华盛顿发行。

在美国其他各州，如休斯顿、芝加哥、西雅图、费城、夏威

夷、波士顿这些华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有一些华文刊物出版。

休斯顿是得克萨斯州的大城市，也是美国石油、航天工业中心之一。近年来，外来移民在此定居者较多，台湾移民和印支华裔难民也有不少涌入此地。在这里出版或曾经出版过的华文报刊主要有旅美留学生于 1976 年创办的《西南时报》（华、英文半月刊），1979 年 6 月 16 日创办的《美南新闻》（原为三日刊，1984 年改为日报），1975 年创办的《华声导报》（不定期，非卖品），1981 年创办《华商报》（周报），1986 年印行的《中报》休斯顿版以及定期刊物《凯讯》（台湾人办的双月刊）、《休斯顿通报》和《望春风》（全美台湾同学会发行）。目前继续出版的仅有《美南新闻》（包括其附属报《美南工商》）、《华声导报》、《华商报》以及 1982 年创刊的《中华快报》（周刊）。

芝加哥自 70 年代以来创办及发行过《民报》、《民主台湾》、《华声日报》芝加哥版以及《革命工人报》。

夏威夷、檀香山的华文报刊有着悠久的历史。自 70 年代以来，这里出版过《中国之友》和《自由中国》等刊物，均已停刊。现仅有创刊于 1928 年的《中华新报》还在继续刊行。该报原名《中华公报》，初为周三刊，1942 年起改为日刊（除周日外每天出版），1951 年 7 月 3 日起改名为《中华新报》，蒋介石亲为题写报头，一贯执行亲蒋反共政策。1996 年时负责人为陈无汉。

波士顿曾经出版过维持多年的《波士顿通讯》和《瑞香华译新报》；费城出版过《华美字报》（周刊）；依阿华州出版过《台中港》；新泽西州出版过《台独季刊》；俄亥俄州出版过《火烧岛》；伊利诺斯州出版过《大汉风》；密歇根州出版过《密西根简报》；西雅图出版过《西华报》；圣地亚哥出版过《加华时报》。此外，1984 年 5 月美国还出版过《源流》双月刊。这些地区截至 1985 年底前仍继续出版的华文报刊有圣地亚哥的以印支难民

为对象的周刊《加华时报》、密歇根州的《密西根简报》以及西雅图的《西华报》。

在美国，还有三家华人通讯社，都是由台湾移民主办的，它们是菁华通讯社、荣华通讯社和金山新闻社。

菁华通讯社 (Asia Press) 1973 年 8 月 8 日开始发稿，创办人是一位有“爵士”头衔、曾任台湾《体育世界》副总编辑的柯尹文 (又名柯哲澄, Sir Robert Ko O. S. J)。该通讯社自称是“非官方新闻机构” 1976 年与菁华旅行团、菁华商展服务中心分组联营公司加盟瑞士汉滋集团，以旅行团及商展收入支付日常开支，对外发稿不收费。该社主要业务有：1、报道各地华侨社区新闻，分中、英、日、西班牙 4 种文字稿，每周发稿 7 次。2、出版《菁华新闻》、《东亚报道》、《美国华人史》等还编印了中英文对照的《美华名人录》。3、以电脑编印、发行多种行业之名录包括《美国华人邮寄名单》、《美国华商电脑名单》、《美国各行各业大中小盘名单》、《美国国会、政要住址名单》、《美国各大学各科系主任名单》等。4、制作名为“Asian Vision”的电视新闻片，供美国和韩国公共电视台播放，已拍出 400 多部。发行人柯尹文，行政主任许文幸。在世界各地有 17 个工作站。北京特派员王苏芬。

荣华通讯社 1973 年成立于洛杉矶华埠，英文名 William's Service (News Agency)。从通讯处和负责人看，为《新光大报》所办。该通讯社报道在美华裔人士的成就、贡献和侨社活动。主要向美国西海岸和加拿大发稿，有关东南亚地区的新闻照片也向港、台、新、马、泰等发稿。1976 年曾获台“联侨总会”举办的中文报业“新闻采访奖”。在台北设有办事处。董事长为《新光大报》董事长陈威立，社长兼总编辑为《新光大报》社长马允臧，总经理陈子平。

金山新闻社 (San Francisco News) 1977 年成立于旧金山，当

年 5 月 20 日起开始向旧金山的一些华文报以及纽约、台北、香港报刊发文字稿和图片稿。董事长林雁君，副董事长蒋尽忠，发行人叶莉莉，社长黄源超，总编辑马全忠。

二、加拿大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加拿大的华人只有数万名，华文报刊也屈指可数（早期只有《日新报》、《大汉公报》、《新民国报》、《醒华日报》、《洪钟时报》等几家）1976 年以来，加拿大实施“新移民条例”，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使得由香港前往谋生、留学者日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华人前往定居者也越来越多。到 80 年代末期，全加华人总数已超过 45 万。随着华人人数的急剧增长，华人人口较为集中的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以及首都渥太华等大中城市的华文报刊也逐渐发展起来。

（一）多伦多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200 多万人口，其中华人人口 30 多万，占加拿大华人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因而这里的华文报刊最多，80 年代中后期有日报 5 家，周报 3 家。

《星岛日报》（加东版）1978 年由香港《星岛日报》创办于加拿大多伦多。初在纽约印刷，用巴士运来；1981 年以后购置新式印刷机改由自己印刷。在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的年轻经理姚守一的主持下，该报员工由最初的五六人扩展至 90 年代中期的近 40 人，出报亦由最初的 3 大张 12 版增加到 11 大张 44 版。销量平日 1 万余份，周末可达 15000 份，约等于其他所有中文报纸的总和，是美加星岛系统最赚钱的分社。该报的成功得益于它的香港背景。多伦多是香港移民聚居之地，这些新移民来到国外，思乡怀旧之情难以排遣，尤其是当他们面临失意、落魄的境况的时候。而这时能够给他们最廉价安慰的就是来自香港的大家所熟悉的报纸，《星岛日报》在多伦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就这一点而言，当地的任何报纸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1995 年的

负责人为门宗津。

《加华日报》 1984 年 9 月 1 日由南洋华侨、香港华丰国货公司财团老板许东亮之子许丕新创办。该报自称是一份“以报道加拿大华人社区动态为主”的报纸，目的是“为投资移民”服务。设备比较先进，能接收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的电传稿。最初出 4 大张 16 版，后来增加到 6 张 24 版。内容有世界新闻、香港新闻、大陆新闻、台湾新闻、美加新闻、华人社区新闻等。发行 2000 余份，该报在创刊两周年时撰文指出：“自创办之日起，《加华日报》就站在华裔加人的立场上，首要关注，维护华裔加人的权益，确立植根本地、服务社会的办报宗旨和目标，探索迈向报纸本地化、大众化的路向，使之真正成为一份言论客观、立场公正、态度开放、以报道与本国及本国华人密切相关的新闻为主的报纸”。1978 年，社长许丕新与友人合办彩色精印的《加华杂志》同年 5 月，又推出《加华日报周末专刊》（4 开纸 2-3 张，随报附送）。至此，《加华日报》宣称自己“已成为本地第一家同时拥有日报、周报、月刊等最多品种的华文传播媒介机构”。1989 年 10 月，《加华日报》停刊 改出《加华日报周末版》。

《快报》 1971 年 1 月 9 日创刊，由以中国国民党人莫夏风为首的、从《醒华日报》分离出来（因受排挤）的人员集资创办。该报虽然在创刊词中宣称其“站在中间路线的立场进行宣传报道”，却被认为是明显区别于一面倒向国民党的《醒华日报》的左倾报纸。该报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视台湾为中国一省，并在社论中提出“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的主张。日出对开纸 4 张 16 版，内容包括要闻、国际新闻、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新闻和当地新闻，此外还有小说专版和副刊，广告也不少。除了多伦多发行外，还销往温哥华、蒙特利尔、纽约等地。80 年代以后，在多种华文报刊的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1984 年，莫夏风等人退休让股，将报纸售出，改新式印刷，由《醒华日

报》承印，免费赠送，由此开始出现赤字。80年代末期停刊。

《世界日报》加东版 台湾联合报系在美所办《世界日报》的加拿大版。该报 1976 在纽约创办后，增出旧金山、洛杉矶版，又在多伦多（1987 年）和温哥华设立了办事处，出版加拿大版。其发行量最初几年还不错，后大幅下落。1986 年，《世界日报》社长曾多次亲莅指导，以求重整旗鼓，但起色不大。《世界日报》加东版原由《醒华日报》承印，1988 年后自置印刷设备，聘请专业人才，自行印刷。读者对象主要是来自台湾的移民和留学生。日出对开纸 18-20 张，大部分新闻、副刊版面与纽约版相同，自行采编当地新闻和经营广告。90 年代初负责人为钱舜麟。

《醒华日报》加东历史最悠久的一份华文报纸，1922 年创刊，是中国国民党驻多伦多支部的机关报。该报立场最右，也是办得最艰难的报纸。70 年代以前，该报曾有过三四十年的好光景，1971 年《快报》出现后，它便开始走下坡路，销量越来越少，以至到了抵押机器、变卖产业的地步。但由于该报是国民党在美洲地区除《少年中国晨报》、《新民国日报》以外仅存的“海外喉舌”之一，因此国民党海工会、侨委会定期向它提供数千计美金的津贴，帮助它渡过危机。该报日出对开纸 3 张 12 版，除本地新闻外，其他新闻主要靠香港寄来的报纸剪贴而成。连卖带送，发行量不超过六七百份。1990 年 11 月 1 日起改为《醒华报》（月刊）以小型刊物的方式刊行。社长为郑伟志。

多伦多还有三家周报《城居周刊》、《时代周报》和《越棉寮华报》，三报都是免费赠阅的。《城居周刊》以报道房地产动态为主；《时代周报》内容分华埠人事、时论、财经、工商、文化艺术、生活娱乐、饮食消费等。这两份周刊有一定的影响，发行量

二三千份。《越棉寮华报》是靠台湾支持的，没有什么影响。^①

（二）温哥华

温哥华是加拿大第二个华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 80 年代初期居住在温哥华的华人有 8 万余人，而 80 年代中期（1986 年）就激增至 15 万人。这里的移民大部分来自香港，老华侨已不多了。温哥华影响较大的华文日报主要有 3 家，即《星岛日报》加西版、《大汉公报》和《侨声日报》。其中又以前两者为主。

《星岛日报》加西版创办于 1979 年，是当时香港《星岛日报》6 个海外版中惟一改“民国”纪年为公元纪年的。创刊后几年，保持平稳发展，1985 年起开始赢利。日出对开纸 6 张 24 版以上，广告约占一半。要闻、副刊等采用香港版内容，同时也力求开辟自己的园地但无多大特色。1995 年负责人为曾锦锐。

《大汉公报》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由温哥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创办（1907 年创刊时名为《大汉报》，1910 年改称《大汉日报》，1914 年后改称《大汉公报》），初创时日出对开纸 1 张 4 版，其后 80 多年间不断更新设备、改进内容。至 80 年代末，版面已增至 6 张 24 版。内容包括要闻、当地新闻、小说、加拿大新闻、经济股市行情、港闻、中国新闻、国际消息、港台娱乐圈动态、中国国片专页等。除要闻与当地新闻外，各版内容基本上都是由香港报纸、通讯社消息等稿件剪贴拼编而成。除在中国新闻版、国际新闻版和香港新闻版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之外，该报还增设《家乡》和《神州大地》两个版，集中进行报道。此外，每周还有一二个版的中国图片专页。1992 年 10 月 1 日，该报因“营业情况需要调整”决定暂时停刊。

^① 刘华瑞：《加拿大中文报业近况》，载中新社《业务通讯》1986 年 11 月。

此后未再出版。

《侨声日报》 1954年10月10日由温哥华华人郑振衡等集资创办。该报以宣扬中华文化、服务侨社为宗旨，持民间立场。在中国问题上，最初受台湾当局的影响，70年代以后转而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华侨中颇受欢迎。但发行量不大，仅800余份。日出两大张，有一版要闻和半版当地华人社区新闻，大部分内容为连载小说、副刊和广告。国际新闻多采用西方四大通讯社的稿件。80年代初社长为周国棟，总编辑吴立民。1988年停刊。

（三）蒙特利尔

在华人口8万多的蒙特利尔市，也出版好几份社区性的报纸（只有周报没有日报），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华声华视新报》和《华侨时报》。

《华声华视新报》前身是1979年4月创刊的免费赠阅的年检刊《华声华视》，1983年9月15日改为报纸型月刊，名曰《华声华视月刊》。从第2期起又改名为《华声华视新报》；1988年1月14日正式改为周报，并改名《华声报》。该报由华声华视广播有限公司出版，每期出4开纸4张，后又扩版为对开纸2张8版，广告占4版以上。版面内容包括加国实况、世界短讯、大陆新闻与特稿、香港及台湾消息、《大陆瞭望》、《神州》以及综合副刊，此外还有华声华视两台（“华侨之声电台”和“中华之声有线电视台”）的情况和节目报道等。1996年董事长兼社长为林良任。

《华侨时报》 1981年12月在当地华商支持下创办，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华人青年。初为不定期刊，1982年5月29日起改为周报。同时增加篇幅为4开纸5张20版，发行网也从蒙特利尔扩展到多伦多和渥太华。该报半卖半送，每期印数2000份左右。1982年7月12日增设多伦多分社，蒙特利尔版和多伦多版同时发行。版面内容有国际新闻、加拿大各地新闻、香

港消息、美国新闻、经济天地以及各种副刊。广告约占四分之一强。其稿件内容一版比较客观，在中国统一问题上曾表示：“无论‘统一’与否，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巩固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家‘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表现，人心的‘统一’才是最有力的实际行动”。1996年时每期出4开纸40版，主要工作人员有出版者周锦兴、经理李镜波等人。

（四）渥太华

在华人人口只有2万的渥太华市，也出版了2份中文月报，即《加京华报》和《加华侨报》。

《加京华报》1977年7月1日由林小英、吴经万等创办，是渥太华的第一份华文报。其办报宗旨是：“（一）立场中肯，以事论事；（二）忠实报道本地华人社区新闻；（三）以简易的文字介绍分析加拿大政治、经济及风土人情；（四）宣扬中华文化”。该报还强调它“向来是一份非牟利刊物。它没有后台，也不隶属于任何团体和组织，所以言论能独立”。该报没有一位职业报人，编辑都是义务工作者。加国政府为了鼓励这些非牟利的中文报，经常把政府文告翻译成中文，以广告的形式在报纸上刊登。这样既可以使政府达到传达信息的目的，报纸也有广告收入可以维持。该报广告收入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约占总收入的80%（除加政府广告外，当地华人餐馆、杂货店等也常在该报刊登广告）华人读者捐款占20%。故经济趋于稳定，业务也逐步得到发展。该报以加国新闻、当地新闻和华社新闻为主，同时每期均有两版篇幅报道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闻。其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新闻稿件大部分剪辑自香港及北美的华文报，也采用香港中国通讯社、采风通讯社及中国新闻社的稿件。版面主要内容有要闻、中国新闻、特稿、专稿、大众论坛、加国新闻、社区消息、读者园地以及各种副刊。1996年每期出4开纸14页，社长兼财政许金山，副社长兼总编辑赵炳炽。

《加华侨报》1979年创刊。据《加京华报》称：《加华侨报》的一些负责人和《加京华报》的负责人同是家京中华会馆的首脑人物。两报的关系颇为密切，立场相似。80年代初期该报社长为曾任家京中文学校首届董事长的陈炳良，前后任主编的有杜云元、梁冬林。1996年每期出4开纸10页，负责人郑茂源。

除以上城市外，温尼伯的华人在台湾当局支持下（1万加元）于1986年创办了《中华日报》，此外温尼伯还有《缅省华报》（月报）《缅省越棉寮华报》；卡城有《侨声报》（周报）埃德蒙顿有《爱华报》。

北美洲尤其美国的华语广播电视业以机构林立、规模小、密度大而见特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国华人人口迅速增加，香港、台湾的广播电视业也逐步走向成熟，这就为美国华语广播电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并提供了广大的受众群。70年代初，一些热衷于视听传播的人士开始投资兴办电视广播节目，这方面起步最早的是台湾移民较多的洛杉矶。1972年，来自台湾的马福全夫妇在此创办了“中华海外传播公司”，每周播放台湾的综艺节目及连续剧，并且制作了15分钟的时事访问节目。但由于该公司没有足够的广告支持，勉强维持了年余就因亏损累累而关门大吉了。此后直到80年代，这一地区的华语电视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此起彼落。

1974年，陈泮与台湾中华电视合作创办“华语广播”，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开播。一年后，旧金山停播，而洛杉矶的“华语电视”却一直延续到1982年才结束播送。1979年，台湾移民梁兴国曾开办“七海电视”，每周播放4天，但不久也停播了。

1983年11月21日，“洛杉矶华语广播电台”开播。该台使用一个调频频道的副波（听众需成为该台会员，获得专用接收机才能收听），每天播放12小时，节目有新闻、广播剧、儿童天

地、社区访问、医药知识、地方戏曲等。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广播，自制节目占一半。

1983年，以蔡明裕为首的“世界关系企业”属下开设“世华电视”（Chinese World Television）。该电视台大胆制作具有相当水平的节目，而且很快就在纽约、旧金山以及芝加哥设台播送节目。一年后，由于业务没有很大的发展，不得不撤销了芝加哥及旧金山的节目。为了节省经费，洛杉矶总台也缩小了节目编制的规模。1984年，洛杉矶出现每周播放一次中国大陆节目的“敦煌电视”，老板是卢谊逊。一年后人事变动，改为“斯扬传播公司”（C. Yung's Investments），由杨宗霭负责。

1984年1月9日，“中华之声”在洛杉矶开播，创办人为李明威，并任董事长。1985年5月以后，由经营旅馆、餐饮业的台湾人巴山接管，播出时间延长，由每日16小时改为全天24小时播音。每天除播出广州话、闽南话节目各两小时之外，其余20小时全部是普通话节目。内容包括新闻（国际、美国、中国大陆、台湾、社区新闻）、社区特写、各种知识讲座以及大陆、港台歌曲、音乐等。

继“世华电视”之后，由大资本集团办的华语电视是香港无线电视台于1985年在洛杉矶开办的香港翡翠电视（Hong Kong Television Broadcasts [USA]）。该电台以有线方式每天播出节目10个半小时，是洛杉矶地区播放时间最长的华语电视台。

此外洛杉矶还有郑佩佩主持的“美国亚洲电视”。该台1986年开播，香港亚洲电视曾一度加入合作，但不久发觉有出无进，所以迅即退出，留下郑佩佩独自支撑。

美国的另一个电视广播中心是纽约，这里播放华语电视的历史差不多和洛杉矶一样长。当“中华海外传播公司”在洛杉矶开始营业时，曾在电视台工作过的刘恕也在纽约创办了第一家华语电视台——“华语电视”（Sinocast TV），开始播送节目（1972

年)。初时租用无线电视台的时间，每周播出一次，后来转用有线电视台。“华语电视”一直维持到1987年才因经济困难而停播。“华语电视”开播不久，刘恕又于1976年5月在纽约创办了“美加华语广播网”(Sinocast)，并自任董事长。该台全天24小时用广州话播音，是最早租用整个频道(副波、SCA)由华人经营的华语广播电台。

1973年，罗中郎创办“中国海外电视公司”(Chinese Community Television Network)，也在有线电视播送节目，每周一次，业务发展起来以后，每天播放。1984年开播的“苹果电视”(ATV)的资本来自香港商界，制作人员大多数也曾经在香港电视台工作过。该台总经理是蒋天龙，特别顾问是港商霍英东的儿子霍震寰。1985年开始营业的“华语电视广播公司”(CSTV)是纽约惟一全天候广播的华语电视台，用微波频道播送节目。1986年，纽约华语广播机构——侨声广播公司(Chinese American Voice Inc.)成立，从10月17日起全天24小时用普通话和闽南话播音。创办人为台湾移民，董事长李厚白，总经理薛纯阳。电波覆盖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订户需购买专门的收音机收听。内容有新闻、音乐、曲艺、宗教、美语教学、专题讲座等。1986年，纽约又出现“世界电视”(World TV，《世界日报》的姊妹企业)开播时每周播出7天，用无线电视台播放，收视地区很广。1988年，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广播网”(Chinese Radio Network)成立。它是由美国多家华语(普通话)电台组成的、通过卫星联结的广播机构，当时名为“中国新闻音乐广播网”。同年2月先开播洛杉矶台，覆盖大洛杉矶地区；同年8月又开播旧金山南湾广播电台，覆盖旧金山南湾、东湾、圣荷塞地区。1993年3月改用现名，并增开纽约台。1980年，纽约出现了一家用有线频道播出中国大陆制作的节目的“宏声电视”(Hong Sheng Broadcasting)。该电视台从1985年起开始在全国卫星电视

网以华、英语播送节目。

此外，纽约还有“美华影视文化协会”（Asian Cinevision）附属的“中文电视台”，这是一个由社区活动者开办的非牟利性的机构，宗旨是藉影视传播媒介，服务在美华裔及亚裔，并向社区提供文娱节目。该台自1976年起在有线电视台播放节目，是纽约惟一的一家节目内容与当地社区有直接关系的中文电视台。该台经常组织电视训练班，培训电视节目制作人才，也同其他商业电视台合作制作一些与社区有关的节目。

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华语电视广播的另一个中心。这一地区电视广播业的起步虽然比洛杉矶和纽约稍迟，但业务的发展比之这两个城市却毫不逊色。1974年1月20日，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陈立鸥等创办的“美亚电视传播公司”（Amasia TV Productions）开始在20频道首次播出华语节目，每周2小时，节目由台湾提供。1976年增加到4小时，1980年停播。由于“美亚电视”满足了社区人士的需求，有助于打破华人与美国社会的隔离状态，因而一开播即大受欢迎。紧随“美亚电视”之后，其他华语电视广播公司也纷纷出现。1975年，台湾移民吴丰坤、吴丰义等组建“海华传播公司”（Overseas Chinese Communications，亦称OCTV），在有线电视台每周播送一次节目。1976年，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黄英和他的儿子黄雅各成立“中华电视公司”（Chinese TV Production Co.），也在有线电台播放。该公司是旧金山第一家引进粤语电视连续剧及新加坡电视剧的电视公司，从1987年起，该公司又在洛杉矶开展业务，每周播放华语节目一次。

在“中华电视”开播的同年，“天祥电视”（United California Communications）也加入了有线电台播放节目的行列。该公司的董事长是黄伟成，总经理是前台湾电影明星张扬。

1977年，纽约“华语电视”的创办人刘恕到旧金山设分台，

聘请“天祥电视”节目主持人陈俊雄（Philip Chan）为“华语”副总裁及旧金山分台台长，“华语”与“天祥”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到1979年“华语”开始在有线电视台播放节目，代替了“天祥”。1981年，旧金山“华语”与纽约分手，选黄伟成为董事长，陈俊雄为总经理及台长（陈俊雄是旧金山合胜堂的领导人，在华人社会有相当的实力）。

1980年，台“台湾电视”、“中国电视”及“中华电视”各投资100万台币，在台北及美国成立“国际视听传播公司”（International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Inc.），“统一价格，统一服务”，把节目供应给美国正在发展的市场。1981年，该公司属下的“联合华语电视”（United Chinese TV）先是在旧金山、洛杉矶及纽约每周播放节目一次，后又发展到在夏威夷、华盛顿、芝加哥、休斯顿等城市播放节目。“国际视听传播公司”已成为各华语电视台节目的主要来源之一。

1982年，浙江宁波籍华裔张济民创办“华声电视”（Hua Sheng TV），在26频道电视台播出，时间为每星期六下午1时至2时，播放中国大陆制作的节目，包括新闻报道及文化节目与戏剧。

1986年，太平洋电视公司在旧金山湾区开始营业。该公司拥有的66频道是旧金山港湾区惟一由华资公司经营的电视频道。不过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被指控违背美国法律，原因是台湾电视公司所占的投资额超过了美国法定的限制。同年，旧金山华语电视的先驱陈立鸥投资38频道，成为该频道的董事长。

旧金山港湾地区华人集中，具有发展电视业的优越条件。80年代，这里有3家公司能够每日播出节目，即“海华电视”、“中华电视”和“华语电视”。所以从经营规模上看，旧金山的华语电视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

尽管商业性的华语电视广播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面

临的困难也不少，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市场小，成本高。为了节省制作节目所消耗的人力财力，这些电台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转播香港、台湾或中国大陆制作的现成的录像带。结果是电台的节目往往与当地社会现实相脱节。此外，这些电台均是在一个有限的市场上竞争广告，而广告毕竟有限，这迫使大家尽量压低成本，避免亏蚀。在这种情况下，电台不得不继续采取“事半功倍”的做法，转播这些舶来录像带了。但华人人口还在不断增加，这个行业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①

加拿大的华语电视广播业也一步步发展起来。80年代末期，加拿大有4家华语广播电视台：加拿大中文电视台、华侨之声电台、中华之声有线电视台和埃德蒙顿四海中文广播电台。

加拿大中文电视台是加拿大中文电视有限公司（Chinavision Canada Corporation）主办的全国性中文电视台。1984年由华人企业家章建国（Francis Cheung）投资700万加元创办于多伦多。其宗旨是“娱乐老人、教育孩子和团结全加拿大华人”。^②最初3年亏损，1988年以后略有盈余。每星期一至五16:30至0:00播出8小时节目，周末则从14:30至0:00播出10小时节目。其中75%为广州话，25%为普通话。除新闻节目外，还有英华语教学、国宝精华、名剧精选以及棋逢敌手、妇女新姿等消闲性节目和各种电视剧、电影等。加拿大各城市均可收看，同时还通过卫星转播到美国有华人社区的一些大城市。其覆盖面仅次于加拿大广播公司（CBS），居全加第二位。该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香港亚洲电视台以及台湾影视机构签有提供节目的协议。1993

^① 麦礼谦著：《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432-436页，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154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年年底由总部设在温哥华的新时代电视（Fairchild Television）收购。

华侨之声电台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华语广播机构，由华人古凤英（Ruth Koo Lam）于 1972 年 11 月 1 日创办。每周广播 3 次，每次 2 小时，逢星期二、四、六 18:00 至 20:00 在魁北克省多元文化广播公司电台（CFMB）以广州话播出华人社区消息、粤曲、小说、广告等。1988 年 2 月 1 日起在 CJVB 电台每周 6 天每天 21:00 到次日 9:00 作通宵广播。1978 年古氏又创办中华之声有线电视台，二者合称“华声华视”，并办有《华声华视新报》（后改《华声报》）。古氏担任华声华视广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该电台主任。

中华之声有线电视台也是蒙特利尔市的华语电视机构。1978 年由华人古凤英创办，为华侨之声电台的姊妹机构。每天凌晨 3:00 至 3:30，22:00 至 0:00，在魁北克省多元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电视剧等娱乐性节目，此外也有名人、商号、餐馆等的访问以及其他社会新闻的报道。古氏兼任该电视台主任。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欧洲华文传媒

欧洲是一个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达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侨民和华裔居民约有 80 万。其中以法英两国的华人数为最多，法国约有 25 万，英国约有 20 万，其次是荷兰（约 8 万）、德国（约 5 万）。其余 10 多万散居于西欧诸国。^①

^① 参见黄煜：《当代欧洲地区华文报刊研究》，‘95 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欧洲的中文报业发轫于 19 世纪末叶（据记载，欧洲的第一份华文刊物是 19 世纪末由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系学者创办的《日国》），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战后二三十年间，华文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既没有专业性的新闻机构，也没有正规的日报出现，大多数出版物不过是同业行会附属的刊物或留学生的同人杂志，数量不大，影响也十分有限。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少有专业人士参与，读者人数也相对偏少与分散，使欧洲华文报刊长期处于凋敝状态。

7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台湾、香港留学生和技术移民、印支国家华裔难民、中国大陆留学生、定居人员的增加，欧洲的华文报刊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就规模与数量而言，目前它名列东南亚和美加地区之后，是位居第三的海外华文媒体重镇（而英法两国又是欧洲华文媒体的重镇）。

需要说明的是，在前苏联的欧洲部分及东欧各国，虽有数以万计的华人前往从事商贸及文化活动，但他们多为暂时栖息，尚未形成稳定的华人社会，其报刊也变动不居，故暂不列入。

70 年代以后出现的欧洲华文报刊计有十余种。

《乡讯》德国华文月刊。1971 年 8 月 1 日由比利时台湾同乡会编印，1974 年 11 月起成为总部设在原联邦德国的台湾同乡会联合会欧洲分会会刊，并由该会负责发行及主持笔政。每月出版一次，每次出 32 开本 64 页至 100 页不等，内文以中文打字机打印及用手誊写，横排，有时也剪辑外来报刊资料制版，发行量 1000 份左右。《乡讯》内容包括乡会通讯、时事报道、论说、散文、诗歌、政治漫画等。该刊在“稿约”中申明：“乐于容纳对各种问题的不同观点，并欢迎来信，对任何一个观点或任何一篇文章提出批评”。70 年代末期以后，该刊的政论性文章有所增加，其中既有较为客观、冷静的时政研究论文，也有情绪激奋的慷慨之辞；该刊还不时发出“台独”论调，鼓吹“台湾人民自

决”“不容中国政府越俎代庖”，“去解决台湾人民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并称“咱努力的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外来政府，反对集权，反对独裁，反对剥削，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台湾绝大多数人民的政府”。可以说，该刊这方面的言论反映了台湾同乡会欧洲分会中一部分人的观点和心态。

《欧洲通讯》德国华文月刊。1972年2月由设在原联邦德国的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创办。初期出版4开纸2张8版，后来增加到3张12版。1979年11月进行改革，并将报名简化为《欧讯》改出4张16版。该刊注重评论，新闻报道占一定的分量，大部分文章由当地人士撰写，少量转载香港、台湾和美国华文报刊文章。内文除剪报资料照原稿影印外，其余均以中文打字机打出简体字，横排版面。每期发行1500份左右。

这家由主张统一的（台湾）同乡主持的刊物，是在“充满激情的背景”下诞生的，用它自己的话说，即“六十年代末，在欧美、中国所掀起的一股理想主义”和在“七十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及那轰轰烈烈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可了解中国的一切，我们搞运动，办刊物”。可是，几年过后，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地位。因为“面对台湾同胞及广大侨胞，在介绍新中国的发展过程及讨论中国统一一问题时，我们也不自觉地犯了一些弊病。在“四人帮”当权的年代里，我们抱着一股狂热的理想主义，试图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但是，由于身处国外，要彻底明白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当困难。从国内来的资料，就只是‘一言堂’式的歌颂形势大好，加上我们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缺点，对问题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现实与我们的理想脱节，而我们并没有警惕到这一点，故此

本刊物给予读者一种活象‘传声筒’的印象”。^① 其实该刊曾有的这些弊病，正是当年海外左翼报刊的通病。

改革后的《欧讯》在扉页上注明其宗旨为：关心祖国，联络侨胞，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同时声言：“《欧讯》是一份开放的刊物，只要符合上述宗旨，文章言之成理，不论立场如何，我们都欢迎”。并表示，决心跟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把《欧讯》办成一份合乎读者要求的刊物，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产生推动促进作用。该刊后来改为 16 开 24 版打字影印，内容包括祖国情况介绍，留学生生活，台湾内外以及文艺讨论等。编辑工作由原联邦德国若干城市的华侨和留学生分期轮流负责，后转移至法国编印，1982 年辍版。

《西德侨报》德国华文月刊。原联邦德国华侨与留学生共同创办，1973 年在慕尼黑创刊。初名《西德侨报》，东西德统一后于 1994 年改名为《德国侨报》。该刊每月出 32 开本 80 页左右，封面为中国画，每期更新，内文全部手写影印。内容包括侨情报道、通讯、评论、小说、诗词、游记、生活杂感等。发行量约 2000 份，发行范围包括欧、亚、美等地区。

该刊自称“侨胞同仁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所以奉中华民国政府为正统及采用中华民国年号”。该刊发表的介绍西德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的文章，以及对欧洲各国风土人情的著述不乏佳作；《认识德国》和《游学走廊》两个专栏，颇受台湾岛上有志赴德留学的学生喜爱。原西德华侨协会前任理事长徐能（后任《侨报》发行人）曾说，《西德侨报》已经“成为各地侨胞、留学生‘通心的媒介’”。

^① 《欧讯》1977 年 9 月 1 日第 4 期《读〔乡讯〕王宝胜文章有感》，转引自方曙：《欧洲中文报业柳暗花明》，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15 期，1981 年 2 月。

上述创办于同一时期的原联邦德国三家中文刊物，由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时常也会发生一些龃龉。例如《乡讯》曾载文斥责“国民党把阅读《红旗》、《七十年代》、《欧洲通讯》等的人一律列为‘匪谍’”，“阅读《乡讯》、《台湾政论》等杂志的人都是‘台独分子’”，用意是“企图分化台湾同胞间的感情，制造省籍的隔阂、挑拨留学生是非、唯恐天下不乱”。^① 在这类笔墨官司中，《欧洲通讯》的态度较为理智。它对来自对方的攻击，都能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与对方商榷，甚至建议三份刊物“从现在起，重新建立联系，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它认为，“虽然在形式上，它们代表了三种对台湾前途不同立场的看法，但其关心台湾前途的出发点则是一致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热爱祖国精神一致，大家总有一天会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种以大局为重的胸怀，颇得人们的赞赏。

《简讯》法国华文双周刊。该刊创办于 1975 年 9 月，是旅法华侨俱乐部会刊。每期出 16 开纸 16-20 页不等，内文绝大部分以中文打字机打印，使用简体字横排，少量篇幅剪辑外地报刊资料影印。内容包括言论、时事（祖国发展情况）、国际新闻、法国新闻、散文、游记以及旅法华侨俱乐部的活动介绍。该刊自称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以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为主，兼顾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着重于法国消息的报道，同时增辟副刊、开设生活服务栏”。该刊所有的编辑、出版、发行事务全部由热心的华侨华人青年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经常参加工作的有 10 余人（主要是来自印支和香港的知识青年）。由于该刊是当时法国惟一用华文出版的刊物，“报道既简而精”，有助于不懂法语的

^① 《乡讯》第 714 期的两篇署名文章，转引自方曙：《欧洲中文报业柳暗花明》，香港《地平线》杂志第 15 期，1981 年 2 月。

侨胞“了解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因而颇受读者欢迎，每期发行量由最初的 300 份增加到 900 份，除法国本土外，在邻近的意、荷、比、德、西班牙等国家也有不少读者。由于 80 年代以后当地陆续出现多家日报，该刊于 1987 年夏停刊，前后持续 12 年，共出版 240 期。

《华侨通讯》荷兰华文月刊。1977 年 8 月 28 日创办，为阿姆斯特丹华人社团“旅荷华侨总会”编印的会刊，免费赠阅。该刊的宗旨是：向华侨介绍荷国社会动态、政策、法令，使侨胞更好适应环境；帮助华侨学习荷文、职业知识，俾能更好参加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向华侨报道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侨乡要闻，使侨胞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向侨胞介绍广大华侨及侨社活动情况，促进侨胞间的互助与团结；促进华侨与荷人的联系和团结，增进荷中两国友好往来。该刊初为月刊，繁体汉字，手抄油印，每期发行 200 份。1979 年 8 月，改为简体汉字，手抄印刷，期发行量增至 2000 份。1982 年，版面改为部分打字、部分剪报贴版影印，发行量达到 3000 份，并于次年 4 月 12 日改为半月刊。1984 年 3 月，考虑到当地读者的阅读习惯，恢复用繁体汉字出版，并改为双旬刊（后又改为半月刊）。90 年代初，发行量达到 6000 份，读者增至约 4 万人。版面内容有当地要闻、荷兰短讯、华埠动态、会务简报，并有《神州中华大地》、《台湾消息》、《香港消息》三个版报道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最新信息。中国版除了选用中国新闻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稿件外，还剪辑香港报刊的有关资料。1996 年时为双周报，每期出 4 开纸 4 张 16 版，彩色印刷，每期印数为 2 万份。

《星岛日报》（欧洲版）香港《星岛日报》海外版之一，1975 年 8 月 20 日在伦敦出版。初由香港编排航寄到伦敦印发，后在当地招揽广告和采编当地新闻，发行英、法、荷、德等十多个欧洲国家，是欧洲国家中发行最广的华文报纸。据专业人士评

估，其日发行量为 1 万份左右，其中 70% 在英国发行。^① 该报每周出版 6 天，周 1 至周 5 每天出报 4 张半 18 页，周末出报 5 张 20 页。内容包括国际要闻、欧洲新闻、香港新闻，以及“经济版”、“小说版”、“综合版”和体育、娱乐、“众星”、“漫画”等副刊。80 年代末期有工作人员 10 余名，每日进行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新闻的采集、编辑工作。自 1993 年 9 月起，该报又单独出版一份以娱乐为主的《星岛周刊》，以免费赠阅或订阅的形式在英国境内发行。

《星岛日报》（欧洲版）是欧洲第一家以中文读者为对象，以采集、发布新闻为己任的专业性新闻机构。它的创办，标志着欧洲华文媒体作为独立的少数民族媒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的华文刊物多半是一种联络乡情、增进友谊的刊物，既没有专业的记者、编辑，也没有专门采集、发布新闻的部门，具有规模小、非商业化的特点。《星岛日报》（欧洲版）的创办使这种状况得以改变。

《文汇报》（欧洲版）香港《文汇报》属刊，1981 年 11 月在伦敦创办。在荷兰等国设有记者站或发行点。初期每周出报 7 天，日出对开纸 2 张半 10 版。驻欧记者负责采写当地要闻及侨社消息并电传至香港。所有版面由香港编辑排版印刷，然后将报纸航运至伦敦，在西欧发行。要闻版以英国和西欧诸国新闻为主，内页每天刊载有英、荷、法等国社区新闻及伦敦电视、文娱节目预告，其他版面内容基本上取材于香港《文汇报》。自 1987 年 6 月起，每周 6 天出报，日出对开纸 3 张 12 版，要闻版、华人社区版以及轮流见报的《财经一周》、《校园天地》、《商业广场》、《英国地产》、《侨胞园地》、《欧洲万花筒》、《英伦猎影》、

^① 参见黄煜：《当代欧洲地区华文报刊研究》，'95 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消费指南》等专刊，改由伦敦编辑制版，其余各版仍由香港编排后将版样通过卫星传至伦敦，合并印刷发行。因发行量有限，为节省成本，1989年底复改为所有版面均由香港编排印刷，再将报纸航运至伦敦。最初印刷5000份，部分用于赠阅。1995年日销量1000份左右，大部分在英国发行。^①

《欧洲日报》法国华文报纸。1982年12月16日由台湾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惕吾出资创办于巴黎。该报每周出刊5天，平日出对开纸3张12版，周末出对开纸5张20版。广告占4-5版。该报设在巴黎的总社负责采辑当地重大新闻、法华社区消息并承揽广告，然后将其传真至台北，由设在台北的办事处负责编辑、排版、制作，之后再通过卫星传真将版面传到巴黎印刷、发行。该报以台北《联合报》（王惕吾为发行人）为大本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信息资源、技术条件和办报经验，因而保持了较高的专业水准。大部分新闻及副刊采用台北《联合报》和美国《世界日报》（王惕吾投资创办）的稿件，初期较重视国际大事、体育、娱乐、金融等方面的新闻，以后陆续开辟了一些专题性的版面和副刊。台湾新闻较多，大陆新闻也时有所见。1986年上半年以前，这方面的新闻大多选自西方电讯和“香港电”，内容“贬”多于“褒”；随着两岸民间往来的增多，逐渐开始选用或改编新华社、中新社和香港中国通讯社的电讯。

该报在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星岛日报》（欧洲版）其发行网已“遍及整个欧洲及法国海外属地”以及北美、澳洲和亚洲地区，报纸销量据称由创刊时的5000份上升到90年代初的1.5万份左右（法国订户约占订户总数的一半）。

《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1983年1月1日由印支华裔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371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在巴黎创办。该报在创刊号中称要以全欧各界华侨华人为服务对象，促进华侨华人适应、融合于欧洲社会，从而达到立足扎根、安居乐业的目的。同时强调要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维护华侨华人正当权益、促进欧洲各国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为宗旨。1984年转让给了（法国）光华报业公司。该报每周出版5天，日出对开纸3张12版，内容包括要闻、法欧新闻、中国消息、国际新闻（含远东新闻）、法华和海外华人消息、生活内务、华人市场信息、娱乐消息、法国电视精选、《花都》副刊、专题副刊、图片新闻、报刊文摘、体育简报，以及一些知识性和消闲性的专版及栏目，尤以有关中国大陆消息多、准确及时见长。当地侨社新闻由报社记者采写，邻近各国侨社消息由特约记者提供；法欧及国际新闻主要译自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电讯及当地报刊的报道和文章；有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远东新闻，主要采用新华社、中新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电讯以及港台报刊文章；知识性、消闲性副刊文章则多剪辑自中国大陆及香港报刊。该报除在法国发行外，在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设有代理处，“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在该报创刊4周年酒会上，希拉克总理的代表黄光曙转达了希拉克的祝贺，并对这份华文报纸几年来为促进法中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所做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①

在上述报刊中，《星岛日报》（欧洲版）、《欧洲日报》与《欧洲时报》是当时欧洲鼎足而立的三家华文日报。除了这三家日报之外，80年代发刊的中文期刊还有《龙报》、《中华周报》、《交流》、《泉源》、《欧华学报》、《学友》、《西北丝语》、《难友通讯》等。

《龙报》法国华文周报。1981年8月18日由台湾前“中国

^① 《华青报》1987年1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法籍华人苑国恩 (K. E. Yuan) 在巴黎创办。该报是欧洲首份由华人创办的，以时事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作为发行人，苑国恩在该报创刊号上宣称：它“是一份独立自主的纯华侨刊物”，“园地公开，言论公正”，并以“提倡人伦道德，传播中华文化，研究社会，认识人生，寻找和适应幸福生活之道，解脱在异地生活中之困扰为宗旨”。对于海峡两岸事务，苑国恩在报纸上公开表示：“主张中国自由民主和平统一，但不参与政治之争”。初为月刊，以“民国”纪年，1982年12月改为半月刊，逢1、15日出版，改用公元纪年；1988年2月17日改为周报，并附《龙德一周》专辑随报赠送。该报着重报道法欧新闻、侨社消息和法华学人动态，此外还有法国新闻、国际要闻、综合版、乡情版（主要报道和评论海峡两岸情势）、台湾近事、世界新闻分析等。《龙德一周》主要版面有侨园、旅游、名胜风光、生活、家庭、影视介绍、工商服务、综合副刊等。服务专版每期提供一项专门的信息服务，内容涉及如何办理居留手续，如何租赁房屋，如何申请开店，怎样报税等等，深受读者欢迎。《龙德一周》每期还出3个法文版，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该报初创时每期约销500份，1988年后达到1万多份。

《中华周报》法国华文周报。该报是在中国国民党前驻欧支部负责人滕永康的支持下，由法国中华会馆常务理事、比利时籍华人侯健章（又名侯健森）于1982年3月15日在巴黎创办。每期出版4开纸1张，广告占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免费赠阅。自称其“宗旨在于吐露侨界心声”，同时“对于所有不实之侨界新闻报道给以纠正及证实”，实则因在当地华侨、华人中制造事

端而被称为“骂街报”。^①该报虽称周报，但创刊后多为半月刊，每期印 3 万份。后因台湾在法人员内讧，当年秋天即停刊。

《交流》“法亚文化友爱会”华文会刊。该会创建于 1981 年，主要由原住越棉寮的华裔青年和法国热心人士创办，会员包括教授、医生、工程师和工人等。该刊以青年为对象，内容生动活泼，受到会内外人士的喜爱。因无稳定的经费来源，出版不定期，于 1986 年以后自行停刊。

《泉源》法国华文不定期刊物。由华裔青年在 1982 年组织的“法国岭南文娱体育会”自费创办于巴黎。以发表时政评论、文艺作品为主，会员们义务抄写、打字、印刷，免费赠阅。每期出 16 开纸，印数百册。

《欧华学报》欧洲华文学术期刊。1983 年 5 月创刊，编辑部设在德国汉堡，由欧洲华人学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in Europe）主办。其宗旨是：为旅欧华人和海峡两岸学者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创造一个阵地。法国华裔学人李治华（Li Tche - Houa, 1916 - ）任主编，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Kuan Yu - Chien, 1931 -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梁兆兵（James Liang）任副主编。虽然由于经费短缺，只在 1983 年 5 月和 1987 年 1 月出版过两期，却受到海内外华人文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撰稿人除了欧洲知名华裔学者外，还有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人。该刊为大 32 开本，176 页，在香港印刷。1990 年 8 月，《欧华学报》改名为《欧华》，并由不定期出版改为半年刊。

《学友》英国华文不定期油印刊物，由伦敦“学友社”创办。该刊由香港留学生和华侨青年利用课余、业余时间自编出版，免费赠阅。其经费靠各界热心人士和侨团赞助。内容包括中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 526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国消息、当地侨情、生活知识和散文等。

《西北丝语》英国华、英双语期刊。1984年2月创刊于曼彻斯特华埠，创办人为英国人钟玺铭(Simon Jones)和几位华人。创刊号称：“‘西北’是代表英国西北地区的华人；‘丝语’，亦即聊天，可让诸位谈天南地北”，并可“为华人提供有用的资料及咨询服务”。初为24开杂志型油印不定期刊，免费赠阅，1986年2月第9期起改为16开铅印月刊，内有36-40页，华文占70%，英文占30%，并增加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该刊曾两次改名（先是改为《丝语》，1993年又改为《丝语时报》），1994年起改为8开本大型杂志，销售发行。每期64页，以华文为主，有少量英文专页。辟有华埠新闻、中国文化拾零、移民写真、随想录、文学、留学生园地、餐饮业、美食经等栏目，1995年底发行量近1万份，为英国和欧洲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新闻娱乐性杂志。

《难友通讯》奥地利华文不定期刊物。20世纪80年代初由“旅奥中南半岛华裔难友互助会”创办。32开书本型，40页，手写影印，属非营利刊物。编辑部负责人为方永成。该刊自称是“服务及团结全体印支华裔难友，联络感情，不唱高调，也不宣传政治，是一本中性刊物”。内容有通讯、社论、难友动态、会务报道、编者的话、奥地利历史、中国现代简史、诗歌、散文、谜语等。该刊“虽少嫌单薄简陋，但也不失为奥地利中文文化沙漠中的一道甘泉”。^①

除此之外，1982年4月，瑞典出版过一份《芬岭会刊》，是由新成立的“瑞典越华联谊会”创办的。该刊图文并茂，每篇文章均译成瑞典文越文同时刊登。在联邦德国还出版过一份手写影印的刊物《慕尼黑中国同学会简报》以及德、中双语杂志《德中

^① 王德海：《欧洲中文报刊》载《欧洲时报》1986年11月17日。

论坛》。法国也出版了法、中双语杂志《能源技术》等。

欧洲的华文广播电视业是 80 年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1983 年 12 月，英国曼彻斯特东方地平线中文广播电台创立；1986 年 11 月，苏格兰电台开办中文节目；1990 年 6 月，英国国际系列广播电台华人节目“城市好时光”在伦敦开播，每周广播 5 天，每天用广州话播音 1 小时。法国自 80 年代起多次试办华语广播，如“华夏之声”（1982 年）、“法亚之声”（1986 年）、“华人之声”（1987 年），但因经费问题，只有“华人之声”坚持办下来。该节目每周日上午 8—10 点播放 2 小时，用普通话播出，内容包括新闻（国际、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一周新闻，取材当地华文报纸）、专题讲座（以知识性、学术性内容为主）、青年人节目（以香港流行曲为主的音乐节目，用广州话播出），此外还有文学节目、点唱节目和法国侨社动态，最后还留有 5 分钟的法语新闻。意大利佛罗伦萨省布拉托市的“志同电台”于 1993 年 8 月开始播出华语节目，每天播出 20 分钟，内容包括新闻、法律、生活工作咨询等，并面对华侨、华人开办每周 3 次的意大利语广播讲座。在荷兰则有荷兰中文广播电台等。

继华语广播之后，欧洲的华语电视也发展起来。

欧洲东方中文电视（China News & Entertainment，缩写 CNE）是以英国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第一家华语卫星电视台。1992 年 11 月由香港商人徐展堂的新中港集团投资创办，1993 年元旦正式开播。1995 年 3 月，香港中资公司——汇光国际公司收购该台 60% 的股份，成为该台的控股者。CNE 通过 Astra 卫星向欧洲 21 个国家免费播出，每日播放 2 小时（1994 年延长至 5 小时），其中约 60% 为广州话（欧洲华人大多来自华南的粤、穗、港、澳等地，1979 年因大陆开放而加入的相当部分浙、闽裔和越棉寮华人则以潮山、海陆丰一代居多），30% 为普通话，还有 10% 的英语或法语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文化、经济、商贸、科教、体

育、旅游和华人通讯等。主要节目来源于香港亚视（ATV）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加上少量本地制作的新闻和广告节目。开播初期只有支出（租用卫星频道开支颇大），鲜有收入，回本期较长。总经理姚泳蓓认为：鉴于欧洲的 2 亿多民众中，许多人士对中国事物及名山大川的秀丽风光颇抱情怀，极为向往，因此，外国人的市场亦不容忽视。一直以来，西人亦可以透过该台节目认识中、港、台的产品，从而造就了一些贸易上的联系。至于欧洲大陆广播，观众若能购买接收器，就可收到该台的节目；另外，该台或与一些有线电视台挂钩，利用他们的频道广播，可令收视人数增加，市场扩大。为实现这一目标，CNE 正在“不断进行更新蜕变，以适应市场的口味”。^①近年来，该台对节目内容作了一些调整，除新闻时事外，增加了娱乐性节目，如电影、电视片（剧）等，使它成为“欧洲华人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

时代华人电视（The Chinese Channel，缩略 TCC）是以英国伦敦为基地的第二家欧洲华语卫星电视台。1994 年初由邵逸夫（1909 - ）的两位侄孙邵在德和邵在纯拥有的邵氏传媒集团（Shaw Media）投资 20%，与英国上市的韦顿公司（现易名太平洋传媒）投资 80%，总计 1000 万英镑联合创办。同年 3 月开播。当时，每日为观众提供 3 小时免费收看的华语广州话节目，并逐步增加本地的新闻节目，播出时间也延长至每日 7 小时。1995 年开始由免费收看改为收费收看，并在西欧一些国家设立代理站。全职工作人员 30 余人。1995 年 8 月，香港无线电视（TVB）附属的电视广播国际公司（TVBI）收购太平洋传媒的部分股权，成为该台最大的控股者（占 52%）。此后，该台仍为收费电视

^① 张卓辉：《欧洲中文卫星电视逐鹿争雄》，载香港《华人月刊》1994 年第 4 期。

台，并在人员、节目制作和安排上作了一系列调整，减少当地节目的制作和播放。该台获得香港无线电视中文节目在欧洲卫星及有线电视的独家播映权，故主要节目来源于香港无线电视中文台制作的华语广州话节目。节目比重为新闻占 15%，娱乐戏剧性节目占 70%，儿童节目占 15%，此外还有少量的当地广告。TCC 租用 Zee TV (TV Asia) 54 台播出，1995 年时每日播放 7 小时华语节目。该台执行董事为温宁顿 (Gerald Winnington)，总经理为 1995 年 10 月香港电视广播国际公司委派的李永强 (Thomas Li)。邵氏传媒集团董事邵在纯指出：随着中国及东南亚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欧洲华人人口的不断增长，欧洲的市场开始需求一些反映亚洲观点的资讯及新闻节目。乘着卫星电视接收之便，加上一级的娱乐节目，时代华人电视不但会令欧洲华人确定本身的社会地位，更能提供长久以来缺乏的服务。

上述两家电视台开播后，欧洲地区第一次有机会通过卫星收看到两家华人电视台的节目。这对华人属于少数民族的这片大陆来说，无疑是资讯上的一大发展。关于这两台节目，秋石在《联合早报》上撰文指出：现已播出节目的两家电视台，都以香港粤语连续剧为重点，分别与无线或亚视挂钩。这大概与香港在 1997 年回归中国不无关系。届时，香港或由香港移居的媒体集团，相信都会竞相扮演华人资讯中心的角色。……但平心而论，新闻采集的速度、翔实程度和涵盖面之广，目前还是英语媒体的天下。中文新闻要培养出一批有同样素质的媒体从业员，说实在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时，华人在欧洲人数尚少，因此电视播出时间也排不上商业上的黄金时间。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在一一点一滴干的，和美洲一样，欧洲华人电视的发展正逐步迈向多元化。^①

① 《联合早报》1994 年 4 月 14 日。

第四节改革开放后 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及意义

这一时期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中心、两个来源和一个转变。

一、三个中心

与前一时期不同，七八十年代以后海外华文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已由东南亚地区占压倒优势，转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两个地区，进而发展到出现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三个中心（当然后者的发达程度不及前两者）。90年代初期有一个统计，当时全世界共有华文报纸 93 家，其中亚洲 41 家，美洲 38 家，欧洲 7 家，非洲 5 家，大洋洲 2 家。^①

“三个中心”的出现，首先与所在国对华（华侨、华人）政策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许多国家采取限制华人发展的政策。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在一些国家得到改变。例如在泰国，中泰建交后，泰国政府对华人采取鼓励同化的政策，允许华人拥有华文报纸，把它视为少数民族语种的出版物，只要不违背国家制定的各项法规，就允许它们存在。这种政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实行着，这是东南亚地区华文报纸得以繁衍、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等国家，华文报纸是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出现的。

“三个中心”的出现，还与华人读者群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尽管随着懂华文人口比例数的下

^①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前景初探》，载《对外报道》，1991年第3期。

降，华文报刊的需求量也在下降，但仍有人乐观地认为，“假定 10 年内，其他社会因素没有大的变化，华文报纸读者群人数增长将略高于现有读者群”。^①而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华文报纸的读者正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马来西亚 1977 年华文报纸读者人数为 131.4 万人，1986 年底，人数增长到 167.3 万人，10 年增长了 27%。在新加坡，七八十年代以来，华文报纸的读者人数每年增长 3.5 万人，报份年增长率为 2.8%。而 60 年代到 80 年代，随着来自台湾、香港等地移民的大量增加（在美国最多）和印支华裔难民的涌入（主要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北美、欧洲等地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也相应地扩大了。

“三个中心”的出现，还与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在战后一段时间内，靠小本经营尚可维持报刊生存的话，那么，在信息化时代，这一切已经是不可想像的了。为了满足读者对时效性的要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报纸必须及时更新设备，采用传播科技的最新成果。而这些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广播电视的设台、制作成本更高）。此时的华人社会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实力。有人曾经作过一个统计，1983 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收入为 948.24 亿美元，比 1968 年几乎提高了 10 倍。^②华人经济收入不仅普遍提高，而且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经营的大财团。传媒领域也是如此，如出版多份报纸的“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收购《光明日报》（马来西亚）的“金马扬油棕有限公司”，开办“世华电视”（美）的“世界关系企业”以及创办欧洲东方中文电视台的“新中港集团”等。

^① 万小穗：《浅谈海外华文报业》载《侨务工作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② 方雄普、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第 122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版。

这三个地区华文新闻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东南亚地区华人口众多，并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中新、马地区的华人（华族）已成为“主流”民族之一，成为“主流文化”的一方代表。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华文传媒发展顺利（当然也面临其他语种媒体的竞争），起到了凝聚华族、维系华族文化的作用。新、马以外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在法律和文化上居少数民族地位，面临着被本地主流文化同化的威胁。这些地区的华文传媒虽有助于团结华社，保留传统，但也因为如此，其发展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前途决定于政府政策以及当权者的政治性考虑。北美和欧洲的华人及其传媒，享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受政府的干预最少。随着新移民人数的增加，这些地区的华文传媒将成为联系当地华人华社和其他华人地区的桥梁。当然，同美国、加拿大地区相比，欧洲国家华文传媒（主要是报刊）在组织化、专业化、市场竞争、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这是由欧洲华人社会较小的人口规模和相对分散的结构造成的。但是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形成的出国热的升温，随着香港技术移民的纷至沓来，随着台湾经济起飞而大举开拓西欧市场的举措，再加上两岸三地关系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强劲增长，当代欧洲华人社会正日益发生深刻的变化并重新塑造着华文媒体的形象，它的发展与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二、两个来源

所谓两个来源，是指创办媒体的人员（资金）来源以及信息来源。

在新、马以及东南亚其他有华文报刊存在的国家，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办报者须为本国公民，故其人员“来源”问题在此不作讨论。

在北美、欧洲等地，情况则有所不同。六七十年代美国（之后是加拿大、欧洲等国家）放松对华人入籍的限制之后，先是大

批台、港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台、港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此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1978年中国大陆全面恢复外派留学生工作以后，又有不少新鲜血液补充到移民大军中来。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大陆留学人员于今相比尚在少数，且多为投亲靠友，缺乏经济实力。在媒体方面，他们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却无力独自创办媒体机构。因此，这一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创办及拥有者多为台、港移民。例如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众多由台、港移民创办的华文报刊，其中历史较长的有旧金山的《中山报》，洛杉矶的《新光大报》、《论坛报》，休斯敦的《华商报》等。这些报刊虽多为周报，但影响却不小。如台湾知识分子在洛杉矶创办的《论坛报》，曾因连载台湾旅美作家江南的《蒋经国传》而名噪一时。有些报纸则由周报发展为日报，进而发展为报系。如一对台湾留学生夫妇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创办的《美南新闻》，后来形成“美南报系”；加拿大多伦多的《加华日报》由香港华丰国货公司财团老板许东亮之子许丕新创办，后发展成为当地第一家同时拥有日报、周报、月刊等最多品种的华文传播媒介机构。电子传媒也是如此。例如，洛杉矶的“中华海外传播公司”是由来自台湾的马福全夫妇创办的；纽约“苹果电视”（ATV）的资本来自香港商界；跨国华语广播机构“美加华语广播网”的创办人是台湾移民刘恕。

信息来源方面，本地新闻一般都由各华文报自己采编；国际新闻、两岸三地新闻以及知识性、消闲性副刊文章，许多报纸除了采用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新华社、中新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的电讯稿之外，还大量剪贴、拼编、转载香港报纸。如加拿大的《加京华报》、《大汉公报》、《醒华日报》等，除要闻和本地新闻外，其他新闻主要靠香港寄来的报纸剪贴而成。此外，德国的《欧洲通讯》、《乡讯》，法国的《欧洲日

报》荷兰的《华侨通讯》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商报》马来西亚的《自由日报》、《晨报》、《亚洲日报》等，也都是同样的情形。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海外华文报刊虽然分布于世界各地，却在版面内容（尤其是大众文化）方面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从金庸到琼瑶，从邓丽君到刘德华，都被报纸津津乐道，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新闻业发达，资讯丰富，且航寄方便，能够为海外华文报刊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海外华报财力及人力资源有限，仅靠自己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而依靠香港报纸的剪报来编一部分版面，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丰富报纸内容。此外，从办报人的背景看，他们对香港报纸最有亲近感，使用起来也最为得心应手。

不仅香港报纸的信息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俯拾皆是，香港报纸自身也频频出击，到海外创设地方版。60年代，以香港《星岛日报》“登陆”美国为起点，开始了港台报纸进军海外的浪潮。至80年代，该报已拥有美东、美西、加东、加西、欧洲、澳大利亚等不同版本的海外版。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香港还有《成报》、《新报》、《电视报》、《大公报》、《信报》、《文汇报》和《商报》等多家报纸印行美国版，其中《新报》还办了澳大利亚版（现为悉尼《澳洲新报》），90年代，香港《明报》也出版了加拿大版和美国版。此外，台湾联合报系于70年代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后，又在美国、加拿大出版了多个地方版，同时还办有巴黎《欧洲日报》和受委托经营曼谷《世界日报》。90年代以后，台湾《自由时报》出版了美国版，《自立晚报》在悉尼创办了《自立快报》。这些报刊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占有当地华文日报发行份额的大部分，从而使海外华人社会及其报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一个转变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及其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使海外华文传媒对她形成了全球性的关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转变。

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损失的内乱——“文化大革命”，而且整整持续了 10 年（1966 - 1976）。这一时期，中国关起门来搞运动，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人对国内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曾有少数力主两岸统一、“可望了解中国一切”的报纸，“抱着一股狂热的理想主义，试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但是由于身处国外，“要彻底明白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当困难”。一些华报只好跟着国内报纸走，传递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虚假、甚至错误的信息，以至后来悔愧不已。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建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从这一刻起，海外华文传媒发生了两个变化：

其一，对中国大陆的报道迅速增加。“70 年代末开始，各传媒如果谁家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谁就将失去读者”。因此，不但中间报，就连亲台报刊也逐渐设置和增加了有关大陆新闻的篇幅。有学者随机对 1982 年 2 月 25 日美国 9 家华文日报进行了抽样分析，结果表明，其中的 7 家报纸当天有中国大陆专版，共 58 栏，另有单独稿件 69 则。^① 这之后，特别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后，有关大陆的报道更多见诸报端。1990 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美《世界日报》用了 6 个版的篇幅作为亚运专刊，不输于《侨报》（1990 年创刊），此外，80 年代末期以来，《美洲华侨

^①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 62 页，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日报》、《侨报》每年都派记者到中国大陆采访人大、政协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世界日报》则通过台湾联合报系到大陆采访的记者获得报道内容。

其二，拥蒋反共、主张台独、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报纸不再有市场。在此背景下，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许多报纸顺应潮流，改变观念，开始淡化政治色彩，改变报道态度，趋向中立。如泰国《中华日报》曾为国民党当局控制，中泰建交后，尤其是 80 年代以后，该报立场有所改变，自诩走“中间路线”；美国《联合日报》创办初期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步转向中间立场；美国《中报》创刊时即宣称“不偏不倚，不党不私”，为此它巧妙处理大陆、台湾、香港三部分新闻，其论坛栏一度是今天评大陆，明天评台湾，力求“平衡”。为了更多地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许多报刊还一改平日的做法，公开采用带有“新华社”、“中新社”电头的新闻稿。由于过去亲台的华文报刊在报道态度上发生了转变，令台湾当局深感不安（美国的《中国时报》就是因为趋向中立，被台湾当局勒令停刊的）。当然，由于大陆与台湾尚未统一，支持新中国和支持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倾向性依然存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亲台报纸已是越来越少。

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东南亚的一些华文报刊虽不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头，却用“本报讯”或“北京电”等方式报道中国大陆的新闻，而且在数量上不比台湾、香港新闻少。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说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她对海外华人及其媒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七章

90 年代华人新移民新闻业

70 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逐步扩大，自港、台、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相对于上一代华侨华人而言，这些新增人口被称为新移民。

如前所述，新移民主要包括四类人：一是港、台亲属移民和已在当地就业、定居的留学人员；二是港、台投资移民和专业移民；三是陆续定居和入籍的印支难民；四是大陆亲属移民和已在当地就业、定居的留学人员。关于前三类人员的情况，本书前章已经作了介绍，因而本章将以主要篇幅介绍第四类人员——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新闻媒体的情况。

据统计，从 1978 年（中国全面恢复外派留学生的的工作）到 1992 年的 15 年中，中国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生总数为 19 万人（是过去 100 多年总和的 3 倍），其中，赴美的占 60%，赴欧的占 20%，赴日的占 10%，其余 10% 则散居在世界各地。^① 而到 2000 年，中国大陆各类留学人员的总数已上升到

^① 方雄普、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第 187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版。

32万人,^①比1992年增加了近一倍。1993年,教育部确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因此,1996年以后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情况有所改变,回国人数以每年13%的速度递增。而学成未归或在当地定居者,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澳洲、南美洲、东欧、非洲等,也有新移民出现。

随着已在当地就业、定居的留学人员以及大陆亲属移民的增多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一些人开始办报办刊作为交流信息和发表意见的园地,于是80年代末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由新移民创办并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由于对办报者的确切身份(持留学生护照、持“绿卡”还是已经入籍)难以分辨,故此类报刊也包括了留学生创办的报刊。此外,这一时期仍有港台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和大陆、香港、台湾报刊的海外版出现,为了展现海外华文媒体的全貌,我们对此也一并介绍。

第一节 美洲华文传媒

美洲地区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美国、秘鲁及加拿大,(新旧移民总数)分别为306万、130万及101万人;其次依序为巴西、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阿根廷、苏里南、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波利维亚、千里达、圭亚那、盖亚那、巴拉圭、古巴、贝里斯、荷属安地列斯、

^① 邓琳:《留学生回国创业是最佳时机》载美《侨报》,2000年3月10日。

智利、哥伦比亚、尼加拉瓜、阿鲁巴及乌拉圭。^①

一、美国

在美国 80 年代以后就开始有大陆专业移民和亲属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它们多为周报和期刊，虽然多数寿命不长，但此伏彼起，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新大陆》（New Continent）报纸型月刊，1993 年 10 月 1 日在西雅图创刊。由中国访问学者聂建国（Nie Jian Guo）、冯朝阳（Feng Cao Yang）等集资创办（聂建国为社长，冯朝阳为总编辑），北美招商集团 N. A. C. Group Ltd. 发行。该报为美国创办较早的、面向大陆新移民的报刊之一。其《发刊词》指出：“本报的宗旨，首先是起到无形桥梁的作用，注重在美华人以及留学生的报道，沟通同命相依的华人的心灵，增强团结向上的合力，同时尽可能提供详实而有深度的故乡情报，促进海内外华人社会的蓬勃发展”。初时每期出 4 开纸 5 张 20 版，面向全美发行。不久后总部移往旧金山，在西雅图、洛杉矶、芝加哥、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圣迭戈、丹佛和加拿大的温哥华设办事处同步发行，每期增至 6 张 24 版。主要内容有：1、反映新移民生活的通讯、报道、文章、讨论等，题材具体、生动，写作亲切、感人。2、关于中国大陆新移民适应美国生活的知识介绍和咨询服务。两年后每期印数增至 1 万份，在美国 50 个州有长期订户，被誉为“凝聚新移民力量”的报纸。

《中国导报》（China Guide）美国华、英文周报。1994 年 3 月 31 日在大洛杉矶地区的蒙特雷公园市创刊。该报首要服务对象是洛杉矶及全美华裔工商界人士，目的是向他们提供急需的信

^① 引自台《宏观报》2000 年 5 月 20 日《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共计三千四百五十余万分布世界五大洲以亚洲最多美洲次之》一文，载于《华侨华人资料》，2000 年第 4 期。

息，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家乡的信息、各种商机信息以及在美生活经验介绍。该报分华文、英文两种版本。中文版每期对开 3 张 12 版至 4 张 16 版，内容有要闻、综合新闻、中国经济、国际经济、中美贸易、大陆社会、新大陆版、华夏论坛专栏、地方新闻、环球采风、荧屏内外、文史、人物、话说美国等。各版均横排，首末页三色印刷。总社设于蒙特雷公园市，在旧金山、波士顿、休斯敦、芝加哥、亚特兰大、纽约、西雅图、华盛顿设有分社。1995 年改称《美中导报》（US - China Times）。

《中华经济时报》（China Business Journal）美国华、英文报纸，也是美国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英文电子报。1994 年 6 月在纽约创刊。创办人和总裁是纽约华资国宝银行董事长孙启成律师，社长是大陆移民董维（David W. Dong），总编辑是覃光广（Qin Guang G.）《发刊词》称该报“是一份为世界华人经济服务的报纸”；“宗旨是：客观、公正、全面地介绍华人经济动态和成就，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华经济的繁荣与昌盛贡献力量”。英文版（电子版）初时每日发行 3 万字，内容包括北京每日各报要闻、中国经济简讯、亚洲经济新闻、中国各类投资机会和中国各代表团的行程表等。订户包括美国企业、官方单位、学术研究单位、各国企业、华人企业、中国留学生及学者等。中文版初时为周报，对开，每期 12 版，全部繁体字横排。第 1 版为经济要闻，内页各版有国际经贸与华人经济、大陆经济、香港和东南亚经济、台湾经济、社区经济、社区工商等版面和《艺文天地》、《生活百科》等副刊。

《新世界时报》美国第一份简化汉字报纸（周报），1997 年 9 月 19 日在华盛顿创刊。创办者是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华人，工作人员包括侨社负责人、中文学校理事、新闻工作者、电脑工程师、律师等各类人士。该报之所以使用简化汉字，是考虑到该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及学成就业人员越来越

多，一个兼具中西文化教育背景的读者群正在形成，华侨社区的传统结构也因此而出现重大的变化。面对新移民，为了适应以简化汉字为教学工具的中文学校蓬勃发展的需要，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该报社长蒋亚洪。

将信息输入国际户联网（Internet）的中文电子报刊，是 90 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海外传媒的新品种，而这一新生事物的带头人和主力军，就是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早在 80 年代末期，留学人员就通过电脑网络传递、交换信息了，只不过那时的网上语言几乎都是英文的。随着户联网中文编码技术的逐步成熟，才有中文电子报刊的问世。据现有资料显示，海外第一家中文电子刊物是《华夏文摘》，它是 1991 年 4 月在英文《中国新闻文摘》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从那时到现在，海外中文电子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留学人员主办的中文电子刊物在世界各地计有数十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华夏文摘》。

《华夏文摘》1991 年 4 月创办于美国，领有国际统一刊号（ISSN: 1021 - 8602），是第一家全球性的华文电子杂志。该刊为综合性文摘周刊，向海外中国留学生、学者和华人社区提供新闻信息和娱乐。该刊称“坚持与任何政治团体无涉与恪守新闻自由、真实、中立的原则和传统”，并“弘扬中华文化”。主要内容是选摘中国和海外各大中文杂志的精彩之作，在每个周末通过电脑网络传送给读者，每期平均约 1.5 万字。设有遥望神州、社会纪实、广角镜等栏目，也发表留学生的作品，曾举办以“乡情”、“我们”等为题的征文。发稿后全部文本长期存放在几个公共电脑资料库供随时通过因特网提取。该刊编辑人员分布在 6 个国家 20 几个城市中，都是正在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或学者，通过电脑通讯网完成编辑工作。该刊订户人数不断增加，1992 年初为 4000 户，3 年之后每周达 29300 户。

类似《华夏文摘》这样的全球性电子刊物还有文学性的《新

语丝》、《橄榄树》学术性的《语文专刊》等。《新语丝》月刊据称是“由一群在中文电网上长期活跃的‘资深电网文人’”，于1994年2月创办的，没有公布编辑部地址。该刊设有“牛肆”（随笔、评论）“丝露集”（诗歌、散文、小说）“网里乾坤”（文史哲小品）和“网萃”（中文网络佳作选）4个栏目。《语文专刊》则是由设于纽约的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主编。1991年7月创刊时为印刷版，1994年起以电子版形式出现，主要讨论中文拼音化和电脑化问题，经常有关于中文联网技术的文章和各种中文软件的介绍。

美国地区性的电子刊物也较为发达。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早在1986年就办有印刷版的《威大通讯》，在此基础上，1993年7月又开办了电子版。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季刊，内容除校园活动之外，经常有诗歌、散文、娱乐、健康信息等。1994年年初，又有《未名》双月刊和《布法罗人》双月刊问世。前者由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留学生创办的《未名》杂志社出版，分印刷版和电子版，主要刊登散文、诗歌、杂文、文艺评论等，也刊登各种实用信息，如生活参谋、家乡食谱、旅美常识、商业指南等。后者由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中国留学生、学者主办，设有“学术讲坛”“文艺沙龙”“世事聊斋”等栏目。此外，每月出版的《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会刊》每期都有最新的科技动态。

美国传统的侨报（在攻势凌厉的港、台报团的冲击下），目前只剩下旧金山的《金山时报》（1924年创刊）和纽约的《华美日报》（1943年创刊）。一些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纸如《美洲华侨日报》、《少年中国晨报》、《华侨日报》、《联合日报》等分别于80年代、90年代停刊。

鉴于《美洲华侨日报》和《中报》（1982年创办）于80年代末相继停刊，此后纽约的华文报纸“无法提供海峡两岸的充分资

讯，而且有太多负面的报道”，一批美籍华裔知识分子联合侨社人士成立了“太平洋文化企业有限公司”（Pacific Culture Enterprise Inc.），于 1990 年 1 月 5 日在纽约创办了《侨报》。该报初为周报，每期出对开纸 4 张 16 版。其宗旨是：“努力成为沟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桥梁”；“维护华侨和华人的权益，弘扬华侨和华人在海外成功创业的事迹，以推动侨社内部的团结”；“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中国的统一贡献一份力量”。该报在《发刊词》中还申明谋求华人福祉，关怀故土吾民，放眼世界的三个愿望。

该报创刊后即获好评，发行量迅速上升。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 1990 年 8 月 31 日改为彩色印刷的大型日报。日报采用了现代化的电子暗房、电脑排版传版设备和印刷设备。初时日出对开纸 9 张 36 版，1992 年增设旧金山版，1994 年增设洛杉矶版，做到美国东西两岸同步出版，并陆续增加篇幅，增聘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和扩大发行。到 1995 年时，已成为美国有影响的全国性华文大报之一。每天凌晨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同时出报，同日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波士顿、休斯敦等大城市发行，读者遍及全美 43 个州。日出 40-44 版，分为 3 组，每组封面和封底为彩色印刷。主要内容有国际新闻、美国新闻、东南亚新闻、中国大陆和港台新闻、美国主要城市的华人新闻、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地区的重要新闻，专栏文章和大众评论，美国、中国、香港娱乐新闻，中国小说连载、文学作品、寰宇珍闻、家庭妇女、卫生医药等类的副刊。其中以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情况的报道最具特色，并增设了《今日广东》、《今日福建》等地区性专版。在创刊 5 周年时，美国副总统戈尔的贺电称：“这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显示了美国华人社区的不断壮大”。

该报社长王明杰，总编辑郑依德（Jeng I-der），西部版总裁

谢一宁。1996 年 2 月进入因特网。

1994 年 11 月，上海《新民晚报》开始在洛杉矶发行，日出 4 开纸 4 张 16 版，通过卫星传版在美国同步发行，至 1996 年已在全美 50 个州有订户。1996 年 11 月 9 日，《新民晚报》美国版（Xi Min Evening News U. S. Edition）在洛杉矶创刊，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份在海外采编的报纸，它的发行和广告业务由新民国际有限公司负责。该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在美华侨华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的新老移民和留学生。版面由 4 张 16 版扩充至 6 张 24 版。增加部分的内容主要有美国新闻和华人社区新闻；《中国投资》、《浦东经纬》等新设立的专刊；中国 30 个省市晚报提供的介绍各地情况的版面。总编辑丁法章（Ding Fazhang, 1940 -）。

美国 90 年代以后出版的报刊还有：

《中华周报》 1992 年 1 月 2 日创办于费城，社长兼总编辑胡冷才。该报逢周五出版，免费赠阅。每期出对开纸 3 大张 12 版，内容有要闻综述、社区动态、环球博览等。

《神州时报》 1992 年 3 月 18 日创办于洛杉矶，社长俞森，总编辑孔婴。每周五出版，每期出对开纸 3 大张 12 版。内容有重要新闻、当地新闻、大陆社会、新移民、社会写真、体育、卫生与健康、小说等。

《风云杂志》 1993 年 3 月在加州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杨文瑜。该刊为月刊，又称《美国华埠新闻》，每期 72 页，主要内容为美国华人社会的人与事。

《中美邮报》 1994 年 7 月 4 日创办于科罗拉多州，社长冯皖宁、总编辑屠新时。为美国中大公司出版发行。每期出对开纸 2 张半 10 版。内容有美国新闻、每周时事要闻、大陆新闻、海外华人社区、台湾社会写真、社会瞭望台等。

《自由时报》该报是台湾《自由时报》在美国同步发行的

美东版，1995年在纽约出版。社长何哲洋，总编辑陈国坤。每日出对开纸5大张20版。内容有焦点新闻、政治新闻、国际新闻、社会新闻、财经快讯、东亚报道、大陆新闻、综合新闻、健康以及各种副刊。

《硅谷杂志》(Silcon Valley Magazine)华、英文季刊，1977年创办于旧金山湾区的圣何塞(San Jose)。内容为北美、亚太高科技通讯。总编辑王守武院士(Prof. Shouwu Wang)，社长谢建扬(Dr. James Xie)博士。

《加州阳光》综合性双月刊，1997年8月在旧金山湾区的San Mateo创刊。总编辑龚慧娴(Amber Kung)。

《是非半月刊》时事政治性杂志，1998年2月15日在旧金山创办。主要刊登关于当前时局的评论文章。

《美华文学》美国华人文艺界协会主办的双月刊，1998年6月在旧金山出版。前身为1995年2月1日创刊的《美华文化人报》。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社长黄运基，主编刘子毅，副主编老南、王性初。

《矽谷时报》华文电子报。由总部位于旧金山硅谷的华人网站CCCHoome主办。1998年12月创刊。宗旨是向全球华人提供最新的科技和财经资讯。内容有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分析，股市趋势以及技术转让、金融投资、人才流通等方面的信息。发行人为黄志远。

《湾区时报》以报道和评论当地华人社区动态为宗旨的社区报。1999年3月19日在旧金山创刊。辟有时事纵横、湾区论坛、人物写真、文艺广场、商圈巡礼等栏目。发行人兼社长杨文瑜(《风云杂志》社长)

《中国日报》在大洛杉矶地区El Minte出版的日报，1997年11月1日创刊。出版者及承印者为洛杉矶伟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每周出报6天，每天出对开纸5张20版。内容包括中国

要闻、美洲新闻、全球金融、国际要闻、南加华人、南加体育等。

《远东时报》印支裔在美华人创办的华文周报，1997年在大洛杉矶地区的圣基博（San Gabriel）创刊。发行人陈庭城。

《医药生活》在大洛杉矶地区 El Minte 出版的医药专业刊物。1997年创刊。

《明报》香港《明报》由张晓卿收购后出版的纽约版。1997年4月8日在纽约创刊，由《明报》（纽约）有限公司发行。《明报》纽约版系在当地编排成版，每期出对开纸16张48版，内容包括要闻、美国经济、副刊及香港新闻三个部分。总编辑马安一。

《存仁社区导报》在纽约法拉盛出版的对开报纸型半月刊，1997年初创刊。主要内容为社区新闻和宗教、文化活动预告等。由存仁出版公司发行。社长杜彼得（Peter Tu），总经理李姍（Jenny Li），总编辑颜嘉男（Chianan Yen）。

《费城中文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版的周报，1997年创刊。社长颜禧智（Tri H. Yan）、彭晚轩（Wanxuan Peng），总编辑彭霖（Lin Peng），主编卢燕（Yan Lu）。

《中国城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Cleveland）出版的华文报纸。1998年12月24日创刊。发行总监陈雷（Ray Chen），总编辑傅瑶（Angela Fu）。

《美中社会和文化》华、英文季刊。1998年12月2日在波士顿创刊，由波士顿美中文化研究所和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联手出版。宗旨是促进美中文化交流。内容有关于美、中社会与文化问题的论文，对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动向、在美华人使命等问题的分析等。主编为波士顿美中文化研究所理事长、所长王永江，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董事长纪虎民、哈佛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何宝章等为编委。

《波特兰周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出版的周报，1997 年底创刊。

80 年代至 90 年代是美国华语广播电视走向普及的阶段。在广播方面，出现了覆盖全国和北美广大地区的广播网。比如美国纽约的美加华语广播网（1976 年 6 月创办），除纽约总台外，在美国的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费城、休斯敦、萨克拉门托和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设立了分台，通过卫星进行联播，使用广州话全天 24 小时播音。1988 年美国华人创办的普通话“中国广播网”，除纽约总台外，还在洛杉矶、旧金山、圣荷塞、达拉斯等设立了分台，每天播音 24 小时。与此同时，北美各地地方华语广播电台也不断发展。比如美国洛杉矶 80 年代以来先后开办的广播电台就有“洛杉矶华语广播电台”（1983 年 11 月）“中华之声”（1984 年 1 月）“中文广播电台”（1993 年 9 月）、联邦电台华语广播（1994 年）、“洛杉矶电台”（1996 年 2 月）、联邦广播电台（1998 年 4 月）等多家。其中“中华之声”中文广播电台都是全天 24 小时播音。

80 年代以后，华语卫星电视开始出现。1989 年 9 月创办于洛杉矶、1990 年 1 月正式开播的北美卫星电视（台湾移民办），是北美、也是海外第一家卫星直播的华语电视公司。该公司每天 24 小时播出节目，在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达拉斯、夏威夷、华盛顿等地区都能收看到。1991 年元旦，台湾和香港的华语电视节目通过卫星传向美国。1992 年 10 月起，海外华人已经能够直接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直播的第四套节目（即国际频道）。1993 年，大陆新移民创办的芝加哥华语电视台发展为 3C 集团，并由该集团同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通过卫星每天向北美传送新闻节目，再经美国国内卫星转发，供北美华人收看。同年 8 月，3C 集团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美洲东方卫星电视开播。该台每天可播出 12 小时来自中国大陆电视卫星提供

的节目，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华语电视台之一。与此同时，华语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创办于纽约的中国海外电视公司，早在 1973 年就在当地有线电视台播放节目；美国纽约的“宏声电视”（1980 年）通过曼哈顿有线广播电视台播出中国的华语节目；美国纽约的中文电视（1990 年 1 月）每天在纽约有线电视 69 频道播出 8 小时；洛杉矶的翡翠电视（1985 年）以有线方式每天播出节目 10 个半小时，后改为全天 24 小时播出。

20 年来，美国华语广播电视不但数量大幅度增加、技术手段日益进步、规模和覆盖面不断拓展，受众、节目来源和内容方面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受众由老华侨转向以占华人口大多数的新移民为主，增加了新移民感兴趣并需要的内容。其次，节目内容渐趋多元化，并且与报纸一样，出现了淡化政治色彩的趋向。第三，有关中国大陆的报道、来自中国大陆的新闻信息和广播、电视节目日渐增多。

二、加拿大

加拿大统计局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进入 90 年代，华裔人口大幅度上升，已近百万，成为全加少数族裔中人数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族裔。

90 年代以来，加拿大华文报刊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

首先，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开始办报，并且逐步出现中文电子刊物。而中文电子报刊的问世，标志着加拿大华文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加拿大的中文电子杂志早在 1991 年就出现了。当年 12 月，渥太华中国同学联谊会主办了《联谊通讯》综合性月刊。该刊强调服务性，较多刊登生活知识方面的文章。1993 年 9 月 20 日，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创办了《枫华园》十日刊。该刊集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文化娱乐、新闻时事为一体，具有较大的信息量。以上两刊据称发行量仅次于《华夏文摘》。此外，卡尔加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的综合月刊《窗口》，原为印刷版，电子版于 1993 年 5 月创刊；《红河谷》月刊由温尼伯市曼尼托巴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于 1994 年 2 月创办，每期同时发行印刷版 1000 份。

其次，报业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大汉公报》（1907 年创刊）已于 1992 年 10 月 4 日停刊；有 80 多年历史的《醒华日报》（后改名《醒华报》）也从过去的日报变成了如今的月刊。目前主导全加中文报业市场的有三份报纸：《星岛日报》、《世界日报》和《明报》。前两份报纸在加发行历史稍长一些；《明报》自 1993 年 5 月在加问世，两年后打开市场，三年后形成与《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三分天下”的局面，并且后来居上，成为目前阅读人数最多的中文报纸，每日拥有 5 万多读者。

《明报》是香港《明报》的加拿大版。先是于 1993 年 5 月 29 日在多伦多创办了加东版（创办时有原《星岛日报》加东版总经理姚守一及其班底加盟），彩色印刷。除了刊登香港《明报》的内容外，还转载《明报》周刊和月刊的文章。同年 10 月又在温哥华创办了加西版。加东版日出对开纸 20 张，负责人洪德修；加西版出 18 张，负责人陈庆源。

目前多伦多还有《城居周刊》、《号角》（加东版）《加华新闻》等华文报刊。

《城居周刊》1984 年创刊于多伦多，自称：“加拿大第一份行销香港的刊物”。每期出 4 开纸 7 张 28 版，内容以报道房地产动态为主，每期大约印 2000 份，分置各大酒楼或华人商场供人免费取阅。广告较多，雇员四五人，据称尚可勉强维持。

《号角》（加东版）纽约《号角》月刊（1988 年创办）的

加拿大版。1992年3月创刊，每月出1期，对开纸3张12版，免费赠阅。出版者为基督教角声布道团。该报称：该布道团“与社区大众接触时发现大部分的新移民，因语言的隔阂，无法了解北美社会的状况；因初来乍到，缺乏亲友的扶持。……因此主动向北美同胞伸出友谊之手，大家交个朋友”。其工作人员全部是义工。设有社区版、综合时事评论、爱心汇点、天伦乐、儿童园地、生命线、时蔬集、怡康园地、加东版教会及社区消息、家在加乡、大都会等栏目。

《加华新闻》华文周报，1999年5月29日创刊。创刊词指出，该报将突出加拿大本地特点，帮助新移民适应环境，充实生活，更好地开创未来，让新老移民在这块园地上充分发表言论，办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认识加拿大的窗口，办成加拿大华人的喉舌。该报每期出对开纸1张4版，随《人民日报·海外版》向全加发行。内容有加拿大国家大事、华人创业独家专访、华人社区新闻、副刊文字等。《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为该报题写了报头。

目前温哥华出版有《真佛报》。该报为华文佛教半月刊，创办者为莲生活佛卢胜彦。1991年10月创刊，4开8版。主要内容有佛学短文和各地华光功德会动态。总社设在温哥华，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台湾地区印刷、发行，依靠赞助免费赠阅。社长为释莲慈上师（白善智）。

在蒙特利尔，资格较老的报纸有《华侨时报》（1981年12月创办），新办报纸有《亚讯》和《华侨新报》等。《亚讯》是华文双周刊，创办于1990年。每期出对开纸6张，后改为4开纸12张。该刊已于1993年6月停刊。《华侨新报》是华文周刊，由魁北克文化商务有限公司（Quebec Culture et Commerce Ltd.）发行。1991年3月2日创刊。初时每周出4开纸5张20版，后增至10张40版。内容以魁北克省和蒙特利尔新闻为多，另有今日华埠、

专题报道、经济之窗、大陆新闻、国际简讯、加拿大新闻和副刊等版面。广告占一半的篇幅。社长车向前，总编辑谭子治。

在首都渥太华，有《加京华报》（1977年创刊）、《加华侨报》（1979年创刊）和《中华导报》等多份中文报纸同时并存。这些报纸从十几版到四十几版不等，或月刊，或周刊，或双周刊，或不定期发行。发行量一般在数千份到1万份之间。

此外，在华人不多的魁北克、温尼伯等城市，也先后出版过《华侨新报》、《草原报》等华文报纸。

在以往加拿大中文报纸市场上，港台报纸一直占居主导地位，自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5月在多伦多发行以来，格局开始发生变化。1997年3月，新民国际有限公司与加拿大博道影视传播公司合作，把《新民晚报》美国版从洛杉矶空运到温哥华，再由博道公司分发到大温哥华地区130多个发行点，使读者能够看到当天的报纸。温哥华地区原有的三家主要中文报纸，《明报》及《星岛日报》偏重香港新闻，《世界日报》偏重台湾新闻，如今的《新民晚报》着重报道中国大陆新闻，从而使大陆方面的声音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而前述《加华新闻》的随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行，更形成了一种强势，成为在加华人“了解加拿大社会的窗口，联络祖国感情的纽带，表达留学报国的园地，提供社区服务的媒体。”^①

但是，由于竞争日趋激烈，加拿大华文报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以加第一大城市多伦多为例，华裔人口近40万，占全市人口的9%。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三大中文报纸已是供过于求，其他小型报纸的竞争更是惨烈。在首都渥太华，多份中文报纸同时存在，共享这个仅有3万多华人人口的中文报刊市场。加拿大中文媒体研究者认为，中文报纸的生存空间已经变得

^① 《环球时报》，1999年8月6日。

越来越小，总的发展趋势是“办报不难，维持不易”。

90年代以后，加拿大出现了一些新的广播电台。

多伦多美加华语电台是美加华语广播网（1976年5月创办于纽约，创办人刘恕）的分支机构。创办于1988年，1990年8月加盟总台设在纽约的美加华语广播网。该台租用 CKFM99.9 的副波全天24小时用广州话广播。星期一至五以自办节目为主，同时转播纽约总台的部分节目。周六、周日以转播总台节目为主，兼播具有本地社区特色的节目。内容有中国新闻、香港新闻、本地新闻和国际新闻。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专题节目。台长程乃根（Jonathan Tsin）。

多伦多商业电台是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商业性华语广播机构。创办于1995年9月1日。使用多元文化电台的 China Radio 广播时段，每天广播5小时30分钟。以广州话播出。节目强调娱乐性和资讯性，适合不同类型听众的需要。该台行政副总裁张家伦和新闻总监甄钧亮与两位主持人一起组织“四大天王会议室”评论时事。电台每小时或每半小时播报一次新闻，并随时报道香港最新消息，同时还设有“点三点四”、“无定向风”、“繁忙都市放工时”、“多城缤纷夜”及“商台至尊榜”等栏目。

在温哥华，出现了“华侨之声”广播电台和温哥华中文电台两大广播电台的竞争。

“华侨之声”广播电台于1973年启播（由留学加拿大并定居温哥华的香港移民刘恒信创办），租用 AM1470 频道，每天播出4小时广州话节目。90年代初，延长到每天播出14小时，从晚上8点到翌日10点。其中有两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其余为广州话节目。

1993年1月，以冯氏为首的 Y. B. C 控股公司收购了拥有 AM1470 频道的公司后，成立了温哥华中文电台，由香港广播界知名人士吴明林任台长。“华侨之声”广播电台被迫转换频道，

向拥有 AM1320 频道的公司租用少量广播时间，以继续经营。之后，该台觅得台湾一财团的支持，成功收购了 AM1320 频道，并延长广播时间为每天（周一至周五）17 小时。这样一来，温哥华华语广播业由一台独大变成了两台争雄。在竞争中，两台各有特色，拥有不同的听众。“华侨之声”有 20 多年历史，因而节目与手法较切合传统华人社区的需要；中文电台则以香港式经营投新移民所好（其听众比较年轻）。

为了增强竞争力，扩大生存空间，促进信息共享，许多地区性广播已开始联播播出。北美地区跨国华语广播机构美加华语广播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十余个城市有联播台。这些城市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芝加哥、休斯敦、多伦多、蒙特利尔等。从 1997 年 9 月 1 日起，温哥华 AM1470、多伦多 FM88.9、AM1430 以及卡尔加里 AM1140 统一更名为加拿大中文电台，通过三地携手合作，形成了加拿大全国信息网络，从而成为北美地区颇具规模的华语电台。

此外原有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仍在继续播放。如加拿大中文电视台、中华之声有线电视台、蒙特利尔华侨之声中文电台、埃德蒙顿四海中文广播、卡尔加里的华人广播电台、罗杰斯电台多元文化频道以及温尼伯的华人之声电台等。

三、中南美洲地区

中国人侨居中南美洲地区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由于中南美洲各国政府排斥和限制华侨入境，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新客”入境已经很少了。同时，由于华侨大多从事农垦及小型工商业，经常流动，稍有积蓄即离开当地或返国，因而很难形成固定的侨社。新中国成立以后，旅居中南美的华侨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至 60 年代，总数已达约 16.5 万人，比二战结束前增长了 4 万多人。70 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国大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国内一些侨眷得以前往中南美国家继承财产或协助经

营企业，移居此地的华侨人数又逐渐增多。据统计，到 1982 年，旅居拉美国家的华侨和取得住在国国籍的华人总数达 23 万人左右（其中外籍华人约 18.7 万人），分布在 29 个国家和地区。^① 近几年来，中南美国家华侨、华人人数继续增长。目前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是巴西。

据《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介绍，中南美各国的华文报刊，从秘鲁的第一份华文报《民醒日报》（1911 年）创刊至今，已有 90 年的历史。该报可算是全球最高龄的少数华文报纸之一了。目前中南美地区除了《民醒日报》及巴拿马的《共和报》之外，30 年代以前创办的多家华文报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由于华侨子弟中懂中文的越来越少，而当地政府对华文报的限制又比较严格，加上办报人才的缺乏，故拉美国家华文报刊的发行量素来不多。有的每期发行量仅二三百份。50 年代，华侨和华裔较多的个别国家，销数最高的华文日报不超过 5000 份。直到 80 年代末期，也还没有一家报刊的销量能够打破此记录。

巴西是华裔最多的南美大国（计约 10 万人以上），也是出版华文报刊最多的南美国家之一。

《中巴新闻》是巴西的第一份刊物（月刊），1958 年创刊，18 开纸 4 页，为钢板刻写蜡纸油印。约经一年才改打字油印。不久因主持人病故而转手，更名《南美新闻》，改出 32 开本 80 页。1988 年又一次转手并更名为《南美侨友》。因订户日减，次年即告停刊。

《巴西侨报》创办于 1960 年，初为蜡纸刻印，每周出 8 开纸 4 页，后改打字印刷。1982 年更名《巴西华侨日报》，因消息来源不畅，实际每周出版两期。1985 年 4 月停刊。同年 10 月转

^①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第 213 页，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手复刊，改为 8 开 4 页双日刊。由于发行量持续偏低，1990 年 10 月宣告停刊。1992 年 7 月 4 日再度复刊，报名改回《巴西侨报》。每周出报 5 次，版面内容包括要闻版、国际版、大陆版、台湾版、综合版、巴西版、副刊版等。到 90 年代中期，编印已全部改为电脑化。

《中华会馆会刊》创刊于 1978 年，月出 8 开纸 1 张，铅字打印，内容以台湾岛内新闻及侨社动态为主。1984 年，因主编遇害而停刊。翌年 7 月复刊，更名《华光》，改为对开 1 大张 4 版，仍为月刊。90 年代中期负责人为董乃虞。

《友联报》创办于 1982 年，钢板刻写，蜡纸油印，18 开簿本式刊物。内容以报道巴西政经及侨社动态为主，偶有介绍当地风光的作品。1984 年停刊。

《美洲华报》1983 年 10 月创刊，由旅巴西华侨集资合办。初为三日刊，两年后改双日刊。1992 年 7 月改电脑打字、排版，1993 年 3 月起每周出报 5 次。每期出版 1 大张半，周末出版两大张。内容有重要新闻、台湾新闻及大陆新闻各一版，巴西新闻二至四版；另有“华园副刊”一版，专门刊登侨胞作品，并举办征文。

《圣保罗时报》1989 年 10 月创刊，其刊期、篇幅与《美洲华报》大致相同，只是从未辟过副刊版面。该报已于 1992 年 4 月停刊。

此外，巴西里约热内卢及圣保罗两市的华侨天主教堂，曾分别出版《里约周报》及《侨光》月刊，内容以宗教及教友活动为主，篇幅不大。以上两刊均于 1986 年停刊。

目前，巴西旧有的华文报刊仅存三家，即《华光》月刊、《美洲华报》和《巴西侨报》。90 年代以后出版的华文报刊有《南美文艺》。

《南美文艺》是巴西综合性华文文艺刊物。1992 年 5 月创

刊于圣保罗市，由《美洲华报》副刊《华园》发展起来的文学团体南美华文作家协会主办。该协会会长朱彭年在《南美文艺》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我们的立足点是南美，我们的着眼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我们的重点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我们的做法是自谋生存，创办一份为我们华族所接受和喜爱的文学刊物，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并称：“《南美文艺》的创刊是南美华文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南美作协成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创刊号共 12 万字，有 30 位作者的 40 多篇散文、小说、诗歌、论述和一些短文。

1999 年 7 月 31 日，巴西侨界推出两个华文网站——“世界中国城”（www.china-town.net）和“巴西中国城”（www.chinatown-brazil.com.br）。这两个网站的内容包括 12 个单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天使书城、网上艺展、全球旅游、电脑科技、经贸特讯、医疗保健、中国食谱、娱乐休闲、求才求职、全球寻人、新闻气象、电玩大观、电子贺卡、交友中心、免费信箱、音乐城。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

秘鲁现有华侨、华人约 5 万人，还有几份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

《民醒日报》创办于 1911 年 3 月 10 日，由梁余永发起，李硕夫、许箴香等人集资创办（一说由秘鲁中国国民党前身中华爱国社老社员蒙合等人创办），为油印周刊。以支持孙中山、宣扬中国革命为宗旨。创办后不久即因资金短缺而停刊。1915 年 5 月复刊，1917 年起改为日报（星期一休刊）。日出对开纸 1 张 4 版。内容包括要闻、社论、国际新闻、当地新闻以及各种副刊。本地新闻大多取自秘鲁各报当天新闻（翻译、整理而成），有时采用各广播电台新闻，还采用台北华侨通讯社供应的稿件。1987 年，为适应新生代华裔日增的需要，开始出半个版的西班牙文

栏。翌年又直接接收台北中央社及西方通讯社传真电讯。副刊版内容多取自香港和台湾报刊。发行量最高时达五六千份。90年代初总经理兼总编辑为国民党驻利马支部前书记长曹巨声，社长陈月莲，副总编辑余剑鸣。1996年采用电脑打字，为三日刊，负责人麦孟强。

《公言报》为秘鲁洪门致公堂主办，其前身是1911年3月7日创办的《华商报》。由谢义友、林永森等负责创办。1914年改为《救国报》，1917年改为《侨声报》，1927年改为《公言报》。其办报宗旨为洪门的“忠诚爱国”、“侠义除奸”、“义气团结”三大信条。1979年6月23日停刊改组，1983年8月28日复刊。复刊后董事长为唐庄生，编委主任张耀明。该报在《复刊词》中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华侨及华侨社团的需要服务，同时将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复刊后日出对开纸1大张4版，内容包括要闻、当地新闻、国际新闻、中国新闻、综合副刊等，广告占1版多。新闻取自中国新闻社、新华社以及香港中国通讯社的电讯稿。90年代初，社长兼总编辑为季晓东。1996年2月5日改版，从“新一期”起重新编号，每周出3期，每期出4开纸2张8版，电脑打字，印刷较前清晰。同年6月3日起改为周4期，星期六为“周末版”。

《东方月刊》为秘鲁华文、西班牙文月刊。1931年4月20日由陈汉荣（Alfredo Chang Cuan）及其表兄弟卡布列尔（Gabriel）、里昂诺尔·阿吉（Leonor Acat Chuan）创刊于利马。宗旨是：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华人读者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为华人的发展作出贡献，成为华人社团的喉舌。创刊号封面为北京颐和园玉带桥，此后各期封面均以东方文化为主题。每期出16开本一册，图文并茂，印刷精美。除刊登秘鲁、中国和世界各地大事外，着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有时转载台湾一些杂志的文章。80年代末期总编辑为陈汉荣之子劳尔·陈（Alfredo Raul Chang

Ruiz), 责任编辑卡洛斯·郭 (Carlos Rosendo Acat Koch)。1996 年时每期出 8 开纸 60 页。

南美的另一大国阿根廷, 近年由于移民增至二三人, 曾出版过多种《华侨通讯》之类的刊物, 有半月刊, 也有周刊, 均为 8 开或 14 开本册式。有钢版刻写油印, 有打字印刷, 更有剪贴港台报刊影印而成。这些刊物大多时出时停, 出版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内容有国内外新闻、侨社动态; 工商业广告所占篇幅较多, 间或也有侨胞作品刊出。1986 年, 阿根廷曾出版《南疆新闻》(对开 1 大张)是与巴拉圭《南美天地新闻》(1980 年出版)合作创办的, 即将《南美天地新闻》原版换上《南疆新闻》报名, 并加入若干阿国信息。一年后因故停刊。

目前阿根廷有两“本”华文报——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华文报, 只是两本不同的华文刊物。它们都是由当地来自台湾的华人创办的, 最先创办的是《阿根廷通讯》, 其后是《台湾周报》。

《阿根廷通讯》创刊于 1984 年 6 月 1 日, 创办人谢俊林, 主编段建安。该刊以“为众多侨胞解除目盲之苦”为宗旨, 并宣称“立场超然”。初为旬刊, 用 14 开纸缮刻复印, 以订书机手工装订, 张数随广告多寡而增减, 一般每期出 2—3 张。内容取材自阿根廷报刊的当地新闻版。1985 年 7 月, 谢氏因投资旅游业无暇兼顾报社业务, 遂将该刊转让给赵诚意独资经营。1988 年 5 月 4 日, 该刊更名为《新阿根廷通讯》, 内容也作了调整。1989 年, 篇幅增至每期 20 张至 26 张, 并改传直接接收新闻及使用电脑打字排版。调整后开始以较多的版面转载中国报纸消息, 同时增辟各种专题分析及新知介绍版, 转载精华文选。对有关中国新闻的报道, 以正面反映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现况为主。90 年代中后期每期出 16 开本 80 页。内容包括要闻、经济分析、阿根廷政经专题、华社新闻、大陆与香港、台湾新闻、国际通讯、中国历史故事和风光文物、小说副刊和漫画等。发行人兼主编赵诚

意。

《台湾周报》创刊于 1988 年 4 月 9 日，发行人李国仁。16 开本，内容以报道台湾岛内新闻为主，多采用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及民进党刊物资料，并常出现主张台独之言论。90 年代中后期发行量约 650 份。

苏里南华侨、华裔人数虽不多（不足万人），却也出版了几份报纸，如创办于 40 年代的《南风日报》，创办于 50 年代的《自由日报》创办于 60 年代的《广义堂月刊》等（均已停刊）。70 年代创办、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的有《洵南日报》和《华新报》。

《洵南日报》是苏里南广义堂主办的华文报，1972 年 3 月 7 日创刊于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该报宣称以“团结侨胞”、“为侨胞服务”、“谋求侨社福利”、“充实侨胞的精神粮食及加强对局势发展的认识，了解人生旨趣”为宗旨，并标榜“不偏不倚，没有政治偏向和背景”；“以侨胞的意志为意志”；“做华侨喉舌工具，为祖国文化争光”。首任社长刘毓贤。之后几经变换。初为手抄油印，许多版面内容由美国、香港报刊资料剪拼而成。1982 年改为打字印刷，但部分版面仍剪贴香港报刊资料。1985 年前后一度被迫减张缩版。90 年代初期情况有所好转，日出 6 开纸 4 张 16 版至 5 张 20 版，主要内容为要闻、国际新闻、当地新闻、中国新闻和副刊等。销数约 500 份。1991 年 3 月起由张振中任社长，副社长黄官兴、房谭才。

《华新报》创办于 1974 年 7 月 1 日由曾任《洵南日报》社长的黄东来与一批华商集资组成的华新报股份公司创办。黄自任社长，总编辑黄官来。《发刊词》宣称：“我们办报的基本立场是：团结、合作、友好、爱国”。创刊当年，即与华人革新协进会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宴会，苏里南总督、首席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均出席庆祝会。初期编辑出版工作由二三人负

责，后来只由 1 人办理。日出 6 开纸 4 张 16 版，内容有国际新闻、苏里南新闻、评论、侨胞文章等。部分版面剪辑香港报刊资料，当地新闻主要译自当地外文报刊，中国新闻、港澳新闻采用中国新闻社稿，有时也采用香港采风通讯社稿。发行量最高时 400 份。后因华人大量外流，减少至 250 份。1983 年新董事会聘请董事张玉华为编辑。张氏于 1986 年 5 月底离职后，由巫其光接任。

定居巴拉圭的华侨、华人亦不足 1 万。巴拉圭于 1980 年出版了一份《南美天地新闻》，初为 4 开版，每周出 1 次；后改为对开 1 大张，每周出两次，打字印刷。因人力有限，该报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间亦刊载短篇小说。1988 年因经营困难而停刊。

巴拉圭另有一份华文报纸《传真新闻》，1987 年 10 月创刊，初期每周出 3 期，每期出对开 1 大张。后改为每周出 6 期，每日 1 大张，打字印刷。内容有巴拉圭当地新闻，中国及国际讯息，其中台湾新闻占一半以上版面。自《南美天地新闻》停刊后，该报成为巴拉圭惟一由当地出版的华文报纸。1991 年易主，更名《荣光报》，刊期、形式与《传真新闻》无大差异。负责人蔡三义。

巴拿马约有华侨、华人两万左右，出版过多份报刊，有《共和报》（创办于民国初年）《民治星期报》（创办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严报》（创办于 20 世纪 40 年代）《大公报》（创办于 20 世纪 50 年代）《新华报》（创办于 1973 年 10 月 1 日）《华侨日报》（创办于 1987 年 12 月 15 日）等。上述报纸 90 年代仍在出版的只有《共和报》、《大公报》和《新华报》。此外，90 年代以后又创办了两份新的报纸——《拉美快报》和《侨声日报》。

《共和报》民国初年由黎尚武等创办。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英文、西班牙

文合刊（周报）时期；第二个时期，华文周报时期；第三个时期，华文日报时期。此一时期从 1946 年 12 月 1 日开始，初为 12 开油印通讯稿型，后改为打字和手写影印。由于历史上该报与中国国民党有着深刻的渊源，主要来自台湾的人参加编务。内容多采用外电及中央社消息，台湾当局驻巴拿马的人员为其翻译当地新闻，经费靠台湾当局资助。据称该报在侨社占有 80% 以上的华文报市场。90 年代中后期每日出 8 开纸 32 页，负责人陈昌智。

《大公报》 20 世纪 50 年代由洪门致公堂在巴拿马创办，手抄油印出版。每日出 16 开 4 张（星期一休刊），单面印刷，广告约占三份之一篇幅，内容主要是国际新闻、中国新闻和当地新闻摘要。初由冯荫承主持，后由蔡斯达（Carlos Sang Navarro）和郑公正（Kon Chin Chen F.）负责，注册人为郑公正。后来因郑公正被拘入狱，蔡斯达不愿与之继续合作，故从 1973 年 10 月 1 日起，将该报改名为《新华报》，迁址后继续出版。郑氏出狱后亦物色新址，恢复印行《大公报》，手抄油印发行，每日出版 12 开纸 4 张 4 版，发行约 300 份。有时收录到北京电台广播的重要消息，即抄印出版，通过熟人派发。发行网限于巴拿马市区。90 年代后期每天出 16 开纸 40 页，社长郑公正。

《新华报》 1973 年 10 月 1 日由巴拿马中兴公司东主蔡斯达创办，编务由李德荫负责。前身为《大公报》。该报除报头红色直书有别于《大公报》外，其基本立场和宣传报道内容与《大公报》无异，并同样以 12 开纸通讯稿型出版。每期出四五张纸不等，所刊新闻主要用手抄影印，有时也剪辑香港《大公报》资料，和中国新闻社电讯稿拼合而成。外电大部分译自法新社和国际新闻社，重要国际新闻或华人社会新闻放在第一、二版。广告多为固定客户所登，约占两个半版篇幅，发行量约 300 份。90 年代仍在出版。

《拉美快报》 1992 年 7 月 1 日创办于巴拿马城，由新闻界及商界人士集资创办。自称不隶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亦不接受任何政治馈赠，完全以中美洲华人立场为着眼点。该报是拉丁美洲首家完全以电脑打字排版的华文日报。每日发行 8 版，周末另出 4 版西班牙文附刊，以服务数十万不熟悉华语的第二、三代华人以及与亚洲事务有关联的各国读者。除在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地区发行外，还向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及洪都拉斯等国华人读者提供新闻，其发行网还拟扩大至南美洲哥伦比亚及委内瑞拉等国。1996 年 10 月起将巴拿马及中美洲新闻通过因特网向全球华人推出；1996 年年底成为“美洲新闻协会”首家华文报纸成员。报务总监兼总编辑郭笃为，发行人白能通。

古巴一度曾是中美地区出版华文报刊较多的国家，但目前仅存一份半周刊《光华报》。该报 1976 年 5 月由《开明公报》（1920 年创刊）和《光华报》（40 年代末创刊）合并而成。该报命运多舛，曾因物资缺乏及有关方面的刁难一度停刊数月。古中关系好转后，该报也有了发展。至 1989 年底，不但行销古巴，而且远销牙买加、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地区的华人社会。日出对开纸 1 张 4 版，铅字印刷，版面较为清晰美观。内容包括要闻、古巴新闻、国际新闻、南美洲国家新闻、华社消息、侨团消息、中国新闻、综合副刊等。广告每期占半版左右。该报国际新闻和中国新闻一是靠拉丁社电讯，二是由中国新闻社、新华社供稿，还采用过香港采风通讯社的通讯稿。1996 年改为周报。社长雷法英，总经理黄文竞，总编辑冯啸天。

第二节 欧洲华文传媒

90 年代以来，欧洲华文传媒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与欧

洲华裔移民的增加和华人社团力量的壮大有直接的关系。

西欧华人华侨除二战前后的移民外，主要是 70 年代的印支华裔难民（近 10 年来，又增加了 10 万来自浙江的新移民），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他们已经在西欧各国扎下了根，生活相对稳定，许多人甚至早已进入了富裕阶层。如巴黎陈氏兄弟公司的营业额已接近 2 亿美元。东欧的华人主要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北方地区涌入的新移民，他们大多从事商贸活动，也有一部分人取得了成功。在华人社团普遍形成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自然就会出现创办媒体的需要。

在法国，除了 80 年代创办的《欧洲时报》、《欧洲日报》继续出版外，90 年代又出版了《法华报》、《欧中经贸》和《欧华侨志》。

《法华报》是法国华、法文报纸。1996 年 7 月 6 日在巴黎创刊。总编辑为文学博士黄育顺（Ng Yok Soon, 1939 - ）。他说，该报担负的使命是：客观地反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现实，培养海峡两岸的共识，完成统一大业，促进海外华人的团结，形成一股力量，加深法华人民的相互尊重与了解，激励华人融入法国社会并作出贡献。该报为周二刊，逢星期三、六出版对开纸 2 张 8 版。其中 6 个华文版面为：焦点新闻、中外要闻、香港要闻、影视娱乐、法华世界、世华动态；2 个法文版面，以报道中国大陆信息为主。

《欧中经贸》是法国华文月刊，1994 年 2 月由法国欧中经贸出版社在巴黎创办。社长兼总编辑王海曦。编辑部分设在巴黎和北京，在香港印刷，先后由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有限公司和法国中新有限公司负责总经销。该刊的宗旨是：“为欧洲与中国的经济贸易交往提供实用性、参考性和指导性兼顾的信息，促进欧中双边相互了解，推动欧中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该刊为大 16 开 100 页，彩色精印，商业发行。辟有经贸动态、市场点评、消

费点评、观察与思考、焦点访谈（透视）、投资指南、名优企业介绍、名人访谈、名城巡礼、统计资料、编译文摘等栏目。每期介绍中国方面的文章约占整个篇幅的一半以上，欧洲方面的以法国为多，德国、瑞士等国的间或也有介绍。创刊时法国政府总理爱德华·巴拉尔（Edouard Ballrad）曾致函祝贺。

《欧华侨志》由旅法华人叶星球、叶骏创办。1995年9月1日出版试刊号，后不定期出版，每期出8开纸1张4版。该报旨在搜集、整理和发表法国及欧洲华侨先贤、当代华人精英及后起之秀在创业、发展、融入侨居国各领域、报效祖国及改善欧华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事迹，介绍欧洲华人历史、传说、社团、组织等。许多内容系由当事人撰写或根据他们的口述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设有人物专访、华人天地、社会春秋、常青树下等栏目。

英国目前仅有2份华文报纸，即前已介绍的《星岛日报》（欧洲版）和《文汇报》（欧洲版）。除了这两份正式报纸外，还有另外几份华文刊物，它们是：《丝路之音》（1984年创办，不定期免费刊物）；《中国人》（1993年创办，综合性杂志，季刊，1995年起改为不定期刊）；《时代电视》（1995年由时代华人电视台创办，免费月刊）；《哥拉斯哥华人通讯》（1993年创办，不定期免费刊物）；《中国透视》（1994年创办，季刊）；《天下华人》（1995年创办，综合性杂志，暂定双月刊）。上述刊物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均不大。《中国人》、《中国透视》两本杂志各自销量每期不超过500份。

英国还出版了一份华文电子杂志——《利兹通讯》，1993年创办，由利兹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该刊为综合性双月刊，内容以文学作品为主，如散文、杂文、诗歌、随笔等，也介绍一些实用性的信息并报道当地中国留学生及学者的活动。

荷兰七八十年代曾出版过《中国饮食业公会月刊》和《半月

报》。前者系中荷文双语刊，1988年8月19日由荷兰中国饮食业公会在阿姆斯特丹创办。内容包括荷国饮食行业最新资讯和信息的介绍、餐饮业经验的交流以及各种行业问题的探讨。大16开本，16页，胶版彩印，每期印行2500份。全部免费发行。后者同样为中荷文双语刊，1984年由荷兰中华互助会在鹿特丹市创办。4开纸4张16版，以咨询服务为主，包括沟通侨社信息、服务侨社。全部免费赠送。90年代初据称发行近万份。除了这两份刊物之外，目前出版的华文报刊还有《华侨通讯》（前已介绍）《联会通讯》和《华侨新天地》（《联会通讯》双月刊也是中荷文双语刊，由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1989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免费赠送。宗旨是维护旅荷华人社团利益，鼓励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促进荷中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主要内容有：联会动态、荷兰有关外侨的法律法规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介绍等。主编邱玲珍）。

荷兰还出版有华文电子杂志《郁金香》。该杂志由荷兰中国留学生会于1994年12月20日创办，并得到荷兰政府经济上的资助。该刊为综合性刊物，设有文学天地、生活随笔、荷兰风情、百家争言、信息交流、时事经纬等几大栏目。初为不定期刊，后改为月刊。

比利时出版有《旅比华侨联合会会刊》、《比中侨声》、《华人通讯》和《留比通讯》。

《旅比华侨联合会会刊》为华文季刊，创刊于1987年7月，由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一群从事餐饮业的华人筹办。负责人为原居住香港的甘培安（Thomas Kam Pui-On）。因经费有限、编辑人员缺乏，经常不能按期出版。该刊为16开本32页，电脑植字印刷，免费发行。除寄赠比利时华侨、华人外，还寄往卢森堡的华人社区。刊物的内容主要是报道旅比华人和华人社团动态，介绍居住国地理、历史、法律等方面的情况，帮助华侨、华人适应

当地社会。此外还以一定篇幅报道广东侨乡情况，介绍有关中国的讯息。

《比中侨声》华文双月刊，由旅比上海会主办，约 1991 年创刊。宗旨是“传播信息，反映侨声，双向交流，促进繁荣”。16 开本，主要内容有时事要闻、文体体育消息、旅比侨社动态和“留学时空”专栏等。在中国排印后运比利时发行。主编李礼中。

《华人通讯》报纸型双月刊，由比中华人协会出版。约 1991 年创刊，免费赠阅。内容有比利时新闻，有关比利时法律、财税和福利方面的知识，中国两岸三地新闻，比华社会报道，比中信息交流等。8 开张，每期 20 版。

《留比通讯》比利时华文电子期刊。1996 年创刊，由在比各大学留学的中国学人自愿联合编辑，进入互联网供免费浏览。内容有留学比利时的信息交流、文娱信息和自由论坛。1997 年春为季刊。

西欧过去没有或少有华文报刊的国家，近年也出版了这方面的刊物。

西班牙 90 年代出版了《南欧华人报》、《西华之声》和《欧洲华声报》。

《南欧华人报》由旅西上海籍华侨林承国在马德里创办。林曾任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有办报经验，但因经费困难，出版了几期即告停刊。

《西华之声》西班牙华文月刊，1994 年 7 月 27 日由旅西华人自助基金在马德里创办。后由西班牙华人总会主办。宗旨是“服务华人，沟通侨社信息，促进华人间的友谊与团结”。每期出 4 开纸 3 张 12 版，设有要闻、综合、西班牙、华人社会、生活服务专版。电脑打字，胶版印刷。收费订阅。社长王熙丽，副社长王观艺、王绍基，主编王克。

《欧洲华声报》西班牙华人协会主办的华文月报。1995年10月1日创办于马德里。每月1日出版，每期出对开纸1张半6版。内容有要闻、中国消息、西班牙新闻、艺海泛舟、文体万象等。总编辑徐松华，主编范剑青。

意大利出版有《华侨通讯》。此为意大利华文月刊，1992年春由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创办。每期3张6版，电脑打字油印，免费发行。钱伟长题写报名。主要刊登当地华人社区消息和摘自中国大陆及香港报刊上的与华侨华人相关的各种新闻讯息。负责人为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会长孙子系。

瑞士出版有《北欧华人》。此为华文期刊，1990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创刊。由亲台报人、瑞典华人文化协会理事长张剑忠和一些留学生合作创办。以向华侨华人子弟介绍中华文化知识为主旨，免费赠阅。每月1期，每期4页。

瑞典出版有《北极光》月刊。该刊为华文电子杂志，由瑞典律勒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1993年10月创刊，为生活性杂志。服务对象包括整个北欧地区。

此外，瑞典还出版有华文电子半月刊《隆德华人》。该刊由瑞典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1994年12月创刊入网。

丹麦有留学生刊物《美人鱼》（双月刊）。该刊原为印刷版，1995年1月1日又创办了电子版，主要发表留学生自己创作或编辑的作品，也有其他报刊的文摘。

奥地利出版有《欧华》、《奥华快讯》和《多瑙时报》。

《欧华》华文双月刊，1992年7月创办于维也纳，由欧洲华侨社团联合会创办。其前身是由奥地利华人总会于1990年7月出版的《奥华》双月刊。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奥地利华人总会会长胡元绍为发行人，常恺任主编。其宗旨是服务侨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与欧洲各国友好往来，沟通旅欧华侨华人间信息联系。版面设有华人社会、大陆实况、第二祖

国、留学生之页、轶事珍闻、商业信息等专栏。逢双月出版。

《奥华快讯》华文旬刊，由奥地利华人总会于 1993 年在维也纳创办，奥地利欧华杂志编辑部编印出版。内容除报道社区信息和广告外，主要以新闻摘要和文摘形式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信息，每条消息最长的只有百十来字，短的只有一句话或十余字。每月逢 5、15、25 日出版。

《多瑙时报》 1995 年 1 月由奥地利华人文化联谊会在维也纳创办，多瑙时报社编辑发行。常恺、马相兰分任社长和副社长，俞建章任主编。该刊“致力于为旅奥华人服务”，设有半月国际、简要新闻、时事评议、侨社信息、文苑、娱乐圈、生活窗、信息服务等栏目、专版。双周刊，每月逢 10 日、25 日出版。主要是免费赠阅，也接受“赞助订阅”。

此外，奥地利还有一个华、德语电子资讯组织——《奥中资讯网》。该组织以因特网（Internet）为媒介，以万维网（WWW）和电子邮箱（E-mail）为主要通讯手段，向全球华人和德语区人士提供各类信息。1997 年 2 月上网。中文版内容包括：奥地利经济专栏，旅奥华人活动，居奥实用信息，旅欧作者的时事评论和文学作品，主要华文、德文报刊电子版网址等。德文版则提供有关中国经贸、旅游和文化方面的信息。负责人管齐、徐高峰、俞力工。

俄罗斯出版有《莫斯科华人》报。该报 1999 年初在莫斯科创刊，为 4 开周三刊报纸。由俄罗斯联邦长城出版社出版。社长温锦华，总编辑路远。每期出 16 版。第 1 版有俄罗斯、中国要闻以及该报记者的专访，内页设有莫斯科新闻追踪、国际变焦、神州广角、环球世界、今日特写等版面以及《生活》、《红场》、《足坛龙虎斗》、《健康门诊部》、《北风的故乡》等副刊。该报已上网。

在此之前，俄罗斯尚有《中俄信息报》出版。

过去几乎没有一份华文报刊的东欧国家，90年代以后也陆续有华文报刊面世。

例如在华侨、华人人口不足万人的匈牙利，就出版了《旅欧导报》、《欧洲导报》、《欧洲之声》、《中华时报》、《欧华时报》、《布达佩斯晚报》、《多瑙河通讯》、《联合商报》等多份报纸。

《旅欧导报》华文期刊，20世纪90年代初由旅居匈牙利的华侨知识分子在布达佩斯创办，旨在为不懂匈文的新华侨提供当地各种新闻与信息。1992年停刊。

《欧洲导报》华文月刊，1992年由旅居匈牙利的华侨知识青年在布达佩斯创办。该刊以沟通旅匈华侨华人社会信息联系、报道与当地华侨华人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种信息为主，也介绍邻近国家侨社动态和中国情况。

《欧洲之声》华文周报，1994年7月9日由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和匈牙利华人商业总会在布达佩斯创办。发行人为两个总会的会长张曼新。该报逢周一出版对开纸1张4版，设有要闻、经济、社会、副刊等版。内容主要是报道有关中国、匈牙利及欧洲各国时政要闻和经济信息。该报首期发行就不同凡响，达到1万份，极受当地华人读者欢迎。

《中华时报》综合性华文周报。约1977年底在布达佩斯创刊。主要内容有匈牙利新闻、中国新闻和重大国际新闻，并刊登一些经济、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文章。

《联合商报》华文周报，1999年1月在布达佩斯面世。原名《企业家报》，1998年2月27日创刊于布达佩斯，是以经济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刊。1999年1月，在匈出版的《欧洲之声》、《欧华时报》、《布达佩斯晚报》、《多瑙河通讯》以及《企业家》报经过协商，决定在《企业家报》的基础上合并为《联合商报》。

《联合商报》是一份以经济、科教、文化内容为主，以生

活、娱乐和体育为辅的综合性新闻周报。其宗旨是为旅匈华胞的经商、学习、工作和生活服务。主要内容有要闻、匈牙利新闻、中国新闻、经济新闻、社会经纬、体育新闻、科技、华人社会历史回顾、休闲娱乐、社会焦点等，并着重于专题报道。据该报称其编辑工作以独立、公正为原则，以求精、求新为动力，以读者喜爱为目标。每周五出版，每期基本版数 20 版，版面 42×27·5 厘米，封面彩色印刷。已上网。社长兼总编辑周永平，副总编辑余泽民。

罗马尼亚的华文报刊也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1998 年创办《欧洲华胞》，1999 年 3 月又出版了《旅罗华人》。后者为周报，每期出对开 8 版，第 1 版为要闻版，此外有中国新闻版、国际新闻版、社会经济特写、大千世界、文艺版和时尚生活版等。

纵观 90 年代欧洲华文报刊可见，这一时期华文报的特点是期刊多，报纸少；小报多，大报少；周报多，日报少。上述华文报刊中日报只有《欧洲时报》和《欧洲日报》两家，两家报纸均在巴黎创办（出版了 19 年）。尽管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不大，但欧洲毕竟有了现代化的中文大报。此外罗马尼亚还有一份周报《旅欧华人》出版时间仅两年，也可算得上是一份大报。其他报纸都不具备这样的规模。除了《欧洲时报》、《欧洲日报》每日刊登新闻外，一般报纸很少刊登当日新闻，许多周报只能刊登一周来的重大新闻。

1999 年 8 月 21 日，凤凰卫视欧洲台正式开播，这是继欧洲东方中文电视（CNE）和时代华人电视（TCC）之后的欧洲又一家华人电视台。

凤凰卫视欧洲台是同欧洲东方中文电视合作开播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表示，凤凰卫视欧洲台的建立是凤凰卫视立足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今后凤凰卫视在继续致力于沟通两岸三地的同时，将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团结世界华

人。

新组建的凤凰卫视欧洲台将继续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数码卫星 ASTRA 2A 播送节目，并成功进入欧洲主流卫星电视网络 SKY DIGITAL 以及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主流电视网络，全面覆盖 25 个欧洲国家，包括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中欧的德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欧的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北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东欧的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北欧的丹麦、芬兰、挪威、瑞典。

凤凰卫视欧洲台的开播，将使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资讯覆盖欧洲，这对于传播华语文化，增进海外华人同母语地区的联系，解脱海外游子的文化孤独，增进欧洲地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大洋洲国家的华文传媒

大洋洲国家的华文传媒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

按照澳官方统计，澳大利亚华人在民族社区中的人数居意大利、希腊和越南之后，约为 30 万（而按照一些华人研究者的估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居住澳洲本土数代的华人加起来，约为 50 万^①）。但就新闻媒体而言，华文传媒在各少数民族中最为发达。如作为澳最大少数民族族群的意大利，至今尚没有一份意文日报，仅有周报和月刊；希腊族也只是一份日报和几份周报。而华文媒体不但数量可观，而且品种齐全。据统计，截至 1997

^① [澳]戈登：《澳大利亚华文报刊大扫描》，载香港《地平线》月刊，1998 年 5 月号。

年底，澳大利亚共有各种中文报刊 42 种，平均每一万华人就拥有一种中文报刊，“连主流社会英文报业的老总们都惊讶中文报业为何如此迅速发展”。^①

澳大利亚最早出现的华文报刊是 1894 年 9 月由华侨书商孙俊臣在悉尼创办的《广益华报》（周报）。该报以刊登广告为主，也报道闽粤近事和在澳华人社会动态，发行范围不限于悉尼一地。出版至 1923 年停刊。1898 年 6 月，悉尼的华商集资创办了《东华新报》初期政治立场不鲜明，1902 年改名《东华报》后，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阵地。1902 年，墨尔本还出版过一份旨在号召华侨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斗争的《爱国报》。1905 年，墨尔本一批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华侨青年组成的新民启智会，创办了宣扬启智救国、主张变革维新的《警东新报》。1914 年，一批拥戴国民革命的文化人在悉尼创办了《民国报》，该报同当地共和派报纸一起，发动了一场对《东华报》的论战，成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华文报，直到 1925 年停刊。此后，虽断断续续出现过一些华文报刊，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澳大利亚从未出现过多种华文报刊并存的局面。

80 年代中期以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逐步制定和完善了鼓励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政策。此后大批携带资本或技术的东南亚华人，中国香港、台湾、大陆移民以及数万留学生接踵而至，从而使全澳华人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华文报业的勃兴打下了基础。

1982 年 3 月，华文媒体“老字号”《星岛日报》率先登陆，成为首家在澳印刷的中文日报。随后，印支澳籍华人创办《华声报》，后发展到半周报易手，1992 年改为《华声日报》，1997 年

^① 经纬：《兴旺发达的澳洲中文报业》载《华人世界》1998 年第 5 期。

又改为《澳洲日报》。具有香港《新报》背景的《澳洲新报》，于 1987 年 3 月在悉尼创刊。1994 年 5 月，采用先进的全页组版电脑设备的《自立快报》以澳洲第一份彩印中文日报的身份，加入了出版者的行列。

上述 4 份主要的中文日报均在悉尼出版，版面形式和内容各具特色。

《星岛日报》(澳洲版)创办初期全由香港《星岛日报》排版，制好版样，航寄悉尼印刷出版。1983 年底，开始通过人造卫星传送版面到悉尼，而澳洲新闻版、当地广告和周末副刊，则在悉尼采写编排，与电传版一起在悉尼印刷、发行。1985 年 5 月，澳大利亚文化商舍里士 (Cerlus) 收购了该报部分股权。此后原报头标示的“香港政府特许刊登法律性质广告之有效报刊”改为“首家在澳洲印刷出版之日报”。报纸篇幅增加为每日出对开纸 4 张 16 版 (竖排)，其中广告约占 5 版。1985 年以前，该报以刊登台湾新闻为主，从 1986 年起，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增多，逐步改为以中国大陆新闻为主，澳大利亚新闻仅占 1 版。其发行范围由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等大城市扩展到北部城市各华埠及南太平洋地区，读者也由香港移民扩展到台湾、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分销处增加 50 个以上，销量始终居于澳大利亚各华文日报前列。90 年代中后期社长兼总编辑潘振良。

《澳洲新报》也有香港背景，原为香港《新报》澳洲版，1987 年 3 月 19 日创办。董事长兼社长由香港新报社委派的罗斌担任，总编辑为容启辉，总经理刘美玲。每天通过电传版面到悉尼印刷。改称《澳洲新报》后，在悉尼独立出版，由香港《新报》委派刘美玲任社长，由代总编辑黄成威 (Tony S. W. Wong) 主持编务。该报初期每日出对开纸 3 张 12 版，文字直排；1990 年改横排，逐渐增加到 4 张 16 版以上，周六、日合刊出 7

-8 张。主要刊登有关澳大利亚、香港及世界各国要闻，设有澳洲新闻、澳洲财经、澳洲地产等版。该报在澳采编的版面有世界要闻、中国新闻、澳洲新闻、澳华风情、四海华胄等。其余各版仍由香港《新报》电传供版。“中国新闻”版除采用西方电讯稿件外，也采用少量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和香港中国通讯社的稿件。“台湾新闻”版则主要采用中央社电讯和选用台湾报纸的稿件。由于读者中香港移民较多，仍以较大篇幅刊登香港新闻、香港地产、股市信息，体育娱乐新闻也以香港为主，其文艺副刊《天岫云心》、《怀袖馨香》、《旧日风情》、《荡涤情志》及小说连载等栏目，也由香港《新报》提供。该报在墨尔本、堪培拉等大中城市华埠设有数十个分销处，并远销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地区，经费来源于广告（该报分类广告名列前茅）及订报费收入。发行量约 1.7 万份，居澳大利亚华文日报前列。

《澳洲日报》1997 年由《华声日报》改现名。现负责人为台湾移民。该报电子版使用华、英文，早于 1997 年 1 月 1 日以《澳洲日报》的名称上网。其华文部分包括澳大利亚的工商、财经、文化艺术、教育、旅游等方面的新闻和消闲娱乐、生活百科、电脑知识等栏目。研究者认为，该报的“品质显得较为芜杂，有点飘忽不定，但多变善变，富于活力，……有时也见其文锋的犀利。但其照片经常取自电视或电脑，清晰度有所欠缺”。^①该报 1998 年 3 月将报价由每份 7 角提升为 8 角，同其他三份日报持平，周末则同为 1 澳元。该报在庆祝创刊 11 周年时称，澳洲中文报业集团已拥有《澳洲日报》、《华声地产》、《华人社区报》、《澳周刊》、《百家信息》和《澳洲日报》电子网络版五报一刊，形成多角化经营。

^① [澳]戈登：《澳大利亚华文报刊大扫描》，载香港《地平线》月刊，1998 年 5 月号。

《自立快报》1994年5月20日由台湾三大报系之一的自立报系股东王茂雄及旅澳台商吴丰山等以换股方式共同集资300万元创办。王茂雄出任董事长，吴丰山为发行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为《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后由胡元辉接任。该报财力雄厚，设备现代化，是澳大利亚第一份采用中文电脑全页组版系统排版印刷的全彩华文日报（该报的彩版化和全电脑制作，又促使其他报社更新设备）。其宗旨为：“立足澳洲，面向华人社区，做多元文化的桥梁，为澳洲华人服务”。该报面向来自港、台及大陆地区的新移民，设有焦点新闻、全球瞭望、澳洲动态、大陆话题、香港话题、台湾话题、澳洲财经、亚洲财经、香港股市、华人广场、澳洲生活、运动天地、影视娱乐、大地副刊、漫画等专栏、专版。

上述4份日报还出版随报附送的周刊。其中《星岛日报》为《大都会周刊》，《澳洲新报》为《澳洲新报周刊》，《澳洲日报》为《澳洲刊》，《自立快报》为《自立周刊》。

除日报之外，澳大利亚还出版了十几份周报，它们是：《东华时报》、《澳华时报周报》、《唐人商报》、《澳洲商报》、《银河娱乐》（此五家为收费周报）、《信报》、《华声地产》、《社区周报》、《今日新女性 车天车地周报》、《华文镜报》、《雪梨导报》（均在悉尼）、《新海潮报》、《大洋时报》、《澳华导报》、《华夏周报》、《大华时代》（均在墨尔本）、《多元文化报》、《华人商报》（在布里斯班）、《南澳时报》等。

杂志有：《汉声》、《动态》、《综合周刊》、《好杂志》、《原乡》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澳洲出现了来自中国大陸半工半读的留学生创办报刊之风。在众多靠打工起家的留学生自筹资金创办的周报中，以1992年8月在悉尼创刊的《华联时报》（第一份留学生周报）和时隔一年在同一城市出版的《东

方邮报》最为出色。他们在没有任何设备，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借用别人的办公室业余办报，极为艰辛。这两份周报，以其明快的风格，丰富的信息，为华人社区生活增添了色彩。1994年10月，墨尔本又出版了一份《华侨时报》。主要报道澳大利亚及中国要闻、港台动态、澳华社区新闻，设有华侨华人论坛、今日中国、神州大地、华人社会动态等栏目，颇受读者欢迎。目前这三份报纸已不复存在。《东方邮报》更名《东华时报》，老板也换了人；《华联时报》也被《澳华时报》取代，主要股东为两位留学生。《东华时报》较多关注与新移民有关的澳洲移民动态、华人参政议政等华社新闻，同时对于澳洲的社会热点也较为关注，此外还大量刊登留学生文学作品，如小说、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很受读者欢迎。《澳华时报》办报取向与《东华时报》相去不远，只不过更热衷报道中国大陆的有关消息；它还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联手，附有一版北京新闻；此外，它还有数版英文新闻，是华文媒体中惟一采用双语形式的。《唐人商报》和《澳洲商报》则以商业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1998年3月创刊的《银河娱乐周报》（创办于悉尼）在其发刊词中称：“目前澳大利亚中文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虽然十分蓬勃，但各报刊的报道内容以综合性的为多，专业性的报纸很少。这给我们创办专业性的报纸尤其是赛马、娱乐和体育专业的报纸以充裕的空间和机会。随着澳大利亚华人人口的增加，专业性的中文报纸有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和广阔市场”。该报因此以报道当地娱乐新闻和赛马信息为主要内容，并报道中国体育消息、体育明星特写、体育重大比赛以及中华武术等。

期刊方面较成功的有1991年元旦创刊的《满江红》月刊和1991年10月悉尼大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创办的《大世界》月刊。前者以“关注人生世态，反映民族风貌，博采中外珍闻，荟萃学海精华”为主要内容；后者把报道重点对准新移民，针对他们关

注的重大问题进行采写编评，吸引了广大的华人读者。这两份杂志坚持数年后，因力所不支而停刊。

据研究者分析，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华文报业空前繁荣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大陆、港、台及东南亚华人移民人数迅速增加，为华文报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的读者市场；二是大陆留学生中的一批文学青年选择了从文办报刊这条路，成为以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为澳大利亚华文报业增添了新的活力。^①但是，全澳华人总数不过50万，就有40多种华文报刊同时存在。由此引发的激烈的竞争，是华文报刊从业人员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的现实。

除澳大利亚之外，新西兰也曾出版过华文报刊，如《民声报》（1921年由中国国民党惠灵顿分部创办，二战前停刊）、《侨农》（月刊，1953年由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创办）和《新西兰华侨》（月刊）均于60年代停刊。

90年代新西兰出版的报纸有《自立快报》和《先驱报》等。《自立快报》约1998年创办于奥克兰。日出对开纸4张16版，版面内容有焦点新闻、地产专刊、台湾话题、中国话题、财经新闻、广告专页等，此外还有“大地副刊”“家居广场”“娱乐快讯”“读书广场”“艺术天地”等副刊。该报是台湾自立报系统的报纸，思想上倾向民进党。《先驱报》是由英文《新西兰先驱报》1995年创办的华文附刊（周刊）发展而来的。1998年创刊于奥克兰市。每期出对开纸3大张12版，版面内容有要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国际评论、先驱博览等，此外还有财经、地产、科技电脑、文艺等专版。该报有关中国大陆的报道，负面新闻较多，未见刊用中新社、香港中国通讯社和新华社的稿件。报

^①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道多不注明消息来源。

澳大利亚的中文广播电视业是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China Radio Network）是澳大利亚第一座 24 小时全天播音的私营华语广播电台，台址在悉尼。1994 年 5 月开始试播，9 月起正式广播。该电台以悉尼为中心，覆盖半径为 70 公里，使用普通话及广州话播出。节目除新闻外，还有咨询、教育、移民、法律、经济、文艺、体育等方面的内容。据悉该台投资 50 余万，资金主要来自香港，其余以股份形式在澳洲筹得。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的华人可以通过澳官方 SBS 电台和多元文化电台收听到中文节目。前者每周播出 5 天，共 12 小时，后者每周仅播出 4 小时。

“悉尼早晨”是澳大利亚悉尼 2RDJ 社区广播电台华语节目（该台为澳大利亚办有多种语言节目的广播电台，1979 年 12 月 1 日成立，1983 年开始全面播音）1994 年 6 月 6 日开办，使用广州话播出，主持人为周志强、李嘉华，每星期日上午播出 1 小时。内容有一周新闻、英语环节、文化趣谈、流行金曲、香港传真、专题访问等。

1995 年，2AC 澳洲华人电台开始播音。该台是以澳大利亚华人听众为主要对象的民族电台，“以维系本民族的感情、促进华人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故土风物的了解，加强澳华各界与澳主流社会的联系为宗旨”。该台采用普通话和粤语两种语言播出，从最初只有悉尼一地能够接收，逐步扩展到墨尔本、布里斯班和阿德雷得等地区。1997 年底，在墨尔本设立了分台，听众达到 10 万人以上。1998 年，2AC 澳洲华人电台举行成立三周年庆祝活动，澳联邦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卢铎出席，并赞扬华人电台在促进澳大利亚文化多元化、丰富华人文化生活和推动澳中友好等方面作出的努力。

悉尼中文电视台是澳大利亚第一座华语无线电视台，又名黑

眼睛华人电视，台址在悉尼。该台是 1993 年 3 月成立的悉尼社区电视台（Community Television Sydnnet，简称 CTS）的骨干分支机构之一。1994 年经过一年试播后，于 1995 年 2 月正式开播。其主旨是尽力为日益壮大的华人社区提供各方面的信息服务，将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互通有无，增进了解。该台注重节目的本地化，尽可能贴近澳大利亚华人的生活现实，播出的节目 90% 在本地制作，同时多方面寻求与中国电视台的合作。主要节目有社区新闻、时事评述、华人政论、经济信息、移民服务、华夏文艺、汽车世界、社区教育以及电视剧、电影等，在悉尼拥有华裔观众达 10 万人。总经理朱翊，节目总监傅晓民。

新世界电视（New World TV）是澳大利亚华语有线电视台，为多种语言的“澳大利亚传媒”（Australia Media Ltd.）所属机构。台址在悉尼。1994 年 3 月 13 日开播，悉尼、墨尔本等地的华裔居民均可收看到。该台使用普通话、广州话播出，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节目、电视剧、电影等。该台为收费电视，独家播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 TVB）提供的华语节目（包括电视剧）。主要节目有“放眼澳洲”、“大城小叙”、“筷子”等，在“新世界电影精选”节目中播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配有普通话及广州话的电影。从 1995 年起，该台与香港传讯电视有限公司（CTN）达成合作协议，独家拥有 CTN 在澳大利亚的播映权，包括每天 24 小时接收的卫星电视新闻节目。总经理曾其果。

在新西兰，有新西兰电台的华人之声、新西兰华人之声、基督城华人之声等华语电台，而奥克兰华人电台于 1994 年启播，成为当地各华语电台中惟一的商业电台。该台兼用华语普通话和广州话于每周一至五 21:00 至 0:00 播出，开办有新西兰和国际新闻、时事追击、时人时事、财经专论、海外乡情、遨游世界、空中教室学英文、空中教室学电脑和顶嘴（Takback）等节

目。星期五晚上设有超级星期五节目，听众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与节目主持人进行交流。

第四节 亚洲国家的华文传媒

据统计，海外华侨及华人的分布以亚洲地区为最多，共计 2678.8 万余人，占海外华人人口总数的 77.63%。而亚洲地区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为印尼，计有 697 万人；其次依序为泰国（664 万人）、马来西亚（559.8 万人）、新加坡（247.3 万人）及菲律宾（103 万人），其余分布在俄罗斯联邦、缅甸、越南、柬埔寨、日本、印度等国。^①

90 年代，亚洲仍然是华文报业最重要的中心，有各类报刊 199 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报刊半数集中在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华文日报虽然只有 18 种，比 80 年代的 20 余种有所下降，但其数目仍踞海外各国第一位。此外新加坡有 3 种日报，泰国有 6 种，菲律宾有 5 种。连同柬埔寨、越南、印度、印尼、日本，亚洲共有日报 38 种，占海外各国华文日报总数（78 种）的 48.48%。^②新、马的期刊业也很发达，马来西亚有各类杂志数十种。此外，90 年代，东南亚还成为全球三个华语电视中心之一（另外两个是北美和西欧）。

^① 引自台《宏观报》2000 年 5 月 20 日《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共计三千四百五十余万分布世界五大洲以亚洲最多美洲次之》一文，载于《华侨华人资料》，2000 年第 4 期。

^② 参见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 32 页，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一、东南亚国家

1、新加坡

新加坡出版三份日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此外还有一份《星期5周报》。因各报情况已在第六章谈及，故在此主要介绍90年代末期《联合早报》电子版及其改版情况。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日报。目前发行网除新加坡外，还远销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和港、台地区。1992年在北京设办事处，1993年获准在北京多家酒店销售。1995年8月，该报开办电子版，上网的当月，浏览者访问的次数即达25万人次。两年后，每月平均浏览人数已达350万人次。1997年5月15日，《联合早报》电子版进行了改版，改版后的新版具有图文并茂、简洁明快、信息量大的特点，深受浏览者欢迎。改版当月读者即达417万人次，4个月后突破1000万人次，1998年3月达到2456万人次。目前，该报电子版设立的主要栏目有：新加坡新闻、亚洲新闻、中港台新闻、国际新闻、财经新闻、体育新闻、社论、言论、天下事、副刊、漫画天地等。并根据新闻的重要性，开辟了一些特别专栏，如‘97香港特辑、金融股市风云专辑等。《联合早报》电子版的读者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区。根据该报1998年公布的数据，美国读者占50.34%，中国读者占11.18%，新加坡读者占8.98%，加拿大读者占5.58%，日本读者占3.6%，马来西亚读者占2.64%，英国读者占2.42%，印度尼西亚读者占2.18%，法国读者占2.04%，澳洲读者占1.52%。可见，随着《联合早报》电子版的推陈出新，它已成为世界上主要华文电子报纸之一，《联合早报》也从一份发行量只有20多万的地区性华文报，跨越地理和政治上的界限，一跃而成为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纸。

1998年5月19日，《联合早报》进行了改版。目的是在保留

现有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报纸的内容，提高质量。通过这次改版，报纸展现出了新的面貌：版面设计更加新颖、活泼，信息更加丰富，言论空间也进一步扩大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改版后，报纸建立了新的言论风格，设评论组，每天一篇评论；设“天下事”专栏，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日、美、法、德、加、印度等国特约 20 多名专栏作家为之撰稿。《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在革新版推出时发表的献辞中说：我们跨出的只是第一步。早报的革新不会是一次短暂行动，而将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我们希望读者参与这个过程，你们的鞭策将促使我们进步，你们的宝贵意见将激发我们的创意，你们的真诚回馈将成为我们茁壮成长的养料。

《联合早报》是目前在联合国上网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另两份是《人民日报》和香港《大公报》）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面对西方媒体的强大攻势，《联合早报》又在积极准备向电视领域进军。以下是该报主编林任君在接受《国际新闻界》杂志采访时谈到的与此有关的问题。

目前从各国媒体发展的情况看，朝向多媒体业务和媒体功能整合似乎是一个发展方向，平面媒体开始向广播领域扩展，并且趋向电视化。我们注意到，目前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大媒体的合并，包括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的合并，近一二年来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合并的结果，产生出了非常庞大的跨国的传媒组织。我认为，各国媒体的同人和公司，都应当注意到这个趋势，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建立好本身多媒体作业的能力，否则市场一旦开放，全球化一旦推开，跨国的多媒体的组织机构、公司、企业打进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必须能够应付，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要看到，我们本身所处的社会使我们有发展的空间和优势，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个优势。否则我们被他们消灭了，全世界就剩下西方的几家了，那将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做准

备。具体来说，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正在开办一家电视台，报业控股属下的报章负责制作电视节目，供应给这家电视台。

《联合早报》也承接了这个业务，我本人受委托主管这个工作。《联合早报》现有 400 多名从业人员，就是这个电视台华语节目的基础资源，当然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还要吸收一些新的人才。在报业控股经营电视的同时，政府还让另一家以电视业为主的公司出版报章（他们准备出版一份英文报纸），形成两个集团之间的竞争。通过整合、竞争，准备应付外来的挑战。

2 马来西亚

根据马来西亚内政部 1998 年的统计，目前在全马的各语文日报中，有 8 家马来文报，8 家英文报，18 家华文报（其中西马 5 家，巴沙 6 家，沙捞越 7 家）。这 18 家华文报的每日销量都远远超过马来文和英文报；在星期天，全马华文报的总销量接近 100 万份，马来文报只有 85 万份，英文报 72 万份，印度淡米尔文日报 19 万份。

在马来西亚报纸中，《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是主要的中文报。

《南洋商报》日出对开纸 15 张 60 版左右，为全马销量最大的华文报之一，现任总编辑李树藩。1996 年 1 月 11 日，该报正式进入国际互联网。截至当年 6 月，网上用户已接近 200 万人次，平均每月超过 35 万人次。这是继 1995 年 5 月新加坡《联合早报》进入互联网、1995 年 10 月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进入互联网之后东南亚第 3 家上网的华文大报，标志着海外华文资讯开始做到全球共享。1996 年 1 月 30 日，该报又出版《南洋资讯网周刊》始出 8 页，15 期后增至 12 页，随《南洋商报》附送。内容以指导读者使用电脑软、硬件为主，传达资讯界动态为辅。

《星洲日报》是马来西亚第一份进入国际互联网的华文报纸，时间是 1995 年 10 月 18 日。该报总编辑为刘鉴铨。

《光华日报》（总部在檳城）日出对开纸 14 - 18 张 56 - 72 版，日销超过 10 万份，占全马第三位。发行网遍及全马。1997 年 2 月推出《休闲星期刊》。1998 年荣获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注册公司及业务蓬勃荣誉奖”。现任总编辑司徒添。

目前，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主要隶属于丰隆集团和朝日报业两大集团。丰隆集团属下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由南洋报社集团改名）拥有三家报纸，分别是《南洋商报》、《中国报》和《新生活报》（三日刊）同时出版有《健康》、《妇女》、《青年》、《淑女》、《风采》、《休闲》等 12 种刊物，并拥有出版英文报的准证。

朝日报业集团（木材业巨子张晓卿创建）属下有《星洲日报》和《光华日报》，同时代为发行月刊。

除这两个集团之外，拥有华文报刊的还有如下集团：

新明出版有限公司（拥有《新明日报》）；

诗华报业集团（拥有《诗华日报》、《新华晚报》）；

马来亚婆联报业集团（拥有沙捞越《美里日报》、古晋《中华日报》）；

马来亚通报有限公司（拥有《马来亚通报》）；

黄文斌报业机构（拥有《国际时报》、《沙捞越晚报》、美里《国际时报》）。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主要着眼于华人社会。因此，在报道重大事件同时，报纸较多刊载有关华人社会的各种消息，如马华工会动态、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华人经济等。对此《星洲日报》负责人张晓卿作了最好的诠释：报纸“不仅希望自己成长和壮大，也希望从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分享中，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共同促进各种资讯的有效流通、交流和掌握，使我们这个族群在时代的进步中，随时拥有与人争胜、抗衡的本钱，和放眼世界的智慧和远见”。

此外，由于马来西亚人同中国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日趋密切的往来，该地报纸在有关国际新闻的选择方面，比较侧重于中国新闻。有关中国的新闻主要放在头版、要闻版、国际版、亚太版、综合版、言论版等版面，位置比较突出。此外，该报《南洋副刊》头版、人文版、亚太风云版等，也经常刊登有关中国的长篇专稿。

但是，由于新闻纸涨价等原因，马来西亚报业的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中文报，近几年来已有数家中文小报关闭（如 1995 年底和 1996 年初关闭的是《新通报》和《新明日报》）。作为过去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日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争取读者，《星洲日报》采取了免费送报、广告削价等手法，两报均进行了技术革新，除写作电脑化外，排版也进口了欧洲设备。同时还提早了出报时间，次日的报纸均在当日下午送到市场，作为当日的夜报出售。如遇特大新闻则在晚间调版。

尽管竞争激烈，但此间研究者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发展仍有较大的空间。首先，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为了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当地华社积极争取华文教育的地位，大部分华裔都将其子女送入华小。据统计，仅 1996 年一年在校的华裔小学生就达 60 万名之多。这些受着不同层次华语教育的学生，都是未来华文报刊潜在的读者。其次，马来西亚几家华文大报均有财团作后盾，经营也有一定的规模，发展前景看好。

马来西亚的电子传媒发展较快，除国家的两个电视频道和一个商业频道外，1995 年又创办了两家商业电视台，一个是娱乐节目，另一个是有线频道，主要提供外国的卫星节目和动画片。1996 年马来西亚发射了两枚广播通讯卫星，至此，马来西亚已有十几个卫星频道。马来西亚的华语电视也较为突出，共有 3 个

电视频道，在平日下午 6 时至 7 时专门播放华语节目，主要是香港提供的广州话节目。其中电视剧占有较大的比重。马来西亚“丽的呼声”电台新近提出“放眼国际，关心社会”的口号，业务范围不断拓展。该台经常派人出访港、台、大陆以及美、加华语电台，与之联合制作节目。

3 泰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泰国报业始终处于竞争状态中。90 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华文报纸或经改组后合并，或因遇到经济困难而停刊。到 1996 年仍在继续出版的报纸有 6 家，即《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新中原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和《亚洲日报》。

《星暹日报》日出对开纸 8 张 32 版。星系报业（泰国）有限公司董事李益森兼社长，总编辑马耀辉。《世界日报》现日出对开纸 10 张 40 版左右。现任社长赵玉明，总编辑黄根和。《中华日报》为泰国惟一上市的华文报纸（1993 年上市），现日出对开纸 8-10 张，为泰国销量最多的华文报纸。另创办泰文《泰星日报》。现任董事长陈纯，社长陈正，总编辑张锦海。《新中原报》日出对开纸 7 张 28 版。现任董事长柳进雄，常务董事长柯楚君，董事总经理兼执行总编辑林宏，总编辑兼督印人何韵。《京华中原联合日报》每日日出对开纸 9 张 36 版。现任董事长陈振治，社长吴金城，执行总编辑萧泽铭。《亚洲日报》日出对开纸 9 张 36 版。现任董事长郭振，社长陈川，执行总编辑林兴。

这 6 家报纸各具特色，并具有以下共同点：1、报业股份产权主要为泰籍华人所有，有的已拥有上市公司；而《世界日报》则由台湾联合报系注资。2、各报均进行了重大改组，邀社会名流、工商金融界人士参与董事会，以增强经济实力。3、言论较为客观，重视报道中国新闻、侨乡动态及海峡两岸消息。4、在宣扬中华文化、推动华人社会团结进步、增进泰中人民友好往来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泰国华文报业后继无人和市场的限制下，目前只能在萎靡不振的情况中继续挣扎求存”，这是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主席方石 1994 年与哥打巴鲁记者交流时所透露的华文报业面临的困境和隐忧。他说，基于上述原因，泰国的华文报业一直无法真正攀上国家的媒介主流，而只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使命。事实的确如此。泰国的华文教育经过半个世纪的萎缩后，目前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 50 岁。新近投入的年轻从业人员不是华文程度不高，就是通晓泰文的能力不足，或是采编能力较差。虽然泰国各大学目前开始教授华文，却没有设置华文新闻采编的课程，使得寻找“接班人”变成了一件难事，以至报馆内 70 岁以上的老报人夜以继日地提供华人精神食粮的情景，已是平常现象。近年来，随着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新加坡等地华人来此投资热的不断升温，这种情形据说有望得到改变。因为“外商”来泰投资后，新读者和广告市场开始增加和扩大，促进了华文报纸的“复活”。此外，由于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泰国北部华人区也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了，而这些人正是华文报纸的新兴的市场。

在泰国，华语电子传媒也有着广阔的市场。电视台常常将中国大陆或港台的电视节目转译成当地语言播放，吸引着一大批华侨、华人观看。

4、菲律宾

菲律宾现有 5 种华文报纸，它们是《联合日报》、《世界日报》、《商报》、《菲华日报》和《环球日报》。

《联合日报》目前日出对开纸 10 张左右。现任董事长高祖儒，总编辑施颖洲。《世界日报》日出对开纸 4 张 16 版。现任董事长施天津，总编辑吴永源。《商报》日出对开纸 5-6 张 20-24 版。现任董事长蔡黎明，社长兼总编辑于长庚。《菲华日报》现

任董事长李昭进，总经理施性等，总编辑庄文成。《环球日报》日出对开纸 3-5 张。现任董事长姚望深，社长兼总编辑陈瑞时。

在这 5 份报纸中，《菲华日报》是最新创办的报纸（其余的 4 份前已介绍）。

《菲华日报》1999 年 3 月 1 日创办于马尼拉市，其前身为《菲华时报》。由于股东变动，董事会改组，该报易名出版，成为一家新的报纸。董事长、总编辑仍由原任李昭进、庄文成分别担任，原社长兼总编辑施性等专任总经理，新社长为叶健勋。报纸《发刊词》中说：“学习、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我们第二代与中国的联系和经济合作，成为我们的职责”；“立足华人社会、以华人利益为利益，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地代表华人发言，言人之不敢言，也是我们的职责”。“这是菲华日报出版的目的，也是我们对华人社会的誓言”。报纸版面情况与《菲华时报》类似，日出对开纸 5 大张到 7 大张，20-28 个版。一版是要闻，二版是本地新闻，三版为评论，四版、五版为国际新闻，六版为体育，七版、八版为本地华人社区新闻，其他各版基本上是副刊和广告。国际版和体育版大量采用新华社消息，亦有少量中新社、香港中国通讯社及台湾中央社的消息。海峡两岸及香港的新闻主要放在这三个版中。

“福华有线中文电视服务”是菲律宾第一家华语电视节目。该节目由菲律宾中文电视公司（Philippine Chinese Television Inc.）主办。1987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播，每天用闽南话、广州话和汉语普通话播出 7.5 小时。内容丰富，除电视剧外，还有新闻报道、文化教育、儿童天地、妇女新姿、歌舞菁华、资讯见闻等。台址在马尼拉。

5 东南亚其他国家

六七十年代，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印尼、印度支那三国和缅甸的华文报刊由盛转衰（有的国家华文报纸绝迹，有的国家只

剩一份在惨淡经营）

90 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华文报刊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

缅甸

1966 年 1 月 1 日，缅甸军政府一纸命令，将外侨报纸全部关闭，华文报刊从此绝迹。在华文报纸中断 33 年后，1998 年 11 月 4 日，一份新的报纸——《缅甸华报》在仰光出版。该报在《发刊词》中说：“《缅甸华报》的诞生，不仅说明我国领导人对世界五大文字之一的华文的重视，而且认同了在缅甸发展华文的必要”。在谈到报纸宗旨时表示：要“以沟通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 and 世界各国华人社会，来促进我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信息往来”为主要任务。创刊初期为 4 开周报，第一期共出 4 张 16 版，栏目有“缅甸新闻”、“国际新闻”、“经济讯息”、“名胜古迹”、“大众园地”、“周末茶座”等。大部分篇幅为缅甸本地新闻，各国华人社会的新闻放在国际新闻中，对两岸动态也比较关注。“周末茶座”是副刊，用以刊登卫生常识、幽默小品、小知识等。印数 5000 份左右，向全缅发行。该报总编辑甄玲珠，发行人吴得顶，顾问江忠、陈万昌、尹纪泽、丘伟文、梁联发。

印尼

1966 年，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颁布第 31、32 号令，禁止和限制华文教育及华文报刊的出版。自那以后，印尼的华文报刊陷入极度萧条中。随着印尼新政府（瓦希德政府）实施开放政策，被禁止、限制出版 30 多年的华文报业得以复苏（尽管限制性的规定尚未取消）

2000 年初，多份华文及印、华双语报刊在亚加达及泗水等大城市问世。首先是印尼文财经报纸《印尼商报》中文版于年初试版及发行（在雅加达），报名定为《印度尼西亚商报》。该报 4 月 17 日正式出版，每日出纸 1 大张，共 4 版，最初印刷 1 万份。《印尼商报》社长为原住民巨商苏甘达尼，他也是印中经济与文

化友好协会主席，10年前就投入了要求解禁华文运动。

在泗水，由印尼文太阳报集团出版的华文《太阳龙报》，于2000年春节前后出版了4天后，于2月24日正式出版，每天出纸1大张。

在此之前，有印、华双语《华文邮报》的出版（1999年年底），发行30多年的双语《印度尼西亚日报》也于1996年改为全部使用华文；在此之后，又有新的华文报出版——《和平日报》和《印尼新生报》。已经出版或正在筹备出版的华文报刊正在招兵买马。已退休的前华文报人李焕清指出，当局长期禁止华文教育后，造成印尼面临严重的中文人才断层问题，现已问世的华文报华文水平有待提高，有的文句完全不通或错别字一大堆，简直是“不堪入目”。

但无论如何，政府对华文报刊的限禁已经松动，印尼华文报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印支三国

越南、老挝、柬埔寨在80年代已没有一份华文报刊。进入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先后创办了《金边时报》、《华商日报》、《高棉独立日报》、《柬华日报》和《越南经济新闻》等华文报刊。

《金边时报》是柬埔寨综合性华文周报，1993年底由马来西亚华人在金边创办。该报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设有要闻、国内新闻、地方新闻、世界点滴、言商、专题、名人特写、民间、恋情、小城故事、学生园地、小说、医药等栏目。

《华商日报》是柬埔寨华文日报，1993年12月17日创办于金边。这是自1975年以来柬埔寨出版的第一张华文日报。社长为前柬埔寨王国政府公共卫生劳动福利部长方炳桢夫人（Mrs. Oung Peng Cheng），董事长为方侨生，总编辑为杨奇文。该报宗旨是：“以宣扬柬华文化为己任，以促进工商经济为使命，以服务广大读者为职责”。方炳桢夫人在创刊词中也表示，要让当地

华侨和华人熟悉华文，使用华文，促进柬中友谊。该报初为双日报，后改为日报（星期日无报），日出对开纸 2 张 8 版。版面内容包括要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小说传记、中华文化、华校园地以及各种副刊，丰富多彩。该报注意报道柬埔寨侨社消息、侨团动态，重视宣扬中华文化，支持华文教育，经常刊登学生习作和征文作品，并举行中柬文翻译竞赛活动，颇受广大华人的欢迎。该报 90 年代末期发行量约 3000 份，是柬影响最大、销路颇广的华文报纸。

《高棉独立日报》是柬埔寨华文双日刊，1993 年底由当地华人创办于金边。该报是 1975 年以来经柬政府批准出版的首批华文报纸之一。只出版几期便告停刊。

《柬华日报》是柬埔寨华文报纸，1996 年 6 月 30 日创刊于金边。社长刘建团。该报以柬文报纸《民族灵魂报》华文版的名义出版。初创时每周三、日出两期，为对开 4 版。宗旨是向柬埔寨华人及前往柬埔寨投资、经商、旅游的中国大陆、台港粤籍人士及各国华人提供有关柬埔寨各方面的信息。内容涉及柬埔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经贸消息所占篇幅较大。

《越南经济新闻》是越南官办的越文《越南经济新闻》的华文版。1993 年 4 月 10 日由河内越南贸易通讯中心在胡志明市创办。16 开本 32 页，繁体字，彩印封面，图文并茂。主要内容有政府经济工作报告及经济计划，各地经济、外贸、投资消息，市场一周，旅游景点介绍等。重要文章附有越南文原文。华文有些词句不尽符合中文文法，不易看懂。该刊主任黎进（Le Tien），社长兼总编为武文贵（Vo Van Quoi）。

6 日本

据统计，截至 90 年代中期，日本华侨华人总数已逾 30 万。随着中国大陆留日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留学生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仅 1985 - 1996 年出版的、被称为“在日中国人”所办的

报刊就有 77 种，其中直到 90 年代中后期仍在发行的有 20 多种。

这一时期，创办于七八十年代或更早创办的华文报刊继续出版的仅有《华侨报》、《横滨华侨通讯》、《关西华侨报》等几份，而大量新的报刊则主要为留学生及就业者所办。如《留学生新闻》、《外国学生新闻》、《中国留学生》、《新交流时报》、《中日新闻》、《中文导报》、《半月文摘》、《华人时报》、《东方时报》、《日本侨报》、《中日产业开发》等。其中一部分为华文报刊，一部分为日文报刊，还有一部分为华、日文合刊。它们均以新移民或留日学人为服务对象。

在 90 年代的报刊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报》。该报是 1984 年以来日本出版的第一份华文日报。1995 年 5 月 25 日创刊于东京，由日中通信社株式会社发行。原为月报，每期出 4 开纸 10 张 40 版，逢 25 日出版。除日本外，还远销香港、台湾、新加坡，总发行量 4 万份。该报主要读者为在日中国人及与中国有着各种贸易关系和经济往来的日本会社。主要栏目有日本新闻、时事评论、人物专访、全球热点、中国焦点、港台风云、欧美记事、北京及上海经济情报、中国不动产情报、女性世界、留学生园地、健康与保险等。1996 年 11 月 11 日增出日报，日出对开纸 2 张 8 版，全部横排。12 月 2 日起每周出报 5 天，为当时日本惟一存在的华文日报。总编辑张一帆。

《时报》(日报)出版后作为月报的《时报》继续发行，每期仍出 4 开纸 10 张 40 版，以深度报道为主。

90 年代后期，又有几份刊物出版。

《日本新华侨报》1999 年 2 月 25 日在东京创刊，为报纸型华文双周刊。其宗旨是做新老华侨沟通的桥梁、祖国与新华侨的桥梁、日本与新华侨的桥梁、环球华侨联系的桥梁。每期出 24 版，套色印刷，主要内容有中国新闻、华人论坛、华人教育、专题报道、华语媒体集萃等。创办人、总编辑蒋丰。

《唐人报》1997年9月30日在东京创刊，为报纸型半月刊。发行者为东宝丽商事株式会社。每期出4开纸7张28版，辟有综合新闻、日本新闻、华人动态、唐人社区、焦点话题、华人见闻、社会纪实、专题报道、大陆传真、港台新闻、国际瞭望、经济金融、科技动态、文化天地等版面，亦设有“读者自由市场”专版，为求职、求人、征友征婚、社交娱乐提供信息。发行人野世优介。

《中国语世界》1998年3月26日在东京创刊，是在日中国人创办的首份中文学习专业报纸。由日中通信社株式会社创办。其宗旨是适应日益增多的学习中文者的需要，帮助他们在提高中文水平的同时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每期出16版，中、日文对照形式，并有单词注解和拼音解读。内容为中日两国和世界各地的时事政治和社会生活情况。设有中国新闻、中国人看日本、中国电影、中国流行歌曲、中国成语故事、中国见闻等栏目。总编辑张一帆。

以上可见，日本华文报刊的分布范围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主的关西地区转向以东京为主的关东地区。

从90年代中期起，日本学人创办的报刊开始进入国际互联网。1994年，《华声和语》日文周刊和仙台东北大学主办的《东北风》中文月刊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当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从1996年起，留学生或就职者主办的电子报刊大量涌现，（主要是一些原有或新创办的纸质媒体入网），包括《留学生新闻》、《日本侨报》、《华声月报》、《中文导报》等。

90年代的日本华文报刊无论就数量、种类、读者规模而言，比之七八十年代都有很大的发展，堪称辛亥革命后华文报业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报刊虽然不如早期留日学生报刊多，但有以下特点：1、一些周刊、双周刊报纸及日报相继问世，标志着日本华侨华人报刊开始由以杂志为主的阶段转向以报

纸为主的阶段。2、华文报刊在帮助旅日学人适应环境、促进华人地位提高及华侨社会的形成、保护在日中国人权益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3、编辑人员及经营者的知识层次大为提高。如在东京 5 家主要的新移民报刊中，中国从业人员 24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 12 人，占了一半。

日本的华文电视业也在发展之中。1998 年 7 月 1 日，由在日新华人主办的首家电视台——“新世纪中文电视台”正式开播。该电视台的频道取“娱乐、快乐”之意命名为“乐乐中国”，每天以大约 20 小时的时间播出汉语综合娱乐节目，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精选电视剧、纪录片、艺术和音乐片，并在每周日播出中国的地方新闻。按照中国驻日使馆新闻参赞李文亮的话说，新世纪中文电视台的开播，“不仅为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及时、全面了解中国和家乡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同时也为许多懂中文的日本朋友了解中国和学习中文提供了很好的渠道”。^①“新世纪中文电视台”是以旅日新华人罗怡文的“中文产业株式会社”为主，联合两家日本上市公司投资创办的。

7 韩国

《韩中日报》是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韩国惟一的一份华文报纸。它的前身是 1946 年 3 月朝鲜文《汉城日报》附设的《汉城华文版》日刊。1947 年，王公温接办《汉城华文版》，改名为《中华日报》。1950 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停刊。战争结束后，韩籍人朱协接办《中华日报》，将报名改为《中华时报》。1957 年《中华时报》为华侨孙日升等人收购，改名为《韩华日报》。1972 年，韩籍人崔凤烈接办该报，改名为《韩中日报》。

该报与台湾关系密切，除了在韩国文化公报部注册外，还在

^① 中新社东京 1998 年 7 月 6 日电，《日本新世纪中文电视台喜庆开播》

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注册（在台湾建立了支社），并把发行网扩展到日本、东南亚和美洲等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报恪守“亲台反共”立场，对新中国时有歪曲性的言论。1992年中韩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该报对大陆的报道虽然有所增加，但态度上没有根本性的转变。《韩中日报》平日出4开纸1张2版，每周日出对开纸1张4版。内容有要闻、专论特稿、港台大陆新闻、侨社消息、小说等，周日增出“文艺志”版及特稿、专稿等。稿件来源包括本社记者采访、转载韩国报纸稿件、台湾中央社和海外社供稿、转载台湾报纸的稿件等。90年代初发行人为李钟锡。1995年1月停刊。

除《韩中日报》外，韩国还出现过几种华文报刊：1960年，关石龙创办过《正声日报》，郑镇城创办过《法政新报周刊》；1963年，孙日升创办过《华侨新报》周刊。《正声日报》和《法政新报周刊》出版后不久即停刊。《华侨新报》为报纸型周刊，每周发行对开1大张，80年代末仍在出版。1992年11月，在韩国华人创建“中国天地”杂志社，出版《中国天地》月刊。由于发行量少、资金不足，于1995年2月停止出版，总共出版27期。

8 印度

历史上，印度曾出版过多份华文报刊。目前仍在出版的只有两份：《印度日报》和《印度商报》。

《印度日报》也称《印度华文日报》，1933年7月3日创办于加尔各答，由中国国民党元老李渭滨等发起，旅印华侨集资创办。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国民党驻印总支部的喉舌，二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初为周报，后为两日报，最后才改为日报。日出对开纸1张4版，广告约占总篇幅的一半。版面内容有国际新闻、印度各地新闻、各地通讯以及“华侨天地”、武侠小说连载、“海外文艺”、“医药顾问”等专栏。其主要新闻来源，除了当地英文报章外，就是台湾、香港当地广

播电台的新闻。该报印刷方式十分落后，采用的是几十年前的字粒和印刷机，速度很慢。90年代初期董事长为印度华侨协会主席叶干中，社长（发行人）兼总编辑陈荣达，经理张庆。

《印度商报》也称《印度华侨商报》，1969年3月10日创办于加尔各答华人村——塔坝，系该地区中国国民党元老李云珍等人集资创办。该报虽代表亲国民党的老辈华人的观点，却与台湾当局无政治上的直接联系。该报没有记者，只有若干名翻译员、编辑和抄写员。长期以蜡纸刻印内文，用红、黑油墨印刷出版，版面单调。日出对开纸1张4版到1张半6版，内容包括国际要闻、本地新闻、武侠小说连载、医学知识等，消息来源主要靠翻译、转载当地英文报以及采用港台等地的电台新闻。发行量初期约700份，至90年代初下降到400份左右。大多在加尔各答市唐人街发售，主要读者为塔坝和加市的中老年华人，少量销往孟买和新德里。

这两份报纸虽然维持不易，处境堪忧，却是当地华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正如一位读者所说：“这份报纸，成了我和我的华族背景之间仅存的惟一联系”。^①

9 蒙古

《蒙古消息报》是蒙古惟一的华文报纸，它的前身是《工人之路报》。《工人之路报》1929年9月1日在乌兰巴托市创刊，由蒙古工会主办。从业人员皆为华侨，长期由刘如一（1900—1982）、王荣（1909—1993）负责编辑。该报是石印周刊（1956年改为铅印），主要向当地华侨介绍蒙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蒙古国内外的的重要消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是该报的鼎盛时期。此时在蒙华侨约有1万多人，又有大批中国员工来蒙援助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成为了该报的读者。使得该报发行量

^① 吴新迪：《印度华文报》载1993年4月3日《联合早报》。

一度高达数万份。1962 年以后，由于中苏分歧，蒙方倾向于苏联，中蒙关系出现裂痕。1946 年 10 月，《工人之路报》交由蒙古通讯社接办，改名为《蒙古消息报》（主要负责人为蒙古人）。1962 年以后，中国援蒙员工陆续回国，在蒙华侨也逐渐减少，到 80 年代只有三四千人。《蒙古消息报》的发行量也大为下降。1991 年，报纸停刊。

进入 90 年代，中蒙关系逐渐好转，两国交往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1998 年 9 月 1 日，《蒙古消息报》在乌兰巴托复刊。复刊号上刊登的《致读者》一文指出：蒙中两国、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蒙古消息报》是我们友谊的结晶，愿它永远成为人民的使者。并表示它将向读者广泛介绍各种有益的消息包括商业信息。同一期报纸还发表了对中国驻蒙大使齐治家的访谈录。齐大使对《蒙古消息报》的复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谈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该报复刊提供了 1 万美元的资助。复刊后该报仍为周报，4 开 4 版，内容包括要闻、蒙古新闻、人物介绍、副刊以及火车、飞机时刻表等。

第五节 非洲国家的华文传媒

据统计，非洲地区华侨、华人的分布以南非最多（4 万人），其次依序为毛里求斯（3 万人）、马达加斯加（28000 人）、留尼汪（25000 人）和其他国家^①。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毛里求斯第一家华文报《华民时报》问世

^① 引自台《宏观报》2000 年 5 月 20 日《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共计三千四百五十余万分布世界五大洲以亚洲最多美洲次之》一文，载于《华侨华人资料》，2000 年第 4 期。

之日算起，非洲华文报业迄今已经有 70 多年的历史。自那以后，毛里求斯出版过 10 来份报纸，包括《中华日报》（1932 年）《华侨商报》（1926 年）《中国时报》（1946 年）《华侨时报》（1953 年）《新商报》（1956 年）《国民日报》（1958 年）《中央日报》（1960 年）《镜报》（1975 年）等。目前仍在出版的有《镜报》、《华侨时报》和《中华日报》。

《镜报》是华文周报，1975 年 4 月 10 日创办于路易港（在《新商报》的基础上创办）。社长朱维导，发行人兼总编辑吴志英。1979 年以来，该报一直以报道中国大陆新闻为主，主张“和平、团结、互助、合作”，以支持海峡两岸的统一，维护当地华人、华侨合法权益，促进当地华社的团结合作为宗旨。该报较多报道当地经济动态，每期辟有相应的专栏（如“新改货价表”），生活版也较有地方特色。稿件来源以当地作者撰写为主，报纸因此广受读者的支持，经济状况良好。该报每期出 4 开纸 1 张 4 版，内容包括要闻、两岸三地消息及专论、当地华人社区新闻、读者来信以及“生活”副刊等。该报的中国新闻大多来自中新社、新华社和香港中国通讯社。无论就版面编排还是就印刷水平而言，《镜报》都算得上是毛里求斯华文报刊中的佼佼者。该报除在当地销售外，还有部分销往留尼汪和马达加斯加。每期销量 1000 份以上。

《华侨时报》是华文日报，1953 年 12 月 10 日创办于路易港。该报由 1946 年创刊的《中国时报》和 1926 年出版的《华侨商报》合并而成，廖君凯出任社长（他随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非洲华侨代表）。该报长期坚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当地华侨、华人中有一定的威望。70 至 80 年代，尽管面临重重困境，资金不足、人才短缺、设备陈旧，但由于有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其销量仍能在当地华文报刊中居领先地位，最多时可达数千份。后因老华侨人数减少，90

年代初发行量 1000 余份。该报每日出对开纸 1 张 4 版，星期日休刊。内容包括要闻、各地新闻、毛里求斯新闻和各种副刊。广告约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一。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刊于要闻版和各地通讯版，以中国大陆新闻最多，且多数采用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的电讯稿。其余大部分内容则主要剪自香港报纸，也采用翻译当地法文报纸上的消息。除在当地销售外，还有少量销往留尼汪和马达加斯加。

《中华日报》1932 年 8 月 11 日创办于路易港。该报为国民党人所办，首任社长李伯宇（当时在国民政府派出机构任职），总编辑侯俊。50 年代以后，李氏移居台湾，报务实际上由侯俊主持，杜蔚文继任总编辑。此后经费及设备均由台湾当局提供，该报实际上成为毛里求斯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成为台湾当局在当地的主要宣传机构。1954 年冬进行改组，增加资金，转由中央印刷有限公司经营。80 年代中期再次更新设备，实现了印务程序的自动化。该报日出对开纸 1 张 4 版，广告约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版面内容包括当地新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闻以及各种副刊。新闻（除当地新闻外）多采用法新社、台北中央社、华侨社、海外社电讯、有时也采用中国通讯社的电讯。本地新闻除自行采访外，也从西方报纸中选取。90 年代销数约 1000 份，除行销本地外，也销往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南非、荷兰、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南非目前有三份华文报纸：《侨声报》、《华侨新闻报》和《南非华人报》。

《侨声报》1931 年 6 月 1 日创刊于首都约翰内斯堡，是南非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该报受台湾当局资助和控制，报名一直采用蒋介石的题字。它长期持反共立场，新闻稿多来自中央社电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岸交流的增加，也开始刊登一些有关大陆经济、体育方面的消息，并开始采用香港中间报刊

的剪报资料。该报原为 4 开 4 版，逢周一、三、五出版，后扩版为每期出 4 开 12 版。彩印，繁体字印刷，技术设备先进。版面内容包括综合要闻、南非传真、台湾要闻、台湾社会、大陆写真、香港一览、国际动态、经贸世界、侨声副刊、休闲娱乐、侨社新闻等。

《华侨新闻报》1994 年 8 月 9 日创办于约翰内斯堡，由《侨声报》前资深编辑冯荣生自筹资金创办。冯氏自任社长和发行人。该报属私人性质，创刊号宣称其“不依附于任何机关或团体”是一个“独立机构”。该报出版至第 100 期，一直为 8 开小报，1998 年改为 4 开大报。现为 12-14 版，彩印，周二刊，繁体字印刷。在南非的三家侨报中，该报排版质量高，内容较为丰富。版面内容有综合要闻、南非新闻、侨社新闻、强力促销、台湾纪事、中国新闻、香港要闻、国际要闻、经贸科技、体育、休闲娱乐等。该报还出版一份 8 开小报《经贸周刊》，受到读者欢迎。

《南非华人报》是南非第一份由来自中国大陆华侨主办的报纸，在中非建交一周年之际于 1999 年 2 月在约翰内斯堡创刊。创办者为南非—中国非洲工程协会、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南部非洲粤港澳工商总会、南非学生学者联合会等侨团组成的“南非华人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宗旨是传播中华文化，服务南非华侨。该报为周一刊，每期出 8 开 12-16 页，彩印，繁体字印刷。固定版面和栏目有：中国新闻、侨社新闻、台港澳新闻、南非新闻、国际新闻、彩虹副刊、祖国采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在非洲等。除在南非发行外，还发行到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国家，发行量屡屡上升，目前已超过《华侨新闻报》居南非侨报之首。“南非华人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走的是“以报养报”的路子，它在南非代发《人民日报》主管的《环球时报》；成立南非中国产品展览中心；成立南非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并将拥有自己的印刷公司。总之，一报为主，辐射各界。1999年7月8日，在南非赛络高技术通讯公司的帮助下，该报推出了电子版。该报同时还在 [http//www.sinotech.co.za](http://www.sinotech.co.za) 网址上开辟《南非商机》栏目，为报纸发行不到的地区提供快捷的网上信息服务。

马达加斯加最早出版的华文报纸是《侨民新报》。该报创办于1930年4月18日，每三日出对开纸1张4版，以报道时事、传播知识、宣扬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因当地只有一份华文报纸，因而行销马达加斯加全岛。后因主张制裁奸商偷运日货，被地方当局查封，负责人祝展华、何金泉被驱逐出境。

1949年2月15日，马岛还出版发行过一份油印半月刊《民锋》。该刊最初由塔马塔夫兴文学校头两届毕业生组织的“毕业同学会”发起和创办，主持人周应藩。从1948年年底起，归兴文学校主办，由教师负责编写，全岛发行。1956年因人员缺乏、经费亏空而停刊。1957年8月在国民党支部支持下复刊，并向当局正式申请备案。复刊后常刊登对台湾当局歌功颂德的文章，并进行反共宣传。同时也报道有关马岛各地侨社的消息。1959年11月由油印改为铅印，1960年8月将横排版改为竖排版。中马建交以及中国在马设立使馆后，仍发行了一段时间，1975年停刊。

目前，马达加斯加已没有正式出版的华文报刊，只有一些不定期专业性的华文出版物发行。那里的华侨、华人大都订阅毛里求斯出版的华文报纸。

总之，由于非洲华人人口不多，且大部分华裔已融合同化于当地，较富有家庭的子女多接受西方教育，加上这里普遍通用英、法、荷兰语，因此华文报纸的读者十分有限（多为老年读者），报刊的数量及规模也不如其他几个洲。

第六节新移民华文新闻业的特点及意义

这一时期，海外华文传媒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美、加、欧、澳、日，由于大批新移民涌入，其人数大大超过老华侨，华文传媒的创办者及其受众正在由老华侨向新移民转变；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战后新移民补充较少，华文报刊创办者及其受众情况与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些国家的读者群开始由老华侨为主转为以当地出生的华裔人士为主）。

新移民报刊的特点在于：

首先，与祖国的信息联系更加密切了。

老一代华侨、华人离开祖国多年，又大多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和祖国的联系已日渐疏远。加之中国大陆“文革”十年，与外界的联系几近中断，他们对祖国的了解就更加有限了。挥之不去的只是浓浓的思乡怀旧之情。在这种背景下，华文传媒就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解乡愁”的使命。在涉及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时，媒体着力于介绍它的风土人情、民间掌故，鲜活的信息和材料比较少。即便如此，华人已经是很满足了。如前述印度的两份华文报纸，“刊登的新闻实际上都是旧闻”，时效性比较差，但读者仍心向往之，说这是“我和我的华族背景之间仅存的惟一的联系”。

新移民则不同。他们离开祖国不久，与祖国的联系十分密切，况且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知识背景，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国家，因而更为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此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其变化引起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注目，来华投资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方方面面的情况，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

情况、投资环境等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适应这种需要，新移民报刊加大了对中国的报道力度，并拓宽了报道范围，过去旧华报没有涉及或无法涉及的一些方面也充分展示出来了。如许多报纸开辟了中国要闻栏目，并在重要的版面上予以突出处理，一些以经济报道为主的报纸（如《欧中经济报》）还开设了经济信息、经贸动态、市场点评、投资指南等栏目，为有意到大陆投资者提供信息服务。一些港台报纸也增加了对中国大陆的报道量，关于中国的话题不但有了新的内容，也更为深入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不但带来许多新的信息，使报纸显得鲜活而有生气，更加深了华侨华人及国外受众对中国的了解，加强了与中国的信息联系。

第二，大陆风格的报纸逐渐增多。

新移民报刊出现之前，海外华文传媒大都为老一代华侨、华人（多为港台移民）所办。与港台风格一脉相承，这些报刊几乎都是繁体、直排、左行文，语言上半文半白。由于它们符合老一代移民的需要和阅读习惯，因而有着较为广阔的读者市场。新一代移民虽然很大一部分仍来自港台，但其中数量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大陆移民。与此相应，也就出现了与老侨报风格迥异的、形式上更加“大陆化”的报纸。其特点是横排，右行文，语言简洁、直白。如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美国华文报刊《中国导报》、《中华经济时报》等，均为右行文，横排。有些报纸还一改繁体字的传统，使用了汉字简化字。如由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当地华人共同创办的《新世界时报》，在美国首次使用简化汉字排版。在大陆移民报刊的影响下，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也作出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并且增加了有关大陆新闻的报道。像《澳洲新报》这样的报纸在海外还

有不少。这说明，大陆移民作为一个群体，其地位在不断提高，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第三，读者范围进一步扩大。

海外华文报刊的读者一向较为单一：老一代的华文报刊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新一代港台报刊主要面向新一代的港台移民，其辐射面和影响力十分有限。新移民报刊（尤其是大陆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读者不仅限于来自大陆的新移民，还包括另外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此前移民海外的老华人和港台移民。如前所述，出于思乡之情和投资大陆的需要，他们会从大陆报纸中寻找安慰和寄托，寻找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另一部分是当地政府官员及民间人士。政府官员需要了解中国情况，作为其对华或对华人政策的依据；民间人士也在寻求各种合作并寻找新的商机，而新移民报刊恰恰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它的创办者来自中国大陆，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提供的信息具有引导性、针对性和参考价值。通过这些报刊了解中国，不但信息准确、快捷，也降低了成本。老的华文报纸是无法起到这方面的作用的。因为老的华文报纸的注意力仅限于本地，对外部世界较少注意；新的港台报纸较多反映港台地区的情况，对大陆的介绍较少，且为间接信息，缺乏参考价值。

当然，读者范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读者人数的增加。因为创办一份规模较大、覆盖面较广的媒体，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新移民报刊在这方面还缺乏优势，暂时无法与有着港、台背景的大报抗衡。即便如此，新移民报刊的作用与影响不容忽视，其市场潜力也不容低估。

这一时期的新移民传媒（主要是报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窗口，可以有效地起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作用。作为世界看中国的窗口，新移民传媒有着

国内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深入所在国社会、社区，与当地华侨华人、当地公民距离很近，可以和他們进行更为直接的信息交流；其次，由于受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官方背景在国外是与“不可信”联系在一起的，而新移民办报人多以民间身份出现，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其提供的信息可接受的程度自然也就比较高；再次，新移民报刊的创办者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其中的一些接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有着成熟的传播理念和根据受众心理策动传播的技巧，其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也就大大提高了。例如美国《侨报》总编辑范东升、西部版总裁谢一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原主编袁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们负责的媒体之所以受欢迎，与这方面的因素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看世界的窗口，新移民传媒同样有着国内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国内各大媒体虽然都有自己的驻外记者，但是由于身份、采访任务和题材所限，他们不可能对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报道）；况且他们多为单兵作战，缺乏群体效应；又是几年一换，缺乏稳定性。新移民报刊的创办者则不然。他们是作为所在国社群的一支存在的，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比较高，触角也更为广泛。正因为如此，有些报刊自创办之日起就把介绍所在国情况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任务。如加拿大的《加华新闻》提出，要把报纸办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认识加拿大的窗口”。借助于这个“窗口”，我国政府及民众可以更近地看世界，对华侨、华人所在各国情况具有更加全面、更为深入的了解。

其次，增进了两岸三地，尤其是两岸的了解与融合。尽管大陆与台湾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因长期隔绝造成的误解和偏见一直存在，“三通”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在海外，两岸华侨、华人及其报刊却已先期化敌对为融合。因为在外国国土

上，无论香港、台湾移民还是大陆移民，都是华族，华人，都是同一社区的群体，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认知都是相同的（少数除外），彼此间很容易达成交流与交融。因而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许多报纸（无论港、台、大陆）都以促进和平统一为宗旨。例如由一批台湾移民中的技术人员集资创办的美国洛杉矶《论坛报》（前身是《加州日报》），自创办之日起便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倾向，致力于促进中美和睦友好；由台湾同乡会主持的德国华文月刊《欧洲通讯》，也强调其宗旨为关心祖国，联络侨胞，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两岸报刊（海外报刊）不但有着共同的追求与目标，两岸新闻记者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早已开始。如美国华人政治家吴仙标说过，1983年他开展竞选活动时，左右派记者水火不容，拒绝同室采访；一年后，他们却乘同一辆采访巴士跟着他跑。^① 1988年夏，台湾联合报系在纽约的“美加新闻中心”和新华社联合国分社“有携家带眷的联谊活动”；1989年，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和中新社美国分社联合邀请纽约各派华文报刊负责人共度元宵节。可以说，在两岸关系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及其报刊先行一步，在彼此认识、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融合，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作了大量的铺垫性的工作（许多台胞投资大陆，就是经海外中转的）。这个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① 引自麦子：《美国华人社会大观》第124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第八章

结 论

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们在此提出四个结论、四个展望和四个建议。

第一节 四个结论

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影响的扩大。

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

《欧洲时报》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对此有人作过一个比喻：“正如澜苍江一样，

它在中国境内发源，流经中国的土地而成为中国的河流，但它蜿蜒进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以后，就称为湄公河了。尽管这条大河的源头在中国，但湄公河是属于它两岸的国家的。它汇集了这些国家的许多支流，就像中文报刊也吸收了这些国家的其他民族文化，又经过长年累月的交融，运动，质变，独立发展，因而使这些源自中国文化的中文报刊，具有了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系一样。虽然它不可能摆脱先天的中国文化的共性，但这也如湄公河不可能割断澜沧江水同一道理。善用这一江水，就可以造福两岸子民”。^①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的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

^① 王德海：《欧洲中文报刊史》载 1986 年 11 月 18 日《欧洲时报》。

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① 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正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 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

第二，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国强它强，国弱它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

二战以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发生过一些排华事件，有的甚至是流血事件。但目前这种现象已基本绝迹。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来看，当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也从排斥、限制转为利用、限制或兼容并蓄。在这种大的政策框架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当局，对待华人及其传媒采取了允许存在、鼓励发展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与各国在外交、

^① 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 1997 年第 5 期《国际新闻界》。

^② 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 1993 年 12 月 9 日《中央日报》。

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各国朝野对中国大陆及其传统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与此相适应，继中餐热、针灸热、武术热之后，一个学习中文的“华语热”在全球兴起。据香港《华人月刊》1990年第8期报道：90年代初期，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的上千所高等院校设立了中文系或中文专业，一些国家的中小学也开设了中文课程。海外华人和各国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习中文的学生超过百万人。

在亚洲，仅马来西亚就有60多家华文独立中学和100多家华文小学，马来族和印度族也掀起了学习华语的热潮。新加坡国立大学设有中文系，而在一般中、小学也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泰国政府已于1992年正式取消对华语的限制，把华文教育由小学一至四年级放宽到六年级，并允许华人社会创办华文大学。印尼政府严禁中文教育和中文书刊长达25年之久，与我国复交后，尤其是新政府（瓦希德政府）执政后，态度有所放松，为了吸引台湾投资，已允许台湾商人在开发区内开办中文学校。日本文部省把中文列为仅次于英文的第二外国语，全日本学习中文的人已逾10万。

在欧洲，除了已有半个多世纪中文教学历史的德国波恩大学外，其他大学也先后设立了汉语专业或汉语研究所，中学也开设了汉语选修课程。至于各个城市自己举办的函授学校、汉语中心等，更是不计其数。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据说比台湾大学中文系日夜班学生加起来还多近千名。意大利的中文热方兴未艾，学习中文的教学点和学生人数在欧洲首屈一指。1994年4月的俄罗斯《真理报》曾刊登《欧洲为什么学华语》一文，生动地阐述了华语在欧洲的重要性。

在美国，约200所大学开设了华语课，美国大学委员会和教育测量中心已经决定，从1994年起，将华文列为外语测验的语种，从而使华文成为美国学生申请大学入学资格的凭据之一。

些州还把中文列为中学的第二外国语。华语热也波及到加拿大。近一两年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的华文部，竟出现了学生报名排队的长龙，这是历年来少见的。

在澳大利亚，由于近年来华人移民迅速增加和政府采取“面向亚洲”的政策，政府拨出专款在全国 23 所大学开设中文、日文等亚洲语言系，不少中小学还将中文列为第一外国语。华语同时也成为一些大企业求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及在职训练的重要课程。

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在新的世纪里，华语很可能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第二语文”。这为华文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与此相关的是，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华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实力也大为增长。华人社区消费能力的遽增，使当地各大商业机构获得实在或潜在的客户市场，而这些遍地开花的商业机构又为华文媒体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广告，成为媒体存活和发展的生命线。与此同时，一些华人富商也纷纷投资传媒业，为华文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办媒体除了要有资金，也需要人才。近年华文传媒业之所以花团锦簇，与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一大批中国大陆新移民专业人士的到来是分不开的。出国之前，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大陆各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从事这一行业对他们来说是轻车熟路。而供过于求的状况，又使办报成本大为降低。这对华文媒体的发展是有利的。

应当承认，由于国别不同，各国政府对华人、华侨及华文传媒的政策不同，各地华人、华侨对华文报刊的需要也不尽相同，华文传媒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有些地区的华文报刊还没有形成规模，甚至没有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

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要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海外华文传媒也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

第三，海外存在着两岸三地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

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泊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唱反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

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

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天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一些在台方报纸工作的海外华文报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香港《九十年代》月刊 1985 年 9 月号刊登的一篇署名彭文逸的文章谈到“陆铿、张旭成、杨力宇等人与胡耀邦的关系”以及“陈香梅与蒋经国的关系”，并坦言：“说到海外文化工作者，我有一种难以置身事外的感觉”；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海外文化人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力正是苏联与东欧国家欠缺的”，因为“海外与域内之间那一种为我族类的群性联系是确实存在的，而这个联系不但是海外华人文化活动的基本内容，并且也是他们受到重视和能够发生影响力的理由”。

1980 年，邓小平曾为前来拜会的美籍华人陈树柏题赠鲁迅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他看来，海外华侨、华人是通达鲁迅诗中境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同他所希冀和预料的，20 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 年 8 月 26 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 60 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 600 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台军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

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①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第四，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

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

^① [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

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

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

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节 四个展望

在前述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以下四个趋势：

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 12 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 3 份日报和 1 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

·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 90 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 30 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 世纪 70 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 90 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国际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 80 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 90 年代中期已超过 30 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了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

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

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 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 3 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

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

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

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①

第三节 四个建议

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同此前有关海外华文传媒的其他研究一样，本课题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

^①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 94 页，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

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

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

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路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媒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

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参考书目

-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年版。
-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
-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版。
-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1-3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 年版。
-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版。
-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
- 冯子平：《海外春秋》 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
-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
- 戴子安：《华侨文教研究》 台北中正书局，1963 年版。
-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台〕正中书局，1998 年版。
- 巫乐华：《华侨史概要》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年版。
- 方雄普、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年版。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周南京：《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

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中正书局，1979年版。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杨力：《启迪与借鉴——新加坡华文报业的源与流》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出版，1996年版。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1998年版。

李凡：《孙中山全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0年版。

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洪渊源：《洪渊源自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陈辛仁主编：《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沈苏儒：《对外传播学概要》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传媒名录》，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主编，1997年版。

后记

《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的“九五”新闻学国家项目，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先生任负责人。承蒙先生信任，他将这一跨世纪的任务交给了我，嘱我独立完成。两年来，我在海外华文新闻业这片天地里涉流探源，爬梳剔抉，做了一次漫长的精神远游，试图从中探寻研究主体由古至今嬗进的历史根据，并试图在掇拾前贤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有所超迈。终于，在 21 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书稿杀青。这既是时间上的巧合，也是心灵的契合。就将它作为礼物，献给新的世纪，献给我的导师方汉奇教授。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原中国新闻社社长王士谷先生。士谷先生自 80 年代起即从事海外华文新闻业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内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本课题组的成员之一，他为这一研究项目提供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并以病弱之躯关心、关注着课题的进展情况。令人遗憾的是，他尚未来得及看到成果结项，便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怎不令人心痛！我们知道，对士谷先生最好的祭奠，就是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完成书稿，让他的精神风貌在本书中延续。

感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各方面资料的海内外朋友们，他们是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中国中旅集团常务理事孙兴盛、中国新闻社宋秉钧、《人民日报》

国际部记者王君超。作为本课题的项目鉴定专家，国家新闻出版署杨牧之副署长、广播学院新闻系赵玉明教授、清华大学传播系刘建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李彬副教授对本课题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特致谢意。研究生颜彦、连晓东为本课题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贾靖峰参与了本书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程曼丽

2001年2月1日

序

“海外华文传媒”，是对使用华文或华语，在海外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和播放的各类新闻传播媒体的总称。这些媒体以 3000 万海外华人华侨及其社区为服务对象。她们所使用的，是拥有 5000 年历史，有“21 世纪第一语言”之美称的汉语文及其方言。她们是海外炎黄子孙艰苦奋斗历史的见证者和纪录者，是海外华人华侨社会维系华夏文化，增加凝聚力的重要支柱，是海外华人华侨发表政见维护族群利益的舆论载体，是世界新闻传播体系中，极具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海外华文传媒发端于 19 世纪初叶。1815 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化的华文期刊。1854 年在旧金山创刊的《金山日新录》，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化的华文报纸。1856 年在萨克拉门托尔创刊的《沙架免度新录》，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化的华文日报。她们的出版，不仅在当时当地的华人华侨中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化报刊的诞生，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从 1815 年到今天，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 186 年的历史。她们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末，是初始发展的阶段；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的 70 年代，是逐步发展的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是加速发展的阶段。这种发展，和近现代华人华侨海外移民进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时至今日，海外的华文传媒已经

遍布以东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为主的全世界的 54 个国家，累计出版的报刊达 4245 家，累计创办的华语广播电台达 60 余家，累计创办的华语电视台达 35 家，累计创办的电子网络报刊达 30 多家（以上据本书和《国际新闻界》2000 年第 6 期所刊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报刊的量化分析》一文所作的统计。）其中，有的国家历年创办的华文报刊的累计数，已经超过同时期其他文种报刊的累计数，如新加坡；有的国家华文报刊目前的总销量，已经超过这个国家其他文种报刊的总销量之和，如马来西亚。（见前引王士谷文）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海内外新闻传播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有关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们现在还可以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等书中，看到那一时代的学者们在这方面积极耕耘的成绩。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发端。研究者们有所开拓，但还远远不够深入。大量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拥有众多华文传媒的新加坡成为这方面的重镇。涌现了以卓南生、陈蒙鹤、王慷鼎为代表的一大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出版了以《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章 1881—1912》、《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著。据王慷鼎先生 1994 年所作的统计，截止 1993 年，新加坡学者已完成的有关当地华文报刊的研究成果，就有专著 52 本，系统论文 11 篇，单篇论文 268 篇。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大量开展，则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情。方积根、胡文英、杨力、吴庆棠、王士谷等先生，都为这方面的研究作出过贡献，出版过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王士谷先生的工作尤其值得称道。他从 80 年代起，就致力于海外华文新闻史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题为《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的